

目 录

我的大学	(1)
塞北文苑萍踪	(7)
三十年代绥远的新诗歌运动	(28)
一、塞原社和新诗歌运动	(28)
二、绥远开展新诗歌运动中一场反形式主义的 争论	(36)
三、诗歌与新文字	(44)
绥东抗战时期的绥远文艺界	(52)
绥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70)
思念	
记绥东抗战时期外地来绥的两个年轻人	(79)
绥远社会日报副刊《洪荒》	(90)
三十年代绥远文艺界鸟瞰	(116)
抗战初期的绥远抗日救亡运动	(139)
一、芦沟桥事变到归绥沦陷	(139)
二、后套工作片断	(158)
三、投入党的怀抱	(182)
延安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	(209)
从延安到晋察冀	(221)
在晋察冀群众中播下艺术的种子	
——记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期乡艺训练班	(238)
回到绥远	(253)

我的大学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我是从爱好文艺而接近革命，走向革命的。我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满脑子英雄侠义的故事，幼小的心灵就有一种纯朴的正义感，想在社会上行侠仗义，抱打不平，扶危济困。考入中学后，又开始接触了新文艺，看得既多、又乱，几乎阅遍了我所能借到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书籍。我尤其酷爱创造社出版的刊物，创造季刊、周刊、月报，能买到就买了看，买不到就借着看。当时，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李初黎、郑伯奇、冯乃超、穆木天的文章和诗，以及蒋光慈、钱杏邨、沈端先的小说、诗文和翻译的小说，都是我爱读的作品。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也读过了，但是理解不深。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关于弃医学文的叙述，却对我影响最大。一九〇六年鲁迅看过一部电影，日本军队抓住一个中国人正要枪毙，旁边却围着一大群体魄健全的中国人在看，而看电影的日本学生竟高呼“万岁”，对于这种赤裸裸宣扬帝国主义的电影，鲁迅看后十分气愤，同时也悲愤地感到电影上那群中国人，是在“赏鉴”日本人杀中国人的“盛举”，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魄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因而认为要改造社会，拯救中国，学医并非一件紧要的事；“第一要紧是改变国民的精神，启发群众的觉悟，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决计要学文艺了。鲁迅弃医学文的动机和决心，更加鼓舞了我爱好文艺的志趣。此后也经常练习写一些短文，在校刊《丰州》和绥远

日报副刊上发表。1932年，即我在中山学院临毕业的那一年，还和同学白维新在绥远日报上办了一个副刊《星原》，又学着写些短文和诗。这样，我和白就认识了绥远日报副刊编辑许的洁。我们经常到报馆看他，他给我们讲他自己的经历，帮助我们修改文章。“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不战而失的消息传来，同学们悲愤至极，我满眼含泪地写了篇“溪畔哀歌”的诗文，抒发自己对祖国山河破碎的忧心，大声疾呼“振兴精神，挽救民族的危机”，以红叶的笔名发表在《星原》第十四期上。许的洁是东北人，东北沦陷后，他悲痛欲绝，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登台讲话，并用刀割破手指，写下了“誓死抗日，收复失地”几个血字。后来他辞职赴东北参加义勇军，许的洁对我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课余读了不少左翼作家和苏联的作品，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有些至今印象还很深。如华汗（阳翰笙）的《女囚》，男主人公是一个革命者，在统治阶级的法庭上，遭受敌人严刑拷打，仍无比坚定地说：“信仰就是我的生命！”最后为他的信仰壮烈牺牲。这本小书，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便把这句话和其他喜爱的文句抄录下来贴在床头作为座右铭。

一九三四年冬，我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弟弟和我，家庭生活的担子便压在了我的肩上。母亲托父亲的朋友，为我在绥远民众图书馆谋得一个事务员的职业。这个职业虽然薪金不多，却给了我一个读书学习的大好机会。我贪婪地抓紧读书，除文艺书籍外，还读了不少社会科学书籍和一些进步刊物，如《读书生活》、《现世界》、《自修大学》、《妇女生活》、《大众生活》、《新生》等。艾思奇同志写的有名的《大众哲学》，最初就是从《读书生活》上一期一期地读完，以后又买了单行本反复阅读的。这本书，对我的教育很大，开始懂得了如何生活和生活也可以改变的道理，提高了自己对人生的积极看法和态度，帮助自己接近了唯物论和逐渐树立了现实主义的人生观。

高沐鸿同志（解放初期曾任过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现任山西

省政协副主席)曾任过这个图书馆的馆长。可能因为他的缘故,藏书室虽然仅仅一间房子、七八个书架,却有很多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新兴文学的书籍,甚至《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资本论》、《经济学大纲》、《新教育大纲》(克鲁普斯卡娅著)、《唯物论辩证法教程》、《辩证唯物论入门》,这些书都有,我安慰自己,这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就是“我的大学”。我从大量阅读这些书刊中,受到革命的教育。这个时期我还读了许多革命家的传记和革命史。如《列宁与甘地》、《革命文豪高尔基》、《伟大人物的少年时代》、《列宁回忆录》、《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即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柏克曼的《狱中记》、《克鲁泡特金自传》、《俄国革命史》、《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法国大革命史》、《世界史纲》等。还有许多的苏联文艺论著和小说,如《新兴文艺论》、《伟大的十年间文学》、《铁流》、《赤恋》、《毁灭》、《士敏土》、《被开垦的处女地》、《十月》、《一周间》等和日本本间久雄著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小林多喜二的《蟹公船》等几十部世界名著,对自己影响很大。鼓舞最大、感人最深的是李蒂甘(即巴金)的《俄罗斯十女侠》。这是一本描述俄国革命运动中十个女革命家的故事,记得其中有苏菲亚·亚罗伯斯卡娅、薇娜·菲格念尔、沙苏丽奇等,有的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现在看来有些是民粹派或无政府主义者。当我看到那些女革命家为了俄罗斯人民的解放,脱离家庭,深入农村,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忍受统治者的各种残酷迫害和侮辱而视死如归,始终信心百倍,坚持不懈地奋斗。她们那种英勇的忘我牺牲精神,感动得自己每读一遍都要淌泪。尤其想到:生活在东北已经沦亡,祖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中国男儿,如不惕励奋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改造这不合理的社会而努力,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祖国,也愧对于那些俄国革命的女英雄。

尽管这个图书馆有这么多好书,可是在当时文化落后的绥

远，人们还不懂得很好利用它，到这个图书馆借书看的人很少，只是阅报室经常挤满了人。除了附近旅社住的几个外乡客人，为了消磨旅途寂寞的时光，借两本小说看看外，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借书。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日报》副刊上，鼓励青年们到图书馆看书。一篇是《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举出，凡是到过北平图书馆的人，都会看到每天那儿云集着各式各样的人，有年轻的小伙子，有年老的学者、教授，还有以卖文为生的作家和买不起参考书的贫苦学生……总之，尽是些求知欲旺盛的人们，他们为了充实自己或者为了钻研某个问题，终日埋头在书堆中，把图书馆看成知识的宝库，书籍是他们最亲密的友人，好学的习惯和探索真理的愿望，使他们在典籍中找到了乐趣，甚至有人说：“如果有饭吃，环境许可的话，就是在这儿呆一辈子也愿意。”可是在绥远却大大不同了，归绥虽然也有两三个图书馆，但是每天去看书的却寥若晨星，据一位在绥远较大的图书馆作事的朋友说：他们每月统计，借书的也不过百十人次，平均每天才二人次多，这与北平图书馆读者拥挤的情况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当然有些劳动人民，为了生计，整天奔波，哪有功夫到图书馆看书；但是一般青年却也糊里糊涂混日子，真是可惜！那些既有固定职业，又有靠山，生活无忧无虑的人们，有时间宁可打几圈麻将，也懒得看书；而有些所谓上层人物，每天则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报纸也不翻，还看什么书。甚至有一位爱写些文章的朋友，也没有养成经常看书的习惯。苏联文学顾问会在给初学写作者的信中说：“书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助手和导师。”其实不只青年作家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就是一般青年也应该和书籍接近，养成读书的习惯，从中寻找走向幸福生活的人生大道。如最近读书生活社出版的几种书籍，便都是我们应该仔细读读的。在这整个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个人生活时时都处在不安定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如何来应付这个非常时期的环境，如何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都需要得到一些正确的指

导，而这些书籍便是用通俗的文字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的种种事物，正确地指导我们，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结尾写道：“养成读书的习惯吧！如果稍微有所选择的话，‘开卷有益’这句口头禅是含有一定道理的。”第二篇文章是《书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介绍一个图书馆》，着重谈读书对于一个青年作家的重要，引用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写作者信中的话：“一个初学写作者，能每日留心阅读，以加深他的教养，扩大他的眼见，充实生活经验，增广语汇等等。”又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爱读书的，如高尔基、巴比塞等，也都把读书当作一种嗜好！”这就是说一个初学写作者如果不养成一个爱读书的好习惯，不从过去及现在的那些伟大作品里吸取营养，学习写作技巧，研究作品的成败，想成为一个好的伟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养成读书习惯对一个作家是如何重要，一个青年作家应该和图书馆发生密切的关系。接着，我介绍了我工作的绥远民众图书馆，把它收藏着世界文学中许多伟大作家的不朽名著的书名，加以推荐，并指出这个图书馆还有很多社会科学的好书和进步刊物，希望青年作家和要求进步的青年，都和这个图书馆发生密切的关系，来这里挖掘我们智慧的宝藏。

因为工作不忙，我每天除了把阅览室的旧报纸换上新报纸，或者为来借书的读者取书外（本来这是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可是这位拿薪不干事的管理员是根本不上班的），就是读书了。这个藏着许多革命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的小小图书馆，真正成了“我的大学”，它大大加强了我本来很浅薄的文学基础和修养，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使我决心坚强地生活下去，在社会上做些有益的事情，献身于自己当时思想上的一种朦胧的革命理想。于是我用自己年轻人的满腔热血，以叶频、红叶、伊宁、叶君萍、晓风、格尔、姜一萍、姜平、林菱、卓英、薇妮、音石、音式、托流、浪涛、敬英、阿玉、也平、君频、绚绮等笔名，几年来，写了大量诗文，并且和几个爱好文艺的年轻朋友办刊物、编诗刊、组织读

书会、成立剧社、演出话剧，从事了一些进步的文化活动；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牺牲救国同盟会，发起组织抗日救亡的文艺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救亡工作。我感谢“我的大学”，从她那里出来，我勇敢地进入现实生活中更高更大的学府——光明和黑暗激烈斗争的人间世界。

塞北文苑萍踪

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间，我从北平回到了绥远。那时，正是归绥党的组织被破坏，苏谦益、杨茂盛（杨叶澎）、韩尚宽（韩燕如）等同志被捕后一年左右。

回来之前，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升学，我便集中精力在北平学习日文。因为日文较容易学，我爱好文艺，想掌握日文后能多读点世界名著。另外，有人把我介绍给杨梅竹斜街三十一号世界语书店的主人，一位热情的世界语学者张佩苍先生，他愿意教我世界语，还说：“世界语是团结全世界被压迫大众的良好工具”，“学好世界语可以在整个地球上任何地方找到通讯对象”。于是我上午学日文，下午学世界语。经过半年多的勤奋学习，这两种文字，我基本上都能翻字典看些浅显的书报了。本来还打算再继续学习两个月，巩固巩固，以便回来后能够自学看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因用功过度，头痛病又犯了，加上经济拮据，吃饭都成问题。而两个月前我给在绥远新闻界工作的同学袁尘影寄回二十几首诗，托他转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希望发表后能得到一些稿费维持生活，继续学习。可是，除了尘影收到我的诗后，给我写过一封信外，诗歌的出路却杳无音讯。于是，我便把刚到北平时买的书桌、凳子等变卖了，还凑不够路费，又借了点钱，才回到了绥远。

回来后，尘影告诉我，我寄给他的那一束诗，已经在杨令德先生编的副刊《十字街头》上陆续发表了，还给我八元稿费。手拿着稿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如果回绥前，我能得到这些稿费，也许还可以在北平继续学习两个月，把日文和世界语巩

固巩固呢。

袁尘影是我在中山学院读书时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他从小受到他舅父杨令德先生的教导鼓励和文学熏陶，在校时，就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有“小文豪”之称。尘影人很聪明，喜爱文艺，读的书很多，特别喜欢读巴金的作品。我最初读巴金的《灭亡》、《家》、《海底梦》，就是从他那里借到的。我们几乎把巴金的著作都读过了，很受巴金作品中一些人物的革命激情所感染。记得我们最初从《文学季刊》上读巴金署名欧阳镜蓉的“龙眼花开的时候”这篇小说时，书中有一个革命的名词“轮值”，就是说：当一个革命者为革命刺杀一个反动统治者，或者为了完成某一项革命行动，而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时，就是他“轮值”的时候。我和尘影、李月轩（即李柯、女、党员；任白戈同志的爱人）、周瑞波（李柯的女友，是南开大学进步的学生，因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为了免遭逮捕，来绥远躲避，后到日本留学）一起谈到这个作品时，还很激动地说：“什么时候该是我们‘轮值’的时候呢？”当李柯、瑞波离绥后，我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龙眼花开的时候”，其中回顾我们当时读这篇小说的情景时说：“……我们以怎样一颗赤热的年轻人的心，读一篇描写未来我们年轻人自己建造一个新世界，其间的斗争生活的故事，我们觉得那是我们这一代人未来的写照，我们总有一天会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献给我们的时代。……”当时大家都朦胧地有一种为革命而准备献身的决心。但是，对巴金作品中那些人物，以暗杀一个反动统治者而又不能动摇其统治，却牺牲了自己的作法也不以为然。

袁尘影当时是《绥远日报》、《绥远新闻社》的记者，并且帮助他舅父杨令德先生编绥远《社会日报》的副刊。我回到家里，既是失学，也是失业，有的仅是时间，于是，我就经常和袁尘影在一起。白天我俩常跑书店，或一同到新城中山学院找英文教师、诗人李穆女；晚上到《绥远新闻社》。新闻社是一个发本

市消息的通讯社，每天出两三张蜡纸的油印新闻稿，供各报采用。编辑部和《社会日报》编辑部在一起，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机构。编辑部只有一间房子，一个长条办公桌，可对坐五六个人。隔壁是个两间大的客厅，放着一台收音机，供《社会日报》收记录新闻用。紧东边是一间客房，有土炕，可以住人。范长江、孟秋江、潘纪文同志等在一九三七年都在这里住过。新闻社订有很多报纸，有上海的《大公报》、天津《庸报》、《益世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等全国的一些有名的报纸。晚上，尘影写新闻稿，我就看报纸。这样过了不多久，我就和绥远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老前辈——《社会日报》和新闻社的总编辑杨令德先生以及新闻社的其他同人逐渐熟识了。

除了和尘影一起活动外，这个时期我每天早晨和上午仍然坚持学习日文和世界语，有时也看些文艺书籍，写写诗，偶尔还写一些读后感之类的书报评介。记得我当时反复读过一本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的《深渊下的人们》，这是一部描写伦敦贫民的悲惨生活，暴露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书，作者为写此书，冒着生命的危险，亲自深入到一般人认为非常可怕的伦敦东市梢，和那里的贫苦人民生活在一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一切，也曾和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晚上同宿在公园的椅子上，半夜又被警察赶走。……读后，我颇受感动，认识到世界上到处都是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多么不合理啊！我激动的心，促使我写了一篇读后感的文章，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十字街头》。当时，我深有所感地想着，如果我们有一个团体，有一个阵地，能经常不断地用诗文为人民说话，那该多好啊！

那时，东北三省已沦亡了三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国家民族正值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时绥远地区危机四伏，政治和文化处于令人窒息的沉闷之中，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谁甘心生活在那黑暗阴郁的日子里。我和佩莹（武达平）、袁尘影、李穆女既是至交好友，又都是爱好文艺的青年，我们经

常在一起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不甘心沉默落后的心情，我们便从左翼文艺作品和进步报刊寻找慰藉，一起探索人生的道路。在党的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终于，我们将满腔的愤懑燃烧起来，化作熊熊热情，投身于进步的文化工作中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间的一天下午，我和尘影、佩莹（他也是我的同学，和尘影同班，也喜爱文艺，经常在报上发表诗文，他在一九三三年就参加了党，同年在绥远中山学院读书时，因中共归绥县委被破坏，苏谦益同志等被捕，他闻讯和反帝大同盟盟员任双弼同志一起到乡下躲避了一个时期，后又偷偷返校学习。这时他们虽然失掉党和同盟的组织关系，但仍然联络进步青年组织文艺团体，出刊物写文章，传播进步思想。）一起到中山学院李穆女那里。看到桌上一叠稿纸，还有写好的两三首诗。大家一面传看，一面议论起绥远的文艺界，一致认为最近绥远文艺界太沉闷了，我们应该使它活跃起来，于是又谈到办刊物的事。原来尘影、佩莹和任双弼曾借《社会日报》副刊，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创刊《塞原》文艺旬刊一种，次年五月十四日出了第十六期后，已有三四个月未出了。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振作精神，负起开拓这块荒芜的文艺园地的责任，便决定重新组织“塞原社”。

关于塞原社和《塞原》

塞原社以我们四人为主，准备逐渐扩大发展些社员，吸收更多的人写稿，并商量另借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十字街头》的版面，恢复《塞原》文艺旬刊。借《十字街头》园地的事，由尘影和他舅父杨令德先生交涉。很快交涉成功了。于是，大家积极写稿，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在《民国日报》四版上复刊，算是第十七期。我们四人还摄影留念。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解放时，我回到故乡，在中共归绥市委工作。那时，我母亲还健在，在她老人家保存的一些

像片中找到了这张照片，上面还有我当年写的“塞原社同人合影，一九三四年九月摄”等字样。可惜，这张照片，在十年动乱中遗失了。

《塞原》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前后四年共出过近五十期，内容有：小说、散文、诗歌、论文、书报评介、翻译等。尘影是塞原社的主将，长于写散文，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百灵庙行”、“塞外杂写”等几组散文和书评，发表在《塞原》和《申报》的《自由谈》、《申报月刊》上。《塞原》的主要撰稿人除尘影、穆女、佩莹和我外，还有芙茵（即袁烙，现西安晚报负责人）、葛垒、北虹（刘映元）、李曼霖、魏列等，《大公报》名记者徐盈也给《塞原》写过稿。最初，我们把稿件集中后，由尘影送往报馆。一九三四年冬，穆女离绥后，佩莹住在车站，相隔较远，到旧城不方便，就由尘影和我发稿。在尘影外出采访，特别是东渡日本学习后，编辑的责任就全压在我肩上了。也正因为塞原社同人东走西散，稿件不易凑齐，从一九三六年后半年起《塞原》就不能按期出版，往往延期成为不定期刊了。当杨令德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因为在《边防文垒》发表美国记者斯诺的《与毛泽东会谈记》，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电追查责任，而被撤职后，塞原社同人写的文章和出刊的《塞原》、《塞北诗草》，就都不能在《西北日报》发表和出刊了。

这里，我还应该谈谈穆女，他原名李伟昌，是广西人，叔父是华侨。还是在北平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时，他就翻译过一本《抒情诗》，以穆女的笔名在北平出版。一九三二年下学期他到中山学院任英语教师，便常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和诗，颇有学问和才气。他的诗受西洋诗的影响很深，常写十四行诗，讲究音节、节奏、韵脚和形式的整齐。有一次，我和尘影、佩莹去看他，李柯、瑞波也去了。他从饭馆要了几个菜招待我们。饭前，他拿出他发表过的几首诗让我看，问我喜欢哪一首，我看后说我

喜欢题名“祷告”的一首十四行诗，他说他也喜欢这一首，原诗是：

没有一颗辛酸的眼泪，不是从
我的刺伤了的心头上喷涌；
没有一缕凄痛的咽声，不是在
我的哭哑了的喉咙上迸来。
假如有一天，流尽了我的眼泪，
假如有一天，动不了我的喉颤，
那我漫天的幽恨，将永远，
会在我的肚子里打闷转，
也将没有一个人；可怜
我这个孤零人，有恨不能言。

上帝啊！我是十分地诚虔，
对你诉说我所希望的心愿：
“我宁愿爱我的人一箭过来把心口射穿，
我不愿这样永在涕泣和幽怨里打闷转。”

在这之前，我们几个人写的诗都很注重形式，有些就是豆腐块式的。在一九三四年秋后，才逐渐改变了这种诗风。

后来穆女还以这首诗为主题写了篇散文，文章开始就是这首诗，他通过到教堂做礼拜发泄对社会的愤懑和不平。叙述他从故都来到这荒凉的塞外，原想多体验些现实生活，结果，刚来就遭到一些卑劣、嫉妒和恶毒的眼光，于是他借牧师的一句话：“我们人类的罪恶，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他把自己的意志当做神，当做上帝。“谢谢上帝，我的意志，把我从历代祖先遗传下来的那些卑劣的观念形态中，拯救出来并帮助我去克服那些残毒的魔鬼。”可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战胜那些魔鬼。一九

三四年下学期，他在中山学院的课程还没有教完，就被迫匆匆地提前离开绥远回到北平，后来又到了浙江。刚去，还和我们通讯联系，寄些诗来，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就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穆女和尘影离开绥远后，塞原社主要成员只剩下佩莹和我了。

为了开展新诗歌运动，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塞原社曾组织了一个诗歌研究会，并出版《塞北诗草》，由我主编（详见另文介绍）。

塞原社编辑出版的《塞原》文艺旬刊是当时绥远文坛历史最长的一个纯文艺刊物，也是当时绥远文艺刊物中质量比较高的刊物之一，在荒芜的绥远文苑中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西北日报》副刊《塞风》上曾发表过刘浪萍的一篇文章“杂谈绥远文艺界”，认为在当时沉闷的绥远文艺界“值得叙述和推荐的要算这一年来崭露头角，异军突起的塞原社所出的文艺旬刊《塞原》了。从天津《庸报》的《另外一页》看到一篇很长的关于由该社发起举行的文艺茶话会素描，也可看到该社的努力以及生气活跃的气象了。再由几次的发刊‘新诗歌专号’虽然有些不成熟的作品，但明白了：‘一切的缺点和错误都可由创作实践中得以解决’，该刊的努力，也很使我们钦佩了。总之，在荒芜的绥远文艺界该社总算做了一些较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了”。另外由洪深、沈起予在上海主编的《光明》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读者之页，绥远青年诗人刘映元写给洪深先生的信中，介绍绥远文艺界的情况时说：“塞原社是绥远文坛的巨星，出刊《塞原》和《塞北诗草》两种刊物，内容丰美……”等等，当然，他们这样说也未免过誉了。但多少也可以看出塞原社和《塞原》当时在绥远文艺界的作用和影响。

塞原社举行的一次文艺茶话会

为了加强绥远文艺界的联系，增进从事写作和文艺爱好者的团结和友谊，塞原社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举行了一次在归绥说来是盛况空前的文艺茶话会。

事前，我们作了些准备，发函归绥各文艺团体和有关人士请他们参加文艺茶话会，并亲自去霍佩心、杨令德、李这副等一些先生处，向他们说明我们这次举行茶话会的目的，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并请他们到会发言。此外，还专函邀请了几位在创作上有经验的先生作专题发言。开会前两天，我们还在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十字街头》，登了两天关于举行文艺茶话会的启事，邀请爱好文艺者届时参加。

茶话会是在绥远新闻社的客厅里举行的。

开会的那天，我们来得很早，我和新闻社送报的老杨布置会场，穆女和尘影、佩莹一块出去买茶点和花生、瓜子，他们抱着十来大包东西回来了。感谢新闻社的帮助，在大厅里，摆了一条长桌，上面覆盖着雪白的桌布，还放了两瓶新鲜的纸花，显得又洁净又雅致。

参加茶话会的人很踊跃，凡是归绥所有的文艺团体和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都来了，有些是看到了启事而来的，共四十五人。

尘影先讲开会的意义。他说：“塞原社今天召开这次小小的文艺茶话会，我们没有登高一呼的企图，只因为我们自己缺乏写作经验，所以邀请各位先生来这里给我们以正确的指导罢了。倘若因为这个小小的茶话会，引起归绥文艺界的经常联系和更好的团结或者能够使类似今天这样的会，在今后不断地举行，那就算是我们抛砖引玉的一点希望了……”

接着便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请预先约好的几位先生给我们讲些关于写作的经验。第一位起来讲的是霍佩心先生，原来请他

讲“我写诗的经验”。霍先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当时是归绥第一中学的校长，经常写诗译诗在报上发表。但他很客气，没有讲写诗的经验，只是说：“在国外也常举行这样的文艺茶话会，由各人朗读自己的诗或其他的作品，然后再由大家互相批评，互相研究，这样，对于大家都有莫大的益处。我希望今天这个文艺茶话会，以后能够扩大起来，并能够继续举行下去。”

霍先生讲话时的语气、态度是诚恳的，虽然他很客气，没有讲他写诗的经验，但这一点诚恳的盛意，也是难得的。

第二位起来讲的是《朝报》的金先生，题目是“填词的我见”。

接着一位张先生谈了谈对于绥远艺术界的希望：“过去，绥远因为环境的关系，不知埋没了多少作家，倘若由这个文艺茶话会，扩大起来，组织一个更大的文艺团体或者加强彼此联系，那么，绥远艺术界，将来是很有希望的。”

然后，绥中语文教师李玮女士发言，她的题目是“我对于旧诗的意见”。她说：“……我们把旧诗拿来欣赏则可，从旧诗中还可研究古人的生活、时代以及其作品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现在拿起笔来作旧诗，那是不必的，特别是青年人不应该作旧诗，因为时代不同的缘故。”她对旧诗的意见，穆女和我是非常赞同的，我是由于自己不懂旧诗，穆女则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旧诗哪能够去表现现代人的复杂的意识呢！

与李女士所讲的有连带关系的，是籍雨农先生所讲的“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籍先生说：

“中国过去的艺术，受古典主义的毒害最深。一般作品，只注重于形式上的美丽，而忘却了内容的重要。形式与内容，对于一篇作品固然是缺一不可，但比较起来说，内容是更重要些，也可以说，内容是规定形式的。”这些话很中肯、扼要。当时，还有许多人，仍专在“形式”上去追求，所得的结果，只是些毫无

生命的作品而已。

茶话会上，杨令德先生也谈了谈他多年来“关于编剧刊的经验”。

此外，郭灵墅先生也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一点希望，他讲得很短，但提出了很正确的见解：

“文艺是时代的产物，凡从事文艺的作家，都应负起推动这个时代前进的责任！”

大家一个接一个发言，会议进行得十分热烈，天已很晚了，会议还没开完。会议结束前，绥中美术老师李这副先生为与会者弹奏琵琶——“梅花三弄”。李先生对琵琶很有研究，奏起来，一时叮叮咚咚，声韵婉转悠扬，如急风，如骤雨，使人听了大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妙。李先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弹完了琵琶大家又请他清唱，一时掌声雷动，于是李先生只好又唱了一段。此外，还有霍世昌先生也唱了俄国民歌《伏尔加船夫曲》。

最后，塞原社请大家合影留念，并把最近几期《塞原》分发给参加会议的人，请他们指正并为《塞原》写稿。

这次会议反映还不错，来宾给我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不仅使我们几个人得益不少，就是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也有很大好处。同时，也扩大了塞原社的影响，引起更多人对《塞原》的关心。

会后，《塞原》第二十五期，还为这次茶话会出了专页。同时，还有人以梅君的笔名给天津《庸报》的《另外一页》写了标题为“绥远归化文艺界——突起的新姿态，塞原社举行文艺茶话会素描”的长篇通讯，连载四天，并附有照片。

塞原社的思想倾向及其存在

塞原社虽然不是党的直接领导下的文艺组织，但是，共产党员武达平同志（失掉组织关系）在塞原社起了积极的组织推动

作用，写了不少诗和文章，是塞原社的骨干之一。同时塞原社一直受左联领导下出版的进步书刊和作家的影响。当时，我们也曾几次试图寻找党，可是，自从一九三三年三月归绥党的组织被破坏以后，到“七·七”事变前，归绥以东就再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当时，党的绥远工委书记李衡同志和他爱人孔祥云在包头以开设成衣铺为掩护，经常在包头、后套扒子铺隆一带活动。塞原社比较活跃的时期，苏谦益、杨植霖、杨叶澎、韩燕如等同志均被关在监狱里。一九三六年七月前后，他们相继出狱。杨植霖同志出狱较早，也是在一九三六年后半年才到了归绥。他们都给塞原社办的刊物《塞原》、《塞北诗草》和我们编的《社会日报》副刊投过稿。杨植霖同志写过几篇杂文和诗。记得有几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战士的态度”、“死硬派”、“闲话‘幽默’”；杨叶澎同志主要是以通俗的文字介绍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苏谦益同志写过两篇短文；韩燕如同志寄过几首诗。他们用的都是笔名，风格虽然不同，而诗文的内容都是比较激进的，给我们坚持现实主义的文艺方向，鼓舞很大，也增添了我们把刊物办得更富有时代精神的勇气和信心。

塞原社成立之后，塞原社的几名成员在创作上都很勤奋。我们除写了不少诗歌、散文，还根据需要写书报评介、影评和不少关于新诗歌运动的文章，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在我们自己的刊物上，同时，还向绥远《西北日报》和《社会日报》的副刊投稿。当时，报纸本身的副刊都有稿酬，《西北日报》副刊稿费比较优厚，而《社会日报》副刊稿费最少。至于借副刊版面出的刊物，则均无稿费，只不过每期给赠印若干份单页而已。塞原社办的刊物，虽无稿酬，但敢于说真话，方向明确，形式多样，版面活泼新颖，又富于自由民主的气息，颇受读者欢迎。所以，当时绥远的一些知名的文艺人士和进步的中学生都愿给《塞原》、《塞北诗草》写稿。

现在，如果回顾一下塞原社的活动，从它发表过的作品倾

向来说，是一个思想进步的文艺团体。它办过几个进步的刊物，发表过一些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腐朽，反映大众生活的疾苦与呼声，要求进步，追求自由和光明，鼓励人们和生活斗争的诗文。这样一个文艺团体，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能够存在，并能利用当时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开辟副刊，阐明自己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和现实主义的文艺见解，好象使人有点不解。其实，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看，是不足为奇的。从一个报纸的政治背景和其文艺副刊之间的关系来说，在三十年代，曾任过《大公报》文艺编辑的萧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中国报业史或新文艺运动史的研究者在回顾三十年代，可能会发现这么一种奇特的现象：许多具有反动政治背景及倾向的报纸，其文艺副刊的编辑方针，往往并不同该报社论亦步亦趋，有的甚至会背道而驰——即是说，同一家报纸，在社论及新闻处理上把实行不抵抗主义的南京蒋政权捧为神明，又在侵略者已跨进关内时还满口‘友邦’，然而它的文艺副刊却洒着东北人民的血泪，声嘶力竭地呐喊着，不当奴隶，要抵抗。”（新文学史料第二辑萧乾，《鱼饵·论坛·阵地》）当时，绥远有些报纸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

其次，当时文化落后的绥远，国民党和绥远省政府在文化上的统治也是比较松的，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亲日派的头子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华北五省（包括绥远）的国民党党部撤消后，绥远当局对文化的控制更加放松。当时统治阶级的一些上层人物，每日花天酒地，腾云驾雾（吸食鸦片烟），过着醉生梦死、腐化堕落的生活。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就是看报也是看看大标题和一些无聊的桃色新闻，更很少看副刊的文章。因为绥远没有职业文人，更没有著名作家，给报纸投稿的较多的是一些中学生。大概那些大人先生们认为不值得一读，所以也发现不了问题，比如我在《塞原》复刊后发表的第一首诗“啊！黄鹤楼”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现在到处又充满白色的恐怖，
人们饱尝着颠沛流离的痛苦，
虽然还没有在狱中被囚，
自由的空气已久不能呼。
天灾人祸围绕着四周，
还有帝国主义的外忧，
于是青年都走向革命的道路，
为着永恒的真理奋斗，
这是啊，我们唯一的生路。

啊，黄鹤楼！黄鹤楼！
离开你已有一年之久，
这一年人们仍然在灾害中愁苦，
但愿，但愿我们再见的时候，
凯旋的旗帜高悬楼头，
扬子江涤尽我们民族的耻辱，
群众在革命声中获得自由！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塞原》第十八期）

此外，《塞原》上还发表过一些很明显的思想左倾的诗文，也都没有引起什么麻烦。就是在苏谦益同志被捕前一年，他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普罗利塔利亚的文学”和以后我在《洪荒》上转载过一篇“三个女游击队员”等十分露骨“红”的文章，也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绥远国民党政府在文化上的统治，不象上海、南京、武汉、平津等大城市控制的那么严密。就是杨令德先生编《西北日报》副刊时，《边防文垒》刊登小侠译的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的“斯诺与毛泽东会谈记”连载三期，在绥远也没有引起什么风波。还是杨先生的老乡，托县人金肇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工作，看到这篇

译文，便报告他的主子邀功请赏，才引起国民党中央来电追查，也仅仅以撤掉了杨先生《西北日报》副刊编辑的职务了事。

再次就塞原社同人和绥远《民国日报》（后改为《西北日报》）副刊编辑杨令德先生的关系来说，杨先生是尘影的舅父；武达平、我和杨先生都是热心世界语者；达平和杨先生又是托县同乡，而我虽然生长在呼市，在中山学院初师读书时，因为父亲的籍贯是托县，我也参加了托县同乡会。由于这些关系，当我们在《民国日报》副刊上恢复《塞原》时，得到了杨先生的大力支持，很快就出刊了。我同尘影也常到杨先生家，而杨先生夫人谢汝珍，又是我中、小学时的同学谢振宇的姐姐，我们很早就认识，所以到了杨先生家也并不感到拘束。特别因为我和尘影的友谊较深，杨先生当时把我同尘影一样是以子侄辈相待的，所以无论我们以后创办《塞北诗草》，或者给杨先生编的副刊《十字街头》、《塞风》（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签订后，绥远《民国日报》改为《西北日报》，副刊也把《十字街头》改为《塞风》）投稿，杨先生都积极支持给予方便的。

“漠南剧团”与《新女性》等

一九三五年冬，我和尘影认识了凌信子和当时绥远饭店的两位青年工人，一个叫锦亮，另一个名字记不得了，一位是烤面包的，一位是做西餐的。凌信子是南方人，普通话讲得很好，矮个子，脸色微黄，尖下巴。当时他也在绥远饭店做接待客人的工作，人很热情。尘影因为是记者，常到绥远饭店采访开会，和他认识了。尘影还请我到绥远饭店尝过一次西餐，并且在那里认识了凌信子和那两位青年工人。此后，凌信子从旧城北门经过时，也常到图书馆和我一起谈谈。他怎么来绥远的我没有问过他，但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凌信子从事过长期的话剧工作，参加过《南国社》，和陈凝秋、应云卫、魏鹤龄等一起演过话剧，有

很丰富的舞台演出经验。就在我们认识的那天，凌信子又一次提出并和我们商议在绥远成立剧团的事，因为以前他已经和尘影谈到过了。记得那天他在谈到他过去从事戏剧活动时，就给我们朗诵起“苏州夜话”的台词，熟练到几乎能把台词对话完全背下来的程度，从声调表情也可以看出他在表演艺术方面有相当的造诣。

经过几次商量，我们一起组织了“漠南剧团”，并且确定了一九三六年春节公演一次。开始排练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莫利哀的“可怜的裴迦”，菊池宽的“父归”。我和尘影与那两位青年工人都参加演出。另外，凌信子还邀请了两位女士和我们一起演出。我参加排练了“青春的悲哀”和“可怜的裴迦”两剧中的男主角，尘影参加排练“父归”中的父亲，凌信子自然是导演和主要演员，他除了个别辅导我们，甚至帮助我们一字一句的读台词，还集体排演了几次。演出时，得到了民众教育馆的大力帮助，就在“九·一八”纪念堂（即现在呼市文化宫的基础，日军侵占归绥后给炸毁了，但基础和四个立柱还在，解放后归绥市工人、干部以义务劳动修建了工人文化宫，现在的工人文化宫是以后又重新修建的）演出。布景也很简单，服装只借了两套西服，其他都是自己准备。除凌信子和那两位工人有舞台演出经验外，我们几个都是破天荒第一次上台，有的上台后紧张得把台词几乎都忘了，不是他们几位老练的内行，那是要砸锅的。第二天正要演出“父归”的时候，突然有一位饰配角的演员临时不能演出，大家就让我上台凑数，我只好后台问了问我代演的这个角色有什么台词，就匆匆上台了，可是上台后紧张得把台词又忘了一半，幸亏凌信子在旁边悄悄地提词，才勉强把这场戏演完。

这次演出虽然不很理想，但也打破了绥远文化界当时沉闷的空气，给一池死水般的塞外，投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子，而且演出三天，场场满座，充分说明当时人们文化娱乐生活实在太贫乏了。演出后，绥远几家报纸的副刊都发表了评论，大家认为这几

个剧的内容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人们的通病，对群众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就“可怜的裴迦”一剧来说，劝人不要酗酒是无可非议的，但规劝的方法值得研究。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西北日报》副刊《寒风》还有一位林之雨先生写文章评论这次演出，认为“青春的悲哀”一剧影射当时社会的现实，对人民群众尽到了启发教育的作用；“可怜的裴迦”是一个译剧，性质是一个轻松的喜剧，内容述说一个男人酗酒，而以妒忌来医治，缺乏积极的意义。这次演出后，我经过凌信子介绍，还和在太原搞戏剧运动的张季纯同志通过一两次信。当时我们还准备继续活动下去，可惜以后因为其他工作忙，我们又不善于表演，那两位女演员也因为家庭关系，不能经常参加，又没有适合的剧本，就没有继续排演新的节目。“漠南剧团”虽然继续存在着，但以后再没有演出，只是在绥东抗战后，陈波儿领导下的上海妇女儿童慰问团和太原“新生剧院”来绥慰问演出时，我和他们有过一些接触，并且在《洪荒》上为他们出过二期特辑。我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还在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办过一个刊物《西北戏剧》，内容为：有关戏剧的文章，剧人介绍，剧运消息等，撰稿者除我用晓风、林菱、卓英、托流等笔名外，还有梅子、苏友、克夫、敏达、袁尚等，尘影还从日本寄回“《日出》上演在东京”、“海外通讯”、“关于《复活》在东京”三篇文章，剧人介绍除介绍了田汉、欧阳予倩等，还介绍了宋一舟（即宋之的，他曾在绥远归绥中学十八班读过书）。《西北戏剧》到“七·七”事变前共出过九期。“七·七事变”前，凌信子离开了绥远，到太原参加了“西北剧社”。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曾打听过他，据说他在晋西北根据地剧协工作。这位热心戏剧运动的戏剧家后来怎么样呢？我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按说让我和尘影上台演戏，那真是打鸭子上架的事，但是我们竟然上台参加演出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抱有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决心献身于我们理想的事业，要改造这不合理的社会，那就应该踏踏实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特别是在这各方面都很落

后的绥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虽然幼稚、浅薄，懂得很少，但是在没有别人做的情况下，从我们做起，哪怕是抛砖引玉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事了许多活动，我们不但组织剧团，上台演戏，同时为了推动绥远的妇女工作和学生运动，我们还创办过两个刊物：《新女性》和《学校生活》。

《新女性》周刊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创刊的。请杨令德先生提的报头，我以主编卓英的笔名写了发刊词，尘影写了一篇“绥远的妇女生活”。第二、三期也是我们俩写的稿子。我试写的小说“菊姊”就是从第二期开始发表的。原来我们想把这个刊物办起来之后，交给女师同学继续办下去，但是和我们熟识的几位女同学怕写稿的人少，坚持不了，不愿接办。正在这个时候，李月轩和毛菊从日本来信说，在东京留学生中进步的女同学，计划在国内外西北、华中、华南办三个妇女刊物，西北他们选择在绥远，希望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园地问题。于是我们同意把《新女性》交给她们办。她们负责稿件，我负责编排、发稿和校对。这样从第四期，她们每月寄稿子来，出刊后印单页数十份，由我给她们寄去。她们稿件寄得非常及时，有时寄来一次，可发两三期。在这个时期，因为《新女性》周刊和我通讯最多的是于晓林和毛菊两位中国留日女学生。稿件由于晓林寄来的最多，每次都有信来，字写得清秀漂亮，文笔流畅，观点正确。看来她很会写文章，可惜我至今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打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对她的为人和经历更不甚了了。一想起《新女性》我就非常怀念这位没有见过面的女战士。毛菊我在延安见过面，那时她正在马列学院学习。

《新女性》自从东京的女友寄稿后，刊物的内容质量大为提高，翻译的文章不少，除介绍各国妇女运动外，还介绍苏联的新结婚法、新教育、劳动妇女与保健设施，苏联的儿童与教育等，还写了不少水平较高的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如“先解放我们的

脚”、“我国妇女运动的前途”、“妇女解放与新文字”、“五四运动”、“寄给故乡的姊妹们”、“关于恋爱”、“对于妇女运动应有的认识”等等，这些文章的观点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比如“关于恋爱”（载于《新女性》第十一期）这篇文章指出：

“恋爱好象大海里的一片浮板，漂流在大海里的人们用尽劲去抓这片浮板，没有找到一个爱人，整个人生变成灰色的了，这是过去的一个时代的恋爱观。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里充分地表现了这种倾向。……五四时代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斗争已经由民主主义的斗争，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了，中国青年的两性关系也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在蒋光慈与他同时的一些作家的作品里，表现了一个娇美的爱人，扯着一个革命战士的袖子，或者酒肉一样的气息的梦啦，迷蒙了朝向敌人的眼睛，告诉我们，恋爱和革命是冲突的，这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在伟大的斗争过程中，这是很快地被扬弃了的一部分现象。当我们社会的大众的斗争发展到最高的一个阶段，爱人的一只手怎么可以把我们的战士扯到后边去呢！因为革命的主力军，已经充分成长起来，整个的形势已经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了。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把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表现在恋爱关系上的温情主义扬弃了。恋爱不单不和革命冲突，伟大的恋爱是要和我们的伟大任务连结在一起的。”“我们中国处在危亡的前夜，一切被压迫的大众为着解放自己不能不加紧努力起来，而且在这新形势之下，对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恋爱，是不能不严肃地加以检讨、批判的。我们要使我们的恋爱发生进步的积极的作用，要使恋爱溶化在伟大意义的行动里。”

这篇文章对于当时一些进步的青年男女，正确地认识和分析艺术作品中的两性关系，正确地处理恋爱问题，树立革命的恋爱观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对于妇女运动应有的认识”一文（载《新女性》第十二期），明确地提出：“要求妇女真正的解放，必先谋求整个民族

的解放。并要求在谋求妇女大众得到人的生活的斗争中，一个进步妇女，首先必须要有：（一）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人生观；（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忍苦耐劳的决心；（三）努力学习，加强自己能与行动一致的理论 and 毅力；（四）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检点自己的行为与矫正自己的错误。”

这篇文章在我发稿过目时，很受教育和启发，也鞭策自己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追求真理，同样必须这样要求自己。这些文章发表后，在绥远地区的反应十分强烈，尤其是各校的女同学，都争先抢读。当时，就经常收到索取购买《新女性》的信件。据女师一位同学讲，《新女性》每期到后同学们都抢着看，有些文章，同学们还抄录下来。

总之，《新女性》上发表的文章，在当时的绥远来说，都是质量很高，难能可贵的，确实对绥远一些进步青年男女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新女性》出了将近三十期，一直到“七·七”事变后，东京的朋友纷纷回国，来稿中断，积存的稿件发完了，我又忙于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的工作，《新女性》即停刊了。

《学校生活》第一期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创刊的。借的是《西北日报》副刊的版面。报头也是杨令德先生给提的字。发刊词是我写的，没有署名，阎宴宾写了一篇“学生生活片断”，尘影写了一篇“学校生活”，另外也记不清是谁以斯基尼齐的笔名写了一篇“考试之前——教师生活的一片断”。第一期出刊后，我们即和几个学校的同学商量，请他们接过来继续办，把同学们反帝爱国热情鼓舞起来，把学校生活活跃起来，他们很痛快地接受了。于是从第二期就由各校进步同学办起来了，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绥东抗战以后，各校学生会共同成立了学联，这个刊物又改为《学联周刊》，由吴秉周、吴殿甲（中共党员，现任吉林军区顾问）、吴焕武、赵桂林等同学主办，发表了不少关于“团结御侮”、“抗战与救亡”的文章。

塞原社同人从事上述的这些活动，不但在绥远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且在太原、天津、青岛、广东等地和国外东京留学生中也有一定影响。东京进步的女留学生，她们在东京“左联”支部的领导下，除了积极参加多种文化团体，还组织了留东妇女会，通过集体的活动，研究学术问题，讨论世界形势的动向和现状，参加戏剧演出，联络感情，促进妇女运动，也加强了对祖国的关心，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愿意在遥远的岛国和故国的朋友，特别是女朋友们取得密切的联系，经常互通声息。她们除在山东有一个副刊外，塞原社同人在绥远社会日报创办的《新女性》周刊，也被选作她们在国内西北地区开展妇女运动，发表文章的阵地，由于我们组织漠南剧团，演出话剧，出刊《西北戏剧》，在绥东抗战时，和各地来绥慰问演出的团体或个人有所接触，并帮助他们在报上出专刊等，我们和太原从事剧运的张季纯、王艺哉、马瑜、小萍、子玉以及后来参加了太原西北剧社的凌信子、天津的冰竹（余炳巽）等在剧运方面建立了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东京参加过《复活》等剧演出的李柯等同志还写信鼓励我们：“你们的话剧运动开展的怎么样？东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沙漠般的塞上经营文化工作了。朋友，努力干吧”（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新绥远》“岛国通讯”）！塞原社从一九三四年冬，开始在左联中国诗歌会的影响和河北分会王亚平同志的推动下，开展新诗歌运动，在一九三六年组织诗歌研究会，出版《塞北诗草》，到一九三七年第八期被迫停刊后，仍继续在社会日报副刊《洪荒》，开展新诗歌运动。如此旗帜鲜明的长期不懈地坚持现实主义的新诗歌运动，不但在偏僻的塞上艰苦奋斗，影响较大，就是在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也是新诗歌运动的一块重要阵地。它曾得到左联任白戈同志和中国诗歌会河北、青岛、广东分会诗人王亚平、袁勃、温流、江岳浪等同志的鼓励和支持，并且在“七·七”事变后一个时期还保持着联系。总之，塞原社的这些活动，

既活跃了绥远的文艺界，给荒漠的塞上增添了生气，团结了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年和学生，也传播了一些进步的思想，成为绥远文坛经受北国的狂风暴雪而仍在荒原上挺拔生长的一朵鲜艳的红花。塞原社同人和经常为《塞原》、《塞北诗草》、《新绥远》（后改为《洪荒》）、《新女性》、《学校生活》、《西北戏剧》写稿的作者，（除不知下落的外）如：苏谦益、杨植霖、杨叶澎、武达平、韩燕如、王亚平、袁勃、李柯、毛菊、侯福荣、袁烙、阎宴宾、吴殿甲、赵维新、渔农（陈介平）、狄敏达、任恕等和笔者，前后大都走上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着一定的负责工作。

三十年代继续的新诗歌运动

一、塞原社和新诗歌运动

本世纪三十年代新诗歌运动是在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推动下起来的。

中国诗歌会是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的革命诗人团体。它倡导诗歌要大众化，要反映现实和封建的现实斗争，以积极推进、发展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国诗歌会上海总会出版了《新诗歌》旬刊。“旬刊”以完全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诗坛。在它的启示影响和推动下，北平、天津、广州、湖北、青岛等地，相继建立了分会。出版了诗刊。全国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文艺副刊，也出诗歌专号。各地诗社组织及新诗歌的出版物，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还组织诗社，出版了《诗歌》杂志。大量反映现实的新诗歌的出版，充分说明新诗歌运动已冲破各种压力和阻挠，在国内和海外健康而迅速地发展。新诗歌已经做为时代的号角，大众斗争的武器，横空出世在中国的文坛。

塞原社诗歌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塞北诗草》，是在《塞原》文艺旬刊和社会日报副刊《新绥远》连续出过几期“新诗歌专号”和“诗专页”之后，为了更集中力量开展新诗歌运动而组织产生的。

塞原社经常写诗的有穆女、佩莹和我。但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我们都写过一些豆腐块一类形式主义诗歌，讲究节奏、韵脚和形式的整齐，但内容则是空洞无力、甚至情调也不太健康。如我写的《诗“韵致”》：

渐渐 渐渐 窗外渐渐的雨声
沙沙 沙沙 窗外沙沙的夜风
微微地 微微地 窗棂 摇曳
怦怦地 怦怦地 心儿 跳动

纤纤 纤纤 伊人纤纤的情影
慢慢 慢慢 飘然慢慢地降临
盈盈地 盈盈地 秋水 含情
淡淡地 淡淡地 素装 高莹

渐渐 渐渐 风儿渐渐地河流
滴滴 滴滴 细雨滴滴的加身
袅袅地 袅袅地 娇容 福彩
轻轻地 轻轻地 新月 迟隐

《塞原》在绥远民国日报复刊后，我们因受左翼作家作品的熏陶，迫切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特别是受到新诗歌运动的影响和鼓舞之后，我们对过去写的诗已不满足。穆女和我几次在一起谈论过我们应该改变过去的诗风，向大众化方面努力。当我第一次用新的题材和形式试写“小玉子”（《小玉子》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塞原》第二十期）的时候，穆女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说由这首诗可以预期我将来的成功，让我好好体验人生，充实生活……记得那一天我和穆女两人还兴致勃勃地跑到清冷的新城公园，反复地读着“小玉子”，进行认真地修改。那时已经是深秋了，可我们都并不觉得时令的萧瑟，还很兴奋地谈论着关于诗歌的创作，怎样把握现实，真实而有力地反映现实生活等等。我们感到，我们创作应该有个春天，我们的春天到了。从这以后我们逐渐改变了过去那些一味追求形式的诗风，开始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 and 为追求光明，憧憬真理而呼喊，从而趋向大众化了。如这一时期佩莹的“更夫”、“洋车夫”，我的“保人”、“愿你做

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光明在前”等，在内容上已闯出了个人主义的圈子和描写身边琐事的倾向了。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塞原》第二十二期开始第一次出新诗歌专号了。我在“写几句在前面”中提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诗歌也不能例外”。“在目前，内有天灾人祸以及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与外来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支配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诗歌是该如何急迫地成为一种强烈的、有力的，作为民众呼声的喉舌了”。

“发刊这个新诗歌专号，我们大胆地尝试创作大众的诗歌，一方面努力于新的内容（题材）的采用，同时也注意新的形式（语言）的试验，（关于技巧和韵律方面我们也不是完全漠视的），那就是说，我们运用劳动人民日常平凡的材料，为大众生活所熟悉者，而以极通俗的文字，为大众所能了解者，来表现创作这种大众所需要的诗歌”。

当时绥远很偏僻，有些书刊很难看到。中国诗歌会总会和分会出的《新诗歌》根本买不到。一九三四年冬，任白戈同志的爱人李柯和女友周瑞波，一同回到了归绥小东街首善医院李柯家里。当时宋竹同志放寒假后，也和她们住在一起。我和袁尘影常到她们那里去。我们组织了读书会，经常和她们讨论一些进步书刊上的文章和华北形势，以及青年人在这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形势下如何生活，如何学习，如何斗争等问题。我们去时，也把出刊的《塞原》送给她们。这样，她们也知道我经常写诗。有一次我和她们谈到我们生活在绥远太闭塞了，孤陋寡闻，什么也听不到，看不见，《新诗歌》出版一年了，我们还见不到一本时，李柯打开一个装书和杂物的箱子，翻了一阵，找出了一期《新诗歌》和一期《诗歌季刊》送给我。我如获至宝，当天回去一口气把两本诗刊读完了。受到很大启发。兴奋之余，我当即给在青岛编辑《诗歌季刊》的王亚平写了封信，寄去两首诗。很快就收到了王亚平的回信，他希望我在绥远团结写诗的朋友们，响应中国诗歌会的号召，开展现实主义的新诗歌运动。我寄去的诗，一首

发表在《诗歌新辑》上，一首发表在《青岛诗歌》上。前者当时我就看到了，后者是一九三八年延安，我被分配到丁玲、周巍峙同志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时，一天我到诗人史轮住的窑洞，在一张青岛的报纸上才看到的。自从得到王亚平同志的鼓励后，我们就经常通信联系，在开展新诗歌运动方面，互相支持，互相投稿。《塞原》第三十六期“新诗歌专号”就发表过王亚平的诗作《虹》。我也给他寄去几首诗，其中一首《生活的担子》经他推荐发表在北平出版的大型《诗歌杂志》创刊号上。王亚平的第一部诗集《都市的冬》出版后，两次给我们寄来数十本，经过我们在报纸上介绍和一些爱好诗歌的朋友们的帮助推荐，很快就销售完了。以后他又寄来他著的《海燕的歌》，工人诗人江岳浪的《路工之歌》，中国诗歌会广州分会温流的《我们的堡》，蒲风的《钢铁的歌唱》等诗集各数十本，也很快销光了。这些诗集在绥远爱好诗歌的朋友中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反响，对于绥远的新诗歌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了开展新诗歌运动，需要进一步在绥远写诗的和爱好诗歌的人们当中，宣传新诗歌运动的意义和当前诗人的战斗任务，以及诗歌大众化的方向。我们在《塞原》“新诗歌专号”和《新绥远》出的诗专页，以及《西北日报》副刊《塞风》上，一方面写文章介绍新诗歌运动，一方面以诗歌创作的实践，把大众化的、反映大众生活的诗歌奉献在读者面前。中国诗歌会的领导人、当时新诗歌运动的主将穆木天，在各种报刊上写了不少关于新诗歌理论建设的文章。他把这些文章集为《平凡集》出版，我写文章作了专门介绍。

在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诗歌创作实践方面，佩莹的《水车》、《我的生命》、《奔》，绍曾的《抢碎炭》，志文的《逃难人的歌》，佛茵的《摆渡人》，刘映元的《病了的孩子》，我的《到处都拥挤着饥饿的人群》、《天就要明了》、《送草老人》、《悼小安子》、《生活的担子》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虽

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且就内容而言，已经摆脱了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框框。开始从社会现实中选取题材，着重反映工农劳动大众的生活。为工农疾呼，为自由而歌，已经向大众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经过我们的努力，在《塞原》新诗报专号、《新绥远》诗专页的影响带动下，绥远写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诗坛上出现了活跃生气。有些副刊如《心波》（张祝三编）、《艺苑》（绥远师范学校同学编）、《三家村》（绥中师生编）、《沙驼》（归绥第一中学同学编）相继问世，并出过多次诗专号。绥中的志文和郝克敏同学也写过不少新诗，但发表在这些诗刊上的一些诗作内容或多或少受“新月派”、“现代派”、“象征派”等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仍有追求形式、描写身边琐事，歌颂爱情至上和逃避现实、粉饰太平的倾向。针对这些情况，我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写了一些介绍新诗歌运动和有关诗歌的文章，如《介绍塞北诗草》、《一九三五年的中国诗坛》、《一年来的绥远诗歌》、《愿逃避现实的诗人清醒》、《关于诗歌创作诸问题》等和一些书报评介。其中如以伊宁笔名写的《一年来诗歌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目前现实的要求，文学界提出了“国际文学”的口号后，素有炸弹和短剑之称的诗歌，也不能例外，而且更有它的重要性了。因为，“诗歌”是最能直接感动人，鼓舞人而战斗情绪的时代喇叭。所以诗歌在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现在，在新的时代的进军中，充当引起群众共鸣，激发雄壮的战斗号角了。……至于国防诗歌在理论方面的建设，也有许多文章探讨，概括起来有如下的特殊性：

第一，目前最需要的是可以歌唱的短篇鼓动诗，它的主题是激发抗敌热情，是民族解放的进行曲。

第二，我们也需要长篇的叙事诗，它歌咏伟大的民族战争的各种姿态，记述爱国运动的行进。它还可以描绘敌人野蛮残暴的侵略兽行，以及汉奸卖国求荣的无耻事件等等。

第三，因为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孤立的，所以必须留意国际间的动向，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殖民地解放的斗争，因此，要求新闻诗的写作。

第四，大众的一切疾苦的表现，以及一切罪恶的暴露，均是诗歌的题材。

第五，我们的诗人必须实际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工作，只有把自己实际的体验和感受歌咏出来，才能真切动人，没有参加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是写不出伟大的国防诗歌，这是可以断言的。

第六，诗歌总是听觉的东西，它必须接受音乐性和歌谣的长处。进行曲和合唱诗是急切的要求，不能朗诵的没有音律节奏的诗不是好诗，表现法一般地自然应该是新写实主义的，它必须扬弃传统的难懂的诗句，通俗化，大众化是正当的路向，不过在必要时，我们仍不可否认可以应用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手法。

第七，为了担负起诗人的时代所课予的任务，集体的研究和集体的创作也是正当的要求。

……希望在国防前线的绥远的诗人们，把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切实担当起来（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西北日报《塞风》）。

发表这些文章，并且对《西北日报》副刊之一《三家村》上发表的郭根君《谈诗歌的韵律》这篇纯形式主义的文章进行批评，由此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论战。这在当时的绥远文坛轰动一时。因为论争的焦点是内容与形式、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所以对写诗的人特别是一些初学写诗的中学生，也是不无好处的。

为了加强对新诗歌理论和创作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新诗歌运动的开展，塞原社以我、佩莹为主，筹备组织了“塞原社诗歌研究会”。因大家都是业余文艺工作者，都有职业，聚在一起困难。佩莹当时在车站省立第三小学教书，很少到旧城。我在旧城牛桥街民众图书馆工作，地址适中，一些组织、联络工作自然落在我的头上。我和北虹、玉琳、许季明、绍曾、阿玉、狄敏

达、张凡林等人进行联系。他们一致同意组织诗歌研究会，办诗刊。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准备，成立了“塞原社诗歌研究会”，并扩大征求会员，定期集体研究、讨论新诗歌运动中的问题，号召“一切有进步思想和努力诗歌创作的人，当民族危机严重、时代的齿轮在血腥中逆转、暴风雨来临的前夕，不但自己应该挺身而出，推进历史的车轮，把诗歌当作大众斗争的武器，而且晓得如何唤醒人们，来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理解生活，和自己站在一条线上，携手向前迈进，作为时代进军的喇叭，来完成诗歌的任务”（介绍《塞北诗草》）。

《塞北诗草》旬刊，由我主编，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创刊。这是绥远唯一旗帜鲜明的开展新诗歌运动的诗刊，也是“塞原社诗歌研究会”会员诗作发表的园地。通过诗歌研究会，团结了更多的诗人给《塞原》和《塞北诗草》写稿，进一步推动了新诗歌运动。除了我和佩莹、袁烙、北虹等经常写稿外，还有李曼霖（《高粮叶》的作者）、雨三（杨植霖）、许季明、劬子（韩燕如）、霍露、刘洪河、玉琳、庞学文、西虹、阿玉、亚华、绍曾、志文、佛茵、绿涛、狄敏达、克敏等人，也常写些诗稿。中国诗歌会北平分会、广州分会王亚平、袁勃、温流也为《塞北诗草》寄稿，表示支持。温流的《凿石碑工人歌》就发表在创刊号上；王亚平的《伟大的前夜——史诗“十二月的风”》之一章，原准备在单行本《塞北诗草》月刊上发表，后因印刷、经费困难以及其它原因没有出成，便发表在旬刊第三期上。《塞北诗草》的出版，是绥远诗歌运动的极盛时期。这个时期在《塞原》、《塞北诗草》及其它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进步意义的诗，特别是绥东抗战后，诗歌的战斗性更强了，如《诗人的战歌》，北虹的《雨地行军》，雨三的《杀他个斩草除根吧》，劬子的《打回三岛去》、《架起太平洋的肉桥》，杨乃燧的《决心》，陈一之的《谁说好人不当兵》，我的《前进，英勇抗敌的弟兄》、《为和平而斗争》、《怒吼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给敌人阵营里的士兵》、《悼》等。诗人们拿起笔做羽枪，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向敌人冲锋了。

《塞北诗草》创刊号出版之后，因为它是绥远文艺界唯一的诗刊，很快便引起爱好诗歌者的强烈的反响。有不少人写信要求入会，索取我们编写的《诗歌研究大纲》。有的亲自找上门来询问入会手续或购买《塞北诗草》。有更多的诗人和初学写诗的青年学生踊跃为《塞北诗草》写稿。其中韩燕如同志就是很积极的一位。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用劫子的笔名在他离绥到太原前，两次寄来三首诗和一封信，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提出建议和要求，并希望把他写的《打回三岛去》一诗制谱献给前线的战士们。我虽然认识韩燕如同志，但并不知道劫子就是他的笔名，信上也未留通讯地址，便公开写信在《塞北诗草》上答复。感谢他给《诗草》投稿和对《诗草》的关心爱护。同时指出“把诗歌和音乐结合起来，在抗敌救亡运动中，是值得提倡的。不但我们需要这样做，而且适应着时代的要求，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做了。最近由上海‘民众歌唱团’集团唱歌的效果，更证实其作用是非常之大的。把雄壮激昂的歌词，象怒吼一般地从战士们的口中唱出，这的确会鼓舞我军的斗志而使敌人心惊胆战。不过，因为绥远还找不到会作曲的和当前迫切的需要，我们认为已经出版的《中国呼声集》是值得推荐的。这册歌集无论在歌词的内容和曲调的雄壮，在目前都是比较完善的，里面收集的《义勇军进行曲》、《民族解放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四十年的愤怒》、《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许多名歌，唱起来非常鼓舞人心，激发人们爱国抗战的热情，现在不是为大家所爱唱的吗？因此，《打回三岛去》制成歌曲，在我们目前还做不到的时候，运用这些现成的战斗性很强的歌曲，来唤醒民族意识，激起人们的爱国心，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是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努力提倡和实行的……。”

韩燕如同志寄来的诗，两首发表在《塞北诗草》第五、六

期，第三首是在《塞北诗草》停刊后，发表在《社会日报》《洪荒》上，那时，他已离开了绥远，后来他说在太原意外高兴地看到他的诗已经发表了。

《塞北诗草》共出了七期，最后一期是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出刊的。当时，《西北日报》副刊编辑杨令德先生，因为在《边防文垒》上发表了美国记者斯诺的《毛泽东会谈记》被撤职，《塞原》、《塞北诗草》也被迫停刊。杨先生的离职，使我们失掉了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但是，新诗歌运动继续开展，我们在我们能够掌握的唯一阵地《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继续写诗，继续战斗。狄敏达的《挺战歌》、我的《献给战斗者们》、《怒吼吧，塞北大众》、《悼鲁迅先生》、《冲向前去》等诗文，都发表在《洪荒》上。同时，我们还转载了周巍峙的《我们的时代》，施谊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曲》，楼适夷的《活路歌》，欧阳予倩的《工人之歌》，苗垆的《我们要做一个新的英雄》，沙梅的《四十年的愤怒》，以及《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等革命歌词，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一直到“七·七”事变后，归绥沦陷那天的炮火声中，才离开了归绥。

二、绥远开展新诗歌运动中一场反形式主义的争论

一九三四年，偏僻闭塞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绥远省。文艺界也是格外荒凉的。

这年八月间，我和武佩莹、袁尘影、李穆女等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基于对现实不满，特别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反共卖国政策，不战而丧失东北大块国土，极其愤慨；又受到中外左翼文艺作品的影响，所以，思想上憧憬着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满腔热情地想在绥远干一些有益于改造这个不合理社会的事业，尤其是想

在文艺落后的绥远，开拓这块荒芜的文艺园地。但是怎样开拓，缺乏明确的努力方向。当我们从报刊上的文艺消息中，得知在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提出开展现实主义的新诗歌运动和诗歌大众化的主张时，高兴极了。我们几个喜欢写诗的人，尤其是穆女和我就曾几次谈论过中国诗歌会的主张，并且对我们过去曾经写过的一些豆腐块式的，空洞无物的诗歌，很不满意了，特别是谈到民族的灾难，人民大众痛苦的时候，更惭愧我们写得有些诗，不但不能反映当前的现实，恰恰是脱离现实，脱离劳苦大众。所以从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后出刊的《塞原》和塞原社同人在其它刊物上发表的诗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改变，特别是诗歌，已逐渐改变了过去偏重形式的诗风，开始注意摄取现实生活的各种题材。作品中尽量反映劳动群众的苦难生活，揭露黑暗社会的各种罪恶，喊出了追求光明和为真理而斗争的呼声。并且和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的王亚平、袁勃取得联系，在新诗歌运动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寄刊物，稿件。同时，我们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积极提倡诗歌大众化，要求把诗歌作为反映现实，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腐败，鼓舞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向旧世界宣战的强有力的武器，从而在绥远推动了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发展。我们在《塞原》发表诗歌时，就是本着上述精神选稿，而且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起，前后出过五六期“新诗歌专号”，在我们编辑的社会日报副刊《新绥远》（后改为《洪荒》），也出过几期“诗专页”。同时，明确提出：“诗歌不是有闲阶级和花瓶诗人玩弄人生，游戏人生的艺术，而应该是时代进军的号角，大众生活的精神食粮。诗人不只要从‘象牙之塔’的艺术宫殿里踱到‘十字街头’，更应该大踏步冲入现实生活的熔炉，深入大众生活的底层，去学习大众的语言，表现大众困顿穷迫的生活”（叶频“发掘本质”）。我们自己在诗歌创作上，不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向着诗歌大众化的方向努力。为了尽可能做到劳动大众听得懂，我们学习着试写歌谣和口语化的诗歌，如佩莹的“生活”。

“火山”、“水车”，我的“小玉子”、“邻人”、“打铁者之歌”、“拾炉渣灰歌”、“拾地皮菜歌”等。经过和热心于新诗歌运动者们的共同努力，到一九三六年绥远诗坛比较活跃起来了。除《塞原》、《新绥远》外，其他报纸副刊如《塞风》、《心波》、《艺苑》、《骆驼》、《三家村》等也相继出过诗专号，写诗的人也比较多了。但从新诗歌运动的要求来说，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大众化的作品，还属少数。除《塞原》、《新绥远》“新诗歌专号”发表的作品，思想比较明确，立场比较一致，其他诗专号发表的诗作，内容均极庞杂。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些诗歌作者，大多数是中学生，他们既局限于自己生活的狭小天地，又受到当时“新月派”、“现代派”、“象征派”等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认识不足，把诗歌当作单纯的感情的产物，专在形式上下功夫，情调也较低沉，完全避开眼前多难的现实，无视民族的危机，人民大众的痛苦，写一些风花雪月，背离时代，单纯追求形式的东西。诗人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诗人爱国救亡的任务都置之脑后。这样，从理论认识上和创作实践上克服这种倾向，便成为当时推进新诗歌运动向前发展的极不容缓的工作。如果从全国说，“要开展新诗歌运动，就必须批判当时的‘新月派’、‘现代派’、‘象征派’这几个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使诗歌为资产阶级服务”（王亚平、柳倩：“中国诗歌会”——新文学史料第二期）的诗派，那么，在当时文化落后而又处于国防前线的绥远，开展新诗歌运动，对于“新月派”、“现代派”、“象征派”等一类逃避现实，反对革命，追求形式，不顾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崇拜者的种种诗歌谬论的批判，就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在绥远新诗歌运动中发生的一场批判“新月派”等形式主义诗论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争论由绥远西北日报副刊之一《三家村》诗特刊上，登载的一篇署名郭根根的“谈新诗的韵律”的文章所引起。这篇文章完全

是“新月派”、“现代派”、“象征派”一类只谈诗歌的形式——韵律，而丝毫不提诗歌内容的纯形式主义的论调。我认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是不能分离的，一首诗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它的内容是否具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思想，当即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郭根先生谈新诗的韵律”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发表在《塞原》第四十三期。不久，郭根先生又在《三家村》写了一篇“再谈新诗的韵律”，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他说：“我只按题说话，我谈的韵律，即是诗歌的形式问题，因之，我一点也没有提到‘意识’或‘内容’。”于是我又写了“由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谈起——再驳郭根君”的文章，发表在《塞原》第四十四期。

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郭君的文章，完全撇开内容而专谈形式——韵律。我在文章里首先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谈起：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内容总是决定形式的，什么样的内容需要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形式是以内容为转移的。即使是一篇专论形式的文章，如果撇开内容，就形式谈形式，必然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苏联文学顾问会在《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不要由形式走向内容；反之，要由内容走向形式，因为内容总是决定形式的。”青野季吉在《新兴艺术概论》里指出：“产生艺术底形式，是它的内容的内在的必然的力，把内容与形式分开来思考，这是把新兴艺术规定为形式主义的艺术，同样的错误。”因此，一个讨论诗歌问题的人，把内容和形式分开来谈论，斤斤于诗的形式空洞的理论的提议和研究，被人当作形式主义的追求者是很自然的。我还引用了玛克辛·杜堪（Moximo Ducamp）批评抛开内容专谈形式者的话，说明内容空洞、形式美丽的诗是没有生命的。

“‘形式’是美的，不错，在根底里有思想的时候，没有髓的美的脸是什么呀！”

关于诗歌的形式，诗歌必须具有韵律这一点，我们并不完全反对。因为诗歌是含有音乐性的艺术。不过诗歌的韵律，不能像纯形式主义追求者那样，专门制作“豆腐块”，不顾内容，而为了死板的形式，去押韵脚。死押韵脚，只讲究音节等等，会束缚人们的思想感情，妨碍诗的真实的表现。而应注意诗的音节的自然的波动和语句的便于朗读。就是要“在诗形里注入音乐的韵律，在内容里溶进吟唱的歌声，使诗可以朗读，可以歌唱”（袁勃：“诗歌的机运”《诗歌新辑》第一、二期）。因此，在不妨碍诗的题材的展开的时候，可以押韵，但是，也押口头上大致相近的韵，而不查韵书的。同时，也并不认为不押韵的就不是诗。并举出华德·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歌，就是不押韵脚，不固定形式的。他的诗热情奔放，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象海浪奔腾，有强有弱，有起有伏，不受传统的格律束缚，用新的形式表达民主思想，对种族、民族和社会压迫表示强烈的抗议。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形式对于一件完整艺术作品的价值。如果具有“艺术手腕”、“素有训练”的作家，能写出形式与内容统一和谐的完整的诗歌来，押韵与否我们都很欢迎，而且那正是我们对于诗歌创作的最高要求。因为一篇完整的艺术作品的成功，不单单是局部内容的成功或形式的成功，而是成功于它的“整体美”上。当我们读一篇成功的完整的艺术作品时，不但感到那是形式而且也就是内容。就像郭君所举惠特曼的那篇最被人称赞最熟知的“oh, Coaptian, my Coaptian”一样，我们读它时，不单只感到它的形式或内容局部的好，而会感到它的内容和形式和谐的“诗的整体成功”。所以，我们要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就是什么内容，用足以充分表达那内容的形式来表现。当然，复杂的诗的内容需要多样的诗的形式来表现。因此，我们要求形式之多样性，也就是多样的内容决定多样的形式。

诗歌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在民族时时浴血在

狂风暴雨中，只有把握住现实，了解社会动向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而郭君偏偏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现实面前，举出闻一多先生《死水》中的头四行诗，即：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作为典范，并从形式上赞扬，说什么“读起来铿铿锵锵，最为入耳，感其美妙处不亚于绝律。……成为完整的韵脚。”诚然，这四行诗音节整齐，可以琅琅上口。但是抛开思想内容，就形式谈形式，不考虑当前时代的脉搏和大众的呼声，在这时候引用这四行诗，究竟会给读者产生什么影响？能给爱好诗歌的青年学生们些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文字的堆砌，豆腐块的制造，除了“绝望”、“清风”、“漪沦”、“破铜烂铁”、“剩菜残羹”等字眼外，还能给读者些什么呢？！在目前（一九三六年）华北、绥远局势危急万分的历史条件下，在整个民族处于灭亡的边缘，广大劳动群众无时不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重重铁蹄下，农村破产到许多农民大众活睁睁地等待死亡的降临……的现在，我们的诗人却不去反映民族的危机，时代的要求，人民群众的呼声，发挥诗歌振兴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大众抗敌的意志和争取生活的斗争，还一味颂扬单从形式上讲求音节、韵脚，而内容距离目前严酷的现实十万八千里的东西，甚至吟风弄月，悲秋伤春，粉饰太平，使诗歌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缺乏时代精神，毫无思想内容，把诗歌当作玩弄文字的艺术，这简直是对诗歌的亵渎，是使人不能容忍的。

第二个问题是诗歌长或短的问题

郭君的文章强调新诗必须是短的。理由是“诗本来是一刹那情绪激荡的记录，如果硬把一刹那拉长到几目几月，这种作量

多半是索然无味，空洞外亮没魂。艾蕨并且蹙蹙地说：“其实Epic（史诗——笔者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如果当初没有人把黄帝的勋功伟绩用诗的语言记了下来，那么今日也正不必痛惜、悲哀……”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新诗可以写得精练，写得短些，如匕首、投枪。但不能说长诗就不能写。长短不能成为评价诗的标准，关键还在于作品的质量如何？并以许幸之的“卖血的人”（《春光》二期），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春光》三期），恺夫的长篇农村叙事诗“骷髅”，还有王亚平的大众合唱诗“万里长城”（以上均载《诗歌季刊》春季号），蒲风的《茫茫夜》等得到相当好评的长诗，说明新诗并不是非短不成的。

关于史诗，我认为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一天天趋于尖锐化，这是一个丝毫不容我们苟且的时代了，这是产生史诗的时代了。上海“一·二八”的民族抗敌自卫战，东北义勇军的浴血奋战，以及“一二·九”之后，全国各地掀起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热潮，这些伟大的血的史实，难道还不及黄帝的勋功伟业值得我们反映在现实的诗歌里吗？！穆木天的“在喀拉巴岭上”便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柳倩的史诗“震撼大地的一月间”（连载于《综合》杂志）在人们脑海里的印象，会同“一·二八”一样，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史诗的时代果真过去了吗？！

郭君还说：“我们的时代是这样的复杂，要拿诗那样的体裁来表现，绝不能充分的表现”。“这时代是小说的时代”。我认为郭君的这种说法，只能是对过去那些把诗歌的内容被形式限制住的形式主义作品的一个有力的抨击。在现在需要创造形式之多样性的时代，诗歌的暴露性，却决不弱于小说，有时还远远较强。蒲风的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书后作者有两段话说明长篇叙事诗、故事诗和史诗的需要，恰好回答了郭君提出的问题：

“刹那的印象的表现，局部的具体的现实的描摹，诚然，短诗更有其所依靠而发展的基础，而实际上位于‘文学之王’的诗

歌，说是必得把暴露现实的责任让位。小说，把诗歌之瑰丽社会，指导社会，鼓舞社会的职责仅依赖于一些神经般的简短的诗句，不待说，在收效上是缺乏，而在我们的职责上，那是我们的职责的背违。

“假如我们要来歌咏铁流群的西征北战，不用说，我们并不描写其勇敢的胜利，我们决不能忘记种种困境里情绪的提起，对于士兵，对于上级的指挥，对于百姓的欢迎、接济等等……请问，这一种伟大的史诗，写起来是不是一篇起码千行以上的叙事诗。”

“在现今，伟大的时代下包含了伟大的现实，谁说我们不当用诗作整体的表现，惟说我们不该当来开发长篇叙事诗（故事诗一类的东西呢？”

蒲风的上述意见我认为是对的，而今后长篇叙事诗、大众合唱诗、剧诗、故事诗、史诗等将会有新的贡献，也是必然的。因为伟大的时代，要求我们采用更多样的形式，表现比惠特曼更为复杂、广泛的社会生活，而让位给小说的诗，应该只是那些所谓“看”的诗了（郭沫若语）。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建设中国诗歌

郭君对这个问题的论点，还是仅仅着重于形式的狭小范围。他说：“要建设起中国的新诗歌，必须融合中西旧的诗之艺术。即是说废掉中国的平仄而采用西洋的音步（抑扬格），韵脚依然具备。至于双声、叠韵等等妙用自然也可保存。”我认为郭君这种“废掉中国的平仄，而采用西洋的音步，音步而韵脚依然具备……”等论调，那结果仍然是和脱掉了三寸弓鞋而换穿高跟皮鞋一样，是没有出路的。建设新诗歌我们固然在形式上应该对过去的遗产，采取有意识的批判的态度接受其长处：能朗读、通俗、大众化的优点，去冲破神秘难懂的个人主义的狭小圈子，开创集团的人民大众的诗歌的坦途。可是，我们首先更应该注意的是诗歌的内容，如何反映现实。诗歌是时代的呼声，现实生活的反映。它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要反映大众的要求。

求，要为广大呼喊，要为广大歌唱。当前，诗人必须面对现实，抓住现实生活的核心，去反映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法西斯统治，压迫的时代生活的题材，鼓舞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热情。为了探索、创造能够充分表达时代生活内容的艺术表现形式，使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渐趋融洽一致，达到比较完美的统一，而获得艺术的最高成就，不但要继续继承我国一切优秀的遗产，还需要从世界各国作家的崭新作风中，发掘更高的、更精练的技巧，学习最适合、最恰当表现新的内容的语言。总之，我们为了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生活，我们要把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中，民间歌谣里的一切优点，选择有用的加以吸收，再从不断地创作实践中来创造新的适合反映我们民族的、大众生活内容的形式。

这场争论，在我写的“由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谈起”这篇文章发表后即结束了。对于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的郑重探讨，在绥远当时的报刊上还很少看到。因此，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引起更多的人参加讨论，但也轰动一时，引起绥远文艺界人士的注意，成为爱好文艺工作者见面谈论的话题，也使绥远的一些写诗的朋友和各校初学写作诗歌的同学们，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诗歌的社会功能，当前诗歌的历史任务等问题，有所思考，有所认识。对防止“新月派”、“现代派”等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诗歌逆流的泛滥，开展绥远的新诗歌运动，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三、诗歌与新文字

——忆一位热心诗歌和新文字的朋友

在左联中国诗歌会领导下的新诗歌运动，强调诗歌大众化、口语化。然而，在创作实践中，人们碰到的一个突出的严重问

题，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几乎大多数是文盲。尽管你的诗写得如何通俗易懂，但是他们不识字，看不懂。为了解决中国文盲太多这个实际问题，卅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种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字工具——拉丁化的创制，就是为适应大众的需要而产生的新文字。它的特点是：简易、适合口语、国际化、好学。是真正劳动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字，通过它可以表达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痛苦和要求。只有推动拉丁化，应用拉丁化，才能提高劳苦大众的文化，提高他们的认识，动员鼓舞他们参加当前民族解放的斗争。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要动员全民抗战，新文字是民族解放斗争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我们塞原社几个热心开展新诗歌运动的诗友，虽然从一些文章中看到了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消息，但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份之前，一直都没有见过拉丁化新文字。我们在试行诗歌大众化、口语化时，只是写些通俗的民歌式的，适合当地口语的诗歌，尽可能给我们能够接触的群众念念，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一直到他们一听就懂为止。但是，发表出来，还解决不了大众看不懂的问题。我们深切体会到群众能够自己掌握一种简便易学的文字工具的重要性。所以，听到一种拉丁化新文字已经创制、推行时，兴奋地感到这真是急群众之急，使诗歌大众化，为人民大众写诗，为人民大众呼喊的实现，有了必要的工具。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我认识了一位从北平路过绥远准备到新疆的青年，他叫玉琳。在等候长途汽车的一段时间里，他常给《塞原》、《洪荒》投稿，有时也到我工作的民众图书馆借书。见面的次数多了，有时就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他是东北义勇军的家属。他那里相当一批人在等候去新疆的长途汽车，当时去新疆的汽车没有准时，有时等两三个月，有时得等半年或更多的时间。他们到绥远已经快两个月了。他很热情、直爽，也很健谈。对文艺方面的问题，对当前的形势，都有独到的见解，我们很谈得来，而且很快就熟识了。他很爱诗、音乐、画，是一位多才多

艺很有作为的青年。那时，我和佩莹正在酝酿组织塞原社诗歌研究会，筹备创办《塞北诗草》旬刊和单行本月刊，他积极地参加了筹备工作，并为《塞北诗草》旬刊设计了两个报头，《塞北诗草》从创刊到被迫停刊都选用的是他设计中的一幅。他为《塞北诗草》、《塞原》写过诗。现在能找到的仅有一首，特抄录如下：

寄北平的好友们

——赴新路过绥远作

愉快和惭愧，
离开了你们，
到远方去。

仿佛又听见浪涛声，
挣扎声——
用生命斗争着的朋友们啊，
不是为自己，不是为金钱。

炎阳下，
额角淌着汗，
干着嗓子，
你们又在呼喊！

不断地前进，
不屈折，
铁一般的阵式！
铁一般的坚贞！

战或是降，
伟大和卑鄙——

友和仇……

这一切，又都活现地，
在我脑海里浮起。

谈起写诗，他和我、穆女、佩莹有过同样的经历。他对诗歌的认识也经过一段曲折的过程。他说，开始他爱诗、爱音乐、爱画画，因为它们都有美的形式或美的韵律。他爱它们就是爱它们的形式或韵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爱形式与韵律，无非是自己“有闲”，追求形式的美，追求艺术的外皮。因为那时生活不成问题，生活不成问题，而又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当然写的东西便要成问题了，甚至感到空虚的无话可写。他认为诗的内容非常重要，内容能决定诗的“形”，因为先有内容没有“形”，但是“形”也相对地制约内容。对这个问题他感到过去自己轻重颠倒了，不过那也是经济条件所决定的。随着大众的斗争，诗歌也正在跃进着。他说：你看现在前进的作家的诗，都有一个一致的趋向。这个趋向便是把过去的诗的严格的格律打破，而描写大众的叫喊了，现在必要时，甚至某些口号之类的句子也出现在诗里了。是的，这是一个火热的斗争时代，旧的形式与韵律，与大众的迫切的热烈的要求已经不相适应了。有些感到受“限制”了。因此，这个新的内容——大众斗争的狂热的呼声，就不能不另创造出和它相适应的形式来……。现在，诗与歌、画正在跃进着，而文字呢？文字还是为多数识字的“士大夫”阶级所专用。我们在流着汗，为大众写诗、写小说、写小品文，而他们却看不懂，他们没有感觉到，这是多么令人难过的事啊！我们要推行大众创造的容易学的新文字，要把文字和大众的运动联系起来，要大众能识字，会自己发表意见，写小说、诗，那时，一定会有好的作品出现。因此，他积极主张推行北方话拉丁化写法的新文字。当然，我也告诉他我们也正为这个问题而苦恼，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种新文字。于是，他热情地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把拉丁化新文字字母、拼音等教给我。因为我学过英文、世界语，都是拉丁

字母，所以很快就学会了字母的发音，拼音法。没有拉丁化新文字课本，他自己给写了几页关于学习汉字的困难，方块字改革的必要，推行新文字的重要意义和拉丁化新文字的一些原则规定。我们还商量着如何一块推行新文字。可是，过了两天，他突然匆匆忙忙地跑来告诉我，他日内就要出发到新疆去了。临行前，他给我留下一封信和几首诗，又重述了他对诗的看法，并再三强调开展新诗歌运动和新文字的关系。他在信中说：“叶频兄：想不到在这里能遇到你，真的，这真使我高兴，遇到一个真实的朋友。然而，我也想不到我会这样快地离开这里，离开了你。我最耽心的是拉丁化新文字，请你特别注意，比诗还注意。因为用汉字写诗一般人看不懂，不是等于白写了吗？诗是表现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文字又是诗的工具，不可不特别注意。”“朋友，推行新文字吧……”他的这封信，后来以“诗歌与新文字”为题，用鲁鲁的笔名发表在《塞北诗草》诞生号上。他走后，我千方百计托人找到一册瞿秋白同志在苏联远东伯力制订的《中国语北方话拉丁化写法方案(草案)》和《拉丁化初、中级课本》各一册。我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方案看完，字母的发音和拼音同玉琳教的一样。我虽然把字母的发音、拼音方法等都初步掌握了，但很不熟练，如不应用，过两天就会忘掉。于是，趁热打铁，我就开始读初、中级拉丁化课本。最初我一个一个地拼音识字，读过两篇文章之后，阅读的速度加快了。我读着、读着就被课文中那些短小精练，通俗易懂，非常口语化而内容又很深刻，密切结合现实的真正大众化的文章吸引住了。读完了还想读，读了一遍又一遍，受到极大的教育和启发。鲁迅先生写的一篇“关于新文字”的文章，我也是这时从新文字课本上看到的。鲁迅先生也很赞称新文字。并且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也多得。”“这回的新文字的确简易的多了，又是根据现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它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

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动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鲁迅先生的文章更鼓舞了我。于是，索性边读边把新文字翻成汉字，这些内容如此深刻、丰富，而文字又那样浅显的文章，不用说在当时的绥远，就是全国许多报刊也很难见到。我便把廿多篇文章，如“这个世界”、“乡下闹饥荒”（农村破产）、“城里头市面儿更不好”（经济恐慌）、“春天”、“好日子在后头”、“纪念高尔基”、“高尔基的一生”、“睁眼睛子”、“苏联”、“联合起来”、“学生游行”等，和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分别在绥远社会日报副刊《洪荒》和绥远西北日报副刊《塞风》上发表。特别难得的是一首苏联的题为“工人歌”的诗。我过去还没有看到过。诗写得很好，译文也相当不错，我又把它翻成方块字在《塞风》上发表了。原诗是：

生活象泥河一样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吐黑我们的脸，
火酒烧焦了心窝。

酒后引起心中烦闷，
无处泄恨无奈何，
常见父亲打他儿子，
丈夫敲他们老婆。

全世界的工人农民，
到处一样受痛苦，
我们天天当人牛马，
这是最大的耻辱。

到处朋友拉起手来，
破坏这个旧世界，

为了光明的新社会，
快把斗争来展开。

最后一句，为了发表时减少麻烦，改为“大家一齐向前”。

这首诗内容深刻，感情充沛，语言文字也通俗易懂，内容和形式达到完全谐和一致的境地，是一首完美的好诗。读了使人奋发精神，鼓舞斗志。这首诗能够在绥远西北日报副刊上发表，多亏《塞风》编者杨令德先生的帮助。绥远一些从事新诗歌运动的诗友们，看到这首诗时也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争相传诵，一致认为这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后来还找到为这首诗谱的曲了，大家经常歌唱。

在《塞北诗草》诞生号发表“诗歌与新文字”这篇通讯时，我们是打算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在绥远提倡和推行新文字的。我也把《中国语北方话拉丁化写法方案（草案）》拿去给一位写诗的朋友看，并且把拉丁化字母的发音和拼音教给他。我们深深感到在旧中国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特别是妇女是文盲的情况下，要把诗歌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唤醒群众，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动员广大群众、包括妇女积极参加民族解放的斗争，推行新文字确实是当务之急。我们还在我编的《新女性》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妇女解放与新文字”来阐明上述观点。但是，当我最初发表那些从拉丁化新文字翻成方块字的文章时，还未引起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可是，不久就发现从北平“民先”总队部给我寄来的拉丁化新文字书报，都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邮电检查所给扣留了。据说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为了扣留拉丁化新文字书报，竟把一些中学图书馆和英文教师订的英文报纸也一同扣留了。这样，除北平和外地“民先”同志，偶而带来一两本新文字书刊外，我自己也很少看到新文字的书刊了。加之，绥远当时的印刷条件困难，许多排字工友不认识拉丁字母，在文章中如果出现一两个外文书名、人名，也经常排错。同时，我们人

力、经费也有问题。特别是反动政府的限制，很难在群众中开展新文字的活动。不久，绥东抗战爆发，我们又投身于紧张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结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总未能开展起来。想起玉琳临别时再三叮咛、嘱咐，我一直感到非常遗憾。如果说在绥远尝试着推行新文字方面也算做了一点工作的话，那就是我把“新文字初、中级课本”和以后收到的“新文字半月刊”上的廿几篇文章和那首“工人歌”翻成方块字，介绍给绥远的读者。发表了两篇关于拉丁化新文字的文章，做了一点宣传工作而已。

玉琳走了，他是乘坐大卡车，要经过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他走后我一直没有收到他的信，使人非常悬念。他究竟是到达了新疆，还是在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的问题？我很惦记他。但愿他平安地到了那里，仍然以他那烈火般的革命热情，积极开展新诗歌运动和推行新文字。

现在距玉琳离开绥远的日子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他所关心的文艺大众化，诗歌应该为群众读得懂，积极提倡推行简易、好学的拉丁化新文字，让工农大众能掌握一种读书和写作的工具，这个愿望，在旧中国很难实现。而从目前我国现状来看，玉琳的主张也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建国后，我们普及小学教育，简化汉字，扫除文盲，推行汉语拼音，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经过十年动乱的破坏，在工农群众中，特别是广大农村青壮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摘掉文盲帽子的人，又发生了回生现象，成了半文盲，而且还产生了一批新文盲。因此，要使诗歌真正为广大工农群众看得懂、自己写，不但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大有提倡的必要，就是扫除文盲，推行拉丁化——汉语拼音，也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玉琳当时提出要把文字和大众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把文字和实现“四化”联系起来，积极为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而努力。

绥东抗战时期的绥远文艺界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日寇的唆使下，察北伪蒙军大举进犯绥东。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傅作义将军所属的绥远军队终于在陶林边境的红格尔图奋起抗战，经过激战，将敌击退，绥北我军也于十一月廿四日晨，一举收复了百灵庙。捷报传来，全国振奋，人民奔走相告，欢喜若狂。因为这次战争的意义，不只是夺回了几块失地和打死一些敌人，更重要的在于大大发扬了全国人民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救亡的战斗精神，也反映了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的极端不满。所以，绥战发生后，全国各界人士首先是平津沪汉以及全国各大中学校教职员工，纷纷自动捐款慰问。有的捐薪一日慰劳绥远抗战将士，有的节食七日，停火一周将节省的煤费慰劳军队，有的绝食一日劳军，有的学校同学除节约募捐外还演剧募捐，甚至镇江监狱的犯人宁愿饿肚三天，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前线，连首都天主教堂同人也将一日的教士生活费和员工的薪金汇到归绥公教医院救护队应用。还有的毁家纾难，当时报载：“慈谿县南乡富孀陈氏，毁家纾难。其夫原在东北从事矿业，前年被日军惨杀，近伊阅报见绥东战事，复感国难日急，乃倾其家产十二万元，输助绥军。”厦门还有一位无名氏女士“在我军克服百灵庙后，立即解金戒指一枚，托厦门大报社出售，以之慰劳前方将士，该社当时询问其姓氏，女士竟去而不顾。该社嘉其志，随号召众曰，高价者可得此戒指，不旬日售金五百元，该社除将款汇绥劳军外，并制银盾嵌志其事实，献诸公共场所以资纪念。”总之，自绥东抗战以来，全国各阶层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踊跃捐输，在极短的时期中，自动捐款的数目竟达三百多万元。当时民气的高涨真是空前的。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看到、听到都要感动的欢欣鼓舞而流出喜悦的眼泪的。与捐款慰问劳军的同时，全国各地纷纷组织绥远前线服务团、慰问队、看护队、救护团、战地服务团等名目繁多的慰问组织来绥劳军。一时绥远成了全国人民注视的中心，各地爱国人士云集归绥，特别是一些进步人士，在慰问的过程中，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宣传抗日的道理，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推动了绥远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对前线抗战的将士也是很大的鼓舞，使绥远将士认识到抗日救亡，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流血牺牲也是光荣的，值得的。

以笔为武器和敌人战斗

这次绥东抗战虽然是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伪军大举进犯绥东而爆发的。实际上，从一九三六年五月日寇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之后，察北伪军即在日寇指使下，不断向我绥东绥北侵犯。绥远是华北、西北的门户。绥远的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全国人民极为关注。所以当绥东刚刚开始发生前哨战时，首先北平学生爱国会即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给傅作义将军发电慰问我军谓：“伪匪军进犯，当地爱国驻军，奋起抗战，望抗战到底，以完成千古之英雄事业。”全国各界人士亦自动捐款慰问。北平学联还决定大规模的支援绥远抗战，发起万件皮衣运动，提出“千针缝，万针缝，送给绥东战士穿着杀敌冲锋”。当历史上有名的绥东抗战爆发后，迅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这种形势下，生活在绥远的人们，特别是一些文艺青年，当敌寇加紧侵略，祖国、家乡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莫不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积极投入这场火与血的斗争。塞原社同人，在穆女、尘影离绥后，只剩下我和佩莹，我们和绥远文艺界的朋友们以笔为武器，和敌人进行战斗。

佩莹曾陪同范长江和广西慰问团乘汽车到红格尔图前线一带慰劳、访问，写了沿途见闻和前线我军士气昂扬的长篇通讯“壮哉，红格尔图！”。我从绥东前哨战已经发生的九月份开始，即写了大量的诗文。如“起来，大青山下的兄弟们！”、“悼”、“为和平而斗争”、“联合起来”、“起来，绥远的姐妹们”、“前进，英勇抗敌的兄弟”，还写了争取瓦解伪匪军的“给敌人阵营里的士兵”等等，发表在我们编辑的《塞原》、《塞北诗草》和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有些诗文在赶不上《塞原》、《塞北诗草》出刊的时候，为了及时和影响大些，随写随即登载在绥远西北日报副刊《塞风》上，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卅一日这一期的《塞风》，就一次发表了我三首抗战诗歌。同时，我们在自己编的刊物和副刊上，组织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寇在华北野蛮暴行的诗文，如雨三的“真战士的态度”，绿涛的“树立反帝文艺”、“死战到底”，克夫的“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芙茵的“莫忘记”，存之的“忆东北”，袭归的“东亚的血钟响了”，靖夫的“谁说我们还在忍耐”，吴逢的“收回冀东”，枯心的“亲善提携的真面目”、“燃起强烈的怒火吧”，泪痕的“这是人道吗”，冰之的“我们愿自掘土坑活埋吗？”，士杰的“准备起来”，武克的“索回血债”，孤雪的“急出眼泪来的怒吼声”，必力的“国防线上”等。

当时，全国人民和绥远同胞，一方面为绥东我军击退伪匪军和收复百灵庙的胜利而人心振奋，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敦睦邦交”的卖国投降政策下，仅仅满足现状，只要敌人不再进攻，就不进一步反击敌人，收复失地而感到失望。就是在绥东抗击敌人的时候，绥远的报纸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提“抗日”两个字眼，我们写的诗文，凡是提到抗日两个字的时候，发表时都得改成“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变成“打倒××帝国主义”，或者开“天窗”（即报纸版面成块空白无字）。那时，在日寇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情况下，

只要稍微有些头脑和爱国心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绥东抗战，从表面上看是所谓“蒙古军政府”和“满州国”的伪军与绥远地方部队之间的冲突，而事实上是嗜血的日本帝国主义与被残伤的中华民族的又一次肉搏。很明显“中国不是战，就是降”。投降就是亡国。现在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到了一个算总帐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把局部的抗战转化为全面的抗战，只有全国总动员，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的目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在某些报纸刊物和社会上散播着一些“唯武器论”和“无准备论”的错误观点，迷信武器，认为我们武器不如敌人，日寇侵华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我们则毫无准备，需要有一定时期的准备才能抗战。为了用事实向群众宣传并批驳这些错误的论点，坚定人们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用大量事实说明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在“把我们的笔集中起来”，一文中指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五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敌人完全灭亡中国的侵华政策是不变的，我们妥协、退让只能使国土一天天的沦丧，越跟敌人讲“亲善”，我们的危机也越加重。我们如果不愿走向亡国的道路，只有全国总动员起来，同我们民族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绥东抗战的胜利，百灵庙、大庙子的克复，完全粉碎了“唯武器论”和“无准备论”的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抗战的决心。最后号召在国防最前线的绥远的作家们，把我们唯一的武器——笔，贡献给神圣的民族解放运动，描绘出我们民族当前的危机，唤醒尚在迷梦中的同胞，向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动员他们、组织他们、鼓舞他们振奋精神，来参加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把我们的笔集中于抗日救亡的神圣工作。

绥远的老作家马映光（马士瑛），那时，正在绥远省府为了接待全国各地来绥的慰问团体，而成立了一个既是接待又是后援会性质的一揽子组织，从各机关抽调一些人在那里工作。马在那里搞宣传工作，也给我在那里挂了个名，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具体

工作。他想做些工作，准备出一个“国防文学”的刊物，约我与些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我写了一篇“谈国防文学”。过了两个月，马映光对我说：“国防文学”没有按原计划出成，并把稿子退还给我。我把这篇文章寄给绥远西北日报副刊《塞风》发表了。马映光写的两篇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后来也发表在《塞风》上，我记得其中一篇是“国防文学的中心思想”。刘映元也写了一首题为“国防文学”的诗，发表在《塞北诗草》第2号。

当时在国民党政府“敦睦邦交”的投降政策下，爱国之士执笔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也受到重重阻挠和刁难。在我编辑的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因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竟引起一些反动派在国民党的一个报纸上公开造谣污蔑，大嚷大叫地说社会日报副刊宣传“人民阵线”，引起了一场争论和广泛的注意。本来人民阵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回事，是在两个不同的国情下结成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阵线。人民阵线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大众及其所属各政党（当然也包括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防止国内法西斯化结成的阵线，共同制定纲领，共同努力实现，以保持民主制度，消灭残余的法西斯势力，胜利地侵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从而逐渐掌握政权，不过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和平的选举的办法。因为只有掌握政权，才能实现他们的纲领。当时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我们的敌人既不是政府一方的，也不是人民一方的，而是整个民族的，只有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保卫祖国。后来我们又发表了两篇文章，从理论上结合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加以澄清，再加上政府中调查了解这个问题的进步青年狄敏达和白丁在暗中的帮助，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绥远的各个报纸副刊，特别是西北日报副刊《塞风》在停刊前，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抗日救亡、团结海外的诗歌和文章，在一

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报纸作为诗歌喉舌的作用，表达了当时绥远人民抗战爱国的热情，做了一些宣传、教育、唤醒群众的工作。可是，这些都引起当局的注意。自一九三七年一月廿七日绥远西北日报副刊因为登载翻译的“毛泽东会谈记”而编者易人后，接着很快便把副刊《塞风》改为《汗魂》，第二期开始第一篇文章“所谓‘人民阵线’”就出现了对共内容的诬蔑之词了，同时我们编的《塞原》、《塞北诗草》也都相继被迫停刊。我们宣传活动的阵地也只剩下社会日报《秋苑》和《燕然》半月刊了。但是我们仍然坚持用笔战斗，发表不少抗日救亡内容的诗文，只不过要求文章尽量写得更短些，精练些，战斗性更强些。

此外，我还以社会日报副刊编辑，绥远“民先”队长等身份和一些进步的文艺团体或者他们中的个别成员、北京“民先”总队部介绍来的一些同志有所接触，并协助他们做了一些工作。下面叙述的就是我所接触、了解的当时文艺界的一些活动。

陈波儿——在冀南演“放下你的鞭子”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上海左联组织的以陈波儿为团长的上海妇女儿童慰问团一行三十人到归绥慰问。当时到车站迎接他们的绥远军政各界人士很多，我也以“漠南剧团”的名义，到车站欢迎。记得那天刚一下车的陈波儿，头戴皮帽、脚登长统过膝的毡履“加登克”，大有塞外蒙古姑娘的风度。原来该团从上海出发时仅十人，抵平后，公开招请平津两地妇女界参加，平津两地参加者颇多。于是该团扩大了，来绥时已有三十余人。她们下榻大北旅社。当天下午二时至四时她们就到各医院慰劳伤兵。接着又在归绥进行了两场慰问演出。演出的主要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这几场剧轰动了整个归绥，大大鼓舞了绥远各界人民抗战救亡的爱国热情。

在演出前她们宣读了“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告前方将士书”。

敬爱的前方兄弟们：你们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是多么辛苦。风刺裂了你们的手，冰冻僵了你们的脚，你们吃不饱、睡不足，整天奔跑，夜夜拼命，但是你们不怕，寒风吹不冷你们的心。你们反而越打越热，冰雪冻不住你们的血，你们反而越战越热。你们不但夺回红格尔图，而且收复了百灵庙；不但克服了大庙子，而且打得德王动摇，王英部下反正，以至敌人溃不成军。这是多么英勇的战斗！这是多么热烈的进军！兄弟们！谁说中国没有人？只是过去不齐心；谁说中国不能打，只是过去不动手；谁说中国不能胜？只是不能坚持到底。兄弟们！我们明白了，只要全国团结，万众一心，哪怕敌人飞机大炮，哪怕失地不能收复？现在全国民众都来做你们的后盾，他们捐款捐衣送吃送药，我们就是来送东西的一个。我们很惭愧我们妇孺做不出什么，可是我们有一颗真挚的心，我们愿号召全国的人们，一致来援助你们，并希望你们拿事实来告诉全国上下，对内团结、对外抗战，不能御侮救国，干啊！兄弟们！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全靠你们呢！

实际上，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慰问信的内容也表达了全国人民播扬抗战的爱国热情和决心。

陈波儿因病未能出场，由朱洪穆之女。第二天陈波儿病稍好些，便带病登台演出。地点是上海“国殇”纪念堂。我随“救国”纪念堂时，剧场已经坐满了人，过道上也还站了不少人。原来五个长条靠椅坐三个人，现在有的已经挤着坐四个人。首先演出的就是“放下你的鞭子”，演的非常逼真。当演到赫梅向青海哭诉其悲惨身世时，动真感情，泪流满面。观众全被角色演得融为一体，极大地感染了观众的情绪。演至此，观众席上已有不少人抽泣、流泪，发出一片唏嘘之声。这时青年亦悔愧已行动，动员大家帮助父女，

这时观众纷纷往台上投掷铜元、银币、纸币。我也淌着泪把我身上带的仅有的一些钱投掷台上，一直到闭幕还有人往台上掷钱，青年工人帮助父女俩捡钱，情景十分动人。这出剧演出很成功，固然是因为演员们有很深的艺术造诣，演得好，但也反映了当时归绥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对东北三千万同胞悲惨遭遇的同情，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共卖国政策的极大愤慨。

这一场是由崔嵬同志饰父，陈波儿同志饰女，郑秋子饰抱打不平的青年工人。郑秋子饰的工人，是预伏台下，中途从台下上去的，真真假假、已难分辨，台上台下融成一片，收到极好的演出效果。

“放下你的鞭子”谢幕后，六位男女和儿童组成的合唱队走上了舞台，由崔嵬指挥唱救亡歌曲。他们先后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救国军歌”等四支歌，每一支歌唱完后，观众都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们把四个歌子唱完后，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一直鼓个不停。他们大概只准备了这四支歌，再不会唱别的歌子了，可是他们被观众火热的激情鼓舞着，感动的既不好意思谢幕，又没有别的歌子可唱，于是又重复地把这四支歌子唱了一遍。唱完后，观众狂热般的掌声仍然不止，一直到他们重复演唱了四遍，观众仍然热烈鼓掌，不让他们谢幕，当时场面的感人，是很难加以形容的。最后，主持晚会的负责人和他们一再向观众解释下面还有节目，不要影响下面的演出，掌声才逐渐停息下来。接着演出了“张家店”，这是一个以绥远抗战为背景，表现民族团结抗战力量为内容的剧。崔嵬编剧兼导演，并由他扮演剧中之张老头，表情动作，极为逼真，张光子扮演张子，陈述蒙汉民族群众团结自卫抗战的情形，表演得亦很动人。这幕剧也受到观众的欢迎，博得热烈的掌声。

演出后我到后台去祝贺他们演出的成功，后台挤满了人，陈波儿这时头上仍然戴着皮帽，脚上穿着“加登克”长统毡靴，可是上身却披了一件白茬老羊皮袄，已不似蒙古姑娘，完全像一农

村姑娘的模样了。杨令德先生还为她 and 崔嵬同志在院子里摄影留念。

吕骥和业余歌咏队

青年音乐家吕骥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应绥远省政府的邀请，以音乐到绥推动抗战救亡运动的，并被聘为绥远省军政各界音乐教授，训练歌唱的总指导。我久闻他的大名，彼此却并不认识。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李柯因事从东京回到归绥。在四月间的一天我们在街上相遇，她对我说：“吕骥病了，重感冒，住在公教医院（解放后曾改为市立医院）。”她说这个医院平时不准探视，约我星期六早上六点钟，在公教医院旁边的小门那里相会，从那里进去看看吕骥。可是她并没有告诉我吕骥同志住在几号病房，也没有说清楚我们去看吕骥是到他的病房，还是早上他出来散步时相见。尽管如此，星期六那天早上我还是去了。因为我从未进过公教医院，推小门没有推开，又走到正面，大门也是紧闭着。我就在那里徘徊了大约一个钟头，也没看见吕骥的影子，我只好扫兴而归。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有人到我工作的民众图书馆找我。我见来人身材不高，穿着西装，圆盘脸，浓眉大眼，是二十几岁的一个英俊小伙子。他操着南方口音先自我介绍说：“我是吕骥，临来前，有些曾来过绥远慰问的熟人和‘民先’总部的人都向我谈到你，让我到绥远后找你了解一些绥远抗战救亡工作的情况，你在这里是李柯告诉我的。”我十分热情地给他让座倒水，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他见图书馆经常和我一起办公的录事张先生坐在一旁，不便深谈，便约我一块出去走走。我们出了图书馆，边走边谈，他问到绥远抗战动员的情况，我就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我先告诉他，绥东绥北抗战，打得不错。但在群

众的组织动员工作上却做得很差，原因是国民党绥远政府，害怕群众起来。学生工作从去冬今春才开始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但力量还是薄弱的。我还向他讲了去年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我们组织游行失败的事。事情是这样的，去年“一二·九”一周年将到时，我们组织“民先”队员和一些进步同学准备发动各校同学举行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游行示威活动。事前我们在各校做了联络动员工作。正在这时，日本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在归绥城西河沿西岸上一所土财主的院里设立了“羽山公馆”，把侵略的魔爪直接伸入绥远。我和武佩莹、袁尘影、一师的吴殿甲、一中的赵维新、高步义等爱国同学联系，并通过他们和各校爱国同学联络发动归绥各中等学校学生起来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并到羽山公馆示威，直捣日本特务机关，驱逐日本特务羽山。我们事前刻印了标语、口号和传单。一师同学还拟了响应“一二·九”运动宣言，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特务”、“羽山滚出绥远”的口号。甚至我们连各校出发游行的路线等工作都确定了。我们还邀请杨令德先生到时前往拍照，向外介绍报导。不料反动政府事先得到了消息，在准备游行的前一天，由伪教育厅出面宣布各校一律提前放寒假，勒令学生当天全部离校。结果这次游行示威的计划便被破坏了。

我还告诉吕骥同志：现在情况虽较以前好些了，由于绥东抗战的胜利，群众抗日爱国热情高涨，各校“民先”队员又发展了一些，“学联”也成立了，基本上掌握在“民生”队员和进步同学手中，可是发动各阶层群众还是个问题……

吕骥同志鼓励我们要有信心，积极耐心工作，并向我们介绍了上海、北平抗日救亡工作的情况，还根据我谈的情况，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供我们参考，希望我们可能的话，也要在手工工业工人、店员中做些工作……

谈着谈着天已黄昏，他便请我到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吃着

饭又谈了很久。

以后他又约我谈过两次。

吕骥同志打算通过新生活运动会组织一个业余歌咏队（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正在全国推行什么新生活运动，各省都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他想利用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为了让各界音乐爱好者均有学习歌曲的机会，实际上利用它来培养歌唱救亡歌曲的骨干，推动抗亡歌咏运动的开展。他找我让我尽量动员“民先”队员报名参加。后来业余歌咏队成立时，报名参加的总共不到卅人，“民先”队员就占了三分之二，我也参加了。

业余歌咏队成立的那天，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王××讲了话，之后吕骥同志也讲话。他讲的大意是：歌曲分积极的和消极的，当此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我们要注意提倡积极的歌曲。绥远现处国防最前线，我们要以歌曲鼓舞全省军民守土抗战的精神……。他讲完后就开始学歌，铅印的歌篇已印好了，我们学的第一支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由吕骥同志一句一句地教。因为参加歌咏队的大多数是中学的同学和少数有一定文化的爱好音乐的店员，经他指点，学得很快，当天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学会了。第二次学的是“青年战歌”，第三次学的是“新生活运动歌”。接着学了“救亡进行曲”、“新的中国”、“民族解放进行曲”、“大众的歌手”、“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这一支歌的名字记不起来了）、“救国军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我们要做一个新的英雄”等歌曲。我们学唱这些歌曲时，情绪高昂，热血沸腾，受到莫大的鼓舞，感到这些歌曲，充分表达出当时我们满腔爱国热忱和保家卫国的决心，激励我们积极投入全国人民热烈支援的绥东抗战的救亡运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业余学习，歌咏队已经学会了廿几支歌了，在吕骥同志的亲自教导下，识谱能力也普遍有所提高。

在学习过程中，“九·一八”纪念堂举行过一次游艺会，吕

骥同志亲自交涉好，告诉我们歌咏队要在游艺会上演唱一次，准备唱七、八支歌，他指挥我们又练习了几遍，并嘱咐大家明天下午两点前集合。第二天下午我们都准时到达了。大家在吕骥同志的带领下，热情充沛地到了“九·一八”纪念堂。在两个节目的空隙间，我们登台演唱了。吕骥同志指挥我们唱了“义勇军进行曲”、“青年战歌”、“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每个歌子唱后群众都热烈地鼓掌，可是我们刚唱了三四支歌，主持游艺会的×先生突然让赶快闭幕，不让我们继续唱下去了。吕骥同志只好带领我们退出会场，大家心里非常气愤，但谁都没有作声，默默跟着吕骥同志走了回来。但是心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虽然，全国各地对绥远抗战的热烈支援，象春风一样温暖着人心，但塞外的严寒，并没有因为人民的热情沸腾而解冻。

不久，歌篇上印的歌子我们都学会了。吕骥又简单地教了我们四分之二，四分之四的拍子怎么指挥，业余歌咏队就结束了。

吕骥离绥之前，又找我谈了一次。记得这次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那天月亮很明，我们相聚在龙泉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那时，公园里不知是哪个慰问团正在露天给群众演电影，我们坐在离演出不远的小亭子旁边，两人谈了很久。这次主要对当时绥远抗日救亡的形势交换了些意见，并在工作方法上，给了我一些宝贵的指导。

吕骥同志在归绥这一段时间，对开展绥远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做了不少工作，他除教傅作义部官兵唱救亡歌曲外，并想方设法举办了业余歌咏队。这个歌咏队培养了一批教唱救亡歌曲的骨干，“七·七”事变以后，在绥远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些慷慨激昂，雄壮嘹亮的歌声，曾经产生过鼓舞人们坚定的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决心和力量。从我个人来说，在我和吕骥同志几次接触和谈话中，也得到他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使我感到工作更有信心，更有办法。

“塞外的狂涛”

在绥远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召开的全省军民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前，以何文瑾为首的太原新生剧院慰问团来到了绥远。他们在三月二十二和二十三日慰问演出了两场。演出前导演马瑜同志带着张季纯同志的一封信来看我，因为“滇南剧团”成立和公演后，我经凌信子介绍和太原搞戏剧运动的张季纯同志通过两次信。这次他来信主要说他因事未能前来，非常遗憾，希望我在新生剧院演出时，尽量予以协助。

“新生剧院”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太原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成立的。来绥慰问前他们排练了三个节目：“塞外的狂涛”、“最末一计”、“不撤退”。

马瑜看去有二十四五岁，瘦长的身材，脸也显得很清瘦，好像多少还带点驼背，也许是因为经常演老头而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缘故。

他和我谈话中主要讲了他们来绥演出的目的。记得，有几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次慰劳伤兵，不只是在物质上的。针对他们的痛苦，给他们一点真挚地安慰和娱乐，慰问他们精神上的痛苦，使他们在痛苦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我们所需要供给伤员的娱乐，不是为享受的纯粹娱乐，我们反对粉红色的娱乐，我们要消灭粉饰太平的娱乐，我们要把最有力、最前进、最能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国防话剧，贡献给受伤的士兵。使这些为国流血，为国效命的健儿，在床畔呻吟之余，来接受我们虔诚的敬礼！使他们感到抗击敌人受伤牺牲是光荣的、神圣的……。我们要把我们剧院来绥慰问的目的、我们的想法向绥远各界人士加以宣传。因此，希望帮助我们能在演出时，在报纸上出个特辑，能使来绥慰问的目的为大家所了解……”

我当时同意和赞许他们的这些看法，并答应在我编辑的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按他们的要求，给他们出两期“特辑”，只要稿子齐了，时间在哪一天，我都可以为他们安排。

演出前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约凌信子到他们住的旅社去看他们，马瑜和一位女同志陈爱兰接待我们。他们正在做演出前的准备工作。有的在整理饰景、道具；有的在对台词。他们住的几个房间都不大，人们出出进进显得乱哄哄的。凌信子和他们中间有的人还很熟，难免双方紧紧地拉着手，叙叙旧情，我问马瑜同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他说：“能在报纸上为我们出两期特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帮助了，其他都有接待组给解决了。”说着他把稿件交给我。我们看他们很忙，就告辞出来。当天中午我就把他们“特辑”的稿件发了（副刊是每天中午发稿），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他们晚上演出之前，“特辑”已经见报了。

演出那晚，我到剧场看了他们的演出。

“塞外的狂涛”由张季纯编剧，马瑜导演。剧情是敌人企图占领绥远，他们利用甘愿做汉奸的伪匪军，来扰乱绥东，许多难民，听说敌人来了，都向西逃亡。伪军团长的卫兵和几个士兵，给伪团长找到了一座比较宽大空荡的房子，在套间的墙脚，发现了一位没有逃脱的老翁，老翁对伪军的光临，最初有些惊慌，后来他听了这一伙伪军士兵的私下交谈，知道他们和他们甘心投敌卖国的长官不一样，他们是被骗利用才做了汉奸的。于是，老翁很慷慨地把他已经埋藏起来的東西，又取出来给他们用，对他们象对客人似的，使这些士兵十分感动，感到再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们再不愿做敌人的走狗，他们要朝东攻。这时，某特派员来监督他们，为了正义，英勇的铁牛，用他的刺刀结果了特派员的命。

接着他们也得到团长“掉转枪口向东开进”的命令，于是，他们跟随着悲壮的军号出发了，狂涛般地震动了塞外的草原。

演出时，马瑜亲自饰老翁，化装得维妙维肖，表演亦很纯熟，饰李铁牛的文瑾，也演得恰到好处，博得观剧的士兵、轻伤员同声称赞和热烈的掌声。

他们来的人不多，非常精干，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导演马瑜不但亲自参加演出，还兼剧务主任，贾克和陈强除参加演出外，贾兼管道具，陈负责布景。我和贾克、陈强仅仅在他们住的旅社匆匆见过一面，看过他们一次演出，再没有其他接触，所以彼此印象很淡。一九四〇年左右，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贾克随战动剧社合并到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后陈强也随联大文工团的一部分同志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我们就在一起工作、战斗了几年。可是，那时并没有想到一九三七年绥东抗战时，到我故乡演出的山西新生剧院还有他们俩位，并且我们之间也有过一面之缘。只是在一九七九年春我到北京治病时，翻阅过一些卅年代报纸上的资料，才知道那时他们到过绥远，并且忆起他们当时演出给我的印象。

我在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为他们发表的“山西新生剧院旅绥公演特辑”第一期上，有杜任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新生剧院为什么来到绥远”，主要是说明他们来绥慰问演出的目的、意义，着重强调“目前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时期，全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不愿做亡国奴，那你就起来抗敌；一条是不能奋勇杀敌，那你只好等着做亡国奴。绥远是国防最前线，当敌人以无情的炮火，来侵并我们的山河，毁灭我们民族生命的时候，后方的同胞，有没有闻到烟火，闻到血腥？大家明白前线武装的同志，他们为谁杀敌，为谁抗战，为谁流血，为谁拼命？

啊！光荣的抗战，胜利的开始。

我们要支援他们，做他们的后盾，并把这局部的战争，促进为全面的抗战，要收复失地，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其他内容和马瑜刚来时向我介绍的精神基本相同。此外，就

是介绍“塞外的狂涛”剧情和演员、工作人员表。第二期主要是“最末一计”、“不撤退”两剧的剧情介绍和演员表。这两个剧也演得很成功。他们这次来绥，不但慰问士兵、伤员，给他们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同时对绥远的戏剧运动，也是很大的推动。

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和

《燕然》半月刊

绥东抗战以后，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一片募捐、慰劳声中，绥远文艺界几经协商，塞原社同人武佩莹、我和杨令德、霍佩心、李柯、马映光、郭良才、胡燕丘等发起，并同其他文艺团体联系，在左联负责人之一任白戈同志的指导下，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假绥远新闻社客厅，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文艺恳谈会。这次会议前适逢任白戈、李柯二位同志订婚回家探亲，他们二人积极参加和推动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且都在会上讲了话。李柯还是发起人之一。在这次会上，任白戈同志介绍了日本文艺界近况，最后鼓励大家说：“绥远文艺界的朋友，积极用笔为武器，投入绥东抗战，等于前线战士，至可钦佩。我到绥后，特别感到绥远文艺界责任重大。以我国实例而言，近年来，有若干东北作家，以东北为题材的作品，均感人很深，得到好评，主要的原因是东北作家，对东北熟悉，而在感情方面也较真实，故技巧、修养虽尚未完善，而评价甚高，以其切合现实也。绥远情形正如此，各地作家欲来绥远找题材，但不熟悉，成就不易。在绥远的文艺工作者，则可肩负此责任。现在是绥远文艺界活跃的开始，中国前卫的文艺界的动向与其意义至为重大……。”会上着重讨论了“绥远文艺界目前任务及今后方向”等问题，最后商量

决定为了实现绥远文艺界的大联合集中力量开展抗战文艺，筹备成立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当即推出燕然社、塞原社、绥中文艺研究会、挺进社、心波社、生活讨论会、小喇叭社等七个文艺团体负责筹备，决定两周后开成立大会。

经过大家两周的努力筹备，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报上报导时把“抗敌”两字去掉了）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卅号在土默特旗中学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者共五十余人。首先由霍佩心代表筹委会宣读协会的宗旨：一、本会以协作之精神，实现绥远文艺界的联合，提高人民抗敌救亡的觉悟，充实救亡力量，推动救亡工作。法国作家马尔洛说过：“一切艺术是为充满欲求被创造出来的”。本会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抗敌救亡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总目标，尤其是在国防第一线的绥远，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们，更应把一切个人的情绪或欲求暂时抛弃，在民族的总欲求里，表现我们的生命与工作，所以我们集合起来了。在抗日救亡的总欲求里，我们要团结本省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们，作共同的奋斗；二、刊行定期刊物，把边疆抗战救亡的真象与意见传达给内地，同时将内地消息，报导给边疆的人们；三、举行定期座谈会。最后选出：霍佩心、杨令德、章叶频、武佩莹、李柯、马映光、侯福荣、狄敏达、李丕才、王如善、樊长荣、霍世昌、张执环、胡彦球、郭良才、武逝然、杨如玉、韩毅、任恕、张祝三、卜效夏等二十一人为理事。霍佩心、杨令德、武佩莹、章叶频、马映光、郭良才、张祝三等七人为常务理事。又选出霍佩心、杨令德、章叶频、张祝三、郭良才等人为出版委员会委员。由杨令德负责召集。

《燕然》半月刊是由霍佩心、杨令德和塞原社的袁尘影、武佩莹、我与绥中教师胡燕丘、郭良才等在一九三六年共同创办的一个文艺半月刊。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团结绥远的文艺工作者，活跃绥远的文艺界。创刊号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出版。十六开本，廿四页篇幅，封面也是白报纸印的，非常素淡，但看来

却也大方雅致。虽然是薄薄的一本，但在当时绥远的印刷条件和我们的经济情况说来，已是很费周折的了。创刊号包括论文三篇（其中翻译两篇），小说一篇，诗五首，散文二篇。其中有杨令德先生从世界语译的“我的母亲”，佩莹翻译的“菩提树”，我的文章“关于诗歌创作诸问题”，郭良才的“现代美国小说之成长与维拉·凯漱女士”，尘影的散文“雪”，葛垒的小说“丽妇桥”，佩心的诗“我愿”、“春的踪迹”，嘉宾的“塞外春光”等。这个刊物出版后，在当时引起绥远文艺界极大的注意。创刊号出版后，绥远西北日报副刊《塞风》，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都很快有人写文评论，为它的问世欢欣鼓舞，认为“这是绥远文坛的一件大事”，“给塞上增添了一支开拓文艺园地的生力军，是值得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们一读的”。四月十八日《塞风》还特为它出了一期《燕然》创刊号批评专号。《燕然》上有的文章，如“关于诗歌创作诸问题”（创刊号）、“伊金霍洛巡礼小记”（第八期）《塞风》还加以转载。在“批评专页”出过以后，仍不断有人写文章祝贺《燕然》的诞生，评论《燕然》上发表的作品。

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燕然》半月刊已出了十五、六期（现已发现的十一、二期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后来改为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继续出版，起到了团结绥远文艺界，开展抗战文艺的作用。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才因种种原因停刊。《燕然》半月刊，虽然仅仅昙花一现，却是从“五·四”到“七·七”绥远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殿军。

绥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绥远队部的建立

一九三四年冬，在任白戈同志爱人李月轩家里我认识了宋竹同志（宋守莲，现任北京市科委主任），那时她还在归绥中学高中读书，是个思想进步，很有理想的女同学。一九三六年冬在全国各界热烈支援绥远抗战的劳军热潮中，宋竹同志作为学生代表，随山东齐鲁大学以李耕田为首的三人代表团来绥慰劳，我们又一次相见了。这次相见，我们除了交换关于绥远抗日救亡工作的意见外，她还给我介绍了郑天翔同志。她说，郑天翔同志在清华大学读书，思想很进步，是从事学生运动并在学校负责编刊物的。当时，我就表示非常愿意结识一下郑天翔同志，于是，宋竹就写信把我介绍给天翔同志。正好这年冬天郑天翔同志和张士珍同志也回到了绥远。大概是宋竹早已把我的情况介绍给老郑的缘故吧，我们一见如故，郑对我十分信赖。郑和张让我约几个思想进步，抗日工作积极的青年和学生，一起谈谈绥远如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问题。记得那天我们集会在旧城麦香村饭馆的一个单间房子里。因为时间仓促，除郑、张和我们之外，还有和他们同时到图书馆找我的吴殿甲（一师的学生）、赵维新（归绥中学的学生）、吴秉周（也是一师的学生）等六、七个人。我们边吃饭边谈，郑和张向我们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并告诉我们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和同学，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基础上，北平爱国的青年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现在全国各地也都成立了“民先”。他们问我们：“在这种国难当头，

绥远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绥远的爱国进步青年学生怎么办？是不是也应该成立‘民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我们几个人听了心情都十分激动，表示愿意立即成立，并向他们介绍绥远的抗日救亡情况，认为许多进步青年和同学爱国热情很高，就是无人领导，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正需要组织起来，以“民先”为核心，团结一切爱国的青年和同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于是会上我们便确定再联络一些比较进步、可靠的青年，成立“民先”绥远队部。我们第二次集会是在小西街四十九号我家里举行的，那天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次参加的几个人以外，还有武达平、苗顺栗、郭新清（女）、张和（即张又新同志）、高德慧（女）、贾鉴秀（女）、张志德等十几个人，一间大的房间挤得满满的。会上，天翔同志把当前华北形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然后把成立“民先”的意见、“民先”的组织、任务、对队员的要求给大家作了说明，并且讲述了北平“民先”队员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些可歌可泣的生动事例。接着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参加“民先”，成立绥远“民先”队部。为了联系方便，我工作的地方适中，最后大家推选我担任绥远“民先”队队长。我们又作了些具体分工，达平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其他几位同学负责各校学生的工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绥远队部就这样正式成立了。郑天翔同志回平后，经他介绍和北平“民先”总队部取得直接联系。记得在那天临散会的时候，我还把我们编辑的最近几期《塞原》文艺旬刊，分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请大家给《塞原》写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民先”绥远队部成立以后，首先，我们在各校进步同学中发展了一批队员。同时，我们写了大量的支持绥东抗战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的诗歌文章，在《塞原》和绥远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以及绥远西北日报副刊《塞风》和朝报《小喇叭》上发表。青年音乐家吕骥在绥组织业余歌咏队，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时，我们动员“民先”队员积极参加，我和郭新清、屠

忠顺、高德慧、梁建一等十几个同志都参加了，这个歌咏队，为以后在绥远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培养了一批歌咏骨干。同时，“民先”队员在各校利用一切机会出去宣传、募捐、参加前线慰问、帮助各地来绥慰问的团体和其中的进步人士了解情况，进行工作。我编的社会日报副刊《洪荒》，就为太原新生剧院、新安儿童旅行团出过两次或三次的专刊，介绍他们来绥慰问演出的意义、目的和活动情况。我们“民先”队员也参加了不少进步慰问团组织的关于形势的座谈会。通过绥东抗战的胜利，揭露了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指出它是一条亡国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十项主张，才是抗日救国的唯一出路。积极支持拥护傅作义将军坚持绥东抗战到底，并希望能够把绥远局部的抗战扩大为全面的抗战。发言中，大家通过许多生动具体的事例，委婉而又很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些道理，使人感到合情合理，很受教益。原来有些平时只顾埋头读书，不关心国事的同学，抱着看看去的心理，参加过一次座谈会后，思想上也有所转变，对参加会议的“民先”同学说：“如果以后再开这样座谈会时，请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告诉我。”这些同学以后对抗日救亡工作也逐渐热心参加了。

“民先”绥远队部成立之后，北平“民先”总队部不时的给我们寄些书刊来，尽管有的被查扣，有的收到很迟，这些材料对我们工作还是起了指导作用。同时在各个慰问团来绥劳军时，有些人都是经过北平“民先”同志的介绍，来找我们了解绥远抗日救亡工作的情况，并且和我们交换一些意见，有的还给我们带来一批进步的书刊。这些同志的到来，对鼓舞我们的斗争热情，鞭策我们努力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在总队部和各地来绥同志的指导帮助下，我们绥远“民先”队部的同志，方向明确，始终不渝地积极工作着。在绥远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二、“民先”总队部派人来绥传达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我收到郑天翔同志从北平寄来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叶频：

××先生和××女士订于二月四日在民国学院××教室举行结婚典礼。仪式非常隆重，届时各地亲友均来祝贺，希你到时也能前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来时请到××楼×号找××先生接洽。

庭祥

一月××日

这是“民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书。当时，我很想去参加，但是怎么凑这笔旅费呢？来回火车就要十几元，加上伙食费最少也得二十元。那时，我在民众图书馆工作的薪金，每月才十八元，我都拿走，家里母亲和弟弟怎么生活呢？！而且每月一发薪，我就把钱都交给母亲了。当时，我手头连一两元也拿不出来。而我给《塞原》、《塞北诗草》写稿都无稿费，编辑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也无编辑费，完全是义务，只是为了占领这块阵地，我才在尘影走后接过来继续编辑的。我给《塞风》、《洪荒》写些稿子，每月也只能得到几元稿费，仅仅够我买书和零用。另外，如果我离开一个时期，又请谁来帮助我临时编辑《洪荒》呢？这些问题都使我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时间又很急，我只好和达平与附近住的一些“民先”同志商谈这个问题，可是大家都是些穷教员、穷学生，一时也想不出筹措办法。有的同志提出，如果咱们不能去人参加，“民先”总队部会不会派人来传达呢！我觉得这个意见也是个办法，试试看吧。于是，我给天翔写信说明我们路费困难，不能参加他们的婚礼，感到非常遗

憾，希望他们参加的人能来为我们说说他们婚礼的盛况，也让我们为他们高兴、祝愿！

在三月初的一个黄昏，绥中“民先”负责人赵维新同志匆匆到我家告诉我，说北平“民先”总队部派人来归绥传达“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来了，让我和达平晚八时到牛桥街庆凯桥东边那家名叫“四海成”旅馆的第三间北房，在门上敲三下，就有人开门。因为那个房间周围可能有密探，他嘱咐我要小心一些，说完他另外通知达平去了。

吃过晚饭，已经七点多了，天色也渐渐黑起来，我找到达平急急忙忙地向目的地走去，找到了那个旅馆，我们按照约定的暗号，在门上敲了三下，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我们自我介绍后，他紧紧和我们握手，并说他是北平×大学的学生，是“民先”总队部派来传达“民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的。我们刚坐下，外面又有人敲门，原来是苏谦益同志（他已出狱半年了），我给他们介绍后，老苏大概是很久没有抽烟了，瘾得厉害，就象和老朋友见面一样，一进门就问：“有烟没有？给一支抽抽。”青年学生给他递过一支烟，他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便在地上来回踱着。于是那位同学就给我们轻轻地传达“民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了：当时全国有六千队员，到会代表二十四人，代表十八个地方队部。会后，凡没有派代表参加的都由“民先”总队部派人传达，这些同志都是自动提出愿意担负这个任务。他就是自动要求来绥远的。他说他这次来绥很顺利，没费什么周折就联系上了。为了防止周围有人偷听，他说的很低、很轻，有时用拉丁化新文字在纸上写着。最后，干脆他靠墙坐在床上，我们紧靠着床边上的一张条桌，挨着他坐在凳子上听，记得他传达的基本精神是：

一、当前救亡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在工作方法上要尽量争取公开合法；

二、要把救亡运动广泛地发展到各阶层中去，特别是工农大

众中去，要使各阶层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适当地配合起来；

三、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斗争已迫近，要加强学习军事，并积极采取各种方式建立群众的武装力量；

四、开展国防文化运动；

五、积极发展“民先”。

苏谦益同志听完后，因为有事先走了。我们又根据绥远当时的情况，交换了意见：一、尽量争取公开合法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二、特别要抓住绥东抗战的这个大好时机，在各阶层中，特别是工农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三、动员“民先”队员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国防文化活动；四、积极在各校进步同学中发展“民先”队员；五、学习军事，建立武装问题，要见机而行，慎重从事，这方面我们既无关系，也无经验，这是个新问题。

这次传达很顺利。传达的同学，一边谈一边用新文字写，我们边听边看，有些问题在脑海里印象较深，记得来传达的同学很高兴我懂得新文字。传达后，这位同学说，他准备最近就要离开归绥。我们和他告别时，依依不舍，虽然夜已经很深了，总觉得会面的时间太短了。当我们出了旅馆来到庆凯桥畔时，环顾四周，并无什么动静，我们分手，各自充满了无限信心和十分愉快的心情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上班以后，我把需要处理的工作抓紧做完，便静坐下来考虑如何传达贯彻“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因为当时“民先”队员大部分是各中等学校的同学，社会上的较少。因此，便个别地通知各校“民先”的负责人，把上述精神向他们进行传达，然后，请他们回去向队员传达。其余的人我们也分头个别传达。经过传达，“民先”队员个个感到心明眼亮，工作方向明确，大家的工作热情更高了。这一个时期，我们具体地做了如下几件事：一、积极参加一切秘密和公开的救亡活动。当时“民先”是秘密的，而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在山西是公开的。根据绥远山西的特殊关系，我们以为在绥远组织“牺盟”也许可以公开活动。于是

我和武达平、吴殿甲、赵维新等“民先”队的负责人都后前参加了组织绥远“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达平是最早参加的）。但是“牺盟”成立后，仍没有能够争取到公开活动。当时我们进行的工作中，一项比较重要而又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就是经过联系，向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输送了几批进步青年，共三十六人，先后到大同集中，由山西“牺盟”总会派汽车接到太原国民师范学习。郑庭烈、张志德、杨植森（曾任四川原梁山军分区司令）等同志就是那时去的。吴殿甲（现任吉林军区顾问）、赵维新（曾在山西粮食局系统工作）、段松林（现任广东航运厅副厅长）等同志是最后一批到达大同的。他们被分配到军政训练班学习。以后他们大多数参加了决死队，成为坚持抗战的骨干。此外，我们和各文艺团体联系，促进和发起组织绥远文艺界抗敌总会；派“民先”队员推动学联的成立，掌握学联的领导；“七·七”事变后，又发起组织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等，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活动。二、利用假期动员“民先”队员、“牺盟”会员和进步同学回乡，在城镇、农村向群众宣传绥东抗战的胜利和日寇侵华的野心，以及绥远的危机等，以唤醒各阶层群众，提高他们抗日爱国的情，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救亡工作。三、在我们编的刊物和各报副刊上宣传国防文艺、国防戏剧、国防诗歌，积极提倡诗歌大众化，开展新诗歌运动。我编辑出刊了《塞北诗草》，并在社会日报副刊《洪荒》上出了《西北戏剧》等以开展国防文化运动。绥远省学联主席吴殿甲等同志，在《学联周刊》，也写了不少关于抗日救亡，青年当前的任务等文章。四、在铁路职工和各校进步同学及青年中积极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归绥沦陷前已发展到一百多人。五、为了学习军事，建立和掌握武装，在“七·七”事变后，我和武达平同志以及大批“民先”队员、“牺盟”会员和潘纪文同志等一起参加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队训练学生的工作，以及训练队解散后，又随潘纪文、郭敬同志等参加了国民兵政训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总之，“民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传达后，我们在绥远的抗日救亡活动更积极、更活跃起来，大多数队员一直坚持到归绥沦陷那天。

三、“民先”和党的关系

“民先”是“一二·九”时代，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一个革命青年组织，全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目的是团结全国革命青年，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是当时青年抗日救国的一支骨干力量，在推动抗日救国工作的发展上，起过很大作用。

“民先”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广大青年学生和“民先”队员，通过“一二·九”运动、“双十二”事变的和平解决等，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正确主张，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力量。从而认清了前进的道路，找到了奋斗的目标。因此，“民先”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但是在当时秘密工作的环境下，“民先”不宣称和中国共产党有直接关系，以便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能保持一个半公开的合法地位。

我们绥远“民先”在和那些领导“民先”的同志相互接触中，从他们工作和思想表现以及艰苦奋斗的作风等方面看，都明显地觉察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而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秘密工作时期，只是彼此心照不宣，避免暴露。实际上，从开始领导建立绥远“民先”的郑天翔同志，来绥传达“民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志，在归绥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潘纪文同志，以及“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一九三七年七月间“民先”全国总队部派来领导绥远“民先”的郭敬同志，他们都是中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领导下的共产党员。

因此，可以说明：“民先”是党领导的地下革命组织。“民

先”执行的任务，是党组织交待和布置的任务，“民先”队和党员领导人的定期和经常联系，是以“民先”关系对党的组织联系。“民先”的工作就是党的外围工作。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绥远“民先”队员有一百多人。总队部来的郭敬同志配合原来在归绥工作的潘纪文同志，除和我、武达平等同志直接联系外，并对青年男队、女队、平绥铁路青年工人队进行了组织领导。

绥远“民先”从绥东抗战到芦沟桥事变后一年多，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知识青年和蒙汉人民进行了组织和宣传活动，加强了军政人员的培训；开始学习军事，注意抓武装的工作。

绥远沦陷时，“民先”队员，除少数留在绥中地区隐蔽活动外，大部分随部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撤退到绥西后套，坚持绥远抗战。一部分退往晋北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到了延安。不少人在革命征途中，由“民先”队员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在延安、在华北敌后游击区、在内蒙西部大青山和晋绥抗日根据地，散布着从绥远“民先”的幼芽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

回忆起来，感到幸福和自豪的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经受了残酷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受到党多年的培养教育，我们要继续发扬三十年代“民先”队员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思 念

——记绥东抗战时外来的两个文艺青年

和所有的人一样，在我这一生中，结识交往的人是无法数计的。特别是在我参加革命之后的四十几年里，因为工作的需要，我接触、熟识的同志又何止成百上千，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形象轮廓，差不多都被无情的岁月慢慢地冲淡磨平，有的甚至完全忘却了，清晰地留在我记忆里的，只不过是少数。就在这少数的一些人中，尤使我难以忘怀的，是绥东抗战时从外地来绥远参加抗日的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个叫狄敏达，一个叫白丁。

一九三六年冬季，绥东抗战爆发，受到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支援。外地来绥远慰问的代表团和来绥远要求参加抗战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不绝。那时，我已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绥远“民先”队长。然而，我公开的身份依然是绥远民众图书馆的事务员，并继续以“塞原社”成员的身份，编辑出版着塞原社在西北日报上辟的副刊《塞原》、《塞北诗草》和社会日报副刊《洪荒》。

那些日子，北京“民先”同志经常介绍一些外地来绥远慰问的团体或“民先”队员，找我了解一些情况，我也协助他们做好来绥的抗战宣传工作。记的我接触过的，有前文已介绍过的陈波儿、崔嵬、吕骥等，还有新安儿童旅行团的汪达之、朱金生（后改朱力生）、范政，太原新生剧院的马瑜，山东齐鲁大学慰问团的宋竹，山西妇女看护队的宋维静，华北战地救护队的白励真和平津沪各地来绥慰问的学生代表等。

一天，我正在民众图书馆值班，一个个子不高的人一跛一颠地走了进来。他穿一身黑色学生装，披着旧棉衣，长着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脸色微黑，鼻梁高挺，深陷的眼窝嵌着两颗大而亮的眼睛。

他操着浙江话比划着问我：“先生，有什么好书吗？”

我看着他，先没有吱声。他问得太急躁，太笼统。什么算是好书呢？

“好书嘛？那要看您喜欢什么书了，读者把自己爱看的书，都算做‘好书’。”我终于平静地开了腔。

“哦，对对。”他大概意识到自己过于急躁，问得欠妥，抱歉地笑笑，说：“比如，高尔基的《母亲》，有没有？”

我瞟了他一眼，心想，该不是垂钓的特务吧？革命文豪高尔基的巨著《母亲》，当时已被国民党查禁，市面上早已绝迹，他并没有查阅图书目录箱，怎么竟毫无顾忌地打问并想借这本书呢？但再一想，图书馆既然有这本书（象高尔基的《母亲》这样的革命文艺书籍，馆里有数十种，都是当年高沐鸿同志任馆长时，购进的。），他想看看又有什么不好！于是我告诉他“有”。

他听说有，高兴得眉飞色舞，看看周围没人，连声说：“好、好，就借它。”于是他拿过借书单，在上面写着：住址——大北旅社，姓名——狄敏达。从他的像貌、口音和临时住址推测，他是外地来绥慰问或者是哪个救护队的。

我不经意地把书交给他，他高高兴兴一跛一颠地走了。

过了几天，我在社会日报编辑部看见给《洪荒》寄来的署名狄敏达的两篇稿子，稿子誉写得很清楚，字迹俊秀，文笔流畅，内容是关于绥东抗战的，文章的论点明确醒目，论据条理有力，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两篇难得的好文章。我当天即给他发表了一篇，接着又给他发表了第二篇。此后我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稿件，这些稿件中，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词，却都是饱含爱国主义的热情。我开始对他有了好感。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换书来了。交还了上次借的，从图书目录箱中又挑选了一本比较进步的书（我忘记了什么书名），还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呵，想不到你们这个小小的图书馆，竟藏有这么多难找的好书。”他对这个小小的图书馆感到兴趣了。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如果您有时间，并且喜欢看的话，够您看个一年半载的。”我不冷不热地对他说，又试探着问他：“您是外地来绥慰问的吧？”

“不，我不是和慰问团一块来的，我是不愿看见我们的国土一块块被日寇吞占，只身从家乡浙江镇海来绥参加绥东抗战的。”他以自信和骄傲的口吻说。

“您来了多久了，准备怎么参加绥东抗战？”

“来了一个多月了，我找了政府有关部门，还没有结果，等得发慌，带的钱也花光了，所以最近借些小说看看，给报纸副刊写些稿子……”

“给《洪荒》写稿的狄敏达就是您吗？”

“是的，您看到了？”

“我看到了，而且看的还是您的原稿……”

“那、那您，您贵姓？”

“我就是《洪荒》的编辑，章叶频……”

他紧走一步，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并说：“咱们天天见面，就是不相识。”

从此，狄敏达每天都到阅报室看报，然后到图书阅览室和我聊天。他继续借书看，写的文章也不再寄到编辑部，而是直接交给我了。我们彼此很谈得来，对当前绥远的形势和抗日救亡的看法也都一致。不过，谈话中，我始终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说过激的话，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个时期，他借阅了不少文艺书籍，写了一些诗和短文，而且我发现他写的一手好美术字。但是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是不是象他说的，为参加绥东抗战而来

的，我心里很不托底。

又过了半个多月，忽然有一天，他没来看报，接着很长一个时期他没有到图书馆来。我心里犯了嘀咕。不久，我从另一位爱好文艺并且认识他的熟人那里知道，他给当时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他从家乡千里迢迢来绥参加抗战，和有关方面接洽多时，仍未解决，如果不能上前方，他希望能给他一个在绥远国防前线为国效劳的机会……后来省府给他安排了一个新闻秘书一类的工作，具体任务是每天把各报重要的消息、文章，加以分类集中，剪贴下来，重要的用红笔勾划、标题，然后送傅作义看。他业已成为政府的职员，早已搬出旅社。听了朋友的介绍，我怀疑起来，狄敏达该不是个坏人吧？后来，我仔细回忆同他往来的细节，觉得没有什么漏洞，心里才安定下来。

与狄敏达给《洪荒》投稿的同时，还有一位署名白丁的青年人也经常写稿。他写的多是一些有关当前形势任务的随笔杂文，如《今年的学生运动与纪念“五四”》、《纪念“五九”应有的认识》、《漫谈三种不同的教育工具》等等。他的文章文笔流畅，并有一定的见解和比较正确的认识，亦没有过激的语言。

一天下午，我正在图书阅览室我办公的地方，聚精会神地赶写一篇文章，有人进来我没有觉察，甚至他开关图书目录箱我也没有听见——突然，听到有人问：“那位是管借书的？”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他脸瘦瘦的，有点发黄，中等身材，穿着一身退了色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张填写好了的借书单，我立起身来回答道：“请你把借书单交给我吧。”我接过借书单就进书库给他取书。当我从书库走出来时，见他正俯身看我写的文章。他见我出来了，颇有歉意地对我说：“我看见印有‘塞原社’字样的稿纸，就有点好奇……原来你就是叶先生啊！”（他看到我署名叶频，以为我姓叶。）

“我姓章，叫章叶频。”我回答他。

“我叫白丁，常给《洪荒》和《塞原》写稿。”他告诉我：

“我来绥远后经常从报上看到你写的诗和文章，但是，人地生疏，想认识您，又无处打问。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识。”

于是，我们两个人就随便谈起来了。听他自我介绍：他原名包瑜，是河北人，在北平搞救亡工作呆不下去了，是来绥远投亲的，现在住在亲戚家。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横行霸道，汉奸公开走私、贩卖毒品，国民党反动政府却无耻地和日本帝国主义搞什么特殊贸易、经济提携、保护侨民、敦睦邦交等等，而中国人民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生存与安全的保障，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和权利，眼看一个黑暗悲惨的命运，就要落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头上……他还告诉我，在北平日军演习行经朝阳门时，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因为喊了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被日军抓去鞭毙在坦克车下的事。他说着说着，眼眶湿润了。“这一次绥东抗战，真是振奋人心、大快人心……所以，在北平呆不下去，我就到绥远来了。丫他的谈话同文章大不相同，颇有些过激之词。似乎他对我既了解又放心。

这次谈话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多了。他常给《洪荒》写稿，也常来看报、借书。有一天，他突然十分神秘地对我说：“明天，我给你拿一本好书来……”我急忙问道：“什么好书？”他说：“到时你就知道了，现在我正在看，今天可以看完。哈哈，真有些喧宾夺主啦，不过，保险，你看到一定很高兴。”

喧宾夺主？什么意思。他的神秘表情和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使我产生许多狐疑。第二天，我很早就到了图书馆。往常，我工作时心里平平静静，可是今天怎么也宁静不下来——因为我喜欢读书，又是性急的人。当时，在绥远，找到一本自己喜欢看的书是很难的，白丁要借给我的是什麼书呢？不久，白丁来了，把一本用旧报纸裹着的、装璜和印刷都很次的书递给我，并悄悄告诉我说：“我那位亲戚是检查邮件的，经他检查扣留的书报，他都拿回家里，往那里一丢，也不看，堆在那里，也不避讳人。这本

书就是经他检查扣留拿回家里去的。你要抓紧时间看，在三天内看完，我好放回原处，以免引起他的注意。”说罢，他匆匆地走了。

白丁走后，我拿起这本书来看。书是用当时常见的一种印刷翻版书用的次纸印刷的，书名是《西北印象记》（即《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书中还带有照片，大部分照片是印在普通的印刷纸上，显得十分模糊。我见图书馆没有人，就立即用报纸包了书皮，上面写了“红楼梦”三个字。下班时，我悄悄地把书放在兜子里，把它带回家，一进家门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了。越读心情越激动，越读越爱不释手，以至通宵没合眼。这真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我完全被作者所描述的陕北苏区，和他笔下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我党领导人的形象，以及那些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过的崭新生活迷住了。我惊奇、振奋、耳目为之一新，大有茅塞顿开之感。这本书使我对共产党、红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原来憧憬着的革命理想，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最明确最满意的答案。我好象得到了无价之宝一样，高兴得不能自己。可是，掩卷思忖：白丁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怎么会把这种“赤化”得不能再“赤化”的好书借给我，他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又怎么会轻易地在他人面前暴露自己？他是坏人？又不象……为了慎重起见，第二天，我把书又带回图书馆，把我包的书皮拆下，将书锁在柜子里。如果白丁来，我就说没顾上看，再把书还给他。可是，第二天他没来。于是晚上下班后，我又把书带回家仔细地看第二遍。可是，第三天他还是没有来。

第四天上午刚上班不久，白丁来了。这时经常和我一起办公的老张头还没有来，阅览室只有我一个人。白丁走近我身边问道：“那本书你看完了吗？”我装着吃惊而又略带歉意地说：“呵，看我，光顾忙了，你拿来那天只翻看了几页，以后一忙就把这码事忘到一边了。”说完，我把柜子拉开，指指放在那里的书：“喏，还在那里放着呢。”“那您是不是还要看几天？”我

把书拿出来，递在他的手里，十分认真地说：“不，我这个人守信用的，说好三天，就看三天，绝不失约。谢谢你！象这样的好书如果还有的话，希望你再借我看看，以补这次没看完的不足。”他十分狡黠地对我一笑，把书收了起来，又对我说：“好，那我先把你那本书拿去了，还有一本，最近，我抽空给你拿来，这本书须赶快放回原处。”

过了两天，他果真又带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交给我，我一看，是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我又惊又喜，问他：“你怎么能弄来这样的书？”他笑笑对我说：“这也是外地邮来被检查所查扣的。”我被他这句话说的吓了一跳，心想：如果这些书真的都是从外地寄来而被查扣的，那收件人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狐疑地跟他说：“这种书，既被查出，不要说收件人要倒霉，阅读者也要倒霉的，你怎么敢给我拿来？”他平静地笑了笑，跟我说：“放心，既然我给你拿来，就不会出事。”说罢，他不管我收不收书，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白丁的话引起我的警惕。他走后，我突然想起去年冬天，一位过去也经常写文章的同学弓玉书，在街上和我相遇时问我“听说，你被监视起来了”的话。我又想起，就在他和我这次见面前后的一个时期，每天总有一两位既不看报，也不借书的三十来岁的人，到阅览室看一看、转一转就出去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监视我的人吗？！我又想起，社会日报总编辑杨令德先生在几个月前对我的一次谈话，杨先生对我说：“副刊发稿子时注意一点，最近有人向公安局反映说，社会日报副刊编辑章××是一个左倾分子。……”这些往事的回忆，使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问号，白丁是同志，还是歹人？在那昏暗的社会里，分辨一个人的好坏，是多么难啊！

不久，我听说白丁经他亲戚的介绍，当了公安局的政训员。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一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洪荒》

发表了几篇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一篇是士华的《谈统一战线》，一篇是金宝的《统一战线》。白丁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救亡路线的商榷》，文中解释了当前有三种救亡路线：一种是统一救国路线，以统一为救国的前题，由这一主张出发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一种是民主救国路线，主张先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任何党派与任何个人的独裁；一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在民族危机严重的现状下，唯有对外抗战，对内和平，民族才有出路。白丁只提出三种救亡路线，其中哪种正确，未置可否。虽然如此，因为《洪荒》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却被人误会，甚至造谣中伤。于是，引起在报纸上的一场争论。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去参加以绥远牺牲救国同盟会召开的为筹划发起募捐的会议。会议是在当时“牺盟”的主要负责人贾润芝家里开的。当我走进他家的时候，一眼就看见白丁和狄敏达也坐在那里，他们俩见我进来，都眨着眼睛向我笑，那和蔼的笑容和那两双清亮有神的眼睛象在告诉我是自己人，我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和他们握手。会上，我们一起研究关于“开展一个铜板运动”，起草一张传单，会议最后决定这篇文章由我执笔，他们两个辅助。

三个人碰到一起，就兴奋地聊起来了。当谈到因《洪荒》为了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发表的文章引起的那次争论时，狄敏达对我说：“叶频，那次你真危险，本来人家对你已经注意了，再加上朝报有人造谣说《洪荒》宣传人民阵线，就有人向傅作义报告，傅过问了此事，还盯得很紧。”我听了大吃一惊。狄敏达又告诉我：傅作义让他把双方的文章查阅，弄清内容，上送审阅。他把双方的文章都从报上剪下贴在一起，标明每篇文章的重要内容，送给了傅作义。狄敏达讲到这里脸上浮现出一种得意的微笑，他说：“我把你文章中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都剪掉了。傅作义看后，见不是那么回事，也就不再过问了。”

白丁也证实了狄敏达的话，他告诉我，公安局长袁庆曾也追查过此事，让他查清后向袁报告。白丁说：“我就按我自己写的那

篇救亡路线的商榷的内容写了报告的，最后还说明社会日报副刊《洪荒》没有宣传人民阵线。报告上去之后，袁再没有提起这个问题。因为公安局和省政府的意见一致，才没有引起什么麻烦。”

他们二位说罢，都哈哈地笑起来，特别是狄敏达，象个淘气的孩子做了很得意的事一样，笑个不住。

我激动万分，望着他们二位，许久说不出话来。我想，如果没有他们的暗中帮助，我早已身遭不测了。

打那以后，我和狄敏达、白丁二人的感情，亲密多了。但因为工作性质不同，我们接触的机会依然很少，即便接触，也是很有分寸的。因为那时“民先”是不公开的，“牺盟”在绥远也没有争取到公开。况且，我还没有弄清他们二位是不是“在党”。因为白丁给我看了那几本十分难得的“好书”，我心里估计：白丁大概“在党”的吧？

不久，平津沦陷，接着南口、张家口、天镇等地也相继失守，绥远省各机关和一些达官贵人都已离开绥远。这时我和潘纪文、杨植霖、武达平等同志参加的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队也解散了，以后如何行动还没定下来。正是这时，大概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初吧，一天，我在旧城九龙湾遇到了白丁，我们又兴奋又惊讶，他问我：“怎么，你还没走？准备怎么办？”我直接了当地说：“准备去陕北，你说好不好？”白丁听了我的话，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好，你去吧，祝你成功。”那时，我感到他的手那样有力，那样热。我很动感情，问他：“你呢？准备怎么办？”他笑了笑，庄重地对我说：“我？现在还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过几天总会定下来的。”他不肯告诉我他的去向，可他的眼神又是那么真诚，我猜，定是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他吧？

分手时，我们紧握着双手，互嘱珍重，真是依依不舍。当我正要转身走时，他突然又喊住了我，只见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黄皮封面的毛边纸簿，皮子上写着“邮电检查簿”，上面还盖有一

个四方大印。他递给我说：“你看看。”我打开一看，吃了一惊。上面尽登记着查扣的书刊名字和收件人的姓名住址，他借给我的《西北印象记》和毛主席在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原来都是北京“民先”总部秘密寄给我的。他又指给我一页看，上面写着，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信，内容摘要：

“××××：查本市章××，现年二十七、八岁（其实我当时还不足二十周岁——笔者注），共产党员，思想硬化，宣传阶级斗争和人民阵线等反革命言论，建议中央明令通缉（过去绥远省党部可以随便逮捕人，由于“何梅协定”后，绥远国民党名义上撤销，就不能直接逮捕人了）……”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竟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听白丁对我说：“这些邮件，都是我那位亲戚从检查所带回家里的，当时，我偷偷地将它们藏掖起来，要不是日本人就要打来，省政府自顾不暇，慌忙逃走，你就危险了。这次，我那位亲戚也准备走，我在他收拾东西时，趁他不注意，把那几本书当做废书刊烧掉了，这叫销赃灭证。”他舒了一口气，又笑着指指那册登记簿，说：“这玩意是刚才我偷来的，正准备去销赃呢！虽然事情已经过去，我想让你知道一下也好。今后，你要格外小心谨慎才好。”他友爱地望着我，十分惋惜地说：“可惜，那几本书已经烧掉，不能物归原主了。”白丁说完，还是笑呵呵地看着我。我却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下子扑上去，拥抱起他，热泪扑簌簌地滴出来。

我们终于分手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和白丁交往的情景一幕幕闪现在我的眼帘：他向我借书的情景，他颇有文采的文章，他对我及时有力的暗中帮助，以及那封黑信和登记簿……。但，白丁现在的身份却偏偏是：一个青年流亡者，一个国民党公安局的政训员，一个暂时不知去向的人……这一切，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后来，狄敏达和我一起参加了国民兵政训处的工作。一九三

八年春，政训处解散，他和一些同志，随同政训主任、也是当时党的绥远工委书记李衡同志，先离开河套地区去了延安。我被暂时留在五原工作。

五月，在我去延安的途中，在桃力民我又和狄敏达相会了。那时，他在党的领导机关绥蒙委员会工作。组织上把我留下，和他在一起编辑了一个时期的《绥蒙周刊》。八月份，组织上批准我到延安学习，从此，我和他分了手，以后就再没有见面。

建国后，有的同志说狄敏达同志在南方工作，有的说他早已牺牲在战场上。而白丁，自从那次在呼市旧城九龙湾分手，一直没有再见，也没有听到一丁点有关他的消息。

白丁，我的好兄弟，你现在在哪里哟？你到底是打进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还是一位同情党的正直的青年？我思念你！

绥远社会日报副刊《洪荒》

三十年代绥远有一个小报的文艺副刊，非常吸引爱好文艺的青年和进步读者的注意，这个刊物就是杨令德先生任总编辑的社会日报副刊《洪荒》。

绥远社会日报文艺副刊，开始叫《新绥远》，创刊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日，中间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改名为《民众园地》，不久又改为《洪荒》，直至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和绥远社会日报一同停刊。编者袁尘影，在袁外出采访或工作忙时委托我代为发稿，一九三六年袁尘影赴日留学后，即由我主编。

在绥远各报副刊中，绥远社会日报副刊是办的比较不错的一个报纸文艺副刊。在《新绥远》时期，就颇受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六日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塞风》登载的刘浪萍的文章“杂读绥远文艺”中写道：“比较下来各个副刊，我们觉得最有希望的要算《新绥远》，我们看从六月至八月之间这一段很短的时间内，该刊无时不在埋头向前苦干。两次征文：‘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和‘各阶层的生活记录’以及最近编者在‘读者、作者与编者’内的自我批判和新的计划，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该刊编者注意到几个重要问题，极力趋向现实，注意到大众生活了……”。而《洪荒》时期，则主张文章要短小、精练，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多写抗日救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内容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版的洪深、沈起予编的《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读者之页发表的“绥远的文艺界”，称赞《洪荒》“内容有些象立报的《言林》，提倡短文和救亡诗歌”。（《言林》是上海立报的副刊之一；办

得短小精悍，很有特色，比较进步。和申报副刊《自由谈》一样，是当时颇受国内读者欢迎的副刊之一。茅盾也经常为该刊写杂文。）

绥远社会日报副刊从创刊开始，编者即努力想方设法把这个副刊办得比较好些，活泼些，希望能在当时依然显得荒芜的绥远文艺界，同民国日报副刊《十字街头》、《塞原》文艺旬刊等相配合，起到一些拓荒者的微薄作用。所以曾两次征文，特辟“读者、作者与编者”一栏，尽量采纳读者的意见，改进和充实副刊的内容和版面的编排。但是由于来稿水平的限制和编者思想认识的关系，最初一个时期发表较多的是一些抒情的诗歌和反映一般知识青年苦闷、徬徨甚至伤感情调的文艺作品，以及对黑暗社会的不满的呼声，如“忧郁”（姜一萍：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友情与爱情”（伊宁：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孤独”（安娜）、“脆弱的灵魂”（伊宁，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寂寞”（幻虹：一九三五年七月廿七日）、“在古庙中”（嘉宾：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卅日）、“别难曲”（芙茵：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夏天的忆”（北虹：一九三五年九月廿三日）、“红柳条铺的徒弟生活”（峻光：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绥西渔民的生活”（精心：一九三五年七月）、“骡轿子”（泪痕：一九三五年七月）等间或也刊登一些反映要求进步的青年人探索人生的价值和追求真理的憧憬，以及反帝爱国的诗文，如：“光明的追逐”（叶颀：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做梦也要勇敢——献给失意的朋友”（姜平：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这是什么时代”（壁光：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挖战壕”（录涛）、“起来，塞北青年”（世忠：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战场上的两封信”（佚名：一九三六年一月）、“悼大众生活”（音式：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我们底力”（静逸：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等。

《洪荒》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改称的。报头是请总编辑杨令

德先生题的字。原来也没有更多的想法，还是继续《新绥远》的宗旨，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尘影和我商量在《千字文》中有“宇宙洪荒”的句子，便把“洪荒”作为副刊的名字，也表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混沌蒙昧的世界——文化落后的黑暗社会。《洪荒》要揭露它、开拓它、改造它。基于上述想法，改名《洪荒》后，由于时间的推移，华北形势的危急，编者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在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下，刊物的内容和质量也逐渐有所提高，能够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颇有进步色彩，成为宣传党的主张和推动当时绥远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

现在看来，社会日报副刊无论是在《新绥远》还是《洪荒》时期，它发表的文章简短，形式多样，内容涉及的范围广泛，能够反映一些现实生活，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

一、经常发表一些有一定思想内容的短文、诗歌、评论、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和抨击反动当局及其走狗之类的卖国投降政策的谬论，以及对某些人、事的批评。如“谈国防文艺”（兆奎：一九三六年二月×日）、“上前线去”（志文：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忆江南”（葛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人们都在准备着”（伊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夺回我们的大好山河”（维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准备起来”（荣世杰：一九三七年一月卅一日）、“死战到底”（录涛：一九三七年一月×日）“兴和慰劳伤兵日记”（映宽：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壮哉红格尔图”（佩莹：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二日）、“人中走狗也是如此吧！”（慕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等。

其中有的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要人们，在凶恶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我国大好山河的现实面前，竟然还和敌人搞什么敦睦邦交，友好亲善，表示极大的义愤。芙茵在“献给故乡的朋友们”（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一文中愤慨地写道：

“离开绥远又是半年之久，在文化城（北平）里听到的倒是很多，亲眼瞧见的也还不少。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咱们的大人先生们与友邦的大人先生们在怀仁堂杯酒交欢，××（日本）军在西郊演习完毕后，践踏了个不成样子，而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却在酒席上不好意思地说：招待欠周到，尚希原谅。真是亲善、亲善！一方面是严肃与奋斗。从一二九运动以来，文化城不甘做书呆子的学生，揭起了抗日的大旗，领导着全城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向×（日）军示威，真是令人兴奋万丈，堂堂的皇军，敢向率领三万大兵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开不能让人忍受的无比玩笑（在天津市府宪兵枪刺上擦洋火点烟，在堂堂省政府门前拉开裤子小便），却不敢对文化城的学生放半个响屁，谁敢污蔑我们？唯有走狗，而今我们也抓住了他们。我们千万不能放松抗日救亡工作，亲爱的同志们，‘把我们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同志们，努力！”

有的文章批判《国闻周报》的名记者王芸生在“三寄北方青年”一文中，提出抗日救国尚在其次，建国却是重要的，实则是先安内后攘外的谬论的翻版。慕华的文章“救国尚在后”（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指出：“赞称大哥把二弟、三弟打出门去或打死，再与已经进屋拿出刀来的十分凶恶的贼人拼命的主张对不对？单看五年以来的失地，就知此主张是如何了。”“我们主张，始终认为不抗敌不能得到好的局面，到底是哪一说对呢？事实和历史是最不饶人的，让名记者作他们四寄北方青年去吧！”樱子（袁尘影）在《旅途通讯》（一九三六年十月廿八、廿九日）中，也对王芸生在燕京大学新闻讨论会议上说的“华北五省的得失不算什么”的谬论尖锐地予以抨击，指出：看样子好象全中国得失在他也算不了什么。他教人平平常常过日子，“中日问题是百年事”，现在呢，还是规规矩矩做顺民吧！这俨然是友邦人士的口吻。他还批驳了王氏在清算新闻记者本身时，说新闻记者不够人，在非常时要做到人的地位，当场尘影即

问他：“在目前不允许做人的环境下怎样做人？”他给了个囫圇吞枣的答复说：“但求在我。”尘影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是“但求在我”的时候了，最后为王补充了一点意见，说光想做人还不行，还得有正确的认识，方不致做了“人家”的人，真是一针见血，刺中要害。联系到大学的生活，对贫穷而上不起大学的人来说，是天堂般的幸福，舒适的生活，使人羡慕。但在当前，华北之大竟连一张平静的书桌也无处安放的时候，这天堂也要崩溃了，也许只有另一种势力胜利时，那广大人群的天堂才会建设起来。作者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真正爱国志士的身上。在“假面具”（一九三七年一月卅日）一文中作者批判：“嘴里仁义礼智，肚里男盗女娼，这证之於最近北平某大学教授（指杨立奎）的言论、行动是最确实不过。在寒冷的冬天里，热血青年为了求为中国人掀起救国的大旗来。而我们的教授凭着他一付三寸不烂之舌，向青年们说仁义礼智，说青年救国是受人利用了。爱国要纯洁，言下有‘国家事你们小孩子不配管，你们要管事，就有人背后操纵’。这逻辑和有人说过的：‘你们抗×（日）、抗×（日）是××（共产）党的口号，你们谁用这个口号就是××（共产）党’。不幸的是教授的仁义礼智，青年们不大理会，依旧干他们的。教授干瞪眼看。”“据北京来人谈，最近教授很领了些法弊，而且运动了纯洁的青年组织了纯洁的团体，在各校从事安内工作，做统一运动，并倡言：‘同学们，不要怕，打死人有我负责’。其时教授的仁义大概跑上天了。谨在此祝某教授成功万岁，俗话说：‘狗戴帽子装好人’。但帽子戴不牢的那一天，好人不是当不成了吗！噫！”慕华的“不是咱们的口号”也是批判这位教授。

这几篇短文都不过五百字左右，《旅途通讯》稍长一些，也不过七、八百字，作者以敏锐的眼光，用他们犀利的笔触，鞭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人先生们卖国投降、卑躬屈膝的奴才面目和某些名记者、名教授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破坏抗日救亡的无耻

嘴脸。

姜平的“冲向前去”（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一文，主要根据当时绥远危急的形势，指出“忍耐、退让、乞求别人救助都是靠不住的。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绝不听信敌人的甜言蜜语，不再上当。还是认清敌友，大家联合起来和敌人抗争，才有生路”。“怒吼吧，塞北大众”（叶频：一九三六年九月廿六日）则强调，敌人的铁蹄眼看就要践踏在我们塞北大众的头上，北平爱国学生和救亡团体已为我们发出强烈的呼声，难道我们自己还糊里糊涂，等着让敌人宰割、奴役，过牛马的生活吗？！”从而动员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起来斗争。

达苏的“宣传”则是批判国民党反共小丑，由於偏见，理解不了苏联人民的、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和革命文豪高尔基在中国人民中的巨大影响。把他们逝世在中国引起的轰动，硬说成是宣传的结果。作者指出“伊里奇死了以后，那些反对过他的人们不能不登纪念他的文章。高尔基死后，就是和他用笔战斗过的人，也不能不称赞他的伟大。虽然他们心里高兴着：‘一个大对头死了’！在中国，情形是同样的，但很叫人惊异的是八月十日某报一条随笔说：‘高尔基之死，在中国竟引起了这么可惊的轰动。俄国人的宣传实在太厉害了，我们不禁这样的感慨，……’这位先生大概是黄震遐的同志，不过没有黄先生的本领。黄先生能在文章里用‘黄人之血’把‘俄罗斯’洗平的，这位先生却只能感慨一下。其实高尔基的死在半殖民地国家引起这样轰动，主要由于他的作品给人带来了热、带来了光。就是报纸上只登一条‘高尔基死了’五个字的消息，也一样引起轰动。反过来说，赞扬墨索里尼宣扬文明的皮罗得娄再宣传的加劲些，也没用处。”

而“许如随笔”（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则以讽刺的笔触，对所谓新生活运动肤浅的褒贬之辞中，只见表面现象，看不到本质和讹传之处，予以抨击和批判。他写道：“新生活运动，在提倡者是具有深意的，风行一时过后，结果如何，似乎还不得而

知。……最近报载王正廷与日人芳泽谦吉、山本实彦的会谈，山本对於绥远新运也表示称赞，他说：‘这回于七月下旬，从察哈尔到绥远，尤其是绥远省，有非常的观感，在那处的街上，既没有人在街道上吃烟，而且醉汉找不出一个，……殊堪敬服’（见北平晨报）。话固然是称赞之辞，可是我们看了殊觉哭笑不得，没有人在街上吃烟，找不出一个醉汉，如此而已。问题还不简单，没有饭吃，当然不会成了醉汉，更不会在街上抽烟了。对绥远新运没有好评的也有人在。就是盲目梦幻地称赞王同春（恶霸地主，汉奸、土匪王英之父）之二女所谓‘二老财’的冰心女士，她是乘坐平绥路特别预备的包车和她的‘黑漆板凳’（英语丈夫）吴文藻博士以及郑振铎等同时来的。我们女作家在绥远走过二十分钟的路没有（当然不是说她乘坐汽车的观光）竟会对绥远的新运下批评了。她说：‘到绥远去那次便有这个笑话，那边小镇上都有赶集的，但在新生活运动推行到了那里之后，有许多乡民竟不敢出来了，因为怕强迫扣钮子，他们本来便习惯敞胸、或竟不用钮的’（“妇女生活”一卷五期冰心女士访问记）。文学家的眼光毕竟不同，她真的是这样锐利吗？！”我们的女作家竟然如此肤浅的“了解”绥远的劳动人民，难怪作者发出这样惊奇的问号。

雨三的“真战士的态度”尖锐地批判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那些起劲喊着‘前进’，听见大炮的响声稀屎就拉下一裤子的文人太多了，这种人是孬种，更谈不上战士了。真正的战士是有胆识、有作为、敢于和敌人及一切恶势力苦斗。至於成败荣辱，在所不计。所以，真的战士是前进、勇敢、持久、不畏艰苦，还要抓住人生。软弱的文人，我们要提防，因为漂亮话都带双重性，他一面煽惑人，一面躲在暗角里，瞧风头。等到胜利就出来，失败了他先投降，因此，这种文人能出卖自己的灵魂，更能出卖友伴。现在，国难当头，很需要真正的战士了，但真的战士们，为要保持自己的阵容起见，碰着投机的、诡诈的东西们，

千万不客气的如同杀敌人一般的除掉，免得征战途中牵连我们前进！”

二、不时介绍进步书刊、世界名著和伟大人物的经历，鼓励青年读者努力学习和认识人生的意义，激发人们和环境斗争的勇气。

从副刊开始创办起，就先后介绍过：“果戈里及其巡按”（天曙：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关于莎士比亚及其剧”（益钧：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林枫：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茶花女”（姜一萍：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卅日）、左琴科著的“一件急遽的事情”（芙茵：《洪荒》第一九一号）、“高尔基的一生”（叶频：一九三六年八月卅日）、“战争”（茅盾译，一九三六年九月廿六日）和进步刊物“大众生活”、“读书生活”、“自修大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生活知识”、“光明”、“文学报导”、“东方文学”等等。为了给青年读者找到一些刻苦学习和生活奋斗的榜样，我写文章介绍了茅盾、巴金、夏丏尊、胡愈之等执笔的《伟大人物的少年时代》，这本书包括伟大诗人歌德和拜伦、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革命文豪高尔基、十九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普鲁东、提倡不合作主义的甘地、被称为进化论鼻祖的达尔文、科学家巴斯图、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大学问家约翰·穆勒、近代四大画祖之一赛痕等十六七位伟大人物。从这些伟大人物少年时代生活奋斗的经历，说明伟大人物“并非天生就的，也都是由于个人的努力，在苦难中磨练出来的”。“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成为伟大人物，自然有他成功的各种原因：他们少年时代环境的熏陶，先天的遗传，个性的发展，都会影响到他将后的事业”。“并且很自然地发展了他的天才，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们不同的生活遭遇里，找出相似之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读书，刻苦自励，努力奋斗”。与此同时还发表了君频等的“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书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介绍一个图

书馆”等文。无疑，该刊这样作，对于青年读者认识学习的重要性，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热爱生活，专心事业，走出一条自己奋斗的道路来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使青年学生认识人生的意义，还特别发表了关于苏联盲人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事迹。他参加红军作战极其勇敢，当受伤不能重返前线时，又以极大毅力投入工作。不幸病魔缠身，竟能在几乎完全瘫痪并且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一生努力革命百折不挠的经历为内容，写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不朽名著。尤其是书中主人翁保尔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致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读了这段话，使人深受感动，给读者以极大的启示：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从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崇高的理想和非凡的毅力及勇气的人。他忍受疾病给他肉体和精神上难以想像的痛苦，克服一切困难，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革命者的光辉榜样。

此外副刊还介绍了柳湜写的《如何生活》。三十年代，《读书生活杂志》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的进步刊物。而该刊“读书问答”栏，“以认识生活为中心，达到用理论指导生活，改善生活的目的”，为读者正确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更为广大读者所欢迎。这册《如何生活》就是选自第一、第二卷“读书问答”栏中发表的十七篇文章，集中讨论有关生活方面的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鼓励人们正确认识当前的现实，指出不论个人的生活和民族的灾难，都不能逆来顺受、苟且偷安。要和恶劣的环境斗争，和民族的敌人斗争。不要相信什么命运的安排，也不要屈从於世俗的偏见。“总之，绝‘不能跟阮玲玉走’（阮玲玉是著名的电影演员，由于人言可畏而自杀），当前要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

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只有争取到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才能争得个人的生存和幸福”。作者文笔流畅、通俗，洋溢着对青年关心的热情，对于徘徊于岔路，辨别不清方向，不知该如何办的青年朋友们，这册书会给他指明一条走向光明之路的途径，是一册正确指导人们怎样认识生活，如何和环境奋斗的平凡中充满了真理的书。

三、每逢重大的纪念日，副刊都要发表纪念文章，介绍其意义，提出当前的任务，宣传革命主张。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副刊出纪念特刊，除介绍“三八节”的产生及意义外，还发表了卓英写的纪念文章“妇女节写给姊妹们”。指出：“三八是国际妇女共同图谋解放的日子，在妇女群众未获解放以前，当有其重大的意义。”然后联系到“我国男女平等虽有明文规定，然而一考实际，则所谓政治上及法律上的平等，不过是等于具文的白纸；而所谓社会上、经济上的平等，更是不可捉摸的幻影与憧憬。同一道德律，不能运用男女两性，妇女职业范围日趋缩小，这一切事实证明中国妇女解放之遥遥无期和男女平等的有名无实。由此，我们除安于现状，甘为男子的从属奴隶，不然，就该踏着先贤的奋斗途径，勇往直前，努力奋斗。自‘九·一八’以迄今日，河山破碎，农村破产，内忧外患，日益深重，中华民族已濒于存亡的最后关键。妇女不能离民族而独存，更不能离民族存亡问题而独谋本身的解放，因之中国妇女为谋其自身的解放，必须首先努力于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族解放中求得妇女的解放。为此，要以赴战的精神和抗争的决心，一致奋起，密切团结，继续先贤奋斗的精神，肩赴前人未尽的使命，投入民族解放运动，以促成妇女解放、人类平等与世界和平。”

至于“五一”、“五三”、“五四”、“五九”、“五卅”那是每年五月都要纪念的。就以“五四”纪念日来说仅一九三七年，就发表了数篇纪念文章。除介绍“五四”运动的意义，发表了白丁的“今年学生运动与纪念‘五四’”，犁生的“如何肩起我们

的工作”。特别是音式的“纪念五四与我们今后的使命”，这篇文章详尽地介绍了五四的起因、经过、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它本身没有结果的原因和今后的方针。是一篇扼要而又全面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它对推动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一定作用。作者首先提出纪念“五四”，“第一，要知道‘五四’运动的起因和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影响？第二，弄清‘五四’运动本身没有结果的原因，再来认识和决定我们今后努力的方针，来完成五四未尽的使命”。其次叙述了“‘五四’运动产生的原因、经过以及由这一运动导起的‘五卅’、‘六二五’、‘三一八’等运动，从而可知‘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价值，至少有下列几点：一、打破恐惧帝国主义的心理；二、激起中华民族的觉醒；三、联合了中国全体民众走上革命运动的战线。接着检讨了‘五四’运动本身没有结果的原因：第一，当时虽有工商参加，但五分钟的热度一过，便因没有严密完善的组织而涣散，致力量不能集中，缺乏坚持性，不能奋斗到底。第二，因当时没有坚强的政党的指导，故外交内政各方面失了联络，不能表现持久伟大的力量。最后接受‘五四’的教训，提出今后方针：第一，要继续‘五四’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要继续‘五四’唤醒同胞的精神，一致共御外侮；第三，要有严密完善的组织，然后才能完成‘五四’未尽之使命。这样纪念‘五四’才有价值。”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俄国革命文豪高尔基逝世了。副刊为了表示对这位为真理、为保卫人类文化，用他那支无比锋利的笔，向一切腐朽的恶势力搏斗的普罗利特利亚前卫战士的哀悼，发表了几篇纪念文章：“纪念高尔基”、“高尔基之死”、“高尔基的一生”、“高尔基的创作态度”等。在“向高尔基致哀”

（罗孙：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一文中，作者沉痛地写道：“高尔基氏，象一颗殒落的巨星，离开了这世界。正如莫洛托夫所说的，那不仅只是苏维埃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的损

失。”“他一生为人类的进步文化，留下了无比丰富的灿烂光辉的宝贵遗产。”在“纪念高尔基”（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一文中，对高尔基的生平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在“动乱的时代里头，生活永远是在斗争的热情里边，为真理斗争，为自由斗争，这是高尔基的一生，并且是为了世界的真理和人类的自由。高尔基是世界的，是人类的”。“高尔基的一生”（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则用两期的篇幅，介绍了高尔基的生平，共分四个部分。一、高尔基小的时候；二、高尔基开始他的事业了；三、高尔基的革命和文学；四、高尔基死了。其中第三部分，关于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他对旧社会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强烈的反对，更高唱极端个人主义，喜欢用童话传说的形式，描写强壮大胆的流浪人，短篇小说《切尔卡什》就是代表作。第二时期：他用社会的观点，观察民众的痛苦，分析人生，走入了现实的方面，《夏天》就是那时写成的。通篇的调子是乐观的，农村的青年充满了热情，向旧社会奋斗。第三时期，他把政治的和社会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他的思想更前进，相信只有劳动阶级才是新社会的建设者。这时候写成了《母亲》、《忏悔》等等，都表明了工人已经有了政治认识、有了主义。第四时期，他用回想过去的形式，写成了《我的童年》、《回忆录》、《日记杂抄》、《四十年代》等等作品，用书信式的笔调，写出了伟大的革命诗集。文章最后说，高尔基的身体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高尔基的精神永远留在每个革命同志的心坎上。

副刊就是这样通过哀悼这位伟大的苏联作家，宣传了革命的思想，使读者认识到高尔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为真理和自由战斗了一生。

一九三六年是世界文坛损失最大的一年，不但革命文豪高尔基、法国进步作家巴比塞逝世了，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逝世了。在全国人民

极其悲痛的日子里，副刊以全版的篇幅发表哀悼鲁迅先生的文章和事迹。如“悼鲁迅先生”、“鲁迅事略”、“鲁迅著译”（以上均见一九三六年十月廿四日）、“鲁迅先生逝世了”（白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还转载了“鲁迅先生挽歌”。我在“悼鲁迅先生”一文中，特别谈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和先驱者鲁迅先生在祖国危亡的紧急关头逝世，比之高尔基离开他那被称为‘自由之邦’的苏联，损失还要大得多。鲁迅对于目前的中国更是如何重要啊！然而，他终于离开了多难的祖国和受难的中国大众而逝世了。但是他那伟大的战斗精神，却是永远深刻地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而不会忘记。我们哀悼这位巨人之死，更应该记着如何来学习他那坚强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完成他未完成的神圣工作：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为人类解放而斗争啊！”“鲁迅事略”介绍了这位中国的高尔基一生战斗的经历，“挽歌”则道出人们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哀悼的悲痛心情和继承遗志、争取胜利到来的决心和信心：

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
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的迷梦；
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你从不曾退后，
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
啊，导师！啊，同志！你死在艰苦的战地，
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
你安息吧！啊，导师！
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那一天就要来到，
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是俄国天才诗人普希金逝世百年祭。从报纸消息报导中，全苏各城市、各工厂，甚至边远的乡村，均组织普希金百年祭委员会。当时我国一些文艺报刊，也有不少发表纪念文章的。《洪荒》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普希金百年祭前夜”，介绍苏联各地筹备纪念的活动；一篇“普希金百年

祭”，介绍了普希金对俄国文学上的功绩。“列宁曾经这样说过：‘没有正当继承过去的文化，便不能建设今后的文化。’这话，在隆盛纪念普希金的时候，有更新的实践的意义。普希金和莎士比亚、歌德……等等伟大的诗人一样，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普希金并不只是一个俄国的民族诗人。……”“在目前正在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我国，也来纪念普希金，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我们不能忘却诗人普希金的精神，是拥护正义，追求正义，憎恨专制与暴力，完全是人民的袒护者。他给卡达耶夫的诗句道：‘我们把美丽的燃烧的热情，献给祖国吧！’这话很值得不愿做亡国奴的我国人民所感动、所紧记。同时，我们立正在普希金的像前，好象又听到屠格涅夫关于普希金的讲演：‘我们希望更多地自我觉醒，更多地成为自由的人们。’二、普希金的写实主义，他的最大的功绩，是从西欧的模仿之下解放出来，创造自我反映当时俄国本身的文学。在他的作品的本质和特性，是同俄国的特性和本质相一致的。我们学习普希金，不能囫圇吞枣地模仿，要在有机地接受文学遗产之下，来创造反映中国的灵魂、中国的性格、中国的感情的作品，中国抗战交响乐的作品。三、言语是文学的最重大的要素，普希金在当时摒弃贵族的语言，向他的保姆学习，采取最普遍的民众的家常语。普希金清算了伪古典主义的文学，经过浪漫主义，而终于奠定俄国写实主义的根基，他创造俄国的真正文学语言，创造许多的俄国自身的文学样式。这两种伟大的工作，据屠格涅夫说，是要经过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我们在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新语言运动的今日，纪念普希金，也不能不注意语言的问题。”

有计划的有目的的通过一些重要节日的纪念，对于一些著名作家的悼念，写文章介绍他们的生平和文学上的贡献，不但使读者了解一些知识性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使他们认识苏联，了解党的一些主张，从而明确当前应该怎样做，激发他们奋发图强，有一个奋斗前进的目标。

四、不断向读者介绍一些比较好的关于创作的书籍和当代作家，指导那些爱好文艺的青年，特别为《洪荒》投稿的作者，学习到一些如何从事创作的基本知识，从而开阔视野，逐渐提高写作能力。

当时给各报副刊投稿的，大多数是一些中学生和少数业余作者。每天收到的稿件，能用的较少，经过修改可以发表的也极寥寥。同时爱好文艺的青年越来越多了。为了帮助这些人懂得一些创作的起码的常识，《洪荒》有意识地介绍给读者几本指导初学作者的书。那时，书店虽出过不少“创作指导”之类的东西，大都是骗人的，很少切合实用。编者就把当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几本书向读者作了介绍。一本是张仲实译的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作者的一封信》（高梅子：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二日），这本书首先扼要地讲述了文学的一般概念、原则，指示初学作者应如何从实际生活中取得材料，如何从事实的文艺创作活动以及如何修养。其要点：一、手触生活。一个学习写作的人，一个作家，同时应是一个实地的劳动者、工作者，一个实地的社会活动的参加者，这样才能有丰富的生活，才能使他的取材正确、真实、具体，而不至因为孤陋寡闻而使他的作品无意义，无生气，成为一隅之见，失去文艺概括与普遍性和创作典型的能力。二、只写你所深知者，能融会贯通而受其感动的材料。三、要用词精练，安排得宜。指出如何充实写作语汇的方法，教我们不但从阅读方面充实创作用语，更主要的是经常的注意生动辞语，研究民众的语言。四、书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以上四点，讲的简要而又中肯，是初学作者应该阅读的一本好书。以后还介绍了茅盾先生写的《创作与准备》。

与此前后，还发表了《高尔基给文学青年的信》（依凡：一九三七年二月）和沈起予写的《怎样阅读文艺作品》的介绍文章。推荐了郭老译的《艺术作品的真实性》、钱杏邨的《创作与生活》、辛人译的《现实主义论》、林林译的《文学论》、陈北

鸥译的《作家论》等，还陆续介绍了一些中外作家的事迹。这些，对于当时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绥远读者，特别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可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精神食粮。

五、在绥东抗战发生后，除发表一些抗日救亡内容的诗文外，还及时发表了文艺界对时局的意见和介绍反映东北沦亡后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东北人民受压迫、剥削、掠夺的痛苦生活及义勇军英勇战斗精神的文艺作品，以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到当前绥远抗战的实际工作中来。

一九三七年一月份，《洪荒》刊登了由于绥远抗战爆发，上海文艺界发表的对抗战救国运动宣言和北方文艺协会对时局的意见。这两篇檄文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心情和抗敌的决心。北方文艺协会的意见写道：“绥远的战争终于爆发了。……从‘九·一八’以来已经忍耐了五个年头的中国人，在今日因得到一次执起刀枪挣扎的机会，而大大兴奋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侵略，已经严重的迫害到我们的生存基础：不仅武力的占领、毒品的贩卖、权利的夺取，而且以种种无耻的、毒辣的手段如：特殊贸易、经济提携、保护侨民、敦睦邦交等，施于每一个中国人头上。在这种形势下，没有一个中国人有生存和安全的保障。农民的稼禾可以任意取去喂马，家屋被占据作毒窟。商人的生意为廉价的走私货所排挤，工厂工人可以任意殴打、处死、解雇。社会上一切都失去了应得的自由和应得的公民权利，中华民族的沦为殖民地，渐渐的，在这五年中已经以一种不具文的形式实现了。现在，全国人民也深切的明了了这一点，而认为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间，一个算总帐的时机到了。所以，这次战争合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要求，从而得到全民族的支持是极端必要的。否则，一个黑暗的命运将落在有着伟大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的头上，和平可爱的土地将呻吟于异邦蛮族的铁蹄之下。”“绥远抗战的开始，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欢欣鼓舞，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赋与了未来以希望和胜利的信心，中华民族

不是永远软弱，永远忍耐的。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这次也喊出：我们要抗争，是的，我们要抗争，因为我们要生存，只有抗争才能生存。”“但是，今日绥远抗战，还是局部的，一个长期持续的局部战争是没有较高的意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把局部的战争转化为全面的抗战，中国才有生路。”“在今日，身处华北的文学青年任务是重要的、艰巨的。我们要把我们抗敌救亡的神圣使命通过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来……我们必须马上把提高整个民族抗敌爱国精神的任务担负起来，促落后的积极，促汉奸们觉醒，……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华北的文学青年应该一致奋起”。

北方文协对时局意见的发表，在绥远进步的文艺青年中，激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大家更进一步动员起来，以笔为刀枪，写抗日救亡的诗文，进行唤醒民众的宣传。同时积极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募捐、慰劳、到前方采访、慰问。《洪荒》不但经常刊登反映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歌和文章，还介绍一些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斗争的文艺作品，如“没有祖国的孩子”（卓英：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这是一篇含有国际意义的小说。作者采取东北一个小学校作背景，以天真的小学生日常事件为衬托，描写一个从已经亡了的祖国——高丽逃亡出来的孤苦伶仃的小孩果里，怎样在这四周充满残酷、污蔑和轻视的氛围中成长起来。从小，这孩子就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朋友的安慰，只是整天在牧场上替人家放牛。但在他的纯洁的头脑中，却深深埋下了对祖国的怀念。到了“九·一八”，又使他在距离亡了的祖国较远的东北，再次受到“魔手”——日本兵的虐待，终于促成了他英勇地刺杀了他的敌人——日本兵。故事就是这样的展开。作者巧妙地利用几个深刻的对比和小孩天真的谈吐，把亡国的惨痛，有祖国的幸福，活生生地刻画出来了。作者在描写悲惨的场面时，很少流露出那种知识分子感伤的情调，相反地充满能够激动读者为祖国而奋斗的，富有艺术性的沉痛之

极的宣传。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八日至卅号介绍的《山灵》，是朝鲜作家张赫笛的小说。取材于朝鲜农民的生活，他们在压迫者的剥削下，一天天的衰落。这篇小说主要描绘出朝鲜农民悲惨的亡国奴的命运，虽然是无出路的写实的描写了朝鲜农民的生活，然而反抗的热情却充盈得要爆炸了，不久的将来已经沸腾了的农民的血液，对于压迫者所加于亡国之民的耻辱、穷迫，总要有一次大的洗刷。

《评述东北作家近作集》（托流：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这本集子有八个东北作家的八篇作品，除穆木天的“江村之夜”是一篇诗的形式作品外，其余七篇都是小说体裁。“这八位作者：罗烽、宇飞、穆木天、白朗女士、陈凝秋、舒群、李辉英、黑丁，其中几位是我们熟知的，有几位虽然不常见，可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东北的侵略、蹂躏，他们所感受的是同一亡国滋味，都直接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迫害，都有着坚定的抗敌意志，他们亲自参加了抗敌的活动，具有这样丰富生活经验的东北作家，来反映东北同胞在侵略者的铁蹄下的悲惨命运，他们物质生活的贫困，精神生活的禁锢，尤其是英勇的义勇军的活动和战斗情况，都能够较真确的实在的告诉我们。在抗敌图存的奋斗目标下，这几篇作品是国防文艺较好的收获”。当然这些作品也并非完美无缺。不足之处作者一一予以指出。由于篇幅关系，每篇作品的具体内容、故事情节这里不详加介绍了。

此外，还发表了儿童剧“最后一课”（许幸之编）、“弱小民族小说选”（世界知识社编）和义勇军领袖“邓铁梅殉难之夕”等，通过上述这些作品的介绍，使读者了解到东北沦亡后，东北人民过的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和义勇军浴血抗战、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告诉面临日寇侵略的绥远人民，如果不愿做亡国奴，那就必须奋起抗敌，把敌人赶出绥远去，赶出中国去。

六、《洪荒》还让出版面办了两个进步的周刊：《新女性》、

《西北戏剧》。前者是绥远办得较早，时间最长，期数最多，影响较大的妇女刊物；后者是绥远当时唯一的以戏剧为内容的刊物。绥远抗战爆发后，各地进步团体来绥远慰问时，《洪荒》也曾帮助一些进步团体出过特辑或专页，介绍他们团体的概况和来绥的意义和工作。如为山西太原新生剧院出过两期特辑（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为新安旅行团出了专页三期（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一日、八日）。这里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新安旅行团，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他们是由十六个十五岁上下的少年所组织的长途修学旅行团，在民国廿四年“双十”节由江苏淮安出发，目的就是实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新教育主张和方法。（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提倡“生活教育”，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有很大的革命意义——笔者注）“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教育，从实际生活中，来锻炼我们自己，教育我们自己，把我们的生活场所扩大，拿大自然大社会做我们的课堂，我们在这大的学校里，来读中国这部大书”。

他们来绥的意义是由于“当绥远抗战一爆发的时候，全国民众不分男女老幼都拿出他们所有的力量来援助绥远抗战，什么一日运动啦，募捐啦，节食啦，以致监狱的罪犯也以不吃一顿饭的行动来捐献，这种现象布满了全国各地，前方和后方简直连成一气，这表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气象。因此，我们感到有机会能够亲自到前线来慰劳忠勇的将士们和同胞们，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呢！并且把后方同胞对于这次援绥工作的热烈情绪传到前方，使前方的将士们和同胞们受到鼓舞，意识到这次抗战，并不是局部的战争，更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跟我们真正的敌人抗战，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做后盾。所以，这是全民族的抗战。同时，我们把前方实际的情形带到后方，比如前方将士抗战的情绪啦，前线的防御工程啦，关于怎样夺回百灵庙、大庙、红格尔图，……的实际情形，使后方的同胞能够得到真实的消息，更使大家兴奋，进一步把前方和后方

连成一片。我们不仅要把绥远守住，还要收复东北失地。同时，在目前这非常时期，需要充实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知识。眼前急需的是军事知识，虽然内地有军事训练，可是还不够实际，假使亲自到前线来向抗敌的将士们学习军事知识，那多好呢！所以有这么多的重大意义，我们更有到前线来的价值和需要，当我们把这种消息宣传出去后，首先得到了上海文化界和热忱爱国的先辈们的赞助，终于来到了国防前线的绥远。”

新安旅行团特别注意做普及国难教育，唤醒民众的工作。他们认为国难一天比一天严重，但百分之八十的文盲同胞尚不知道，这不是他们甘愿如此，因为他们一字不识，不能看报，又少人同他们讲。凭着他们的耳朵、眼睛，范围实在太小了。他们不知道‘国难严重’，当然不知道怎样去打倒敌人。新安旅行团“过去一年半之中，经过了东南数省，其中有一半是乡村，接触到的农民在十万以上，据了解，他们大都连‘国家’、‘民族’都不知道，要说抗敌救国更非常淡漠，毫不发生兴趣。但是，我们知道，救中国的主要力量正是这大多数的农工，要他们共同负起责任来，国家才能有救。如果百分之八十农工的力量不能用到救国工作上，那么国难如何解除呢？所以，普及国难教育，唤醒群众，就成为拯救这垂危民族最重要的工作了”，“责任这样重大，决不是少数人所能负得起的。必须动员百分之二十受过教育的同胞，赶快负起宣传这个重担。普及国难教育只有一条原则：是‘即知即传’，就是我知道的传你，你再传给别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少，都可以负起这个责任。”这就是“把教育送上门去”，实行小先生制，学到一点教人一点。

普及国难教育的方法：一、放映电影：他们认为这是普及国难教育的最好工具。当时，在城市里虽有电影，可是被有钱人剥夺了，成为他们的消遣品。但在内地，特别是农村，连电灯都没有，还能谈到看电影？“为了把电影普及到内地，使没有机会看电影的人，也能欣赏一下电影，我们旅行生活中，放映电影成了

重要的工作。”他们放映的影片内容都是有救亡意义的。如“小五义”故事告诉人们：（一）挽救危亡靠少数人是不够的，一定要联合多数人，才能打倒敌人，收复失地；（二）依靠别人是不行的，只有靠自己才能自力更生。此外“一·二八”、“民族痛史”等国耻影片，都充分暴露敌人的野蛮、残暴，激发起民众的爱国心。二、演讲：放映电影时，或者欢迎会上，做宣传普及国难教育的演说，倘有个人或团体需要做普及国难教育的讨论时，我们尽我们所知的贡献给他们做参考。三、举行通俗读物展览：他们从北平带来的通俗小丛书就有五十多种，内有叙述历史故事的，也有几种关于这次绥远战争的，如“大战百灵庙”、“二十九军大演习”、“鸦片战争”等，都是用最有趣味的故事体裁描写的，容易使一般文化水准低的民众也能看懂，又可教育儿童，做普及教育的读本。他们还把上海各大书店出版的新书，带到内地，使平常得不到好书看的青年可以买到。这也是宣传文化工作的一种。四、唱歌：也是普及国难教育的好方法，在救亡歌中可以明悉许多道理，把大家团结起来。他们到处唱歌，通过唱歌，结识和得到了许多朋友。五、参加到普及教育运动的工作里去。安徽巢县西北乡——冯玉祥先生的故乡，有个园山学校，去年，他们到时，正是学校全体动员做小先生普及教育运动的时候，于是“我们全体参加。先分组到各村调查，把调查的结果弄明白了，就分组赴各村工作，每天两小时，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成绩很有可观”。“站在国防第一线的绥远同胞们，赶快起来吧，保卫我们祖国，诸位是首当其冲，中山先生说‘唤起民众’，普及国难教育，是绥远同胞不容再缓的工作了”。

新安旅行团在绥远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做了大量工作，除参加阵亡将士追悼会，献旗献盾、慰劳伤兵、参加军民同乐大会、参观游览，写在归绥活动的文稿外，还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给伤员、学校放映电影，举行通俗读物展览，在各种场合讲演、唱歌、教歌，在中小学青少年儿童中非常活跃，对于开展抗

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洪荒》为他们出了三期专页，介绍了他们团的概况，包括旅行团的目的、组织、经费来源等，使绥远各界人民对他们这十几位少年的有意义的活动和爱国精神，有所了解，颇受感动，深为钦佩。特别他们普及国难教育的认识和经验，对绥远从事救亡工作的同志们启发很大，而当时绥远抗战中唤起群众的工作是最薄弱的，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做。

七、《洪荒》还刊登过一些以大众化、口语化的文字写的通俗的介绍苏联，揭露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帝国主义者侵略掠夺的罪行的文章，使读者认识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贫有富，穷人们怎样才能争得一条生路。

“苏联”（叶频：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这篇文章主要介绍苏联是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的国家。“人人都做工，所有的人都念书。农民种的地，不是地主的，是国家的。地不是一小块一小块各人种各人的，而是一大片用机器来耕的，又快又好，这样耕种一大片地的组织叫集体农庄。”“苏联男女平等，女人也照样管理国家大事，照样的做工、种地，男人女人都一样念书作事。因为苏联没有穷人也没有阔人，大家都一样……这样的社会叫社会主义，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叫社会主义国家。”

“乡下闹饥荒”（伊宁：一九三六年八月廿日）、“城里头市面儿更不好”（伊宁：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这两篇是讲农村破产和城市经济恐慌。用兄弟通信的形式讲述：“农村遭灾，连树皮、草根都吃光啦。饿死的、自己寻死的每天都有，逃难的庄稼人成千成万，到处都有吃大户的（乡下闹荒年，穷人们都没有饭吃，只有大户人家存着好些粮食，大家伙儿就到大户家里，把粮食分了，有饭大家吃，就叫做吃大户）。他们要活命，有什么办法呢？”弟弟打算进城找工做，哥哥回信说：“在城里做工，也很困难。日本人用军舰（兵船）载来堆成山的日本货物，中国货物卖不出去；工厂、铺子，都成千成万地倒闭，逼迫的穷

人们简直没有活路啦！”“我们穷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好一点儿的日子过，我们穷人们总应该大家一块儿商量一个活命的办法啊！……”

“上海”（伊宁：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则描述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殖民地。文章首先指出：上海大洋行、大公司、大工厂很多，高楼都是十几层，街上汽车飞也似地跑来跑去，可是都没咱们的份儿，那些都是外国人的。“因为上海地方重要，到咱们中国什么地方都方便，所以，这些帝国主义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上海强行划定了许多租界，拿它当做大本营，好来侵略咱们中国人，赚咱们的钱。他们有的从本国运来货物，有的就在这儿制造，随后再运到全中国各地去，把咱们的钱全赚了去，并且他们把赚钱的道儿都占据了，逼迫咱们老百姓没有活路走。”文章紧接着进行了阶级分析，并指出穷人生活不下去的根源，最后，给穷人们指出一条如何才能生活下去的斗争道路：

“上海住着三百多万人，全世界各国的人都有。可是分别起来，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压在咱们头上的一群‘洋大人’、‘阔老爷’；另一种是被压在脚底下的穷苦工人、老百姓啦。那群吃肥胖的‘洋大人’，还有那些沾了‘洋大人’的光，也捞了不少钱的中国阔人，坐汽车、吃大菜、上电影院、上跳舞场，成天享乐。可是，咱们穷人呢，在乡下，他们把咱们的钱赚了去，抢了去，咱们没有法子生活，跑到城里头来，又找不到工做，或者藉故又被从工厂赶出来，一天吃不上一顿饭，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躺在大街上睡，象我们这样的，在上海就有七十多万人。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可是就找不出一条活命的道儿来，而那些抢东西，偷东西的流氓，那些当窑子的姑娘，成天价站在街上拉客人，谁愿意作这些下贱的事，都是为着活命啊！艰难困苦的生活逼迫的人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得下去？你看！每天有多少上吊、跳

河、寻死的人，他们谁不愿意好好的活着？可是这个社会偏不让他们活下去啊！把我们逼迫的这样活不能活，死不能死的样子，那些帝国主义者还嫌不够，还不死心。还要派来军舰、飞机、大炮、铁甲车、坦克车……动不动就成千上万的杀人，把咱们中国人看成猪狗一样，在南京路上英国人杀死了那些学生、工人，到如今每一个人心里都藏着愤恨。在闸北、吴淞，日本的飞机大炮把房屋打了个土平，把人民杀个精光，谁不咬牙切齿的发恨。这样怎么能再过下去，咱们被他们压在脚底下的人们要拉起手来，大家一条心，一齐反抗，把这血腥的市场反过一个滚儿，把那些吃人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去。”

“小和尚的冤屈”是一篇小小说，描写一个叫小和尚的孩子，因为爸爸做工摔断了腿，为了活命，就天天出去拉洋车。一个下雪天，一天也没有等着买卖，交不起车租，被掌柜的拳打脚踢，还让警察把他关在监狱。小和尚气得不行，心里说：“妈的，我们成天跑腿，赚来的钱全给开车行的啦，一个车行有一百辆车，一天就租十块钱，十天一百块钱，一月就是三百块钱。我们一天跑死了，倒吃不了一顿饱饭，他妈的，要没有人租他的车，看他还赚什么钱，没脸的王八羔子，赚我们的钱，还对我们穷人耀武扬威地说打骂就打骂，说关起来就关起来，凭什么”？！小和尚年纪虽小，可是很明白道理，他根据自己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感到这世道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他越想越恨，就连巡警、公安局也恨起来了。他说：“这年头儿，穷人总是受冤枉的，巡警不是有钱人和大官们的吗！所以他们才向着有钱人，欺侮我们穷人哪。有钱人的钱从那儿来的，有地的人家，他们的钱都是种地的给他们赚的。作官的钱，都是老百姓交粮纳税，钱都出在穷人身上。就比方我们的车行掌柜的，没有穷人替他拉车，莫非他一个人拉了一百辆车去赚钱吗？看他能走得动一步。”小和尚想明白究竟是谁养活了谁的道理后，气得直跺脚，“哼，这些家伙，光赚我们穷人的钱，不管穷人们的死活，穷人就不是人，穷人就得

到处受苦，他们赚了我们的钱自己去住洋房子去啦，我爸爸给人家一辈子盖房子，自己却没有房子住，还把腿摔断了，也没有人管。穷人，穷人就是让有钱人欺侮的。哼！他们拿了我们的钱，自己坐汽车，修马路又要我们纳捐，我们出钱修的马路，而拉车又得给车捐，他妈的……。”

小和尚越想越生气，但是该怎么办呢。文章通过小和尚的梦。指出穷人应该走的道路。小和尚梦见有人告诉他：“穷人——齐心，联合起来就有法子啦。”他梦见大伙儿穷人起来把有钱的全轰跑啦。他梦见，他拉车不用交车捐了。他梦见什么捐都没有啦。当他醒来的时候，自言自语的说：“哼！瞧我出去以后，不干就不是小和尚。”

这篇短小、通俗，能激发起人们阶级仇恨的小小说和另外两篇“好日子在后头”、“联合起来”等同类性质的文章的发表，对绥远广大劳动人民和青年读者具有很深刻的阶级教育意义，受到读者的欢迎。

此外，还发表了“春天”、“天旱”、“睁眼的瞎子”、“老李发愁哪”、“学生游街”等数篇，这些文章都只几百字，长的也不过千把字。却写得非常朴素、真实、口语化。上述这十几篇文章都是我从拉丁化新文字翻成汉字的，思想性很强，是为劳苦大众而写的，反映了三十年代苦难的祖国人民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悲惨生活，和人们逐渐觉醒，找到明确的奋斗目标，团结斗争的情况。读了都很发人深省，很受启迪，给人们从绝望中带来了生活的勇气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在当时华北危急的情况下，使许多热心爱国的年轻人受到巨大的鼓舞，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对于推动一些年轻人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激流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个女游击队员”（普特：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是一篇描写女游击队员缴获三个团丁枪枝的故事，写得很生动，是内容很“红”的一篇小小说。由于国民党那些官老爷，整日价花天

酒地，不是吞云吐雾，就是打几圈麻将，要不就是在妓院里鬼混，不读书，不看报，特别是象社会日报这样的小报，更是不值得一看，所以这篇小说发表后在绥远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倒是河北省清丰县的一位读者青风看后，寄来一首“读普特的三个女游击队员”的诗，也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的《洪荒》上发表了。

另一篇小说“逃走”（人元：一九三六年二十一、二十二日），是写两个被关在监狱的难友，他们悄悄地商量，无论如何不能让两个人同时坐牢，至少要有一人能够出去继续过自由的生活。于是，在一个深夜，人们都沉沉入睡，脚上有镣的老孙，让没有上脚镣的老魏登在他的肩膀，从窗洞逃走，而自己承受那无情的鞭打，最后被解往他处的狱中故事。

总之，这些短小、明快、生动而又富有革命意义的文章，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洋溢着催人奋发前进的思想和反帝爱国的精神，形成《洪荒》独特的风格。

以上是笔者根据自己的记忆和手头现有的部分资料，对三十年代绥远社会日报文艺副刊《洪荒》（及其前身《新绥远》），作了简略的概括的介绍。虽然很不全面，但仅就这些，也能从中对这个文艺副刊的编辑方针和政治倾向略窥一斑。在三十年代那个风雨晦冥的岁月里，该刊能如此鲜明的，以与旧势力搏击的战斗姿态，出现在文化落后的绥远文艺界，发表了大量富有革命内容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宣传党的主张，在抗日救亡战线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反映出绥远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荒漠的塞外奋勇前进的踪迹。

三十年代绥远文艺界鸟瞰

内蒙古自治区不但有着长期的革命传统，而且在文化战线上，也受到“五四”运动反帝爱国和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伴随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也在萌芽、茁壮生长。当然，它也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潮和低潮，有时蓬勃发展，有时显得低沉。但是进步的文化工作从未间断，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绥远最早的文艺刊物《火坑》

从内蒙古西部地区——原绥远省来说，历史最早的传播新文化的文艺副刊，就是杨令德先生编的《火坑》了。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时期，冯玉祥到达包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办起西北民报，由共产党人蒋听松任社长，胡英初任总编辑，这是一个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报纸。杨令德在该报任编辑和记者。《火坑》开始就是在包头西北民报上创办的文艺副刊。一九二六年还自费在北京印过单行本，三十二开，每期十四页左右，包括封面一律都用白报纸。这是当时绥远唯一的文艺刊物。撰稿者除杨令德外，有霍世休、李记今、马映光，刘洪河、陈永森、王佐兴、陶慧影、霍嘉宾、朱子平等。一九二八年，还断断续续出过几期。这个刊物提倡白话文，歌颂恋爱、婚姻自由。从最近发现的第

十、十一、十二期《火坑》来看，作品体裁有随笔、小说、诗、翻译、通讯等，间或有关于作品的批评。如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第十期《火坑》载有杨令德评沈从文的小说《蜜柑》，当时沈从文已是中国文坛上稍有名声的青年作者了。全书共有小说八篇。杨先生指出现代的写实小说偏重于性的表现。“美国有一位小说评论家曾说过，现在的小说要销路好的话，至少也将有一件新奇的好情公案，或者还附带着一场男女苟合的描写。这类的小说固然没有批评的价值，不过风行到如此之盛，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一种变态！”（叶公超：写实小说的命运）。因为《蜜柑》有许多关于性的描写，所以我想起了这一段话。我自己的意见，决不承认这种描写是变态，只看作者与读者两方面的态度是否严肃吧！而《蜜柑》一书，严格说起来，除去“初八那天”、“草绳”、“猎野猪的故事”三篇外，其余五篇：“晨”、“早餐”、“蜜柑”、“乾生的爱”、“看爱人去”可以说都是关于性的方面的，最明显的是“晨”和“早餐”。杨先生还引用了小说中的几段为例，并批评书中某些交待式的插话，是具有艺术手腕的作家所不应当写的。并提出以《蜜柑》名全集，想作者对此篇比较满意，就我看来，极其平常。“初八那天”和“草绳”二篇，颇能写出一般平民的命运和生活来。“猎野猪的故事”和“看爱人去”两篇平淡无奇，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谈的。这篇评论虽然剖析的还比较简略，但在当时能让读者批判地阅读文艺作品，也是颇有意义的。这期翻译有陈永森译的安徒生的童话“冰女郎”和朱子平译的莫泊桑的小说“二小兵”。“冰女郎”译者在这一期着重介绍安徒生为举世公认的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指出他的作品，只要有文字的国家，就有译本，即使是贫弱的我国翻译界，也颇有几种，如“小船兵”、“丑小鸭”、“天鹅”、“皇帝的新衣”、“豌豆上的公主”、“幸福的家庭”等，每篇都已翻译过好多次了。还介绍安徒生的童话大都是写平凡的故事，写一个可怜的母亲，贫苦的女孩，一个小兵，一双红的鞋子，一朵小花等，这

些都是他的好题材。他用了广泛的伟大的同情，天真活泼的小女儿的吻，更加上他美妙的诗人的笔调来写，便象活的一般在纸上出现了。安徒生不仅以童话见长，他的小说、戏剧、诗歌也是很美妙的，他在文学上的地位足以和但丁、荷马、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莫泊桑等人站在一条水平线上。译者对安徒生的评价和介绍还要详细。这在当时地处塞外，文化极其落后的绥远，是很有必要的。只是这期仅介绍了作者，译文在第十二期才开始刊登。这一期的两首诗都是情诗，编者对此的态度是“兼收并采主义，富有革命性的作品，我们固然欢迎，并且也乐于发表，不是革命的情诗，我们以为只要是真情的流露，在艺术上有了成就时，也未可一笔抹杀。我们择优刊布（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火坑》第十一期编者赘言）”。这期发表的谷心依的“爱情的火焰于今天燃烧在我心头”，霍嘉宾的“贻某女郎”两首诗，如果从提倡白话诗和反封建的角度说，也还可取，但都不够精练。短剧“那边就是我的家”是一篇不足千字，描写一个迷信怕鬼的大人，还不如一个小孩子的故事，可以一读。“孤鸿哀音”则很一般。第十一期的目录有“五卅给我们的教训”（马映光）、“昨天的乌云今天吹得杳然”（诗，张德琮）、“忆姊”（随笔，王佐兴）、“我的心”（散文诗，卜效夏女士）、“给你祝福吧”（小说，令德）、“遥祝你前途顺利”（诗，嘉宾）、“二小兵”（翻译，朱子平）、“孤鸿哀音”（通讯，李记今）、“编者赘言”（令德）。第十二期的目录有：“恢复原状下之面面观”（嘉宾）、“咄咄怪事”（令德）、“都统感天和”（潸然）、“认清我们的使命”（马映光）、“千万不要把我们放在脑后”（诗，璠女士）、“人与畜”（嘉宾）、“狂人”（诗，朱子平）、“猫女士”（小说，令德）、“冰女郎”（陈永森译）。《火坑》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绥远最早的文艺刊物。从上述两期目录和第十期简单的介绍来看，在当时能办成这样，是相当不错了。《火坑》还经常发表一些反映当时天灾人祸下，绥远人民遭受涂

炭的悲惨痛苦的生活，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我记得在绥远中山学院读书时，学校图书馆有三四期《火坑》，同学们争相借阅，有一期杨令德先生写过一篇《兵燹》，描写兵灾过后农村被抢掠、奸淫、破坏的惨状，至今在我脑海里还留下很深的印象。《火坑》办到第二十八期，于一九三二年停刊。

三十年代的绥远文艺界

三十年代的绥远，地处边疆，文化、经济都非常落后，根本没有单行本的杂志和刊物。仅仅有四家报纸。它们是绥远省政府办的《绥远日报》，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办的《民国日报》、《朝报》和绥远省民众教育馆办的《社会日报》。前两种是一张报纸的大报，后两种是半张报纸的小报（以后在包头出版了《包头日报》，一九三六年归绥又增出了一种小报《绥闻晚报》）。而文艺活动主要表现在报纸的文艺副刊上，有的报纸有副刊，有的则时有时无。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绥远文艺界比较活跃，一九三三年曾一度显得沉闷，但有的报纸，仍不时发表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诗歌和文章。一九三四年后半年，绥远文艺界又蓬勃发展，不断出现新刊物，反映现实生活，暴露社会黑暗，追求光明的呐喊和抒发大众呼声的诗、文多了。绥东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一直到归绥沦陷前，绥远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党和“民先”的领导下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活动，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文章、诗歌和战地通讯。不少文艺工作者还深入群众中，进行宣传、募捐、发动群众的工作。有些同志一直坚持抗战救亡工作到归绥沦陷。

现在，仅就我了解的情况和手头的一点资料，对三十年代绥远文艺界的概况作简要的叙述，供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原绥远省的文艺工作者参考。并请熟悉当时绥远文艺界情况的同志们指正和补充。

绥远日报副刊

绥远日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许的洁编副刊《西北风》时，发表过不少主张抗日，哀痛东北三省的沦亡，慷慨悲歌的诗文。特别使人记忆犹新的是连载过著名作家宋之的的小说“四子嫂”（宋之的是归绥中学十八班的学生，学名宋汝昭）。当时思想左倾的青年作家刘寺钟的小说，任鼎生（漂萍）、若愚等的诗文，一时很引人注目，那是绥远日报副刊编的最好的时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归绥中学学生弓玉书（献麟）在绥远日报办过一个副刊《冰河》，除发表一些文艺作品外，还登载一些时事评论的文章。如“黄浦江上吊英魂”、“挽救危亡之管见”、“一年来之东北”等，写稿的有献麟、继庵、仲焯、文秀（瑞华）、宋汝昭等。与此同时绥远日报还办了一个文艺副刊《星原》，是由绥远中山学院学生白维新和我等人创办的，白维新主编。执笔者有维新、苏谦益、丽采、秦戎（漪泽）、元魁、穆女、剑琴、芳洁、松涛、松杉和我等，也刊登过一些有反帝爱国思想内容的诗文，如穆女的“最悲痛的日子——纪念‘九·一八’一周年”（诗）、苏谦益的“今日文学的任务”（杂文）、漪泽的“出征前一日”（戏剧）、我的“一天晚上”（诗）、“别”（诗）、“溪畔哀歌”等。这个刊物办到一九三二年底，共办了二十六期。由于副刊编者易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西北风》改为《寒光》。这些刊物和一师同学办的《晨鸡》相继停刊。从一九三三年起，绥远日报的副刊就每况愈下。竟至办成了真正的所谓报屁股了。刊登的诗文完全象遗老遗少的笔墨，枯燥无味，青年人根本不看。

《血星》

这一时期，最值的大书特书的是反帝大同盟盟员杜如蕪、苏谦益等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办的《血腥》。开始是油印的，第一期只一两页腊纸，后来改为《血星》，用铅字印刷。油印的也曾用铅字重新复印。这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刊物，可惜现在一期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我从北京图书馆报库保存的绥远报纸上，发现了第五期要目，这期发表的重要文章有：“由辩证法的演进论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文学”（王少船，即马映光）、“国际政治之现势及中国革命的出路”（世刃即苏谦益）、“淮阴江头”（刘洪河）、“给彬弟的第三封信”（苏谦益）、“血花飞溅”（地方评论）。我和韩燕如同志谈起《血星》时，他还记得给彬弟的几封信，这是作者用通讯的体裁写得非常生动而又富有思想内容的文艺作品。我们从上述文章题目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个刊物的革命倾向。因此出版之后，引起区内外强烈的反响，被称为是艰辛跋涉的“沙漠里的骆驼”。只是办了几期就夭折了。

绥远民国日报副刊

绥远民国日报的副刊，开始就称为《民国日报副刊》。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九三二年初，高沐鸿（曾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任过编辑。高是狂飙社成员。他在上海和高长虹办过一个时期《狂飙》，后来和高长虹分手回到山西，又从太原到了绥远。在编《民国日报副刊》时，他自己写过不少文章，如“商品”、“变”、“孤独的悲哀”、“典型的旧文人”、“新兴艺术论”等，也发表过狂飙社成员向培良的文章“论小品文”、“哀史——一部伟大的作品”等。此外发表过籍雨农的“封建的尾巴”、“中

国二十年代思想形态的物质基础”、“抽象之思想史观”、杨进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之鸟瞰”，还有悼念“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两大损失——蒋光慈、徐志摩之死”等内容的文章。以及李孕育从世界语翻译的小说。并且出过一期“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博士纪念特刊”等。办得也有生气。一九三二年四月在民国日报副刊的版面出过由省立第三小学任教的诗人刘洪河编的《塞风》，撰稿人除编者外，有王少船、许如（杨令德）、籍雨农、书阁、铁箍、兹德、言韵等。这个刊物虽然只出了五、六期，但因发表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文章，如“创造劳动者的平民文学与知识阶级应有的觉悟”（王少船）、“新生歌”（许如）、“阶级意识在维持阶级利益上是绝对必要的”（书阁）、“怒吼吧”（洪河）、“由悲壮的五月说到现代文学的使命”（刘洪河）、“二十年代思想形态的物质基础”（籍雨农）、“罗曼罗兰之怒吼”（言韵）等，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民国日报副刊》由杨令德先生编辑，办了一个时期后，副刊改名为《十字街头》。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又改名为《塞风》，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杨令德先生被撤职为止，从《十字街头》到《塞风》这四、五年杨令德先生都任副刊编辑。副刊主要登载杂文、诗歌、小说、翻译等，成为当时文艺青年发表文章的要重园地，尽量给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以发表文章和在副刊版面办刊物的机会，对于活跃绥远文坛起了一定作用。这个时期它是当时报纸本身文艺副刊办得最久和较好的一个。

《塞原》和《塞北诗草》

一九三四年九月，塞原社成立，恢复了《塞原》文艺旬刊，以后又出刊了《塞北诗草》，受到了绥远文艺界，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曾被人称为是“绥远文坛的巨星”、“内容丰美”。

《塞原》还被誉为“在绥远文艺界具有特异光彩，而且有着辽远前途的唯一刊物”（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塞风》刘浪萍：“杂谈绥远文艺界”）。《塞北诗草》是“在往诗歌国防化，大众化方面努力”的诗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上海《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刘映元：“绥远文艺界”）。《塞原》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创刊到一九三七年初被迫停刊时，共出了五十多期，是绥远办的比较时间长，期数最多的一个进步刊物。《塞北诗草》也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出到第七期时被迫停刊。执笔者除塞原社同人外，还有芙茵（袁焘）、徐盈、王亚平、袁勃、温流、江岳浪、许秀明、杨植霖、杨叶澎、韩燕如、李曼霖、魏列、刘洪河、葛垒、北虹、白山曙、崔幻虹、庞学文、笳鸣、鲁鲁、绿涛、碧波、静逸、志文等。（《塞原》和《塞北诗草》另有专文详细介绍。）

昙花一现的《骆驼草》

一九三五年九月绥远民国日报改为西北日报，副刊也把《十字街头》改为《塞风》，仍由杨令德先生编。不时的发表一些进步的反帝爱国的诗文。一九三五年十月份前后，在《塞风》的版面又新出了几个副刊：《骆驼草》、《心波》、《三家村》、《学校生活》、《艺苑》等，其中《骆驼草》办得较有生气，是由东北流亡诗人《高粱叶》的作者李曼霖、魏列等所编。遗憾的是出了四期就“寿终正寝”。第一期在十一月四日出刊，出了三期便中断了。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的第四期上，发表了林之雨关于《骆驼草》讣告一文，大意是说，该刊没有按期出刊是因为丢了一期稿子，几次向报馆查询，均无结果。最后找到了，却缺两篇稿子，而这两篇稿子是涉及时局问题的。他们表示：“宁做饿死的硬汉，不做驯顺的走狗”。如果是编者对这两篇稿子的发表有为难处，那么，“为难是‘懦弱’，‘懦弱’就是松蛋，也就是中

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缘故，不把这两篇文章编入《骆驼草》就连狗尾巴都不如，于是乃向《塞风》编者请求停刊。”这也是他们对反动当局随便扣留稿件提出的抗议。这个刊物就因为遗失了两篇稿子，问世不久便夭折了。

《边防文垒》

一九三六年西北日报副刊的版面上新出了几个刊物：《曼流》、《乐园》、《农圃》、《金析》、《边防文垒》（绥远开展新诗歌运动的唯一诗刊《塞北诗草》也是在这一年创刊的）。除《塞北诗草》外，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泣黎（王毅然）主编的《边防文垒》。它是绥东抗战，收复百灵庙之后不久出刊的。编者在发刊词中，首先表示对冒着风寒，冲锋陷阵的前方武装将士，不能袖手旁观而不有所表示。“我们的态度：不开倒车，不作帮闲文章，不作无病呻吟。反之，有违时代潮流的讲述，有背民族利益的诗文，有歪真理的论调，我们将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和痛斥，也不趋过急，不作无谓的辩论，不作空谈妄想，不纯主观立场。依据特殊的环境，追随着时代的动向，谈些切合实际的真确话语。目的：开辟文化荒地，集中国防第一线上的文化战士，使荒漠的塞外，成为一个文化灿烂的国度”，“并联合后方大众，配合着前线战士的步调，一致向前抗敌，使这个仅存的国防线成为钢铁般的巩固”。第一期要目有：“论国防文化”、“在后方的人们应该做的几件事”、“向哪里逃避”、“压力愈大抵抗力愈强”等诗和文章，内容充实，颇受读者欢迎。以后差不多每期都有每周谈话，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从第三期起，连续三期发表了“斯诺与毛泽东会谈记”的译文（杨令德先生即因此被免去西北日报副刊编辑的职务）。此外，还发表了一些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诗、文。如第四期发表的陈一之的一首题为“谁说好人不当兵”的诗，就是为了改变人们过去对旧军队士兵蛮横无理，欺

压百姓的厌恶心理，说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敌人侵略下，觉醒了的爱国的志士，才参军杀敌，鼓励人们为保家卫国而当兵是光荣的。得到读者的好评，原诗是：

谁说“好人不当兵”，
那么他一定是个糊涂虫，
在敌人侵略下，
已经不允许我们做书生。
讲什么道德，
读什么经，
只有战争才能换得来真和平。

好人是奴隶的别名，
这一点我们总要认清，
屠场上的耕牛，
便是我们的铁证。

谁说“好人不当兵”，
那么他一定是别有作用，
叫我们都变成弱者，
好供他们宰割和欺哄，
讲什么礼让，
说什么镇静，
不是吗，已经断送了我们的东四省！

好人是奴隶的别名，
这一点我们总要认清，
屠场上的耕牛，
便是我们的铁证。

可是，现在我们都已觉醒，
从此要和敌人斗争，
第一解放自己，
第二保全国家领土的完整。
集合起来，
向前冲锋，
谁说“好人不当兵”！

这个刊物结合现实，诗文并茂，不但引起绥远文艺界的重视，很有影响。而且袁尘影在“东京寄语”中说：东京的朋友们，对《边防文垒》也颇有人注意，向他了解何人主编，望我告诉他。这个刊物由于杨令德先生被免职，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出过第四期后，也停刊了。

《伟大的工作》和《瑞芝堂诗抄》

这个时期，绥远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杨令德先生的散文《伟大的工作》，一本是荣祥的旧体诗《瑞芝堂诗抄》。

杨令德先生是绥远有名的报人和文艺工作者。从一九二五年参加西北民报起，到绥远和平解放前，他大半生从事新闻工作。他每天都要执笔为文，勤奋写作。他编《火坑》时，每期都有作品发表，往往不只一篇；他主持民国日报地方版时，特辟一栏“睡眼朦胧”（后改为“绿灯之下”），每天都根据当天的新闻报导，写一篇几百字的、针对性很强的时事短文。他文思敏捷，一挥而就。有对地方时弊的抨击，有对某些人和事的辛辣的讽刺，有对被迫害、被欺凌者的同情和控诉，有对某些问题发表一些公正的议论。这一栏很引人注目，颇受读者欢迎。报纸一来，人们都以先读“睡眼朦胧”为快，同时，也使社会上一些为非作恶者，有所顾忌。惟恐指名道姓的批评指责。至于他之所以写这些

文章，主要是在当时流行的“记者是无冕之王”、“报纸是民众的喉舌”的新闻记者的立场上，在某种范围内，说些比较公正的话而已。但在当时能够如此，也是难能可贵的。以后他任民国日报（后改为西北日报）副刊编辑和社会日报、绥远新闻通讯社总编辑、兼任天津大公报等特派记者时，除白天发稿，每天晚上亲自动手和记者一起写新闻，发电稿，还写了大量的杂文和通讯。他每次外出，回来都有文章发表。仅一九三六年，他以记者身份，随沙王等到伊金霍洛参加成吉思汗祀典，回来后就写了好几篇文章，如“伊金霍洛巡礼记——成吉思汗陵寝祀典”、“伊金霍洛巡礼记”、“守护成吉思汗陵寝之达尔哈特”、“伊金霍洛巡礼小记”、“伊金霍洛巡礼日记”、“综馆伊盟——七旗之东胜县”、“记包头之行”、“从莎拉齐到五当召”等文章，不下数万言。以绥远新闻社通讯稿发出，同时在社会日报、西北日报、天津大公报登载。杨令德先生是我国第一个到伊金霍洛访问的记者，也是第一个向外报导有关伊金霍洛和成陵祀典情况的记者。他的这些文章，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解放前已为国外一些研究蒙古史专家的著作中所引用。同年，他到西安出差一次，回来先后写了“五日京兆话西安”、“西安五日印象记”、“北平小记”、“津门杂记”、“古都别记”等通讯。就在这个时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北平世界日报副刊，有人剽窃杨先生的一篇文章，一字不差的署了自己的名字在该报发表了。杨先生看到之后，十分气愤，写信向该报副刊编辑揭发，不料这位编辑竟然说这是不可能的，在文化落后的绥远，还能有人写出这样的文章，更谈不到抄袭了。后来杨先生把发表原文的报刊寄去，这位编辑才认错道歉了事。为此，杨先生一气之下，才把自己几年来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散文编选成册，书名《伟大的工作》，由大公报印行，张季鸾先生还为这本书提了书名。据我所知，这是绥远文艺工作者在三十年代铅印出版的第一部白话文作品。曾由绥远新闻社书报部代售。

此外，绥远还有一位被称为塞外文豪的蒙族诗人荣祥，他古文根底深厚，写过不少旧体诗，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却曾自费印过一本《瑞芝堂诗抄》的诗集。

社会日报副刊

一九三一年四月份，绥远社会日报曾办过一个文艺刊物《文学》，编者是马士瑛（即马映光），他写过一些进步的文章，如“现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文学与社会”等，李月轩也在上面发表过一篇小说“春夜”，连载两三期。这个刊物只办了十一期，在七月初就停办了。同年十月社会日报还办过一个叫《曙光》的文艺副刊，是归绥中学同学编辑的。写稿的有苏谦益、寂人、袁鸿（宋之的）、流浪、ST、忧人等。苏谦益同志用世人的笔名在上面发表过“困难中”、“战争与和平”等文章，但只出了几期。同时，在这个时期社会日报还出过《绥远建树》（归中文瑞华编）、《浪萍》（一师赵登瀛编）、《戏剧》等几个刊物，大都是各校同学办的，内容也都一般。

一九三二年绥远社会日报基本上没有什么文艺副刊。一九三三年初，也只有《学园》、《妇女》、《医学》、《儿童》、《职业周刊》、《戏剧》等几个周刊，到下半年也相继停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武佩莹、袁尘影、任双弼等在社会日报四版创办了《塞原》文艺旬刊，这是当时社会日报唯一的副刊，但到一九三四年五月便停刊了。这时，偶而出上一期《塞云》和什么《裸体》等，也不经常。七月又出过《北风》、《奔涛》、《芜原》、《旭光》、《语丁》、《杂组》等几个不定期刊，但坚持下来的不多，而内容也很平平。一九三四年杨令德先生任社会日报总编辑后，他很忙，顾不过来，便把副刊交袁尘影代编（后由叶频编），从此，社会日报才有一个象样的文艺副刊。最初叫《新绥远》，一九三六年六月曾一度改名为《民众园地》，但仅

月余，便又改为《洪荒》。办得比较活跃，而且从内容和编排上不断地改进，成为绥远爱好文艺的青年和学生们所喜爱的刊物之一。社会日报副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能够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越办越能注意反映时代的精神，它发表过不少描述年轻人的苦闷、彷徨、对现实不满和对光明追求的文章。也刊登过不少思想进步、观点正确的诗文。同时，由于当时投稿的主要是些中学生，为了照顾广大学生投稿的情绪，也发表过一些内容空洞浮泛，只要文字稍微通顺的诗和文章。还出过周刊《乐园》（后改为《新儿童》）和《友林》（出了几期即停刊）、《今日》（许钦主编，也只出了二期）、《曙村》（塞原社出版物之一，由李培业编，一九三七年五月已出至十一期）。特别是后期，在党的外围组织“民先”的领导下，刊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坚持了抗日救亡和现实主义的方向，开展新诗歌运动。除发表一些反帝爱国的诗文，如“发动全面抗战”、“纪念死者不要忘了活人的任务”、“愿宋将军实践前言”、“竖立反帝文艺”、“不打自招的口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献给战士们”等，还介绍了中外进步作家的事迹和作品。如高尔基的生平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贡献，普希金奠定了俄国写实主义的基石，奥斯特洛夫斯基怎样写出伟大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迅先生逝世后，发表了悼念先生的文章和先生战斗的一生与译著，还介绍了知行诗歌集《时代的号筒》“抗战文人陈子壮”“义勇军领袖赵尚志”等。此外还介绍了作家巴金、艾芜、舒群、罗烽、黑丁、卞子凯、徐懋庸、萧军、任钧，女作家白朗，彭子冈等。

还应提到的是，在社会日报副刊的版面上还办过几个进步的刊物：《新女性》、《西北戏剧》等。《新女性》很受进步的男女青年学生的欢迎。至“七七”事变后，共出了三十多期（另文已有详细介绍）。是绥远妇女刊物中办得时间最长和较进步的一个。

《西北戏剧》

《西北戏剧》是绥东抗战后问世的刊物，编者是我。它的诞生，在第一期的两篇文章中作了说明。由于“敌人的炮火，把我们从偷安的迷梦中惊醒，为着生存和自由，为了不做亡国奴，我们团结一致，为巩固我们的国防，坚决的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我们绥远是国防最前线，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敌人的炸弹已经掷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武装同志已经在前线浴血抗战，全国同胞也掀起轰轰烈烈的援绥抗战运动。我们绥远的民众，也决不能落后，应该更积极地负起我们抗战救亡、保国卫家的责任。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奉献我们的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嫌一滴水的微薄，一粒沙的藐小，只要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汇集起来，那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为了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团结奋起，投入这场生死的斗争。戏剧是最有效的宣传教育工具之一，《西北戏剧》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另外，还有一个没有写出的原因，就是我、尘影、凌信子等组织的“漠南剧团”虽未解散，但自从凌信子走后，我们留下的几个人，既缺乏导演，又不善于表演，因此再未演出。而和各地从事剧运的朋友们仍有频繁的联系，于是便想通过办一个刊物，一方面进行关于戏剧运动的宣传，同时也便于和各地搞剧运的同志进行联系。

《西北戏剧》发表了一些关于剧运的文章，有“目前戏剧创作的主题”、“关于剧运的几种组织”、“戏剧的意识问题”、“练习写剧”、“戏剧漫谈——我们应该学习”等等，都是从反帝爱国的立场出发。如“目前戏剧创作的主题”，指出在这个群凶角逐的世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在不反时代、不反历史的意义下，我们戏剧创作的主题；具体说来

有如下数种：

一、一切侵略者的反动措施，摧残人类文明的活动（若意国之占领阿国，某国之以非刑拷打自由主义者、焚烧书籍、驱逐杀害文化工作者等）。

二、我国伟大抗敌救亡奋斗牺牲的故事，和无耻汉奸卖身投靠的下流行为相对照。

三、青年在现时代中对于生活的希求、不满、烦闷和挣扎的情况。

四、新的曙光和旧的一切恶势力的冲突。

五、学生群众抗敌救亡运动的描写。

六、中国工农生活物质的与精神的悲惨状况。

七、一般虚假、欺骗、伪诈的人事，与有真挚热情的人情的对照。

八、旧的道德、意识、生活习惯所养成的人类相互欺骗的堕落行为。

九、世界弱小民族的抗战故事。

十、各种时事、风俗人情的讽喻。

创作主题虽举出以上数点，然而生活的复杂，绝不止此，只要在生活中悉心观察，到处皆有可取。“关于剧运几种组织”一文，指出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各地戏剧运动风起云涌，无处不有剧团的组织，无处不有公演。绥远的戏剧爱好者，也应克服一切困难，推动剧运的发展。为了抛砖引玉，就剧运的组织提出几点意见：一、组织剧团或者剧社，二、组织戏剧作品讲读会，三、戏剧创作研究会。此外，剧人介绍：先后有欧阳予倩、田汉、宋一舟等，剧运通讯：发表过尘影从东京寄回的“日出上演在东京”和梅子的“给爱好戏剧朋友们的一封信”等。

《西北戏剧》在戏剧运动作了一些宣传工作，也通过它和各地从事剧运的朋友们进行了一定的联系。因为戏剧需要集体的力量，即使尽量精干，也不是少数几个人就能搞起来的。加之，当

时绥远真正懂得戏剧、热心剧运又能演戏和善于搞布景、化装的人才很少，而我们在社会上的接触范围也很小，许多抗日救亡工作，只能在业余进行，不易发现对戏剧方面有专长的人才。所以，并没有能够组织起更多的人来参加戏剧活动，举行公演。这个刊物一直办到“七·七”事变，现在能够找到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份的报纸，已出到第六期。主要撰稿人有笔者、梅子、苏友、林菱、樱子等。

朝报副刊

朝报是半张报纸的小报，副刊名为《绿洲》，一九三三年前是个不大为人注意的所谓报屁股，登载的尽是一些言情小说，如什么“罗帕姻缘”、“绿野哀鸿”、“趣谈”、“漫谈”等一类的文章。以后王元魁（王如善）编辑时，有所改进，出过《醋潮》等刊物。也出过一个比较不错的文艺副刊《小喇叭》（一师同学编），一九三六年绥东抗战后还出过《绥远青年》（心波社主编），也发表了些抗日救亡的文章，可惜这个刊物只出了一两期就停刊了。不过，从总的说来，《绿洲》仍使人感到有些庸俗、低级的倾向。

包头日报副刊

包头日报是和朝报一样的小报，副刊名为《时代风景》，内容一般，是绥西当时唯一的副刊，写稿的大都是一些中学生。和绥远省会的文艺工作者很少联系，也不大为人注意。

《燕然》半月刊

一九三六年四月，轰动塞外古城——归绥的一个纯文艺半月刊《燕然》问世了。自《火坑》、《血星》停刊后，绥远长期以来，只有报纸上的文艺副刊，纯文艺的单行本刊物根本没有。所以，它一出世就引起爱好文艺的人们的注目。这个刊物是由霍佩心、杨令德、武佩莹、袁尘影和我同归绥中学的语文教师胡燕丘，英文教师郭良才等，为了团结绥远文艺界，活跃绥远文坛而创办的。这个刊物的产生经过是这样的：归绥中学学生庞学文和教师胡燕丘、郭根等在绥远西北日报上出刊的《三家村》上，发表了郭根写的一篇“谈新诗的韵律”的文章，引起了塞原社当时正在热心开展现实主义新诗歌运动的笔者的不同意见，于是在报上展开了一场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等问题的论争。霍佩心作为归绥中学的校长和绥远文艺界的前辈，为了加强团结，消除由于这次争论而引起的隔阂，从中斡旋，由他出面约请塞原社的袁尘影和我到归绥中学同郭根、胡燕丘等当面谈谈。可以讲清问题，经过探讨，达到统一认识，就不要再在报纸上争论了。以便加强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开展绥远的文艺运动。这样我和袁尘影在一天下午到归中找到霍佩心，他和我们一起到胡燕丘的办公室兼宿舍。我记得归中教师是和女生同住在一个单独的院内。东房是女生的宿舍，在报上曾经发表过文章的李风同学就住在那里。胡燕丘、郭根等教师都住在北面高阶台的几间正房里。见面后霍为我们互相介绍，寒暄过后，就从胡燕丘书桌上的本文艺刊物谈起，联系到绥远文艺界竟连一本单行本刊物也没有，大家都感到非常遗憾。这样一谈，关于争论的问题彼此都没有提起，倒是热烈地讨论起我们在绥远应该出版一个文艺刊物的事了。当时天色已晚，我们便告辞回来，准备再找些人一块谈谈。以后我们又和霍

佩心、杨令德、胡燕丘、郭根等一起又谈了两次，决定出个文艺半月刊。刊物的名称一时大家想不出适当的名字，有人说，过去就有人采取翻字典的办法，翻到什么就起个什么名字。于是随便找辞典一翻，翻到有燕字的一页，又翻了一页有个然字，霍佩心说就叫“燕然”吧，于是刊名就这么定了。这就是说叫“燕然”并没有什么其他含意。讨论到具体问题，确定印刷经费由霍佩心、杨令德筹措，稿件的编排共同商量决定。具体工作包括校对等由我、袁尘影多做一些。由于刊物定名为《燕然》，便有燕然社的成立，成员也就是这几个人，由霍佩心任主任，别无其他章程。创刊号出版前，为了吸收更多的人参加，更广泛地征集一些稿件，曾以燕然社主任霍佩心的名义，向绥远爱好文艺的朋友们发出一封征稿函件，说明今年四月一日，出版一种文学刊物，每半月一期，定名为《燕然》，请大家踊跃投稿。

创刊号四月一日出版之后，西北日报副刊《塞风》上，首先很快就有人写文章评论。一位署名文卒的文章中认为“纯文艺半月刊《燕然》的产生，无论从那方面说，都使我们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们感到欢欣的事。十六开本，封面虽然素淡，可是看去还很大方。廿四页，包括论文三篇、小说一篇、诗五首、小品文两篇、译文一篇，内容倒也充实，作者都是绥远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从这个刊物我们可以瞭然绥远文坛的动向。……总之，这个刊物确实给塞上添了一支开拓文艺园地的生力军，是值得一读的”。菊生在“读《燕然》创刊号后”写道：“《塞原》、《塞风》、《新绥远》、《三家村》这都是今年可观的报纸文艺副刊，而《燕然》的诞生，轰动了全绥——这是我们绥远文坛的重要柱石。”俊三认为“《燕然》的创刊，确实是绥远文艺青年的福音。它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使我们了解文坛的消息，它能帮助我们的文艺创作。”四月十五日西北日报副刊《塞风》，还特为《燕然》半月刊，专门出了一期专页。写稿的人一致认为“《燕然》的产生是绥远文艺界的大事”，“把这个刊物一打开，

便会有有一种新鲜的欣欣向荣的感觉，创刊号内容也还充实。”对葛垒的小说“丽妇桥”，认为风格和技术都是经过锤炼的。通过丽妇桥的来历，描述了专制时代君主的淫威和董珍等一类走狗式人物的丑恶。并描述了元奎爹的苦难命运，儿子因杀死侵占民田的大户，逃亡在外，媳妇出走，老伴儿又因为房屋倒塌压死，只留下一个孙女银子，又叫宋保长强奸身死。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故事，是一幅活生生的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也给我们读者提出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死？！小品文有许如译的“我的母亲”，译得很好。尘影的小品文向来就写得不错，这篇是冬的图画，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他五篇都值得一读。不过“春之踪迹”、“塞外春光”二首诗，带些吟风弄月，佩莹译得“菩提树”很好。佩心的“我愿”是一篇较好的诗作，特别其中第二节：

吹起你激昂的号筒，
唤醒一切的有生之伦，
同时当作挽歌一首，
和这垂死的世界分手。

通过这一节诗，可以看出作者对新社会的憧憬，旧世界的憎恶。当时这首诗很受读者欢迎，得到好评。遗憾的是《燕然》未能保存下来，不能把全诗介绍给读者。

我还代表《燕然》写了一篇“我们的话”感谢《塞风》编者不惜篇幅，为评介《燕然》出专号，也感谢读者对《燕然》的鼓励 and 希望，并把我们今后改进的意见作了说明。

《燕然》每期都有论文、小说、诗选、翻译、小品文、书报评介等。区外诗人袁勃和许季明给《塞北诗草》寄来的诗文，有些也在《燕然》上发表了。我们从第三、四期的目录中可以看出这个刊物的一些面貌。第三期目录：论文“莫泊桑的思想”（本修）、“关于易沙克和他的诗”（孕育），小说“董家沟”（贺桑葵），诗选“忆”（燕丘）、“压力之下”（嘉宾）、“黄昏”（正者）、“三月弦”（庞学文），散文诗“钟与炮”（孕

育），小品“塞音”（静逸）、“我与孩子”（佩莹），书报评介“前奏”（诗杂志，叶频）。第四期目录：论文“川岛有雄论中国文艺青年”（史见人），小说“风暴之后”（郭良才），诗选有“冬夜”（佩心）、“光明在前”（叶频）、“第二个洪水时代到了”（许季明）、“送别”（阿玉）、“菲亚”（刘洪河），散文诗“诗人”（孕育），小品“重逢”（尘影），书报评介有蒲风的“六月流火”（袁勃）。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绥远文艺界，在“左联”负责人之一任白戈同志的领导和推动下，由霍佩心、杨令德、武佩莹、李月轩、马映光、郭良才、胡燕丘、笔者等发起，在绥远新闻社客厅，召开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文艺恳谈会。这是自从一九三四年塞原社举行的文艺茶话会之后，又一次文艺界的大聚会。会前还以发起人的名义，在报上登了启事，邀请文艺界人士参加。那天参加会议的有五十余人。首先霍佩心代表发起人，讲了讲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意义。他说：绥远自去岁抗战以来，举世注目，地位骤然增高，各界人士的责任因而加重。就文艺界而言，近来文艺团体和刊物（副刊）之增多，大有雨后春笋之势。但过去文艺界之间很少联系，而绥远文艺今后应如何尽其当前之任务，极待研商，同人等召集此会即为请文艺界人士，共同商讨建立必要的联系，决定今后的路向。沪上进步作家任白戈先生，适于此时，因事来绥，请其莅会指导，尤为不可多得之机会。今日除任白戈先生讲话外，讨论的总题目为“绥远文艺界当前任务及今后路向”，望各位畅所欲言，尽量发表意见。霍讲话后，任白戈、霍嘉宾、李柯、任漂萍等讲了话。任主要是介绍了“日本文艺界近况”，并对绥远文艺界以文艺为武器，积极支援前线，参加抗战表示敬佩，鼓励大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反映绥东抗战多方面实况的光荣任务。李柯讲了“绥远妇女与文艺”。然后大家着重讨论了绥远文艺界目前任务和今后路向等问题，并商量以协作的精神，实现绥远文艺界的大联合，以期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和写作

水平，充实救亡力量，推动救亡工作。会上一致通过筹备成立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互推燕然社、塞原社、绥中文艺研究会、挺进社、心波社、生活讨论会、小喇叭社等文艺团体负责筹备。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乃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卅日正式成立。协会成立后，《燕然》半月刊就改为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在抗日救亡的总目标下，把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绥远文艺界人士团结起来，在救亡战线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到“七·七”事变后又出了两期停刊，共出了廿多期。

抗战日报的《国防前线》

平津失守后，绥东战事日益吃紧，绥远省、县政府已经撤离。绥远几家报纸早已停办。我们在国民兵政训处潘纪文同志的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份，由王毅然、武达平和我等又创办了绥远抗战日报，总编辑王毅然，副刊名为《国防前线》由我主编。这一时期发表的诗歌和文章，完全以抗日救亡、保卫家乡为中心，宣传、动员绥远各阶层人民积极参加抗战，支援前线，也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文艺副刊一直和报纸办到归绥沦陷的那天。为副刊写稿的有哨兵、佩莹、狄敏达、张子秀等同志。这是绥远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坚持在文艺工作的岗位上，以实际行动，用笔为武器进行对敌斗争的光荣一页。

下面就是我用哨兵的笔名在最后一期抗战日报副刊《国防前线》上发表的一首诗：

坚持长期抗战

听，远处隐隐约约传来隆隆的炮声，
这是日伪军从大黑河一带向归绥进攻。
弟兄们，勇敢抗击，消灭凶残的敌人，

这一仗关系着绥远人民今后的命运。

“九·一八”事变至今中华民族屈辱的生存，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华北到处横行；
羽山特务机关竟然公开设立在旧城，
堂堂炎黄子孙怎能任人如此欺凌！

芦沟桥的炮火粉碎了一些人的迷梦，
现在平津和华北大部都被日寇占领；
绥远也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晨，
守土有责，抗日战士决不怕流血牺牲。

抗战救国是全民神圣的使命，要坚定信心，
即使归绥失守，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只要我们不中途妥协、苟且偷生，
坚持长期抗战，必能争取最后胜利的来临。

一九三七年十月于归绥沦陷前一日

抗战初期绥远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芦沟桥事变到归绥沦陷

发起组织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

当绥东抗战的炮声还在人们耳边萦迴，日本帝国主义者又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了全面侵略我国的“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

芦沟桥距离北平仅有十余公里。眼看敌人就要侵占平津，矛头直向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整个华北就要陷入敌手。在这祖国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些文艺工作者，继续以笔为武器，在会刊《燕然》和我编的绥远社会日报副刊《洪荒》及其他报刊上，写了大量抗日救亡的诗文，以揭露敌人侵略的罪行，提高广大群众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员大家积极参加抗战工作，鼓舞激励部队士兵保国卫民的抗战情绪。同时我和武达平、贾润芝、狄敏达、苗顺栗、吴秉周、张和等“民先”和“牺盟”的负责人，一起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我们不但要在文字上进行宣传，还应该抓紧时机，根据党的“八一宣言”和“民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公开地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力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于是，我们发起组织了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简称“抗日救亡会”）。事前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们除了通过“民先”队员、“牺盟”会员在社会青年和各校教职学员中联络、宣传外，还和一些接近上层，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联系。这个工作由贾润芝利用绥远通讯社社长的名义进行。这时，绥远士绅张钦的女婿常佩三从日本留学回绥不久，也和我们一起积极参加了筹备工作。并且通过他和政府有关部门

打了招呼，备了案，以防止反动政府说我们违章加以刁难。一九三七年七月底，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在“九·一八”纪念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二百多人。会上，由常佩三简单地介绍和说明了成立“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的筹备过程和它抗日救亡、保卫家乡的宗旨，然后推选组成理事会。理事会由武佩莹、章叶频、陈渔农（介平）、贾润芝、常佩三五人组成。理事会具体分工是常佩三为总负责，武达平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陈介平负责妇女工作，贾润芝负责募捐、慰劳及其他不属各部门的事务。经过和民众教育馆交涉，他们同意把一间久已闲置不用的阅览室暂借给抗日救亡会做为办公和临时开会商量问题的地方。

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成立后，我们为了扩大影响，还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既向绥远各报馆和通讯社阐明“抗日救亡会”的宗旨，也为争取公开合法的活动，在社会上制造舆论。

抗日救亡会的工作，都是在业余进行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职业。在那平津危急，国亡无日的年头，大家那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促使人们一下班，顾不上回家吃饭，也不管一天工作之后的疲劳，就急急忙忙地奔向民众教育馆，在那里集中。每天，在人们集中的过程中，抗日救亡会的理事们总是先开个简短的会议，然后便分头带领会员们到新城、旧城、车站、龙泉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那时候还非常简陋）一带进行宣传、募捐。当时，每天到民众教育馆集中参加活动的大都是各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一部分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小职员和小业主等。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侵略，激起人们抗日爱国的情绪，把所有爱国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紧密地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了。那时，杨植霖同志从监狱出来正寄居在绥远民众教育馆，他也主动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会的宣传工作。一中的一些教师，特别是郭良才和他的爱人（邵飘萍的女儿，“七·七”事变后，从北平到了绥远），以及各校的“民先”队员、“牺盟”会

员和同学如张和（党员，生前曾在内蒙民委工作），任觉民（党员、二〇二厂付厂长）、屠忠顺（党员、现在教育部工作）、巩纯一（女、党员、十年动乱前任辽宁省教育厅付厅长）、贾鉴秀（女、在右玉撤退时牺牲）、郭新清（女、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德慧（女）、苗顺栗、任恕、侯福荣（即侯野峰、党员、曾任外交部付部长）、马映光、狄敏达、樊长荣、高大山、吕志斌、吴秉周、田玉珍、贺安珍等都是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甚至旧城北门里大有恒地毯厂业主的儿子也常参加抗日救亡会的活动。

在抗日救亡会中，“民先”队员、“牺盟”会员是骨干，“民先”队员好多人都是参加过青年音乐家吕骥同志组织的业余歌咏队，学会不少救亡歌曲，我们常常到街头和公园选择比较人多适中的地点，高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众的歌手”等救亡歌曲，这在当时的绥远还是很新鲜的事儿。很快就吸引了不少人围拢来，听我们这些男女青年歌唱。我们唱过两支歌后，便开始讲演。当时，平津危急的情况下，绥远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绥远的前途，所以，人们都很注意听“抗日救亡会”同志们讲演，当听到我们沉痛地讲述日寇逼近平津，祖国危在旦夕的形势，听到我们宣传的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慷慨激昂的救亡歌声时，听众和我们一样忧心如焚，情绪激愤。有的人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解答，甚至有的直接问我们，到哪里去报名参军抗日救国。

一次没有开成的市民大会

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刚成立时，并没有引起绥远反动当局的注意。后来，由于抗日救亡会活动日益活跃，成绩显著，加之报上又经常报导宣传，从而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并开始加以阻挠、破坏。最初是不准许各报登载抗日救亡会的消息。因为我编辑绥

远社会日报副刊《洪荒》，是从报社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就十分气愤地和一些“民先”同志说：“不理它！”并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个情况向一般会员讲，以免影响大家的情绪，我们发起组织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为的是救国救民，保卫家乡，不做亡国奴，报上登不登消息，没有关系。”大家依然积极热情地工作。

经过一个时期普遍的宣传鼓励工作，“抗日救亡会”决定：在“九·一八”纪念堂召开一次动员全市人民参加的市民大会，以便更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事前，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派人向省府等有关部门联系备案征得他们的同意，同时还请公安局到时派人维持秩序，求得合法；另一方面，我们在开会几天前，便在全市广泛深入地宣传动员，告诉群众抗日救亡会将在×月×日上午九时在“九·一八”纪念堂召开市民大会，向群众讲述芦沟桥前线的情况和平津、绥远危急的形势，号召大家积极动员起来，以实际行动救亡图存。并到处张贴召开市民大会的通知，动员市民届时踊跃参加。特别是开会前一天，我们又分组深入到大街小巷，挨门逐户进行宣传动员。我们宣传组还编写了《告全市人民书》等八、九种宣传品，铅印了数千份，准备在召开市民大会时散发。

开会的那天早上，我和武达平、陈渔农同志等很早就来到了“九·一八”纪念堂门前，纪念堂的大门还紧闭着。我们到民众教育馆去找钥匙，却见民众教育馆门前立着一块木板，上边贴着一张绥远省政府不准召开市民大会的通告：

“值兹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汉奸、坏人乘机捣乱，市民大会应即停止召开。

曾厚载

×月×日

曾厚载是绥远省政府的秘书长，当时省府主席兼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驻防在大同，省府的日常工作由曾主持。

大家一看通告，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昨天下午聚会时，曾佩

三还和我们一同嘱咐大家今天早些来，表示由他交涉，政府有关部门都已同意召开市民大会，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又会变了呢？人们都有些疑惑不解……那天又恰好是星期天，民众教育馆不办公，找不见人。钥匙拿不到，会场进不去。而参加会议的群众又特别踊跃，九点钟开会，七点多钟就有人来了。到八点多钟，人流从四面八方向“九·一八”纪念堂涌来，我们又急又愤，只得向不断前来参加会议的群众解释，说明会议不能召开的原因，请大家谅解。当群众听到是政府藉故不准召开市民大会时，真是群情激愤，纷纷责骂反动政府，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自己不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反而处处限制人民抗日救亡活动，但却公然允许日本侵略者的特务机关“羽山公馆”继续存在和活动，真是丧心病狂。围拢在“九·一八”纪念堂前的人群久久不散。于是抗日救亡会的理事和一些经常热心参加救亡工作的同志一起商量决定：除留少数人向继续前来参加会议的群众进行解释工作和宣传外，救亡会的会员和一些参加会议热心抗日救亡的爱国群众组织成若干小组，分头在全市普遍讲演、张贴、散发传单，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今天集中的全市性的市民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是我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全市每个角落召开了千百个小型群众会，让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遍地开花，深入人心。使全市人民认识到当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只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能挽救祖国危亡。号召人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积极参加一切抗日爱国的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一天，我们几乎走遍了全市所有的大街小巷，特别是在劳动人民较多的旧城大召前、大南街、人市街、牛桥街、新城鼓楼、南街，车站等处，进行街头讲演，入户宣传，三三俩俩的个别谈心，散发张贴传单，把抗日救亡的呼声传播到全市每个角落。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救亡会的同志们，不顾饥渴，不顾

疲劳，一直宣传到黄昏时分，才拖着十分疲倦的身子，怀着完成一种神圣任务的愉悦的心情走向各自的家里。

从此以后，抗日救亡会在群众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少群众到抗日救亡会报名入会，参加救亡工作，有的把劳军的捐款送来，还有一些青年要求参军抗日……抗日救亡会的工作更紧张、更繁忙了。

抗日救亡会和官办的救国会

就在抗日救亡会工作获得群众的拥护、支持，工作开展的颇为活跃的时候，另一个官办的由上层官僚士绅署名的所谓绥远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了。他们放出风来，说什么凡是叫救亡会的都是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统一领导组织的抗日团体，企图以此破坏和限制救亡会的抗日救亡工作。开始我们并不理睬他们。认为我们光明正大的搞抗日救亡工作，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大家仍然继续积极热心地进行宣传、募捐等工作。可是，没过几天常佩三找来了，他告诉我们说：“政府有关方面找我说：一个地方成立两个抗日的群众组织不合适吧，让我们考虑考虑怎么办好？”大家听了非常气愤，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抗日救亡会成立在前，并且成立时向政府备过案，抗日救国会后来成立的，如果说一个地方有两个抗日群众组织是重复的话，救国会就不该成立，我们有什么可以考虑的呢。”大家说的理直气壮，常佩三听了也频频点头，准备再去和他们讲道理。

又过了几天，政府有关人士再次叫去常佩三无理纠缠说：“一个省会成立两个同样性质的抗日群众组织，力量分散，是不是合并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好？”反动政府企图取消救亡会，实际上不允许人民群众抗日的狰狞面目终于完全暴露出来了。救亡会的同志们都十分愤慨，坚决不同意合并，认为救亡会成立在前，救国会虽然成立，他们又不做实际工作，如果省会存在两个群众抗日组织不合适，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再让他们成立，既然允许他

们成立，又说两个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存在不妥，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大家识破了反动政府的意图，他们害怕群众起来抗日，不敢发动群众，也怕救亡会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工作，企图采取合并的方式取消救亡会，包办抗日工作，却又包而不办，这是办不到的。于是便请常佩三根据大家的意见向政府有关方面去解释，去讲理。问题就这样地拖着，我们照常进行我们的工作。

不久，常佩三又来告诉说：“政府有关人士又找我，希望我们考虑考虑，不管救国会、救亡会哪个成立在先，总之，省城同时有两个抗日群众组织存在，力量是分散的，长期下去不利抗日工作，要我们和救国会商量商量，想个妥善办法才好。”当时，在场的理事和会员都很气愤：“说来说去好象他们倒有理了，我们却妨碍抗日工作了！”有的同志对常佩三说：“你是救亡会的总负责人，那就请你去和救国会商量吧。”之后，我们“民先”的同志开了个会，大家认真讨论了时局，一致认为平津危在旦夕，战局变化万千，两个组织合与不合是次要问题，而主要问题在于抓紧工作。所以，我们仍然让常佩三出面和政府及“救国会”接洽周旋。这时常佩三提出：“老让我一个人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人和我一同商量商量，很不好办，是否再派一位理事和我一同去呢？”于是，大家商量决定请贾润芝和他一同去和救国会商量。他们商量两次回来说：“救国会要我们和他们合并，名字仍叫救国会。”我们早已明白他们险恶意图，于是，我们做了一定的让步，表示合并是可以的，但名称一定要叫救亡会，因为救亡会成立的时间长，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对抗日工作有利。以此表示我们并不反对合并，同时也知道这样坚持，谈不成功，不过敷衍应付他们而已。

向周小舟同志请示

正在救国会同我们捣乱扯皮的时候，社会上突然传来一个喜人的消息，共产党的代表周小舟同志到了绥远，下榻在绥远饭

店。这时，袁尘影也因芦沟桥事变发生，和其他留学生一同归国。回绥后，他有时也参加一些抗日救亡会的活动。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三考虑“民先”是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我应该向周小舟同志汇报和请示工作，但是我们之间没有组织关系，怎么办呢？这时袁尘影也告诉我，听说共产党的代表到了归绥，咱们是否去拜访拜访，就有关抗战和当前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遇到的问题，去请教请教周小舟同志？因为尘影是新闻记者，会见周小舟同志是有许多方便条件的。于是，我俩在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来到了绥远饭店。饭店服务人员拦住我们，不让进去。还是尘影曾经用过的印有绥远日报、绥远新闻社记者的名片起了作用，救了我们的急，尘影把名片递给服务员，说我们是报社记者要采访周小舟先生。服务员拿着名片看了又看，才拿着名片慢吞吞地进去为我们通报。不大一会儿服务员出来说：“周先生有请”便把我们引到二楼一个单人房间。推开门，周小舟同志正坐着看东西，见我们进来，站起身来走前两步同我们握手，请我们坐下，吃茶。我环视这个房间，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架，一张两屉桌和两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非常简单。桌子另一头还堆放着很厚一叠名片，看来拜访过他的人已经不少。周小舟同志穿着一身很普通的有浅兰色线条的白底儿府绸中式裤褂，他白净的面孔，显得和蔼可亲，完全是一个文雅的书生。我们先做了自我介绍，我特别说明我是绥远“民先”队长，也是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的负责人之一，向周小舟同志表明我的政治倾向。接着提出一些有关抗战和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周小舟同志首先赞扬了绥远军民绥东抗战的胜利和全国人民自动掀起的援绥抗战的热潮，然后讲述分析了当前形势，他说：七月七日日军炮轰芦沟桥，中国守军奋起反击，全面抗战爆发了。然后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详细地向我们解释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的道

理。原来，我和一些“民先”同志听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恨不能张学良、杨虎臣两位将军把这个恶贯满盈、阴险毒辣的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立刻杀掉。结果却把这个“蒋该死”放了。当时，我们对于这个行动很不理解，缺乏正确的认识。现在，经周小舟同志详细的讲解，我们才明白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是为了逼蒋抗日。而当时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配合，准备借讨伐张学良、杨虎臣之名，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一时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在这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不计十年的血海深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主张释放蒋介石，以争取国民党联合抗日，推动了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部“讨伐派”（亲日派）企图继续反共内战，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阴谋。我们深深为中国共产党这种光明磊落，忠诚为国的义举所感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正确主张。从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的希望，看到祖国的未来。最后，我把以“民先”队员和“牺盟会”会员为核心的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工作的情况，向周小舟同志作了汇报，末了也谈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又组织了一个官办的以上层人士为主的救国会，不做工作，反而和我们纠缠，一心想合并救亡会的经过情况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请示他怎么办好。小舟同志同意我们不管怎样都要抓紧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平津即将沦陷的情况下。你们要尽量争取多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不要在合并不合并的问题上和他们纠缠不清，为了团结抗日，只要不影响你们在群众中工作，合并起来也没有什么。他们不做工作，你们正好利用合法地位的便利条件，抓紧进行工作……。同时还要考虑到平津失守后，日军必然要进而入侵绥远，那时怎么办？能不能在军队中做些工作，或者组织群众武装……我们听了周小舟同志的教诲，进一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意义，以及我们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满怀信心地和周小舟同志告别。

根据周小舟同志的指示，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团结更多的上层士绅，极大的孤立少数反动分子，我们作了一定的让步，同意两家合并。合并后的名称就叫救国会。但我们也向他们郑重提出：一、救国会是以抗日救国，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各阶层人民群众，积极宣传、组织群众救亡图存为宗旨的群众团体。二、救亡会的理事理所当然地转成救国会的委员。三、合并后救国会的领导成员，应团结一致和会员积极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做广泛的群众工作等等。救国会同意了我们这些要求，就这样两家达成了协议，实际上这时候前方战况越来越坏，平津已经吃紧，救国会早已处于瘫痪停滞状态，一些上层人士都已准备逃离绥远。过了不久，一个以傅作义署名的红字铅印的聘请我为绥远民众抗日救国会委员的公函，送到我工作的民众图书馆。那时候潘纪文同志通过郭灵墅先生已把我调到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队工作。当我有一次回到图书馆取参考书时，才看到这个函件，可是，那时绥远省政府大部职员已遣散，原救国会的上层人士早已离开了省会。

和潘纪文同志收听北平巷战广播

一九三七年七月间，潘纪文同志由北方局从太原派到了绥远，因为和郭灵墅是同乡的关系，住在绥远新闻社那一间唯一的客房。社会日报和新闻社在一起办公。那时，我虽常去社会日报编辑部给副刊发稿、看大样，但因抗日救亡会工作较忙，总是来去匆匆，无暇坐下来闲聊。因此，开始我并不知新闻社里又新来了客人。后来，一个偶然的机，我在新闻社院里看见了他。他是一个沉静稳重的青年，比我大几岁，他引起我的好奇，许多人此时都忙不迭地撤离绥远，他却偏偏来这里干什么？一天我到新闻社发稿，正碰到郭灵墅和潘谈话，郭灵墅先生叫住了我，并给我介绍说：“你们认识认识，这是潘纪文，是刚从太原来

的。”然后，又指着我向潘纪文同志说：“他叫章叶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郭灵墅先生为人豁达开朗，说话一向随便，他私下还告诉我潘纪文是共产党员，他的堂弟郭奠原（当时也住在新闻社）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当我了解到潘纪文同志的身份后，就尽量抽空主动地接近他。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八日，这是一个叫人永生难忘的用血泪把人们的记忆浸泡过了的夜晚，这天夜晚北平沦陷了。记得那天晚上，已经入夜了，我和潘纪文、郭奠原三个人守在新闻社的收音机旁，屏息静听日军进攻北平的广播。当时，我们的心情沉重而压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当广播员以高昂激动的声调报导北平南苑和市内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巷战的时候，我的心也燃起焦躁、炽热的火，当我们听到佟麟阁、赵登禹将军亲自率领将士奋勇和敌人拚杀而相继以身殉国的消息时，我的眼眶湿润了，心在颤抖，我悲愤地念叨着：“我们祖国的文化古都就将沦陷了，难道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具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就这样轻易地沦入敌手吗？”我们听着，听着，一直听到电台突然停止广播为止，然后我们又相对无言，默默地静坐了好长时间，才黯然分手。在回家途中，想到祖国山河破碎，国亡无日的惨景，我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参加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队

平津失陷后，绥远人心惶惶，政府各机关给职员发了双薪的遗散费，准备撤离。政府官员、士绅、富户，有的已经离绥，有的先把家属送走。一些还未走的，也早已做好了逃难的准备。

我们抗日救亡会虽然和救国会已经达成了合并的协议，但还未合在一起。救亡会的同志们仍然继续紧张地工作着。我们不断收到群众送来托我们转交的捐款和慰劳品，有更多的年轻人则积极要求参军抗日，我们和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一直得不到答复。

战争形势继续恶化，敌人已经开始大举西进，战争的确实消息一点也听不到，几家报纸也都先后停刊，敌人究竟到了哪里？没有撤走的机关职员和平民百姓，见了面就互相问询着。尘影随同他舅父杨先生一家走了，郭良才夫妇和胡燕丘等许多外地来的中学教师也都离绥他往，稍微有一点办法的人都离开绥远了。就在这个时候，省政府给我工作的绥远民众图书馆发来公函：以“大敌当前，一切服从抗战”为由，调我到大台什农科职业学校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队报到。我接到这份通知，心中兴奋极了。因为事先已经有人和我打过招呼，通知我准备参加训练队，知道训练队实质上是掌握在以潘纪文同志为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手里的。当我带了行李和几本书到农科职业学校时，郭灵墅、潘纪文、杨植霖、武佩莹也先后都到了，工作人员还有解方平、姚玉也到了。各校参加训练的同学也陆续前来报到。同学中“民先”队员、“牺盟”会员、进步青年和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占多数；认识模糊或者因回不了家，抱着大家到哪我跟着走的随大流思想的也不少；至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毒害较深，成见较大，思想反动的学生则是少数。同学们由于在抗日救亡和统一战线问题上认识有分歧，一进校就在宿舍里发生了热烈的争论。多数同学在乎津失陷，日寇压境的情况下，都主张大敌当前，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军民，应该团结一致，不分党派，不分阶层，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志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实行全面抗战，中国就有办法，中国就不会亡；少数同学则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观点；还有些同学则担心中国武器不如人，人心不齐，不能和日军打，像埃塞俄比亚一样，一打非亡国不可……，争论不休。但在前方情况越来越坏，日寇眼看就要打到绥远，东北同胞那种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就要落到每个人头上的现实面前，同学们那种抗日救亡的情绪日益高涨起来，主张前一种意见的同学越发增多。凡是“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多的宿

舍，这种抗日救亡的主张更是占了上风。我那个小队里某一个宿舍的小组，有一个比较思想反动的同学，进校后就和全屋同学争辩，而且争论得很激烈，尽管“民先”同志耐心地从道理上事实上把他驳得理屈词穷已经无话可说，但他仍然不服，致使他在那个宿舍里非常孤立，再加上杨植霖、武佩莹和我几个小队长也都赞称这个意见，而我还在参加他们小组时，旗帜鲜明地批驳他的反动主张。因此，最后这极个别坚持反动思想的同学，还未上课，在报到的第三天早上竟不辞而别地跑掉了。

当时，工作人员除了管理伙食的，搬到训练队的只有郭灵璧、潘纪文、杨植霖、武佩莹、解方平、姚玉和我七个人。我到的当天下午，郭、潘就把我们几个召集到一起，说明这次训练队是第七集团军政训处主办的，是为军队训练政治工作人员，如果日寇占领绥远，就在敌人后方进行活动。所以讲课的内容，除有当前国内外形势、中日问题、中日战争等内容外，还有敌占区的组织工作，秘密通讯、爆破等。最后宣布：潘纪文同志是教官，我们五个人是小队长，任务是每天早上带领小队学员早操，随班听课，组织领导小组学习讨论，管理同学们的生活。郭灵璧是以政训处付处长的身份，主持训练队的工作。

经过两天多的报到，二百多学员到的差不多了，便编为五个小队，每队四十多个人。又按宿舍居住的情况分为若干小组。第一天早操，我把小队同学集合好，带到校院外面一块四边有树木的空旷场地，跑了几圈步，但因时间还很早，我自己本来不懂得什么军事操练，于是我便教同学们唱救亡歌曲。我在吕骥同志办的业余歌咏队学会的廿多个救亡歌曲，这时找到了用武之地。同学们对学唱救亡歌曲非常感兴趣，越学越唱越起劲，其他四个小队长听到我在教唱救亡歌曲，也把同学带来了，大概他们几位也和我一样除了跑两圈外，也不会什么军事操练。他们说：“怎么只教你们小队，要教一起教吧！”我开始教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然后是“救亡进行曲”、“中华民族不会亡”、“牺牲已

到最后关头”、“大众的歌手”等。这样，教唱救亡歌曲就成为我们每天早操的主要内容了。

开学那天没有举行什么仪式，郭灵墅简单地讲了讲开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然后就开始上第一堂课了。他讲的题目是“战争论”。他引用了著名军事家克劳什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句名言后，从一般战争的目的讲到中日战争。这些观点同学们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感到非常新鲜，都很注意听。下课后大家还认真的对笔记，整理记录。郭讲完后第二课是周北峰讲国际形势，周曾任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是傅作义的高级参议，善于讲演，他的课也很受同学们欢迎。接着王毅然（党员，曾任陕西省委党校付校长）讲“中日问题”，李慎之讲“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潘纪文同志讲的是“敌人占领城市后的组织工作”。这些课程都是当时同学们急需了解的问题，引起同学们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潘纪文同志讲的内容，更吸引着同学们的注意，大家睁大眼睛，高度集中地听着，潘讲话缓慢干脆，很少重复，但字字句句都牢固地印记在同学们的心上，如果一字不漏地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而他讲的又是如果敌人占领绥远、包头后，需要我们留下来做抗日的秘密工作时，我们怎么做，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以及如何防止和摆脱敌人的盯梢等等，这是在敌占区工作必须具备的起码常识，所以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讲课的教官除郭灵墅、潘纪文住校外，其他人都是兼职的，讲课时来，讲完课在学校用过饭后就走了。一般都是上午讲课，下午和晚上自学、讨论。

上课十多天之后，田馨年、魏中柯前后来到了训练队。郭灵墅宣布田馨年是大队长，魏中柯是教官。他们也都住在学校。因在“何梅协定”前绥远省国民党党部未撤消时，在绥远省党部任干事，魏中柯是国民党特工人员，他讲秘密通讯，讲一些最简单的用药水写信通讯的技术。并带同学在农科职业学校的实验室试验了一次。原来还准备讲爆破，因为南口、张家口、天镇等地失

守，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队解散，没有讲成。

在训练队时，我和杨植霖、武达平同志与潘纪文同志接触较多，我因为知道潘是太原派来的共产党员，他也了解我是绥远“民先”队长，在训练队时也有意识的对我们进行教育培养、考察了解。我们也经常向他汇报情况，请示工作。记得有一次谈话时，他提出几个问题问我，大都是关于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以及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当时，我都一一作了认真地回答。

不久，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队解散了。解散的原因据郭灵璧讲是和上级失掉联系，经济来源发生了问题。原来第七集团军驻防大同，当南口、张家口、天镇等处失守后，第七集团军军部转移了。

准备到陕北

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队解散后，同学们能回家的都回了家，归绥以东回不去的，也都各自投亲靠友另想出路去了。潘纪文同志给我写了介绍信，让我带十几个比较可靠的进步同学，到陕北去。那时正好刚刚过了中秋节，早晚已感到凉秋寒意了。我和吴秉周、任觉民、苗顺栗、张和、高大山、吕志斌等十几个同学一起徒步走到托县，有两三个同学因事随后乘车赶来。记得和我们同行的还有马映光、张少庸、何集中（归绥铁路小学的音乐教师）、梁建一和居忠顺夫妇等。到托县后我们住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晚上就睡在学生的课桌上，我们都没有带铺盖，睡得很不舒服，而且第一次离家远出，又是要到久已向往的陕北去，思绪万千，翻来覆去，不能成眠。

我们刚到托县，安顿好住处后，我和马映光、吴秉周、何集中、张少庸等几个人就跑到校外不远的一个小高坡上，眺望托县黄昏的景色，商量我们怎么往陕北走，大家因道路不熟，路费也少，曾议论过是否组成一个宣传演剧队之类的集体，一路边演

唱边走，奔赴陕北。最后都同意等大家到齐后再商量决定。第二天傍晚，我们到汽车站去接乘公共汽车来的同学，等到夜幕已经降临了，才来了一辆卡车。司机一煞车就问：“有一位叫章××的没有？”我说：“我就是。”他向我招手，递给我一个纸条，是潘纪文同志托他带来的。上面写着：“叶频，绥事尚有可为，希速回”。我看后把纸条传给其他同志，即问司机：“汽车是否今晚还要回归绥？”他说：“就要回去，你们可以乘这辆车走。”我们请他稍稍等候，很快地从学校把随身带来的简单的行装取了，连夜乘这辆卡车又回到归绥。有些家在托县的同学，暂时留下没有同行，准备随后赶来。梁建一、屠忠顺夫妇仍留托县，先到陕北了。

参加国民兵政训处

日军从北平向西继续进犯时，傅作义率三十五军开往绥东，负责收复察北地区，晋绥军作为后续部队。因为汤恩伯部在南口败退，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日军沿平绥路西进，晋绥军李服膺部望风而逃。傅率三十五军在平绥线正面阻击敌人，受到严重损失，遵照阎锡山的命令，退往山西，因而下令国民兵司令袁庆曾把国民兵全部带到山西补充其部队，并准备防守太原。国民兵副司令李大超却另有打算，但表面上则主张国民兵应该留下，坚持绥远抗战，保持绥远这块地盘。意见统一不了。郭灵墅等人支持李大超，并且认为绥远的子弟兵应该留在绥远，保卫绥远。郭灵墅和潘纪文为李大超组成了国民兵政训处，郭任处长，潘任主任。当袁庆曾带着一部分国民兵经托县到太原的前夕，李大超带着一部分国民兵乘火车到了包头。以前我们对国民兵还是存有戒心的，因为最初它叫“防共自卫团（队）”，现在他们既然提出要“坚持绥远抗战”，潘纪文同志也参加了，我们回来后即参加了国民兵政训处，第二天也跟着到了包头。

当袁庆曾带国民兵一部离开归绥，李大超到了包头之后，归绥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状态。绥远省、县政府早就不知跑到什么地去了。袁庆曾带一部分国民兵走后，我们又从包头连夜赶回归绥，政训处的同志在潘纪文同志领导下，驻扎在归绥正风中学。立即通宵书写标语：“国民兵是绥远的子弟兵”，“绥远的子弟兵要保卫绥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严惩汉奸敌探”等。第二天一清早就贴遍了全市重要街道，并组成政治工作队向市民进行宣传工作，以稳定人心。

这时，在通俗读物编刊社工作，从山西太原“民先”总部派来绥远领导“民先”工作的郭敬同志，也参加了国民兵政训处的工作。

杨植霖同志的一次惊险的经历

我们从包头返回归绥不久，杨植霖同志也来了，他当时的样子非常狼狈。大家见到他，都高兴地说：“咱们又聚到一块了，你从哪里来？”他摇了摇头叹口气说：“啊哟，这次我几乎和你们见不上面啦，差一点被人家当汉奸给枪毙了，幸亏在政训处训练队学会的救亡歌曲才救了我的命。”原来训练队解散后，他曾到绥东白塔一带找同志商量组织群众武装问题，在他返回归绥时，乘坐的那列火车，拉着一批国民党军队。这列车上一般乘客很少，那些官兵看他乘车往西去，硬说他是日寇派来刺探军情的探子，不然前方吃紧，兵荒马乱，好老百姓这时候谁还到处乱跑？不由分说地把他捆绑起来，要当汉奸枪毙。那时候，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在这危急万分的生死关头，他急中生智，高声唱起救亡歌曲，唱完一个接着一个，一口气唱了十几个歌，把这些国民党官兵——也都唱楞怔了。感觉到他们的判断可能错了，如果真是汉奸怎么会唱这么多抗日救亡的歌曲？这才又经过详细查问，弄明情况，给他松绑，把他放了。他叙述过这次危险的经历后说：“要不是在训练队学会这些救亡歌曲，我就

会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地把命丢了。”大家听说，也都为他这次惊险的经历，感到后怕。

杨植霖同志来后，也曾和政治工作队的同志们一起在街头积极进行宣传工作。

绥远抗战日报

因为绥远省、县政府早已跑光，所有几家报纸皆已停办，为了加强宣传工作，稳定人心，鼓舞士气，政训处决定创办“绥远抗战日报”。由王毅然同志任总编辑，我任副刊编辑，武佩莹、狄敏达、张子秀等一些同志也先后参加了编辑部工作。我们就利用原来社会日报那一套设备进行工作，编辑部也设在原社会日报的办公室。我们很快找回印刷厂的工人，经过短期的筹备，“绥远抗战日报”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初出版了。副刊名为《国防前线》，我以“哨兵”的笔名和武达平、狄敏达、张子秀等写了一些短小诗文，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社论主要是由王毅然同志撰稿，郭灵墅、潘纪文同志也都为“绥远抗战日报”写过社论。特别记忆犹新的是九月十三日平型关大战的捷报传来时，我们万分兴奋，用极其醒目的标题和较大的字型，大张旗鼓地报导这一胜利消息，在广大军民中，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全市人民和国民兵士兵的抗战信心。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们抗战日报的职工和在政治工作队工作的同志，工作得更起劲了。

一天，潘纪文同志约我晚上到他住的九龙湾大北巷九号的住处。那天晚上我摸黑找到一个四合院，他住在一间靠东的北房，屋里除去那能容纳两个人顶多挤睡三个人的土炕外，靠窗放着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地下就没有可以回旋的余地了。这真是一间

斗室，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郭灵墅这些年在归绥一直住在这里。

潘纪文同志开始向我了解一些抗战日报的情况，然后就直截了当地问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我讲述了多少年来我对党的向往，经常接近一些进步人士想找党，但又找不到，自己就在摸索中前进的苦恼。同时从“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协定”、

“何梅协定”等一连串丧权辱国事件和条约的订立，对蒋介石反共卖国政府，把祖国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的罪恶行径，十分愤慨，任凭他们这样搞下去，非亡国不可。这两年我通过“民先”和一些进步青年的帮助，看到了斯诺的《西北印象记》（即《西行漫记》）、毛泽东《在瓦窑堡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书和文件，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是为国为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我坚决拥护。他听我讲后，接着就问我：

“那么，你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听他这么一问，禁不住眼眶湿润，非常激动地说：“我早想参加党了，从一九三四年回到归绥，就到处找党找不到，于是我就从阅读进步书刊中，寻求真理，凭着一股年轻人的革命热情从事了一些进步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工作，这些你来绥后是亲自看到的，我处处想按照党的主张工作，怎么不愿意参加呢！我早就想同你提这个问题，就是怕不够条件不敢开口……”潘纪文同志最后说：“好，我对你的情况也了解，我可以介绍你入党，咱们下次再谈谈。”我满怀高兴地回到了报社。可是，潘纪文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再次找我谈话，归绥就沦陷了。从包头向后套撤退中，被追击的敌人冲散，潘过河到了河曲，我到陕坝，于是，这条组织关系的线又断了。

自从和潘纪文同志谈话后，我精神上感到有所寄托，工作得更起劲了。但是，过不了几天，绥东前线的消息越来越坏，敌人攻陷大同、丰镇等地后，继续沿平绥路西进。十月十日日军、伪蒙军已经到了归绥城南大黑河一带，与我军接触，打得很激烈。在城里偶而也听到远处传来一声两声的炮声，市民纷纷在街上观

望，打听消息，也看到马车不断地往平民医院等处运送伤兵。当时，在绥远的部队有国民党骑兵第六师门炳岳部、马占山的挺进军、新编第七旅、第九旅、暂三师和国民兵几个团等不下三、四万部队，但战斗力不强，指挥不统一，虽然也经过三昼夜的激战，终于在十月十三日黄昏撤离归绥。记得那天王毅然同志写的社论题为“最后一拼”，午夜两三点钟，我们发完稿件，刚刚和衣躺下，朦胧入睡，便被隆隆的炮声惊醒。我们急忙起来，到印刷车间等工友把报纸印好，天已微明了。我们根据命令，大家拿着报纸边散发，边往车站走，沿途不少市民，惶惑地立在门前张望，向我们索取报纸，询问战况。我们到了车站，黄昏时分，指挥部的人员和一部分部队撤下来后，一同乘火车到包头。日寇也就在这天夜里入城，归绥沦陷了。

二、 后套工作片断

撤退途中

从归绥撤退下来，随部队乘火车到包头，因为沿途不断有撤退下来的军队中途上车，所以火车行速很慢，到包头时夜已降临。车站上一片昏黑，人喊马嘶，乱乱攘攘。站台电杆上的电灯，发出微弱的光芒，从车上下下来的人群和站台上的人群，在这黄昏的灯光下，拥过来拥过去，大声喊叫着名字寻找人。我和马映光挤在人群中，找政训处的队伍，始终没有找到。站台上的人越来越稀少了，后来碰到了张少庸，三个人只好相随进城。城里的旅店都住满了人，好容易找到一个名叫悦来客栈的旅店，还有一间空房，才算有了歇身之处。

第二天，我们到处找政训处的同志，还没有找上，却找到了“绥远军民联合抗战委员会”。这是前些日子撤到包头的一些官僚士绅和军队首脑，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临时成立起来代行政府职

权，给撤退下来的部队和职员解决给养等问题的一个组织。据说这个组织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有伙食补助，马映光和那些人很熟，为了领点伙食补助，解决吃饭问题，他托了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给他填写了一张秘书的聘书，还顺便请那位职员，给我也弄了一张。当时会计不在，也没有领上伙食补助。我们急于寻找国民兵政训处，从军民联合抗战委员会出来，又去寻问政训处的同志，直到黄昏才找到。他们拥挤地住在一个两间大的房子里。有些同志已领到武器，正在擦枪。但是没有见到潘纪文同志，只看到郭敬同志。因为那里地方狭小，挤不下，我们只好仍回到旅店去。晚上才搬到部队一部分参谋人员居住的一个大院里。据挺进军的一位参议说，当时集中到包头的队伍，有中央军骑七师、马占山的挺进军、国民兵及其他部队，总共不下四五万人。经各部队首脑研究，决定要坚守包头。十月十七号日寇正在向包头推进，当晚首脑们开会还决定要抗击敌人，认为我军能够阻止住敌人的进攻。大家也以为只要抵抗，我们还会在包头坚持些日子。于是，大家都准备上床休息。谁料，还未躺下，突然又传下命令，放弃包头，连夜撤退，到后套去，晚十二时在西门外集合。根据命令，按各部队、单位的前后序列，都拥挤到包头西门外，一直到午夜一时多，才开始出发。黑压压的队伍刚刚移动开，突然又停下来了。后面的向前面望去，有如一片黑雾、弥漫地向前扩展着，人流停停、动动，足足有两个多钟头，弄得人们心急体困，又过了一阵，队伍总算向前行进了。

我们随着人流，边走边回头望望身后的包头市，只见城里的电灯像星星在一片昏暗中闪烁，为我们送行。现在这个万家灯火的城市，已经不属我们，将沦于敌手，经受摧残了。我们望着黑漆一片，渺渺茫茫的前途，一种国破家亡的悲痛心情，袭击心头，感到凄凉极了，悲痛极了。没有走多远，隐隐约约地看见道路两旁抛着不少衣物、被褥、家俱、日用杂物和整袋整袋的面粉。原来这是前边部队的军官眷属，用畜力车、人力车拉载的东

西太多了，走不快，这就是开始为什么队伍行进缓慢的象蜗牛爬行一样的原因，后来耽心天明被敌人追击，才走一阵从车上往下丢一些。看见这种仓促退却逃跑的狼狈景象，令人十分凄惨。走着走着，我们队伍里也有人因为疲累不堪，开始把舍不得丢掉的一些书籍和衣物往路旁扔了。在包头参加国民兵政训处，原来在绥远推行陶行知先生的职业教育的王仁安、宋黎夫——这两位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过去没有步行走路的经验，今天行军，还拿着装得满满的一个小手提箱，越走越累，看见人们在轻装，丢东西。他们也一本书，一本书的往道旁丢，然后丢衣物，最后连手提箱也丢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和国民党军队一起撤退行军，简直混乱狼狈极了。天将拂晓，队伍才能放开脚步在汽路上行进。到中午，走出四十多里路，到达麻池。政训处的同志，找到一家跑得没主人的大炕上，集中休息，煮了一些土豆、稀饭，有的人在吃自己带的烙饼。我和马映光，刚刚端起碗，喝了两口稀饭，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同时，有人大声喊道：“敌机来了，赶快疏散、隐蔽。”这时敌机接二连三的丢炸弹，轰炸声震人耳鼓。我们原以为飞机过后，就可以再回来用饭，连两个土豆也没带，便匆匆忙忙跑出院门，一直朝向前面一块庄稼地里隐蔽。精疲力尽地坐下喘息，又听到从汽路那边传来一阵阵突突的声响。一位士兵高喊着：“敌人的装甲车追击来了！”赤手空拳的人们又慌乱地离开汽路各自奔跑。我和马映光从庄稼地里一直往北跑，当跑到离公路稍远的一块谷子地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马映光说：“歇歇吧，这里离公路也远了，装甲车的马达声也听不见了，咱们休息休息再走。”我也跑得喘息不止，同意说：“好，咱们休息一阵，再找队伍。”谁料想由于昨晚一夜未睡，又走了一上午，实在太疲倦了，竟然一坐下来就很快地沉沉入睡。当我们醒来时，天已黄昏。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音，四外看看，渺无人影。糟糕，我们脱离队伍掉队了。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南面汽路不敢走，两个人便无目的往北走。打

算在前面找到人家，问问道路，吃点东西，再赶队伍。

我们在崎岖不平，没有道路的荒野里，走啊，走啊，看不到人家，天色也有些朦朦胧胧。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有人高声喊道：“干什么的？”我们抬头向前看去，百米左右的山坡上下来两个骑着马穿着便衣的带枪的人，向我们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逃难的。”我们话刚说完，这两个家伙，便在马上端起枪来，一个朝向我，一个对准了马映光，凶狠地喊道“举起手来，拍着跑过来！”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只好把两臂举起，拍着手跑了过去。我跑到离这个土匪还有两三米的地方，那家伙就喊我站住。问我：“你是干什么的，到哪儿去？”我说：“归绥、包头都被日本兵侵占了，我们是出来逃难的。今天又被敌人装甲车追击，认不得道路，跑到这儿来了。”接着我问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他说：“我们是××游击队。”说完，用枪逼着我：“快把大衣脱下来。”当时，我正穿着一件绥远手工制的毛布大衣，这还是一九三四年我从北平回来后，拿到发表的十几首诗的八元稿费，又从家里找了个旧里子，和尘影两人各做了一件土制毛布大氅。我说：“我们是逃难的，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丢光了，天气又冷了，脱下给你，我们逃难会冻死的，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行行好吧！”任你好话说尽，怎么也不行，用枪硬逼着我脱。我只好脱下来送给他，我怕他还脱我里边的衣服、毛衣，又把套在大衣里的一件雨衣也脱下来送给他。这件雨衣质量很好，是在精减东西时狄敏达拿不了给我的，让我带着，拿不了时再丢。我说：“干脆把这件雨衣也给你吧！”并央求他把毛布大衣还给我御寒，他见我自动送了他一件雨衣，又求他索要大衣，便好心地从马背上取出一件旧毛背心给我。并说：“你们不要往北去了。”说罢转身打马向北面山坡上跑了。他们走后，我和马映光聚到一块。原来马映光穿着一件黑呢子大衣被脱掉后，那贪婪的抢劫者还逼着他连里边穿的毛衣也脱下拿走。这时，已是阴历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的季节，早晚已感到有些寒

冷。我的毛衣没有被脱掉，便把那件背心给马映光穿上。我们很痛心，为了抗日救亡，暂时撤离绥远，免遭日寇的杀戮，却没想到刚离开包头不远，却先被我们的同胞，所谓“××游击队”抢劫了。路还长，前途如何坎坷，还会遇到什么？我们心有余悸，不敢再向北走，天色也渐渐黑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又向南走了一程，还提心吊胆，避开了大路，插荒向西走去。这一夜我们俩互相挽扶着踉踉跄跄地不知走了多久，才找到一处人家，主人早已逃光。炕上躺着几个和我们一样从包头撤退下来的人员，我们又饥又困，挤上炕去，头枕鞋，冷得蜷曲着身子，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同炕睡的人，有的已经起身赶路，我们赶快起来和几位不相识的人相跟上，继续前进。后来，终于走上靠近黄河的大道。这时不断碰到三三俩俩、十个八个撤退时被冲散的人，看来，我们还不是走在最后的。人们又饥又渴，沿途群众都跑光了，更找不到卖东西的。我和马映光走到一处院落，听见人声嘈杂，乱哄哄的，原来是十几个士兵，正在煮面片吃。经过的人，有的也去抢点盛在葫芦瓢里吃，并没人讪。大概都是天涯沦落人，有饭大家吃吧！我们便在院子里摘了两个葫芦，把瓢掏空当碗用，也去抢着捞了点面吃，这面粉是上等精细的面粉，不知这些士兵是从哪里弄来的。可惜，既无调料又无盐，面片又厚又大，半生不熟，还有一股很浓的烟熏味，尽管如此，人们都饿急了，抢着狼吞虎咽地吃了。

我们继续随着人群一同又走了半天，马映光双脚打泡了，走起来一拐一拐的，我只好慢慢地陪他走。和我们一起走的一批一批赶向前去了，后边掉队的又三五成群的跟上来。我们和他们结伴前行，不久，又拉后了。就这样，走了三四天才赶到西山嘴。我们到时，门炳岳骑兵师的一个连驻扎在黄河对岸，为了阻止日寇过河追击，他们已经把那根唯一能够过河的独木桥燃着，准备烧毁。我们如果再迟到一刻，独木桥烧掉，我们就无法过去了。

过了西山嘴，我们和国民兵司令部的一位副官和一个背枪的

士兵相遇，我们又结伴同行。

沿途群众已经逃光，途中偶然看到几户人家或独户民房，屋内已经空空如洗，院子外边埋藏较浅的东西，特别是土豆、小米、面粉之类的食物都被刨光，无用的东西散乱地丢在坑边，我们经过的地方，到处是一幅幅劫后凄惨的景象。日本兵还未到来，老百姓已经被国民党那些杂七杂八溃退下来的军队，糟害的不成样子了。

各个部队在撤退中，被敌人冲散后，零星掉队的很多，于是便发生了国民党各部队之间互相对零散人员下枪的事。我们走到中午，在一个三岔路口，就被早已埋伏好的新编第七旅的一个连长和几个士兵包围，又把我们分别带走。我和马映光被带到连部，那位副官和带枪的士兵却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到了连部，连长对我们很客气，首先让勤务兵给我们弄饭吃，随后同我们谈话。知道我们都是有文化的，而且在搜查我们时，发现我们身上带有绥远军民联合抗战委员会秘书的聘书，便表示希望我们留下给他当文书。我们都没表态。第二天武践实同志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带到连部。我们正互相询问撤退到此经过的情况时，团长因为老百姓告状，下连检查来了。据一位年老的蒙族妇女说，他们连的士兵抢了老乡一头牛，不给她还要找旅长去。团长查明此事，让蒙族老乡把牛牵走，来到连部。团长看见我们三个人，便同我们谈起话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听说我们是绥远军民联合抗战委员会的秘书，是些有文化，有知识的职员，和连长商量，让武践实同志留下，把我和马映光带到团部。他热情地款待我们，递烟、倒茶，开饭时还打开一个罐头，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这位团长也因为缺少有文化的部下，许愿让我们俩给他充当书记官和军需官，并且要我们和他磕头结拜。我们向他表示：和我们一起出来的还有十几个人，都到了五原，要留，我们找到他们一齐留。怎么说团长都不让走，没办法，只好住在团部。一直等到旅长来团里点名，我们顶替了两个名额。团长看到留不住我们，才派了

一位司务长，把我们送到五原。想不到我们驻地离五原仅仅半天的路程。早知如此，我们早设法离开这个部队了。快到五原时，那位司务长给我们指点了去五原的方向，就回去了。我们一再请他向团长转达我们感谢他这些天对我们的热情招待和照顾。

国破家亡 慷慨高歌

到了五原，我们住到一家旅店的大炕上，一位挺进军的高级参议也住在里边一间房内。我们第二天早上出去吃早饭时和他相遇，马映光认识他，通过他我们了解到国民兵司令部已到陕坝。当然，政训处的同志们也到了那里。

于是，我们等机会搭伴到陕坝去。

一天，我们到一家饭馆吃午饭时，碰到了王建功、何集中，还有一位家在五原，在归绥女师读书的年轻姑娘左文英。我们一起要了些饭菜。在等候饭菜的时候，大家谈起归绥的沦陷，包头的放弃，撤退时的混乱和狼狈状况，深深感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尝到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痛苦。谈着谈着我们这几个无家可归的青年男女，怀着一种流亡者的沉痛心情，悲愤地引吭高唱起抗日救亡的歌曲。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唱“打回老家去”，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唱了一个又一个，特别唱到“松花江上”的几句：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唱到这里，我们几个都热泪盈眶，歌词表达了大家此时此刻的悲痛心情，这不正是我们当前自身处境的写照吗！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自己可爱的故乡和爹娘欢聚在一堂呢？！接着我们又慷慨激昂地唱起“五月的鲜花”当唱到：

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愤怒，

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
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
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一种要雪耻，要复仇的悲愤之情，激荡着全身。通过这慷慨激昂的歌声，充分反映出我们这些中华儿女一定要坚决抗日，收复家乡的战斗决心。是啊，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奋发图强，坚决抗日，为解放祖国和家乡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参加绥远工委领导下的政训处

过了几天，我们几个人先后都到了陕坝。

到了陕坝，才知道潘纪文、杨植霖、武达平等同志，在麻池被敌机轰炸、装甲车追击冲散后未到后套，去向不明。由于不少人途中被劫，杨大山同志在撤退中又被流弹打伤右臂，几乎丧命，我们都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

我因为一路风霜，饥寒疲累，到陕坝后就病了。浑身骨节疼痛，发高烧。我和郭敬、姬子平同志住在一家老乡的小房间里，当地缺乏木材、煤炭，老乡做饭都用牛粪烧火，大家开始不习惯，烧不了，弄得满屋子是烟，熏得人双目流泪，嗓子呛得难受。就在这样条件下，郭敬和姬子平同志为我烧姜糖水，找偏方，煮稀饭。经他们多方照顾，我的病情很快减轻，逐渐恢复了健康。

到了陕坝之后不久，国民兵改称为游击军。

潘纪文同志等虽然没有退到后套，而政训处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包头参加的王仁安、宋黎夫等都到了陕坝。这时，绥远工委书记李衡同志带了扒子补隆（即现在乌拉特前旗新安镇）东北新村支部的一些党员同志王志诚、刘景平、刘铁民、李清、罗云路、赵子超等近廿多人，也到了陕坝。他们通过原来政训处的党员和郭灵墅商量正在组成游击军新的政训处。

大概在十一月初旬政训处组成了。郭灵墅任政训处处长，李衡任主任，工委组织部长郭敬任组织科长，姬子平任宣传科长，王仁安任总务科长。李衡同志的爱人孔祥云（党员）和到陕坝后参加的左文英（女）、马俊英（女）在组织科工作；我和宋黎夫在宣传科工作。各团的工作人员是：一团政训主任王建功，二团政训主任由工委宣传部长王志诚充任，三团政训主任吕自拔，四团政训主任王兆增，五团政训主任马映光。杜如薪和李佩衡同志到马旅工作，刘耀宗、吴士杰、高万章等同志被派往屯垦军工作，骆时同志原来也在那里。刘景平、狄敏达、张和、吕白斌、苗顺粟、刘铁民、赵子超、李清等廿几位同志分别到各团任政训员，人员不够、又从军官团抽调了一些同志充任，除每团留两名政训员外，大多数到各连任付连长，做政治工作。

这里，我想简略地谈谈郭灵墅。他是山西荣河人，是傅作义的老乡。曾任绥远省公安局秘书。在抗战时期曾一度任傅部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在傅作义的幕僚中，郭颇具爱国主义思想，赞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他有个堂弟郭奠原曾参加长征，任过红军团长，因为负伤，隐蔽在群众家中养伤。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到过绥远。我曾在绥远新闻社和他见过一面。郭奠原后来在傅作义第七集团军任参谋，随傅在平绥路前线与日伪军作战时又一次负伤，被送到包头治疗。归绥沦陷后，不知去向。也许因为郭奠原的关系，郭灵墅对共产党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很崇敬共产党人恽代英、宣侠文，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他大胆地任用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如在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学生时，他敢于吸收潘纪文、杨植霖、武达平、笔者等任教官和小队长；国民兵成立政训处时，他任处长，又请潘纪文同志为主任并吸收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撤退到后套时，潘未到陕坝，而郭又用中共绥远工委书记李衡同志和郭敬等大批共产党人、“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负责政训处工作。这些都说明郭灵墅是愿意接近共产党的。在傅作义任华北剿匪总司令时期，因为多种原

因，郭灵璧一直没有得到傅的重用，甚至也没有给他一个稍微象样的事做。在北平和平解放时，郭在一所中学任历史教员。绥远“九·一九”起义后，还是杨植霖同志邀他来绥，任绥远文史馆副馆长。

救亡歌声给陕坝带来了生气

政训处成立后，大家分散在镇上又住了几天。当各团的同志分头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了以后，政训处的全体人员都搬到一个小学校里住。也在那里办公。学校早已停课，但同学们还三五结伴的不断到学校里来。这时，我们都已经换上一色的灰布军装，还带着自做的领章。同学们没有看见过女兵，很好奇的围在我们住的房间，从玻璃窗往里张望。我们有时唱几句救亡歌曲，他们瞪着一双双小眼围着听。有时也在院里唱几句歌，表示他们也会唱，也喜欢唱，因为是旧歌词，他们唱几句就不再往下唱，愿意听我们唱。同时也在院子里乱吵乱闹，管也不好管。从此，我们得到启示，想到通过教唱救亡歌曲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一些抗日救亡的教育。于是，我问他们：“我们教你们唱救亡歌曲，愿意不愿意？”他们立即高兴的高声喊叫说“愿意愿意，我们可喜欢听你们唱的歌啦！”“那你们明天多找些同学来学歌，好不好？”“好！好！”他们满意地跑着跳着走了。第二天，他们来了二三十个同学，我和宋黎夫就教他们唱救亡歌曲，学起歌来。同学们越来越多，大多数都是八九岁，其中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嗓音很好，他会唱许多过去的歌子，还会唱电影“自由神”中吕骥同志谱曲的主题歌。我们便让他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排好队，由他当队长，带领孩子们整齐、有秩序地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听我们给他们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和东北义勇军打日本的爱国故事，他们非常爱听，总缠着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每天他们准时到达，我们的宣传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学会唱几个救亡歌曲后，在政训处院子里唱，整队回家时在街上唱，在家里唱，还教别的孩子唱。加之，我们在连队里也教唱了救亡歌曲，一时陕坝这个沉寂的小镇上到处荡漾着救亡的歌声，陕坝开始有生气了。

连队政治工作

政训处成立后，宣传科怎么进行工作，大家都没有经验。科长姬子平首先让我给各团政训员拟了一个包括数十个题目的宣讲提纲，作为一个时期内向连队士兵进行政治教育的内容。宣传科还编写了“如何做宣传工作”的小册子，油印到连里。同时，处里的同志还分工到驻扎在陕坝的连队进行政治工作，我分工到特务连。我和连长接洽后，确定每天晚上去给士兵讲一个钟头的政治课。我上课的第一天先简单的讲了讲：国民兵是绥远老百姓的子弟兵，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后套，收复失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强盗抢占了我国东北，“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又想吞并整个中国。现在已经把平津和我们归绥、包头侵占了，我们如今是国破家亡。我们在家乡的亲人和绥远的父老兄弟象东北同胞一样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下的亡国奴，遭受着敌人的欺侮和蹂躏。中华民族有血性的好儿女，绝不能容忍敌人这么横行霸道下去。国难家仇都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抗日，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后套，并以后套为基地，将来反攻，收复包头、归绥和整个绥远，解放全中国。只要我们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齐心协力，中国绝不会亡……。然后，就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抗战歌曲，并把歌词的内容也简单进行之讲解。之后每次上课前我先教廿分钟左右的救亡歌曲，然后讲半个小时多政治课。因为我们每天只有一个钟头的政治课，没有更多接触士兵的机会，更谈不上和士兵谈心、交朋友，把政治工作做得更深入一些，也无法发现和培养一些积极

分子，通过他们教育和团结更多士兵，成为连队团结抗日的核心，以利于彻底改造这个部队。我虽然和连长、连副（政训处没有派人去特务连）等几个人关系相处得很好，非常融洽。但一谈到找几个士兵谈谈或召开一个座谈会，他们就以每天军事科目和值勤任务很重，安排不开，每晚一小时的政治课也是硬挤出来的，已经很费劲了而婉言拒绝。这样，我们在直属队的政治工作，都象蜻蜓点水一样，浮在表面，深入不到士兵群众当中去，甚至在连队工作两三个月了，还叫不来一个士兵的名字。在各团连队做政训工作的连副，虽然生活在连队，和士兵接触的有利条件较多，但他们的工作也受到限制，连长以各种理由，使他們也不能更多的接触士兵，甚至有的团长戒心更大，根本不让你工作，更谈不上你和士兵接近。我们原来设想的，通过政治工作，把抗日的道理做到深入人心，逐步把连队真正改造成为抗日的部队，而不是随便任人欺骗、拨弄的私人工具。这种主观的愿望，虽经努力，可是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工作只能一点一滴地逐步开展。

街头宣传

队坝街头的十字路口，有不少摊贩，经常聚集着一些群众。路东北边有两间刚修好只有三堵墙，前面壁未垒，门窗也未安装的空房子。这大概是原来准备经营商业的主人，因为战事的关系而停止修建了。我和姬子平把它选择成为我们进行口头宣传的场所。每天上午到那里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讲解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战况消息。开始，我们也以唱救亡歌曲来招引群众，然后进行宣讲。姬子平同志是一位善于宣传鼓动工作的演说家，他在太原失守后，从山西徒步走过好多城镇乡村，经过娘子关、雁门关等地来到绥远。他非常生动地向群众讲述他沿途经过的见闻，讲述日寇所到之处奸淫、抢掠、杀人放火，遭

在敌人浩劫的地方，听不到鸡叫犬吠，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说明不抗日人们就没有活头，没办法生存。只有抗战到底才能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当时群众看不到报纸，只听说归绥、包头。绥东几县都被敌人占领了，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如何，则毫无所知，更不知道有什么八路军。急切想知道一点外边的消息，于是，在我们宣讲时，群众非常注意听，并且有时也提出一些问题，请我们答复。姬子平同志就把他从山西前线沿途所看到的一切向大家讲解。他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和阎锡山的部队和日本军一触即溃，不战而逃，把大片大片的国土丧失，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在敌人未到之前，就把老百姓抢劫践踏的不成样子，弄得鸡犬不宁，人民逃跑一空。他还给大家详细地讲述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即从前人们常说的红军，却向前线挺进，并且处处照顾群众利益，首战平型关，消灭敌军精锐板垣师团三千多人；雁门关伏击战，击毁敌人运输汽车三四百辆，全部消灭了车上的日本鬼子；夜袭阳明堡敌人机场，炸毁飞机二十多架；歼灭了大部分守卫机场的部队。这些胜利，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也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八路军所到之处，群众热烈欢迎，烧开水的、送鸡蛋的，当时正是中秋节前后，送月饼、水果的，情绪热烈极了……。从这些具体生动的事例中，使听讲的群众感到八路军真正是老百姓的队伍，因此老百姓把八路军当做自己的亲人，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军队，真正是军民一家，水乳交融。……我们每次讲演，群众都非常注意地听着，不时地随着讲演的内容，发出气愤的骂声或钦佩的赞叹声，我们在群众情绪激奋时，抓住时机，带领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等口号。讲过几次后，到时，我们去了，群众就围拢过来听。我们坚持不懈，十个八个群众来了也讲，三十四五个人时也讲，如果只有三五个人在场，我们就和他们拉家常，进行宣传。就这样，这种宣

讲坚持了很长一个时期，直到我们被停止活动，集中学习时，才中断了街头宣传。

纪念“西安事变”一周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一周年到了。住在陕坝镇上的三团政训员，要举行一次纪念大会，对政训工作人员进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那天，其他各团的政训员也都通知回来参加。会场是在一个有戏台和围墙的空旷的场子里，没有座位，没有人守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听。这样，参加的人就不仅仅是政训工作人员了。有司令部各处的，也混进一些其他部队驻陕坝的人员。会上主要由工委宣传部长——三团政训主任王志诚同志报告“西安事变”的重要意义及其经过。“西安事变”时，他正在东北军内部成立的“学兵队”，这是一九三六年春天，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在延安（当时延安还归东北军管辖）举行秘密会谈后，张学良赞同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主张。从此，不但抵制蒋介石剿共的命令，停止和红军作战，同时在东北军内部积极开展促蒋抗日的活动，成立了“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参加者都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军官。“西安事变”时，学兵队有些人担任了逮捕蒋介石的任务，王志诚同志也参加了。所以对整个“西安事变”经过的前前后后，都比较了解，他首先着重讲“西安事变”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介绍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调动二百六十个团包围陕甘地区，并亲到西安逼迫张、杨反共，促成了兵谏，蒋介石被捕。事变后，如何处置蒋介石，关系到我国是走向扩大内战而灭亡，还是全民抗战以图存这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大问题。事态的发展，终使蒋介石接受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意停止内战，实现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

转变内战而为联合抗日这一历史性伟大转折，是我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与张、杨密切合作而得以实现的。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向张、杨二将军，向东北军、西北军军官，向各界人士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何应钦等企图挑起更大规模内战的阴谋，详细阐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深刻讲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能实现“反对内战，联合抗日”的道理所在，周恩来同志在工作中，真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他那对国内外形势精辟的分析，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宽宏胸怀和热情洋溢，扣人心弦的讲话，使听到他讲话的人，无不心悦诚服，钦佩不已。此外还和以张慕陶为首的一小撮托派分子，以“左”的面貌，破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和有力的斗争，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王志诚同志也讲到西安事变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西安市的爱国学生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游行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几乎遭到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还是张学良亲自劝阻同学回去，并表示：“一周之内，张某一定用实际行动答复你们。”这里，王志诚同志着重说明西安广大群众的爱国运动，特别是“一·二九”一周年的示威游行，对促进张学良在哭谏不成之后，实行兵谏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讲了东北军在临潼骊山后山，半山腰一块虎抱石的后面活捉蒋介石时的情形，那时蒋象一只丧家犬一样，从乱草丛中狼狈地爬了出来，他只穿着一件夹袍和白色衬裤，连鞋袜都没有来得及穿，光着双脚，吓得浑身发抖，像筛糠一样，赖着怎么也不走，由两名士兵硬是架着他才下了山，同志们听了兴奋地哄堂大笑。王志诚同志也谈到张学良未经和周恩来商量，就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蒋扣押。由于东北军少数高级将领在张学良未从南京回来之前，擅自释放

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政府大员，东北军的一些“少壮派”军人，激于一时的气愤，打死了东北军另一将领王以哲将军，几乎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胜利成果，在这样一个危急的局势下，多亏周恩来同志，镇定坚决，多方说服，采取一些紧急措施，稳定了时局，避免了一场极其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

王志诚同志的讲话，不断引起政训员和一些进步军官的掌声和欢笑声，使大家对西安事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自己逼出来的，蒋介石抗日也是张、杨两位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同时也使大家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的反共卖国罪行，激起极大的愤慨。但是由于缺乏统战工作的经验，王志诚同志只考虑到向大家介绍西安变动的真实情况，在讲到兴奋的时候，也说了一些容易刺激国民党人士和军官的话，使他们感到嘲笑，奚落了他们的蒋委员长，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和意见。而我们在游击军的政治工作也才开始，没有基础，更谈不上对这个部队的改造。同时陕坝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除游击军司令部驻扎在这里外，还有国民党骑六师和其他一些部队的少数驻陕坝人员和特工人员。因此，这次纪念大会的召开，虽然对政训工作人员和进步军官有很大的教育，懂得了西安变动的起因与和平解决的重要意义，但也为我们以后在游击军的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和不良后果。

在陕坝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双十二”事变一周年过后，接着一九三八年元旦就要到了。政训处的同志们提出我们是否举行一个新年联欢晚会，演演剧，并和各团的政训员进行团拜。于是大家都希望宣传科能演出一个节目，既活跃陕坝的文化生活，还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但是，当时交通不便，我们在后套任何书报都看不到，剧本更难

找到了。演什么呢？宣传科的同志们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克服一切困难，也要演出一个节目，为我们的宣传工作闯出一条路来。于是，大家都动脑筋思考，但时间太短，要写出一个新的剧本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剧本写出，也排不出来，大家商量的结果，还是演一个现成的剧吧！想来想去，都认为“放下你的鞭子”可以演，大家比较熟悉，而且这个剧的内容，台词根据情况可以有所增减，宋黎夫同志还演过老头，我虽没有演过，也没有看到过剧本，却在陈波儿、崔嵬等同志在绥东抗战慰问演出时，曾看过他们两次演出，因此，大家都同意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决定后，首先，我们几个人凭着记忆，你一句我一句的往起凑剧本，经过两天的努力，虽不完整，大体上总算有个轮廓了。然后又研究谁参加演出，商量确定仍由宋黎夫同志演老头，我演青年工人，女儿本来由左文英演比较合适，但她五音不全，唱歌老走调，只好请身体显得稍胖一点的马俊英担任了。经过几次排练，元旦就到了。那天，仍然在那个有围墙的场内举行团拜。开始由政训主任李衡同志讲了讲当前抗战的形势和如何加强连队的政治工作、并祝大家新年愉快工作顺利后，就开始演出了。这时除游击军政训处和各团政训员外，司令部各处也都有人前来观看，有些群众和小学生也挤进来看了。这是陕坝第一次演出街头剧，虽然演得不怎么好，却也很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宣传了抗日救亡的内容，激励了人们抗日的热情，认识到国难家仇，只有坚决抗日才能报，要重返家园和亲人相聚，也只有坚决抗日、打回老家去，收复绥、包和所有失地，才能做到。

这次演出后，对连队开展群众文娱活动也有所推动。春节时，有些连队也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在农历正月十五，不少连队的政训干部和士兵、群众按照传统习惯，组织耍旱船、踩高跷等各种活动。如张和同志男扮女装耍旱船，很受当地群众和士兵的欢迎，他们驻地的大人、小孩无不认识他，不少乡亲在节日请他到自己家里过节。

油印抗日刊物《一条线》

我们在游击军政训处，通过摸索，总结经验，正在逐步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在陕坝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比较活跃的时候，突然政训处长郭灵璜告诉我们最近暂时停止外出活动，要集中学习一个时期。但是既无一定的学习计划，又缺少书籍，也没有人领导检查，这是为什么呢？自然引起大家的猜测，虽然心里都嘀咕着，但是彼此都心照不宣。还是找到一些理论书籍自学。我记不得从哪找到一本布哈林的辩证法，沈志远著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一册妇女社会常识读本（其中有一章专谈哲学）。我自从在归绥读过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后，对哲学很感兴趣。我就专找哲学书籍着重学习有关哲学方面的问题，并且很认真地作了读书笔记。

在我们集中学习的时期，组织科长（工委组织部长）郭敬同志却没有参加学习，而是经常穿一件蓝布大褂，骑着一辆不知哪找来的旧自行车，来去匆匆地到乡下去接头和开辟地下党的工作。活动在北至狼山口（五家河北）东至百川堡，南至临河，西至磴口一带。

大家虽然整天坐在那里看书学习，但是心里又不踏实，对各团和连队的政训工作和下边的同志非常惦记。感到我们政训处的同志就这么关门读书，下边连队的同志们怎么工作呢？出于一种对工作的责任感，处里同志一起议论，是否出个刊物，登载一些如何做连队政治工作和宣传抗日内容的文艺作品。经过大家讨论，李衡同志也同意，决定出一个卅二开本的油印刊物，稿子大家写。本着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刊名就定为“一条线”，意思是全民全军站在一条线上团结抗日。由谁编辑？大家都认为我过去在归绥办过刊物和报纸副刊，可由我负责编辑，宋黎夫同志刻印。但是我考虑文章由大家写，稿件好办，而油印

刊物主要的工作是编排、刻写，由刻写的同志设计版面，安排文章会更好些，便提出既然由宋黎夫同志负责刻写，而版面如何设计，文章如何编排，都需要刻写的同志动脑筋，这样由宋黎夫同志编辑较妥，我可以协助他编辑，最后就这么定了。第一期主要是李衡同志写的一篇关于如何做连队政治工作的文章，用他的号“仲权”署名，我写了一首以抗日为内容的诗歌，还有其他同志的两篇短文，就已经是相当厚的一个小册子了。创刊号出来后，政训处的同志非常高兴，总算做了一点工作，尽了一点责任了，这个刊物在陕坝文化史上是破天荒的，也是当时绥西唯一的刊物，对当时政训处停止工作和对外活动后，各团政训干部如何进行工作和活跃后套的文化生活，都起了一定作用。这个刊物每期都有李衡同志写的关于政治工作的文章和一些杂文、诗歌等文艺作品。我只每期写一首诗塞责，编辑、刻写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宋黎夫同志担负起来了。可惜，因为政训处即将解散，这个油印刊物只出了三、四期，就和政训处一块停办了。下面就是我在《一条线》上发表的几首诗中的两首，现在抄录如下：

团 结 起 来

日本强盗杀来了，
不管是你的，
还是我的，
都要抢劫、烧毁。
他们霸占我们的土地，
杀害我们的兄弟，
奸淫我们的姊妹，
把我们当成奴隶。

在侵略者面前，
我们再不能各顾自己。

人民要生存，
祖国要独立，
我们必须服从国家民族的利益，
团结在一起，
奋起抗击，收复失地，
把敌人赶出中国去！

一九三八年二月于陕北

只有拿起武器

敌人侵占了绥、包，
还要把战火烧向后套。
我们决不能撇弃大片国土
和千万同胞，
再往后退了……
任凭你退到那里，
敌人都会跟踪追击。
贪婪的强盗，
妄图把中国从地图上抹掉。

被敌人践踏过的地区——
土地在颤抖，
房屋在燃烧，
人民在哭泣，
汉奸们卑躬屈膝，
侵略者横行霸道，
这简直是人间地狱，
我们怎么能忍受得了？！

中国人要有骨气，
我们决不做亡国奴隶，

妥协、投降是一条死路。
我们要活下去，
只有全民动员、拿起武器，
和敌人血战到底！
和敌人血战到底！

一九三八年二月于后套队撰

李大超撤职 政训处解散

一九三八年二月游击军司令部接到傅作义的命令，要向前推进，移驻五原。同时也传来游击军司令李大超被撤职，由马秉仁任游击军司令兼五原专员公署专员。在马未来前游击军司令由参谋长李敬暂代，还传有政训处解散的消息。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前一个时期让我们停止工作、集中学习。也听到传闻傅作义对李大超违背他的命令未从归绥撤到山西，却带一部分国民兵到后套有所不满，还传说李大超在政训处吸收了大批共产党员，简直要把游击军赤化了等等，其实，李大超撤到后套，占据了这块地盘，成为傅作义以后存身和发展的立脚点，为他立了一大功。至于政训处的同志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也仅仅才开始，工作还未很好展开，并且有的团，如一团侯团长，根本不让政训干部到连队去，也不让政训主任在团里任职。外界的传说远远超过实际情况，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不少恶意的中伤。但是纪念西安事变一周年时，王志诚同志的讲话，却成了所有谣传根据的重要例证之一。

当李大超撤职，政训处解散的消息成为事实时，中共绥西临时工委（到陕坝后，绥远工委在七七事变后，和上级组织失掉联系，工委书记李衡同志和郭敬、王志诚同志组成绥西临时工委）研究确定，由李衡同志带一部分同志经临河、伊盟去延安和党中央联系并汇报我们在后套这一段的工作情况。因为李衡同志是由北方局派到绥远，组织绥远工委的。机关设在包头，一九三七年

五月他还到北方局汇报过工作。“七七”事变后，才中断联系。另外，因为王建功同志在一团无法开展工作，决定由王建功、高万章同志和吴士杰、刘耀宗，马俊英等另分一路经磴口、宁夏、兰州等地到陕北去，宋黎夫和左文英单独走，后来到了安康，郭敬和孔祥云同志则暂时留在陕坝做地方党的工作，建立和联系党的秘密活动点，吕自拔这一位少年英俊、工作很有魄力的同志，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在乡下工作时，被暗杀牺牲的。

到 五 原

政训处的一部分同志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从陕坝和游击军司令部一起到了五原。出发前，我们宣传科的同志和从团里回来的狄敏达同志商量写些短小、简练，富于鼓动性的抗日救亡的宣传品，刻印出来只有二寸宽、三寸长就行了。表示政训处解散了，但我们这些人到哪里，就要把抗日救亡的火种带到哪里，姬子平、狄敏达和我都写了几篇，由狄敏达同志刻写，用红黄绿白等色的油光纸油印了几千份。当我们乘坐的大卡车开进五原县城时，沿途从车上散发下去，五原街上的群众跟在车后抢拿这些红红绿绿的小型宣传品。好象农民播种一样，我们要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播种到人民群众的心田。散完这些宣传品，就好象我们心中燃烧的抗日烈火喷吐向这昏暗的人世间，宣示抗日的烽火是扑灭不了的，政训处解散了，我们抗日的决心是动摇不了的。

到五原后，我们被安顿在一个小学校里等候消息。我们住在过去作为教师宿舍的一所两间大的房子里，那儿有一盘很大的土炕，我们行李简单，铺了些干草当褥子，挤在一起睡。室内桌椅等什么都没有。大家每天无事，校院虽不很大，在教师宿舍旁边却有一个小小的网球场。我们从学校存放一些零乱杂物的储藏室里发现了网球、球拍和网子，于是，大家每天除了在一块议论议论传闻到的一点点全国战况外，有的打球、有的外出访问亲友，

找住在五原街上的熟人聊天。

过了几天，王志诚同志在一个晚上来到我们的住处，向我们传达说：李衡同志不回来了。捎回话来，准备留下姬子平，章叶频，王晓庄（骆时），王黎生等七八个人帮助筹备五原专员公署，其他同志都由王志诚同志带领，到延安去。

游击军司令兼绥西行政督察专员虽然换为马秉仁，但他一直没有到五原。司令由游击军参谋长李敬暂代，专署的工作据说是由马秉仁带来的也是一位姓李的参谋长管，但是在我离开专署前，他也从未到过专署。专员公署设在一所有里外院，很讲究的住宅里。筹备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姬子平负责。我们在陕坝政训处时，伙食管理得不好，不知是为了表示政训处工作的同志应该艰苦朴素，还是缺乏经验，每天炒白菜，咸的使人难以下咽，很少变变花样，有些同志便拿上馒头到饭馆里要个菜吃。到专署后伙食大为改善，每顿饭几个菜，主食有大米饭、馒头，有时还有面条，很合大家口味。办伙食的是由部队派来的。大家开玩笑说：这大概是因为专署是后套最高行政机构，我们还没有干什么事，却先享受起优越的官僚生活了。

不到延安心不甘

在专署筹备的两个多月里，只起草过一个禁止种罂粟（大烟）的布告，但是反复修改了几次，最后仍未定稿。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闲得苦闷极了。原来说，留我是为了编辑一个油印小报，可是没有收音机、电池，更无电台，收不到新闻，也没有油印机等一套设备。小报办不成，每天无事可做，也找不到什么书看，王晓庄同志找到一本“苏联计划经济”每天认真阅读学习，其他人也都呆着，不是聊天，就是下棋。我除翻阅一本哲学书外有时也出去找一些熟人，当时秦漪泽和他爱人甘雨兰也住在五原，我便常到他家聊天。在他家里我竟意外地看到他

保存的几期《塞原》文艺旬刊，这是“七七”事变前我从归绥给他寄来的。看到自己编的刊物，重读自己写过的诗文，心情分外难受，越发感到自己这么呆下去简直是浪费生命。家乡被日寇侵占，母亲弟弟生死不明，如果还在人间，老母幼弟，她们娘儿俩又如何生活？许多同志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上前线去了，我却在这里无事可做，把大好时光都白白消磨过去了，我怎么能再这么呆下去呢？！我开始考虑如何离开五原。

四月底，延安派刘瑞森同志到五原。一天，王晓庄同志告诉我，有一位老刘同志找你，并告诉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到时，我按约定的暗号，找到那个地方。原来那是两间破烂不堪，顶棚露天，空无人住的房子。当我走进去，纳闷地向四面巡视的时候，从房子外面和这间房子相通的院里，走进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他穿着一身半旧的制服。一见面就很亲切地问我：“你找谁呢？”我按王晓庄同志告诉的话说：“王晓庄让我到这里来，说有一位老刘同志找我。”并且作了自我介绍。刘瑞森同志听了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噢，你就是叶颀同志。”然后问了问在归绥沦陷前的工作和在专署的情况，我向他汇报后，同时也告诉他我是绥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长。最后，老刘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是否还愿在这里工作？我说：“我想到延安学习，学习。”于是老刘同志给我写了到延安“陕公”学习的介绍信。我便高兴的准备到陕北去——我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当时，专署虽由那位李参谋长代管，但他一次也未到过，我也不认识他，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他的住处，找他请假，我借口要到汉口去找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的叔父。他以专署正在筹建，人员缺额很多，坚不准假，反复动员我留下在专署工作。我决心已下，不到延安心不甘，过了两天我又找他，还是不准。接着我第三次找他，我找各种理由，特别说明我叔父在武汉国民党××师做事，我只有他一个亲人，去迟了，怕因战事他迁居别处就不容易找到了。同时也讲了调我到专署，主要是编辑油印小报，现在

什么也没有，收不到新闻，工作无法开展，没有事干，已经呆了两个多月了。他还不答应，我不走，他仍然耐心动员我留下，最后，看到我坚持着要走，他才应允，并送了我三十元旅费。我请假后，就了解如何到延安的路线，并打问有没有可以同行的伙伴，准备去延安了。

三、投入党的怀抱

——桃力民抗日救亡工作片断

从五原到桃力民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带了绥西特委刘瑞森同志给我写的到陕北公学学习的介绍信，准备从五原出发，经临河、桃力民到延安去。

热情的朋友吴，非常关怀地劝我不要到大后方去。那时我对外都说是打算到武汉找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的叔父去，临行的那天，他为我在一个饭馆里饯行，仍还好心地再三劝我留下，他说：

“你不明白，现在逃难到武汉的人太多，如果万一找不到你叔父，人地生疏，工作更难找，你会饿饭的！”我说：“我已请假了，不好再考虑其他了。”

“留下来吧！请假辞职的事不要紧，工作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从饭馆出来，我要走了。吴还拉着我的手不放，善意地规劝我。他说，他是刚从大后方来的，知道大后方的情况，许多人到了武汉，找不到熟人，饭也吃不上。但我仍坚决地挣脱他的手，向前跑了几步，跟上一位预先约好的向导，向他挥手告别了。

因为走得匆忙，又没有经验，虽然书包里还带着一双布鞋，

可是没有来得及换，还穿着一双不跟脚的破皮鞋。天已很晚了，才走了卅多里路，双脚都打了不少泡。那位向导把我安排在河北新村的一位老乡家里住宿。第二天，我丢掉破皮鞋，换上那双布鞋，向导给我指了指方向，我一个人上路了。

路上行人很少，碰到几辆拉货的骡车，想请车把式捎个脚，但都被拒绝了。我只好自己一拐一拐地走。本来不到两天的路程，我却走了两天多。第三天上午一到临河，第一件事就是到商店买一双胶鞋，以便继续赶路，在街上我碰到了准备到桃力民自卫军工作的王兆增同志，他是骑着马和桃力民自卫军司令越兆仁一块走的。当晚我们都宿在同一个客店里。这时，我才知道和我同行的有樊建中夫妇，一辆牛车满满拉着一车行李、包袱和日用家俱，他夫人也坐在上边。另外还有自卫军副司令史仙舟的儿子史学进和李佩衡父子俩。第二天我们都还宿在一起，越兆仁和王兆增骑马早就到了，并为我们准备好房子、晚饭。饭后，越向我们说，他们有事准备骑马先走，让我们和樊建中夫妇一同走，他们牛车走得慢，我们可以相随上。

第三天，我们从客店出发，我和小史在前面走，其他人在后面跟着。沿途很少人家，也没有道路，是一望无际的沙滩地，幸亏小史是桃力民的人，这趟路走过几次，比较熟悉。我就跟上他走。开始我双脚打泡未愈，走起路来还有些疼，走不快，过了两天，逐渐恢复原状，能够和小史一同快点向前走了。一天，快到中午，已经感到太阳有些晒人，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个人，也看不到一户人家，肚子里空空地感到饿了，脚步也走得慢了。走呀，走呀，好容易远远看见一个蒙古包，便朝向蒙古包走去。想喝一口水，买些东西吃。还未走到蒙古包前，一只挺大的狼犬已经狂吠着向我们扑来，紧跟着从蒙古包里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蒙族老乡，把狗喊住，他肩上背着一只枪，两眼盯着看我们，我们不知他是什么人，大概他也弄不清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又不会说蒙语，便转身悻悻地赶快离开那里，走几步还回过头来看

看，生怕他向我们开枪。又走了几里，经过五六里沙漠地带，天正中午，太阳当空晒得人象在蒸笼里一样，浑身是汗，头脑昏晕。沙漠也被晒得烫人，我又穿着一双胶鞋，脚心被烫得简直无处下脚，可是坐下来屁股又被烫得难以忍受，我们俩忍耐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漠上走着，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舌敝唇焦、疲惫不堪地走出这一段沙漠地带。黄昏，我们走到一处仅有一眼井的地方，小史说我们今天只能宿营在这里，前后左右几十里没有人家，错过这口井，我们今天就连一口水也喝不上了。这时我们口渴、肚子越发饿的厉害，后悔昨天为什么不买点干粮，准备在没有人烟的地方食用。我们守着这口井，坐在沙地上，又渴又饿地等了好长时间，樊建中他们几个才赶着牛车慢吞吞地走来了。我和樊说：“怎么办呀，我们什么干粮也没有带，有井连口水也喝不上”。樊笑着向我们说：“你们别发愁，我们带着小米和水桶，咱们煮粥吃”。说着他从车上拿下一只白铁桶和一小袋小米。我们高兴地拣了些牛粪、骆驼粪，又找了几块破坷拉，勉强搭了个灶，点着牛粪用水桶煮粥。我们每人喝了两碗粥，虽然不十分饱，但是感到特别香甜，晚上，我们就露天宿营在满天星斗下的沙地上。

第四天晚上，我们仍然露营在又一处仅有一眼井的荒野地方，据说从临河到桃力民，这是必经之地，错过这两处，便要挨饿受渴。我们真应该感谢老樊，如果不是他搬家带着小米、水桶、碗筷，我们不但这两天喝不上水，吃不上东西，恐怕以后这段路程也很难度过了。

这样我们走呀走的走了整整七天，才到了桃力民。

在中共绥蒙委员会

到了桃力民，自卫军司令越兆仁请我们吃了一顿离开五原后最丰盛的午餐，糜米捞饭羊肉炖土豆。

在吃饭时，我了解到八路军骑兵团，就在离此二三十里的大康保庙驻扎，原绥远工委书记、我们政训主任李衡同志就在那里的中共绥蒙委员会任组织部长。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当天下午就借了一匹马，驮着我简单的行李，到骑兵团去找李衡同志。

原来党的领导机关绥蒙委员会和骑兵团在一起活动。到了那里，我找到李衡同志，还有狄敏达同志，他是随李衡同志到延安又一同来这里的。我们都多么高兴啊！自从五原分手，已半年多不见了。因为住的很挤，就让我先暂时住在绥蒙委员会书记白如冰同志的外屋。以后，我又认识了党委宣传部长赵通儒、青年部长白成铭、妇女部长白凌云（白如冰同志的爱人）和刚从延安“抗大”、“陕公”分配到这里的郑朝珍、高耀堂（鸿光）、王×等同志。

住下以后，我向李衡同志说明我是经刘瑞森同志介绍到延安去学习的。他谈话中表示这里各方面的工作刚刚开展，很需要人，希望我能留下。同时，我也不知道从这儿怎么到延安去，于是便留下了。

中共绥蒙委员会，除了直接领导桃力民地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外，还不断派人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工作，所以，经常人来人往，有的是来请示汇报工作的，有的是刚从延安派来的，住上几天，又派出去了。因此，今天吃饭时突然多了几个人，明天有的同志又不见了。当时，我看见在桃力民搞民运工作的薛向晨几次到大康保庙来找党委的领导同志。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白如冰同志忙得很，开会，谈话，作学习报告，经常有人来找，每天很晚才休息。

中共绥蒙委员会机关带着一批图书，除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书籍外，还有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肖军的《八月的乡村》、肖红的《生死场》，还有许多过去听也没听说过的，延安出版的马列主义的书，有些是抗战以来大后方出版的进步书籍。虽然只有二

百本左右，但从归绥撤退以后将近一年，我们很少和外界接触，什么进步的新书也看不到。现在，看见这么多好书，我高兴地如获至宝，在没有分配我做具体工作之前，我如饥似渴地整天看书和做笔记了。

在我住的土炕上，用上坯垒起上面搭了一块门板，就成了我的书桌。我在后套已经读过两三本关于哲学的书，开始我又重读了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和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的几章哲学讲稿。接着我读了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基础》，并且做了笔记。

住了几天之后，首先分配我到教导队教唱救亡歌曲。

每天早上我看着骑兵团的战士们进行操练，他们骑着骏马飞奔，威武地在马上挥舞大刀，并且高亢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壮歌曲。看了使人心情特别感到振奋，激动。他们才真正是抗日的队伍，中华民族的希望。给这些战士教歌，是多么光荣的任务啊！

我到教导队后，先了解他们会唱哪些歌后，开始还是从“义勇军进行曲”教起，然后教“救国军歌”、“大众的歌手”等，我隔一天去教一次，教得很起劲，也非常自豪。

在绥蒙委员会机关，我还参加了一次生活会，会上批评了前一个时期组织的宣传队带队的王×同志。宣传队在附近一带巡回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救亡的道理、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等。王×同志由于生活上疏于检点，不能在吃苦耐劳方面起带头作用，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引起同志们的反映。发言的同志都非常严肃认真，从党和群众的关系方面，处处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批评了王×同志的缺点和错误，有的同志批评的非常尖锐，并提出今后应该如何注意接受教训。这次会上我认识了绥蒙委员会的军事部长、骑兵团副团长于占彪同志，他也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赤红脸庞，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英俊、果敢的青年指挥员，他发言的时间较长，嗓音宏亮，讲话有

条有理，句句使人听了心悦诚服。我在炕上一个角落里悄悄地坐着，由于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屏息着呼吸，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心里非常紧张，而又感到这次会对我来说是一次关于进行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使我亲身体会到八路军是一个严肃的集体，有远大的革命理想，纪律严明，和群众血肉相联，又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革命队伍。会后，紧接着我们学习讨论了毛泽东同志最近写的《反对自由主义》。我们看到的是个油印的小册了。当时，我感到文章短小精练，文字通俗，结构严谨。明确指出为什么要反对自由主义，它的表现，危害以及如何克服并同自由主义进行斗争等都说得那么透彻，尤其十一条表现，条条都有针对性。想起过去我虽然看过许多书，但是从来也没有阅读过这么简短而内容又这么丰富的文章，更没有看到过与每个人和现实生活联系的这么密切的好文章。特别是当我和大家一起参加讨论时，同志们一条条拿来对照检查自己，都说自己某些方面存在自由主义，有的说我有这几条，有的说我有那几条，而我这个过去自认为思想进步，追求真理，洁身自爱，真诚老实，刚刚生活在这个革命集体中的年轻人，怎么竟会没有一条？感到好象毛主席就是说自己似的。开始感到在这个革命队伍里做一个真正的战士，一个参加现实火热斗争的革命者，一个布尔什维克是多么不容易啊！绝不象自己在归绥所看到的中国某些作家笔下写的那些革命者，从而深深感到克服自由主义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艰巨性。

第一次领到两元津贴

自从到了桃力民，便到绥蒙委员会机关，和八路军骑兵团的战士生活在一起，心里比在后套踏实了，心情舒畅了，有了理想的奔头了，真正找到了靠山，不愁吃不愁穿，还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工作条件，我很安心的住下来了。

不久，机关发津贴了，据“小鬼”说每人都是两元，也给我发了，当他把二元钱递到我手里时，我发愣了，我来了才两三个星期，也给发吗？我望着他问道：“这是给我的吗？”他说：“是给你的。”这两元钱虽然很少，可是，我心里不由得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幸福的感情。因为我现在确确实实被他们看成这个革命集体中的一员了。我参加到这个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队伍里，是多么光荣啊！这一晚上，我简直兴奋得不能成眠，往事一幕幕从记忆里重新映现在脑海。

我想起在国民党统治下，找事谋生的困难。父亲失业两年多，家庭生活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好不容易找到一点事做，他老人家就日没夜地拚命苦干，晚上经常是母亲、我和弟弟都早已入睡了，父亲还在煤油灯下，一笔一划工整地为人抄写东西，终于积劳成疾，卧床不起。由于治疗不及时，病已沉重，才托人请到一位大夫到家给诊治，大夫用听诊器检查后，埋怨我们看得太晚了，是肺炎，给开了一个处方，告诉我药费需要一块大洋，到他诊所去取。我从母亲手里接过她多年压在箱底的，她赔嫁时的手饰，急忙去当铺当了一元钱，又赶快跑到大夫家里取药。大夫正在家里忙着打麻将，我一开口，他就说等等打完这一把再说，一直等他打完那一把牌，才抬头问我“有什么事”，我递过去一块白洋说“来取药”，他才起身给我包了一片黄胺。我又匆匆忙忙回家，把药给父亲吃了，这时父亲已奄奄一息，当晚就逝去了。我们娘儿三个悲痛地号啕大哭起来。我们哭泣父亲为人忠厚老实，一生辛勤地劳动，在失意中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我们哭泣父亲还不到五十岁，因为不能及时治疗，耽误了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们更哭泣父亲逝世后，我们娘儿三个将怎么生活，真象是天塌下来了！我们感到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眼前是一片黑暗……几个月之后，经过几番周折，才托父亲的朋友为我找到一个勉强能够糊口的工作。

我也想起我和我的朋友们，如何对旧社会人吃人的制度极端

不满，我们想改变它，又无能为力，却处处受到它的压迫、限制和侮辱。我们经历着一个苦闷，彷徨、摸索、挣扎前进的痛苦过程。我们逐渐从进步书刊和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里得到启示，在思想里有一个我们愿意为之献身的朦朦胧胧的革命理想，它支持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也鞭策着我们。从事了一些进步的文化工作和抗日救亡的活动。我们找党，首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牺盟”，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

我还想到，在没有找到党的日子里，我的心绪是不稳定的，感情是脆弱的，工作顺利时是积极的，兴奋的，愉快的，工作遇到困难，受到打击时，竟又消沉起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被当作赤色分子受到敌探的监视，自己编的副刊受到警告，当杨森这位使人钦佩的革命老人，在龙泉公园散发山西“牺盟”会一个月前印发的，在久远说来是毫不切合时宜的传单时，公安人员也到我家查问，我编的《塞原》、《塞北诗草》被迫停刊，“民先”总部寄来的书刊被扣……。这时，我很痛苦，烦恼。啊！可是，就是在这时候，一批批外地来的朋友、同志，他们不断地给我以帮助、鼓励和力量，使我空虚的心田又逐渐充实起来，使我感到我们并不是孤立的，我眼前又憧憬着光明的未来，我激动地振作精神，又勇敢地冲向前去……。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党，找到我们自己的队伍，象一滴水溶化在滚滚的长江、大海里。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浑身充满力量。

参加党的研究会

一天，白成铭同志通知我参加党的研究会。会场在一个大殿里，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人们还未到齐，同志们正互相拉着唱歌，歌声此起彼伏，一片欢腾，会场非常活跃。我刚找个地方坐下，一个脸庞圆圆的、红红的十七八岁少年，这是经过长征的

青年委员，在歌声刚落的时候，突然立起喊道：“欢迎章叶频唱一个好不好？”“好！”接着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弄得我心头象怀着一个小鹿一样频频乱跳，幸亏我在唱歌教歌方面已不是第一次了，我想了想，唱了一支我平常喜欢哼哼的歌子“保卫我们的祖国”，这是吕骥谱曲的“保卫马德里”，在“七七”事变后，人们把它改为“保卫我们的祖国”了。歌词是：

拿起爆烈的手榴弹，
对准杀人放火的日本兵。
起来！起来！
全中国的人民，
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
快加入为和平而战的阵线。
起来！起来！
向疯狂的侵略者，
作决死的斗争，
保卫我们的祖国，
保卫全世界的和平。

这首歌子唱起来慷慨激昂，雄壮嘹亮，振奋人心，鼓舞斗志，铿锵入耳，非常好听。当时我嗓子还好，每次都能把高音挑起。唱后，大家又是一阵掌声，可是这位可爱的青年委员又出新的点子了：“请叶频同志教我们唱这支歌好不好？”大家同声道：“好！”于是，在开会之前，我一句一句地教唱起这支歌了。我参加过两次党的研究会，会前都由我教歌。

这次党的研究会，主讲的是中共绥蒙委员会书记白如冰同志，他着重讲党的任务。他说：“我们党为了照顾大局，从民族利益出发，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为实现国内和平打下基础，使中国抗日救亡的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三中全会被迫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亦已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现阶段党的任务，就是实现和发展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人民共和国。党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已经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就是为明天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奠定基础。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两者并不是矛盾的。我们要向苏联学习，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策略水平，为中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努力……”。他讲的很多，虽然没有讲稿，却侃侃而谈，使人很受教育，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自听到的关于党和共产主义的道理，有许多名词过去都未听过，实际上这是一堂生动的党的共产主义教育课。和我在归绥偷阅的斯诺的《西北印象记》时相比，直接听了使人感到更新鲜更亲切。

参加过两次会后，我又认识了更多一些同志，晚饭后经常和他们一起在庙外散步，坐在沙丘上谈心。一位名叫薛鸿亮的经过长征的年轻人，给我讲长征的故事，他讲得那么生动，那么激动人心，使我为红军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为革命而不怕牺牲流血英勇献身的精神所感动。他们过雪山、走草地，吃草根、野菜、煮皮带，经受了除共产党人之外，任何人都忍受不了的饥寒、贫困，克服了别人克服不了的无数艰难险阻，他们三天行军三百二十里，还要消灭前进道路上拦阻的敌人，抢渡乌江，飞夺芦定桥，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突破天险腊子口等等，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胜利地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成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英雄史诗。我对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红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初读《论持久战》

七月间的一天中午，刚刚吃过午饭。我在院子里一个人来回走着散步，忽然看见一位身穿灰色军装，年纪约廿几岁的同志，

肩上扛着一个灰蓝色的马褡子，汗流满面，走了进来。我以为是一位司务长买东西回来了。看到他的同志都亲热地和他打招呼：“老高同志回来了！”他笑容满面地应答着：“嗯，回来了。”他走进中间一个房子里，把马褡子放下，一面擦汗，一面向周围走近他身边的同志们说：“这回可给你们带回好东西来啦。”大家抢着问他：“是什么好东西？”他指着马褡子说：“毛主席的最新著作《论持久战》。”说着从马褡子里一叠一叠往外取出最近一期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上面醒目地印着红色大字标题“论持久战”和毛泽东同志的署名。

我在门外听到他的话后，也满怀高兴地走近他的身旁。高耀堂同志为我们介绍说：

“这是新来的章叶频同志。”

“这是咱们的秘书长高增培同志。”

我紧走一步和他握手并且说：

“从延安回来，一路辛苦了！”他说：

“惯啦，也不感觉到怎么累。”

我顺手拿起一本《解放》杂志，翻着看了看，这期只登载着毛主席《论持久战》一篇文章。便向老高同志问道：“我可以借一本看看吗？”他笑着爽快地说：“你拿一本去看吧！”

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於抗战的前途抱着一种忧虑的心情，看不到希望，感到前途渺渺茫茫，只好听天由命去罢，或者听候国际联盟调查，主持公道，裁决日本退兵，把希望寄托在国联。有些人虽然模糊认识到只有抗战才能争取生存，但是抗战能不能够胜利，如何才能胜利，许多问题都弄不清楚，讲不出个道理。看到听到的只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一溃千里，弃城失地，使人失掉信心。至於八路军，虽然挺进敌后，打了些胜仗，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但毕竟人数很少，武器装备也差，能不能打败鬼子，什么时候才能争取胜利，对此人们也有些怀疑。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虽有抗战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但是如

何说服人民，鼓舞人民的斗志，动员人民起来，拿起武器，坚持抗战，争取胜利，还需要艰巨的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抗战以来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特别是亡国论，在徐州失守，武汉告急的时候，又很嚣张地到处传播着。这就更加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正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指导中国人民抗战的有力的理论武器“论持久战”发表了。

我拿了一期“解放”，回到自己的住房，认真地读着，越读越感到这本书不同一般，越读越爱不释手。我原来思想上的疑难问题，这篇文章都一一作了明确的解答，而且道理讲得透彻，内容丰富，有些问题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于是，我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气把它粗读了一遍。

毛主席为了解答抗战以来全国人民对于战争能不能胜利？如何去争取胜利？战争过程究竟会怎样？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等问题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一、敌强我弱；二、敌退步、我进步；三、敌小我大；四、敌寡助、我多助。据此，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深刻地剖析了为什么抗日战争不能速胜，必将是持久战和最后胜利则是中国的道理。从而科学地推断抗日战争必然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而达到胜利。毛主席有力地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亡国论”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一面，即敌之长处，我的短处，并加以夸大，得出“亡国论”的结论。“速胜论”则相反，只看到敌之短处、我的长处，而加以夸大，得出“速胜论”的结论。从认识论上讲都是主观片面的。不能如实地全面的反映战争双方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因而也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毛主席在论述了抗战规律之后，紧接着提出了人民战争的路线和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阐明了战争和政治，防御与进攻，持久与速决，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辩证关系，确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具体战略方针等问题。

读了毛主席这一逻辑性很强，非常有说服力的著作，我真是

茅塞顿开，心里一下那么豁亮。我被毛主席生动形象的语言，通俗易懂的文笔，精湛的分析科学预见所折服，所钦佩。感到中国有希望了，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惊讶中国共产党有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真了不起。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绝不会亡，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有针对性地完全解答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心目中希望解决而又解答不了的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为全国人民指出了抗战胜利的道路，坚定了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我年轻时喜欢看《三国演义》，非常崇拜诸葛亮，佩服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的本领。但是总感到有些神秘莫测，非常玄奥，难以理解。读了毛主席“论持久战”之后，觉得毛主席比诸葛亮高明多了。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十个月来中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日双方各方面的对比加以科学的分析，层层深入地把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等等道理讲得深刻透彻，面面周到，使人信服。这是诸葛亮望尘莫及而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这篇著作全篇都贯穿着唯物辩证法，这也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哲学书籍。它不仅是一篇伟大的军事著作，而且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在我阅读这篇著作时，满腔的热血在胸中不断翻滚着，我从毛主席这篇伟大著作中受到鼓舞，得到启示，吸取了力量。兴奋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信心百倍。感到在有这样英明领袖的革命队伍里工作，真是太幸福了，我更加愉快地积极在中共绥蒙委员会工作着。

编辑《绥蒙周刊》

又过了几天，李衡同志告诉我，由于桃力民地区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为了使同志们对国内外大事和国统区、敌占区的情况，及时了解掌握，组织上决定让我和狄敏达同志编印一份油印小报，刊登从电台收到的国内外新闻，及时反映绥蒙、后套军民

抗日救亡运动的动态，和敌人统治下绥远人民的情况。这份报纸定名为《绥蒙周刊》，每周出一期，篇幅视内容而定。于是，我和狄敏达紧张地忙碌起来了，我编稿子，狄敏达刻写腊板。他善于写美术字，腊板也刻写的很好，在后套时就和我合作刻写过宣传品。这次两人又合作共事了。而特别使人高兴的是，这次编辑小报，是在党的领导机关绥蒙委员会，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条件困难，但我们工作的十分认真，起劲。这样，经过几天紧张的筹办，《绥蒙周刊》这个油印小报，很快就在1938年六月底七月初问世了。这个小报受到同志们的欢迎和赞扬，多少解决了一些消息不灵，对外界毫无所闻的处境。我记得第一期正赶上张皋峰事件，这是头条新闻，其次是我和狄敏达根据从绥远沦陷区来人收集到的在敌人占领绥远后，人民遭受迫害的亡国奴生活点滴。第一期用了两张腊纸，印成一大张。《绥蒙周刊》在我被批准到延安学习前，共出了五六期。

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一周年就来到了。党委和骑兵团绥西专员公署派赴伊盟的政治工作队，鄂托克旗游击队等决定在桃力民的乌兰素，召开一次军民联欢会，来纪念抗战一周年，以便宣传八路军的胜利和我党我军的政策，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组织上决定我们几个年轻人演个节目。没有剧本怎么办呢？于是，白成铭、狄敏达、郑朝珍和我几个人商量，以敌人进攻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一家儿子被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抓丁，老头被打死，婆媳逃亡流浪，遇到八路军得救的故事为内容，宣传敌人的残暴，国民党军不打鬼子害百姓的罪行，八路军坚决抗日，关心群众，爱护群众，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从而指出敌人来了只有坚决抗战，中国人民才有活路……。把内容情节大体上确定一个轮廓后，台词由个人自编，因为没有女同志，就

男扮女装，白成铭同志饰婆婆，我饰媳妇，狄敏达、郑朝珍同志等人饰逃难老乡和溃兵。角色分配后，就排演。边排边补充修正，排了三四次，简单地准备了些服装道具，就演出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早饭后，我和同志们兴致勃勃地骑马到桃力民乌兰素去。我不会骑马，同志们为了照顾我，挑了一匹比较老实的马让我骑。可是，大家一上马，前边的马匹一跑，我骑的马也跟着跑起来了，我紧张的心儿突突地直跳。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庄时，突然跑出几只高大的恶狗，狂吠着向我们扑来，紧追着马汪汪乱叫、乱咬，并往马身上扑，把马惊的跑得越快了，简直是飞奔了。我既怕狗扑上来咬住腿，又怕摔下马来，双手抱着马鞍，弯腰俯身在马身上，惊慌地任马狂奔，危险极了。忽然，我前边一位同志，连人带马鞍子摔下马来，我不但无法停下来搀扶他，就连自己骑的马也控制不住，也很担心自己滚下马来。马匹狂奔了一阵，离那个村庄远了，那几只可恶的狗也大概返回去了，马跑的速度也逐渐放慢。万幸，我竟没有摔下来。过后同志们笑我不会骑马，抱着马鞍跑，那样骑马很危险，马鞍一滚就把人摔下来了。

到了桃力民乌兰素，这个临时的集市，蒙汉群众已经到了不少，蒙族老乡都穿着民族服装，妇女头上戴着一串串头饰，还有许多摆摊卖东西的老乡，卖扁食（饺子）的、羊杂碎的和其他吃食的，使会场增添了热闹的气氛。在会场西边搭了一个简易的台子。骑兵团的战士也列队坐在台前参加大会。会前，战士们互相拉着唱歌，非常活跃。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开会后，首先主席阐明开会的意义。接着白如冰同志作政治报告，他正确地分析了这一年来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检讨这一年来抗战的经验和教训，末了，指出最后胜利是我们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战胜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他讲过后，鄂托克旗副官，在群众热烈欢迎的掌声中讲话了，他满口流利的汉话，讲的虽然不多，可是每句话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讲到“今天我们应该放

弃过去彼此仇视的成见，从此蒙人不欺汉人，汉人不欺蒙人，大家携起手来站在一条线上，对付我们共同的大敌——日本帝国主义者……”更获得全场热烈的拥护，掌声雷动。同时，“蒙汉团结起来”，“蒙汉齐心打日本”，“拥护蒙古王爺领导抗日”的口号声轰动了整个会场，每颗心都被激动着、兴奋着。蒙古人汉人沸腾的血液，一齐在抗日的洪流中含流了。接着，骑兵团政委刘永远同志讲话，他讲了当前抗战的形势，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敌人后方对日作战的捷报。他特别提到“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我们一定坚决执行四项保证，也要求国民党按五项要求办事。最后谈到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来到绥蒙地区和各族各界同胞共同抗日，希望各族各界人民多方予以帮助。同时也讲到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时时处处为人民服务。如群众纪律有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提批评意见。刘政委讲完话后，开始演戏了。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高压下”，这是骑兵团战士和伊盟政治工作队演出的。此外还有表演唱“送郎上前线”、“抗日十杯茶”和我们自编的节目“张家店”，虽然舞台、布景、化装都非常简单，我们几个人南腔北调，又演得非常蹩脚，但因为演出的内容是针对当前抗战中发生的问题，和群众切身利益相关，同时这里群众从来没有看过话剧。所以，大家都 very 注意看，也获得了一定的宣传效果。回到机关后，我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通讯“七七抗战一周年在桃力民”和一首诗。当时往什么地方投寄，并无目标，后来，看到机关有陕西省委公开出版的《西北》，刊物上注明通讯地址，我就把通讯寄给《西北》了。后来在延安碰到郑天翔同志，他告诉我：“你在桃力民写的通讯我从党刊八月份的《西北》上看到了，才知道你的下落。”我写的那首诗，在《绥蒙周刊》上发表了，下面就是那首诗：

抗战必胜的信念

——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在乌兰素，
一块荒漠的沙滩；
平时没有人烟，
今天却点燃起战斗的火焰。
去年今天——
爆发了芦沟桥事变，
日寇抢占了平津、华北；
也侵入大半个绥远。
如今，抗战已整整一年，
民族的灾难、人民国破家亡的悲惨，
就是这偏僻的沙漠地区，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也不会忘记。
东西桃楞，乌素吉汗、桃力民等地的群众，
驻扎在康保庙的八路军骑兵团战士，
今天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开会纪念。
于是，乌兰素沸腾起来了！
你听——
这儿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那里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还夹杂着慷慨激昂的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坚决抗战到底！”
在坚持抗日的旗帜下，
在蒙汉人民团结的口号下，
军政各界代表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只要团结抗战到底，
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夜於伊盟康保庙

入 党

我在绥蒙委员会这个充满朝气的革命大家庭里生活工作的非常愉快，心情舒畅。一天，白成铭同志给我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说：“你仔细看看，看完后交还给我，咱们谈谈，但你不要给任何人看。”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捧着这本用麻纸刻印的，虽然很薄但却使人感到份量沉重的小册子，眼眶湿润了。我万分激动地说：“好，我很快看完给你。”

我兴奋地回到自己的宿舍也是办公的屋内，里面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我从衣袋里取出那本极其珍贵的密秘小册子，坐在炕沿上，待激动着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便开始认真地一字一句的读着，读了一遍又一遍，禁不住心潮翻滚。我从中看到革命理想和奋斗的远大目标，要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队伍，一批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光荣的组织啊！联想到过去传闻中听到的有关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的丰功伟绩，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许多有名的共产党员英勇献身的故事，而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后，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努力，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迹等等。读了党章之后，我才真正了解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党，共产党人是一批如何有远见卓识而又脚踏实地干革命事业的非凡人物。我读着，想着，崇高远大的理想，当前严重的民族灾难，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这本小册子给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给了我无限力量和坚定的信念，我完全沉浸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神圣的

高尚的情感中了。

经过反复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第二天，我压抑着自己激动的心情，把小册子送还白成铭同志，并且说：“我看了几遍了，虽然还记不住，但是内容懂得了。”

“你能为共产党的纲领奋斗吗？”白成铭同志问我。

“能！”

“你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

“当然愿意，我早就想参加了，我一到桃力民听到李衡同志在这里，下午就赶来了，就是为了追随党……”

“你仔细考虑考虑，共产党员是干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崇高、艰巨而伟大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要不惜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处处事事要维护党的利益，遵守党的纪律。你能做到吗？”

“能做到！”

“能？如果为了党的工作，组织上决定让你到一个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工作，你能服从组织决定吗？”

“能！”

“能吗？党如果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决定让你去完成，可是完成这个任务有牺牲的可能，因为去了几批同志都牺牲了，明知去了可能牺牲，可是为了革命事业，需要你去，你能接受这个任务吗？”

“能！”我坚定地说。

白成铭同志微笑地向我说：“不要急着回答。你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答复我。因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轻率的脱口而说‘能’，那样的思想是不牢固的。”

我不再说什么了，虽然我从一九三四年在左联中国诗歌会的影响下，在归绥开展新诗歌运动以来，经过长期考虑，长期的探索、追逐，长期地和共产党人接触或相处中，认识了党，崇敬党，所以两次要到延安去，都充分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有献身革

命的精神。但我仍然遵照白成铭同志的嘱咐，又认真地进行了考虑：我真能经得起这种严格的考验吗？

——真的，党分配我到一個危險而又可能牺牲的地方去工作，我能勇敢无畏的前去吗？！

——还有，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能牺牲自己的爱好、志趣，抛开一切私心，自觉地执行党的决定吗？

我把这两个都属于“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问题，一个一个琢磨着、思索着，革命工作是一点一滴脚踏实地地去做。过去写好写坏还能勉强凑合的拿拿笔，多少可以表达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到最艰险的地方去，自己是能够做到的，我曾把“信仰就是我的生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早已有了这样的信念，但要服从党分配我做其他工作行吗？我翻来复去考虑：自己别的什么也没干过，也不会干，分配自己工作做不了，完不成任务怎么行呢！不是耽误了工作吗？想着想着，这一夜我竟失眠了，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睡了一阵。

第二天，我找到白成铭同志，一见面，他就问我：

“想好了吗？共产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共产党是一些有觉悟，有理想，有组织，有纪律，团结一致，又有实干精神，能够自我牺牲的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组成的，不是咀上说说就行的。”

我说：“经过反复考虑，服从党的需要，到任何艰苦的地方，从事任何工作，我都能做到，只是我没干过别的工作，怕干不了，完不成任务误事！”

“不要紧，工作是可以在干的中间学习的。”

于是，由白成铭、高耀堂二位同志作为介绍人，我很快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他们看后，让我着重写写思想转变过程。我连夜伏案把我如何从爱好文艺，从阅读左翼作家的作品，受到启发教育，不但看了大量新兴文学作品，而且也读了不少社会科学、革命史、革命家的传记，也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对党逐

步有所认识，并在左联的影响下，在绥远积极开展新诗歌运动，从事了一些进步的文化工作，以后参加了“民先”、“牺盟”，发起组织绥远文艺界抗敌协会，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绥东抗战时，接触过许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以后又在潘纪文、李衡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详细叙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我写完立即交给白成铭同志，他们看了后，又让我作了些补充，我都很快抓紧完成。白成铭同志对我说：“你真认真积极！”是啊，这是我憧憬了多少年，关系到我的政治生活的大事，怎么能不严肃认真的对待呢！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共绥蒙委员会批准我为中共候补党员，候补期三个月。并且在一个庙堂的大殿里举行了入党仪式。组织部长李衡、宣传部长赵通儒、青年部长白成铭及高耀堂、郑朝珍等同志都参加了。李衡和赵通儒同志都讲了话。李衡同志主要是讲了我到桃力民绥蒙委员会仅仅两个月，就吸收我入党，这是经过了较长时期的考察和了解，潘纪文同志在第七集团军政训处训练队，在国民兵政训处，在抗战日报，以后在游击军政训处，一直把我当作培养发展的对象，只是因为战事变化太快，几次解散、撤退，便拖下来了。来到桃力民也表现不错。他举了一些具体事例，特别是我一直在找党，参加“民先”、“牺盟”，在党的直接间接领导和影响下工作，几次要到延安去，表现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这次从写思想转变过程也看出这个问题。并鼓励我入党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做群众表率，服从组织决定，积极为党工作，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也在会上宣誓：“我志愿参加中国共产党”愿意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坚决服从组织决定，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积极学习，努力工作，永不叛党。”

到延安去

入党后的一个黄昏，晚饭后，我和李衡、赵通儒、白成铭同志一起谈天。这时候我才知道李衡同志一直在包头——扒子补隆一带活动。他当时是绥远工委书记，和他爱人孔祥云在包头开了个成衣铺作掩护。他说归绥以东自从苏谦益、杨叶澎等同志被捕后，一直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七·七”事变后，潘纪文同志从太原来绥找他联系，李曾向潘讲过，曾山同志、王德同志准备来绥，到时由他们三人组成绥东工委。后因战事关系，交通不便，曾、王没有来到，绥东工委也未能组成。接着，绥远很快就失守了。李衡同志也曾谈过，归绥以东虽未建立起党的组织，但个别党员还是来过的，如刘澜涛同志就曾到过兴和，李自己也去过归绥。于是，我幼稚地提出一个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可笑的问题，我说：“我从一九三四年到处找党，找不到，想做些工作，也不知道怎么做，和一些朋友，通过一些进步书刊的指引，从事了一些文化工作。你既然到过归绥，为什么不找我们呢？如果当时我们有党的领导，工作会做得更好些的。”李衡同志笑着说：“你想想，你们那时候自己搞得那么红，你编的刊物发表的许多文章和诗，如《新女性》尽介绍苏联妇女运动和其他方面的情况，发表苏联的‘工人歌’、‘纪念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还在《洪荒》上发表‘三个女游击队员’等等，够红的了，我们怎么好去找你们呢！那不是自我暴露吗！”

我听了李衡同志这一番话，自己也笑了，那时候我们太锋芒毕露，沽名钓誉，好表现自己“进步”了。

不久，组织上通知我，党委批准我到延安学习。我听到后感到非常意外，当然也更高兴。因入党后，我已经不再想到延安学习这个问题了，一切要听从党组织决定，虽然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心愿。

八月间，李衡同志代表中共绥蒙委员会到延安汇报工作时，让我和他同行，还给我也找了一匹马，和他的警卫员三个人从大康保庙出发了。

再见了！大康保庙！再见了！桃力民！我虽然在这里仅仅呆了短短的两个多月，可是我多么留恋你，怀念你呀！因为在这里我投入了党的怀抱，加入到为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的行列，我新的生命——政治生命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晓行夜宿，有时住在牧民蒙古包里，有时住在庙里。一天，经过一个牧民居住点，晚上宿在一户牧民家里，他们有两间房子，屋外还有两个蒙古包。这一天他们正办喜事，给儿子订婚，招待亲家。我们去时他们正互相献哈达，交换鼻烟壶等。李衡同志非常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和蒙汉关系，他听说这个消息，为了加强蒙汉团结，密切八路军和牧民群众的关系，他以八路军的身份送了这位牧民一块白洋，作为贺礼，表示祝福。牧民一家也热情地招待我们在他家吃饭，羊肉大米粥，还有奶豆腐和奶皮子等食物。我们三个饱餐一顿，晚上就宿在屋里。

当晚还有几个骑兵团的同志也经过这里，他们大都是南方人，不习惯牧民屋里那一种和羊肉一样的腥味，宁愿在外边搭帐篷住，煮小米饭吃，也不愿住到牧民的屋里。

我们继续前进，经过大片沙漠地带时，我也大胆地和他们一样地飞马奔跑，因为我认为在沙漠中飞跑，就是摔在沙子上也摔不坏。就这样骑着跑着，我逐渐学会骑马，不再抱着鞍子跑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到了榆林城。临近榆林城时，沙堆越走越高，榆林城完全被沙漠包围着，我们简直好象爬沙山一样，忽上忽下，有时沙漠竟比榆林城还高，行人道路蜿蜒、曲折地绕着城走，好不容易才走下沙山，进了榆林城。当时，榆林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商店、摊贩不少，相当繁华。我们三个人拉着马，李衡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臂上戴着八路军的臂章，大摇

大摆地走着，我跟着他们，也很自豪地走着。但是我们所过之处，并没有引起人们好奇的注意，好象很平常似的，从表面上看来，这里统一战线工作还不错，八路军可以随便进出，无人查问。我们住在李衡同志他们经常住的一家小店，店外有个小书摊，出售许多抗战书刊，洛甫同志的统一战线讲话也在这里发行。我们问摆书摊的“有没有‘论持久战’”？他说：“一来就很快卖光了”。此外，街上平平静静，看不到一点战时的气氛，也没有看到一条动员抗战、支援抗战的标语，当然也听不到救亡的歌声了。

我们住下之后，我在店门口站着，瞭望一下周围的环境和榆林的市容。突然，有人喊我：“叶频，你怎么在这里呢？”回头一看，原来是绥远新闻社的一位熟人。我说：“我刚到，就住在这个店里。”我们高兴地握着手，互相询问起别后的情况，他说，归绥失陷后，他经河曲、辗转来到这里，暂时找了个工作糊口，今后究竟如何，还未考虑。他还告诉我，杨令德先生和王毅然，张子秀等同志也在这里。杨仍然任《大公报》等报的记者，就住在《大公报》张季鸾先生的院里。王毅然、张子秀等两三个熟人在绥远驻榆林办事处工作。我听说这里有熟人非常高兴，我向李衡同志请示过，第二天早饭后就按照告诉我的地址找到了杨先生和他的夫人谢汝珍，及谢的妹妹谢汝琴，他们住在外院的两间南房。他们见了我非常高兴，彼此打听了解一些熟人的情况，都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最后，他们问我今后的去向，我当即坦率地告诉他们我要到延安去，也告诉他们我和李衡同志等三人一起走。杨令德先生作为一个记者，和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很好，他曾以邓宝珊“私人秘书”的名义，随邓路过延安，会见过毛主席，还给毛主席写过两封信，毛主席给他写了回信，现在他仍珍贵地保存着。其中一封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134页。他知道和我一同来的李衡同志是八路军的一位高级干部，就和谢先生说：“叶频不远千里而来，异地相逢，真不容易，过两天又走，

咱们明天请他吃一顿便饭。”然后他又说：“你是和李同志三人一块来的，只请你一个人好呢，还是把李同志他们也请上一块见见面，认识认识，和八路军的同志联络联络感情好呢？”我听了揣摩杨先生的意思是愿意请李衡同志一块吃吃饭、认识认识。他作为一位名记者，又是绥远人，和绥远的八路军总难免有接触、联系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从李衡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愿意尽量和非党人士谈话、接触、搞好关系的态度，估计他会接受邀请。便说：“请请李衡同志也好，我可以向李衡同志转达你们的盛情，我想李衡同志是会来的。”杨先生还说：“如果李衡同志能来，我们顺便请王毅然作陪。”王毅然同志是绥远“抗战日报”的总编辑，我们一块工作过一个时期，他可能是共产党员，起码也是一位进步人士。我说：“好，我们也将近一年没有见面了。”

回到旅店，我向李衡同志把和杨令德先生见面的情况作了汇报，并简单的介绍了杨先生的情况：他是绥远文艺界的老前辈，名记者，曾担任过绥远《西北日报》、《社会日报》和《绥远新闻社》的总编辑，还兼任过平津沪全国几家有名报纸的特约记者，在绥远社会上有一定的名望。我在绥远从事文艺工作时，曾得到他的帮助。他是国民党员，但不是当权的一派，是一位不坏的国民党员。是倾向抗日的。同时也把王毅然的情况，就我所了解的向他做了汇报。经过考虑，最后，李衡同志认为去好，让我去向杨先生表示谢意，明天准时践约。

我们第二天准时到榆林城内一家比较有名的饭馆，杨先生和他夫人谢汝珍及王毅然同志已经在那里等候。我给他们互相介绍后，大家寒暄几句，就谈起来了。酒菜上来，大家边吃边谈。谈到当前抗战的形势，徐州失守后，武汉危急的情况，大家都担心武汉能否守住，特别谈到最近毛主席发表的“论持久战”，杨先生和王毅然对这篇名著，赞不绝口，认为“读了这篇文章，确实振兴人心，很得效益。如同拨开了云雾，看清了抗战的方向。提

高了胜利的信心，真是科学的分析，英明的预见，使人心悦诚服。”李衡同志也谈到：“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坚持持久战，中国就不会亡。”他还特别强调地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希望大家对团结抗战的事业都有所贡献，今后多多联系。李衡同志和大家谈得很融洽，这是一次很愉快的会见，最后大家高兴地握手告别。

当时还有一位归绥的友人，在归绥沦陷前辗转来到榆林，找了个工作，就在榆林住下了。见到我，表示要尽地主之谊，请我吃了一顿饺子。谈话中，我希望他和我一同到延安去，他却说：“国共两党将来谁胜谁负还很难说，我先等等看看再考虑。”这件事说明当时国统区虽然有许多爱国的年轻人，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因为找不到关系而欲进无门，有不少人则是历尽艰险才到达陕北，还有很多人中途被国民党拦阻、关入集中营。可是也有些年轻人，虽然距延安近在咫尺，可以通行无阻，但缺乏革命的觉悟和进步的要求，到延安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下决心的。

在榆林休息了三天，我们又向延安进发了，有时整天在高山峻岭的峡谷中，踏着崎岖不平的石子，来回淌过曲折小溪，艰难地骑马行进。途中，不时遇到背着背包，身穿灰色土布制服的男女青年迎面而来。一看就知道他（她）们是从延安出发到前方或国统区工作的。我虽曾从五原徒步走到桃力民，但是还没有背着行李走过。现在骑着马，看着他（她）们背着背包，忽高忽低的踏着山石，缓慢而又吃力地走着。一种钦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深深感到这些男女同志，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信念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怎么能背着行李长途跋山涉水到遥远的工作岗位去呢？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向他们这种革命精神学习。

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站，就是米脂县城。傍晚我们到达县城时，街上正在露天演剧。我们找好住处，就相随上街转游。我们站在人群的后面看了看戏，有群众自编自演的节目，也有近似秦腔的地方剧。会场情绪非常活跃，不时腾起一阵欢乐的笑声。

我们离开戏场，又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走走看看，忽然看到有两间房子里面灯光很亮，门上面挂着一个横牌，写着“救亡室”几个大字（早先苏区机关、学校、乡镇、红军连队都有“列宁室”，抗战后都改为“救亡室”），我感到很新鲜，便和李衡同志走了进去，里面摆着一些桌凳，还有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谈论什么。原来他们夜校刚上完课，留下支部的同志和自卫军的干部正在研究问题。看见我们是八路军，都站起来亲热地和我们打招呼。李衡同志和他们寒暄几句，问了问他们今年生产的情况，看了看墙上贴的红绿纸的抗日标语、奖状、锦旗、生产计划等图表，翻了翻墙角桌上放的一些书籍和连环画，就出来回旅店休息。

我们继续向延安前进，经过清涧第三站到了绥德。当晚宿在警备司令部。当时，王震同志是警备司令，习仲勋同志是地委书记兼专员。街上贴着署着他们两位名字的布告。李衡同志和那里的同志非常熟悉，我们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安排好住处，小鬼就把脸水、开水送来了。

进了边区，气氛就大不一样，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墙壁上，随处都可以看到抗日的大字标语。街上自卫军扛着红樱枪来来往往，歌声不绝。特别活跃的是妇女，有的拿着军鞋往妇救会送，有的扛着红樱枪整队操练。晚上参加夜校，学文化，学唱歌，不只是围着锅台转，能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了。这和后套、榆林等国统区相比，真是另一番天地，那么，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的崭新气象就更可想而知了。于是，快马加鞭，恨不能立即飞奔到我久已向往的延安。

马儿飞快地向前奔跑着，远远地已经可以隐隐约约望见清凉山和宝塔山的轮廓。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越近了。我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啊，延安！你这革命的摇篮，你这革命的熔炉，我终于投入你的怀抱。

延安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

你听。抗日的烽火四起，
你看，大旗在火光中高举，
我们热烈的相聚，
也热烈的别离，
学习，斗争，斗争，学习，
在工作中锻炼自己。
握紧锋利的武器马列主义，
站稳坚定的立场无产阶级，
稳定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
用无情的铁拳，
击碎汉奸托匪，日本帝国主义，
努力，努力，党在热望着你，
同志，再见，
到工作中去！
到广大群众中去！

这是一九三八年九月间延安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在临结业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学唱的一支党训班歌。每当唱到最后几句的时候，同志们就都眼眶噙满泪珠，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像聆听母亲殷殷嘱咐。党在期望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到党所需要的地方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是为了适应当时蓬勃发展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党的事业的飞跃发展及前方对干部大量需要的情况，

把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等校吸收的新党员和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党员或从前线回来而又不可能有较长时间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的党员，加以短期轮训，三个月一期，结业后，很快地分配到前方急需干部的地方去。

这次我到延安，就是进入组织部党训班参加学习的。经过情况是：李衡和我，到了延安，即被安排在招待所——西北旅社，李衡同志每天出去联系工作，我呆在招待所等候通知，饭后也在招待所门前和附近街上看看，有时李衡同志也带我上街转转。那时延安到处呈现一派革命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墙上写着街头诗，贴着诗传单，到处听到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抗战歌声，人们好像生活在歌的海洋里一样，显得非常愉快、自由、幸福。男女同志大部分穿着灰色土布军装、戴着八角帽，腰束皮带，缠着裹腿，来来往往，特别精神；也有些穿着蓝色的土布制服，虽然并不完全合身，也挺神气的，也有少数同志穿着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工人服。当我在延安新华书店第一次看见书店的一位女同志穿着工人服时，感到非常朴素、大方、端庄，十分羡慕。而一批批刚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男女老幼，男的西装革履或市布大褂，女的旗袍和各式各样的华丽装束，分外显眼，一看就知道是新从陕北区外来的，但大家都眉飞色舞，兴高彩烈，像回到自己温情满怀的母亲身边一样，流露出极其喜悦的神情，男女同志间熟人相见，亲热地握手问好，毫无拘束地谈笑，严肃地谈着工作问题，使我感到这儿才真正是一块解放了的天地。

延安城里市面也很繁华，商店很多；有些是公家开办的。城隍庙街两旁摆满了卖馅饼的、油炸糕的、羊杂碎的等各式各样的饭摊，人们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在一条街的拐角处，还有收售旧衣服的摊子，墙壁上挂满了各种样式的服装，摊上还摆满了旧皮鞋等各种物品，这些都是早些时候从国统区来的同志，到延安换装后，把这些和延安艰苦朴素的作风很不相称的衣服物品处理

到这儿来了。

刚到延安，我还不知道延安除“抗大”、“陕公”外还有什么学校，也不清楚自己能够到什么学校学习，后来听说有所鲁迅艺术学院，我虽然酷爱文艺，写过些诗文，但是并没有进过专门的文科学校，完全是自学，所以很想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继续从事文艺工作。但是，最后根据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我到中央组织部办的党员训练班（简称党训班）学习。

党训班设在城隍庙里。我参加学习的是第二期。当我去报到的时候，人们还未到齐，正陆陆续续前来报到。校部刘芝兰同志和另外一位男同志，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谈话，不时提出些问题，了解我来延安前的全部经历，他们边听边记。我从我如何爱好文艺谈起，谈了我在阅读左翼作家的文艺作品、社会科学书籍和进步刊物时，看到书中探索人生的意义和走向真理的道路，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也谈了现实生活的苦难，求学希望的破灭，前途的渺茫，国家的危亡，都使我极端不满意国民党反共卖国政府的统治和那腐败黑暗的人吃人的不合理社会。我和我的朋友们渴望光明，向往党，可是自从一九三三年归绥党的组织被破坏后，找不到组织，我们便自发地从事了许多进步的文化活动，一直到绥东抗战，全国各种慰问团体来绥慰劳，我们才接触到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了“民先”、“牺盟”，接受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奋斗的方向。我还讲了我通过各种渠道，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禁锢非常严密的情况下，看到过一些党的文件和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书籍。以及因为在报刊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怎样受到诬陷攻击和反动当局的注意，我们又怎样写文章据理斗争，最后怎样得到在反动政府中工作的两位进步青年的暗中帮助，才使风波平息。他们激动地听着点头微笑。最后，我又讲了经过许多曲折坎坷之后，终于找到党，参加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的行列中了。谈完后，他们和我热情地握手，希望我好好学习，以后更好的为党工作。

党训班编为三个支部，总支书记是曾固同志，我们支部书记兼指导员是张学文同志。张健（曾任北大副校长）是一班班长，我是二班班长，清涧县委宣传部长老李是副班长。此外，我们班里还有何继云，史进学，杨××以及从武汉来的四位工人同志。和我一起对党训班学习的还有从鲁迅艺术学院来的张颖同志（全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和沙克夫同志的爱人岳慎同志以及鲁前、徐捷、边军、刘克英、王铁英、鲁克明等同志。这里，我又和郑天翔同志、宋竹同志相遇了。宋竹在马列学院学习，天翔同志和李舜卿同志在党训班研究室里。天翔一见面就告诉我，我在伊盟写的通讯《七七抗战一周年在桃力民》，已在陕西省委的党刊《西北》上发表了，还给我介绍了学习经验。但是《西北》在当时和解放后我始终没有找到。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在西安档案馆找到，但标题被改为绥远通讯：“沙漠中的七七周年”。

党训班的生活是紧张、愉快的。每天起床后，我们按支部排队带着牙具毛巾，高唱救亡歌曲，到延河边上洗涮。街上一队队来往于延河边的队伍，都是引吭高歌，歌声此起彼伏，人们精神焕发，情绪振奋，别有一种风味。这是只有在延安革命圣地所特别具有的一幅崭新的生活景象。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比较困难，但是一日三餐的小米饭是有得吃的，菜是烩土豆，有一定的限量。每周可以吃上一顿肉菜馒头。生活虽然艰苦，大家心情都很舒畅，精神也很饱满。我们吃的粮食都要自己到供给部去领，同志们轮流去抬，记得我第一次去领粮食时，一麻袋小米，我们两个人抬着，走起来有些摇摇晃晃，经过一座小桥时，因为粮袋捆得不牢，一滑，掉了下来，几乎滚下桥去，我们都出身于肩没有挑过担子的学生，经过几次扛粮的锻炼，以后就不那么费劲了。

我们在党训班学习的是党的基本知识：党章、党的建设等。没有教材，都是上大课，文件很少，只传阅过一本“党的建设”和一本“共产党员的条件”。

上课是在城隍庙的大殿里，原来的神像供桌，已换成一张讲桌。上课时每个人一个小凳子或马扎子，膝盖和腿就是书桌，把笔记本放在腿上听讲记笔记。我们除了听过关于党的性质、党的组织原则、党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党的各级组织、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党的纪律、党员应具有的条件等外，还听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讲他们在白区丰富的斗争工作经验。特别是刘锡五同志给我们讲过两次“监狱斗争”，非常吸引同志们的注意，大家极感兴趣。他讲的内容，至今我深铭心底。记得他说过，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这是最起码的条件。“铁窗风味是家常便饭，杀头枪毙是告老还家”。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斗争生涯。有些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屠刀下，无所畏惧，慷慨激昂，从容就义；或者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冲锋陷阵，饮弹而亡。这些同志牺牲的英勇、光荣，值得我们钦佩、尊敬。有些共产党员被捕后，在监狱里经受敌人严刑拷打而不丧节，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不动摇，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维护党的利益，严守党的秘密，和敌人进行斗争，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把牢房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这些共产党员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崇高革命精神，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的大无畏的斗争风格，更是鼓舞我们永远奋勇前进的动力。刘锡五同志讲得非常具体生动，他讲述许多同志在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任凭敌人怎样用高官厚禄诱惑，酷刑威逼，都丝毫不能动摇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他说：“敌人用千方百计，我们有牢牢主意。”有些被捕同志当敌人无计可施而最后让一些可耻的叛徒出来当面对质时，如果毫无凭证，他们就决不承认和叛徒相识；如果被敌人掌握了确实的证据，他们便严词加以斥责，而使叛徒无地自容，抱头鼠窜。他叙述了为改善对政治犯的待遇，在狱中进行几次绝食斗争中，都因为同志们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样，更加鼓舞和坚定了同志们斗争的信心。他还讲了同志们在监狱里怎

样组织党的支部，领导大家斗争和学习。他们通过狱外党组织的关系，把党的文件和一些外文的马列主义书籍送进监狱，经过狱中懂外文的同志翻译出来，大家传阅学习，如《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路得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等等。党支部非常重视学习，要求同志们珍惜时间，把学习马列著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以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和与敌人斗争的艺术，把牢房办成党校，坚持马列著作的学习。同志们身陷囹圄，英勇斗争的动人事迹，使我们这些入党时间很短的同志们听了禁不住心潮翻滚热泪盈眶，决心要向这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信念。

我们这次学习，正好赶上党中央召开六中全会，各个根据地的负责同志都回延安参加会议来了。有些同志抽空还给我们作了重要报告，如彭真同志讲了关于“晋察冀政权建设和对敌斗争”，李富春同志讲了关于“南昌起义”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王德同志讲了关于“广州起义”，陈云同志讲了“干部政策”，徐冰同志讲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此外刘少奇同志、罗迈(李维汉)同志、邓发同志、关向应同志、程子华同志、徐特立同志、王鹤寿同志等都给我们作过报告(可惜我们提前分配工作，还有些重要报告没有听上)。他们的报告都是一堂堂极其生动的党课，同志们受到极大鼓舞，特别是陈云同志讲的“干部政策”，每一句都深深铭刻在大家心上。他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长，上一期他讲“干部政策”就大受欢迎。他开始讲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党的主张在全国的影响，他说现在全国爱国志士，革命青年看到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到处遭害百姓，非常痛恨；也看到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到处打击敌人，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的救国救民，全国人民都把希望

寄托在共产党身上。现在是“天下人心向共产党，天下英雄归延安”。我们的干部队伍大大扩大了。因此，了解人、气魄大、用得好、爱护人是干部政策的关键。要全面地了解人，善于使用各种人才，把他们分配在能够充分发挥他们长处的岗位上，为抗战，为党的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要关心同志，为他们解决困难，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当他们需要领导支持时，要及时地给予帮助。如果发现干部犯了错误或错误倾向刚刚萌芽时，要及时给他指出，敲敲警钟，进行耐心的教育和必要的适当的批评，拉他一把；不要等错误发展到极其严重，非给处分不可时，才加以处理。要大胆地提拔使用干部，任人唯贤，这就是我们党的干部政策。陈云同志讲时举了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什么样的人分配做什么样的工作来使用才适当。讲得同志们顿开茅塞、心悦诚服。而徐老的讲话却是另外一种风格。徐老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们党内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也是党内德高望重的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老战士。他是毛主席的老师。徐老主要讲述了他在国统区湖南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情况，他当时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在长沙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过去就是长沙有名的教师、教育家，威望很高。回到长沙，找他的人很多，有的是询问中国抗战的前途，有的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情况，更有很多爱国进步的青年，要求到延安学习。徐老都耐心接待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帮助解决他们提出的要求，昼夜紧张地埋头积极工作，真是老当益壮。此外还有不少学校、团体请他讲演，报纸刊物约他给写稿，他做了不少工作，很有成绩。他说他在长沙工作，和人谈话、讲演、写文章宣传党的政策，阐明党的主张，兢兢业业，唯恐有欠妥的地方，这次回延安来，把讲话稿、文稿都拿给毛主席，请他看看有无差错，毛主席看完后对徐老说：“讲得很好，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徐老说到这里，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孩子似的喜悦心情，面带笑容地说：“我听毛主席这么一说，心里才踏实了。”徐老是毛

主席的老师而现在竟然那么虚心地向后来居上的自己的学生请教，同志们听了徐老这种谦虚谨慎，对党对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优良品德和崇高精神，都钦佩的赞叹不已。

许多同志在讲话中都指出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和红军的危害。在王明路线下，把坚持正确路线的刘少奇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经济主义”、“投降主义”，随后在苏区又排斥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们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然而正是在他们居于党的领导地位时，使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殆尽，在白区站不住脚被迫转入苏区后，又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最后，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退出苏区进行长征。红军突围后，仍是被动挨打。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使革命化险为夷，走向胜利。……同志们听了以后，从革命失败和胜利的对比中，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在革命危急的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的伟大功绩。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在党训班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还到延安东门外参加过两次欢迎会。一次是欢迎周恩来副主席、博古等同志从国统区回来，一次是欢迎朱总司令从太行敌后回来。记得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去欢迎并讲了话。因为年代已久，讲话的内容已记忆模糊了。可是只有朱总司令的讲话却还记忆犹新。欢迎总司令时，首先毛主席简单地致欢迎词，总司令便讲话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司令，他风尘仆仆，刚下汽车不久，便到会场，他穿着一身普通的灰色土布旧军装，腰束皮带，打着裹腿，中等身材，宽宽的额头，黑红黑红的面孔，看起来非常慈祥、威武。他满口浓重的四川口音，缓慢地讲述着我们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北上抗日，挺进敌后，第一仗是去年九月平型关大战，消灭了敌主力王牌部队板垣师团，接着又袭击火烧了敌人阳明堡的飞机场，大大打击了日

本强盗的嚣张气焰，壮大了八路军声威。我们在敌人后方创立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发展了人民武装，组织了民兵、游击队，灵活机动地袭扰敌人，使敌人不得安生。特别是晚上敌人更不敢出来活动，害怕得很哪，甚至吓得日本兵晚上一两个人都不敢出去屙屎撒尿，总得相跟上几个人壮壮胆才敢出去。敌人已经处于中国人民群众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生怕八路军、游击军突然从天而降，因为他们尝过几次挨打的滋味，有了经验教训了。朱总浅显朴素而又风趣的讲话，使大家兴奋得不断地发出笑声，受到极大的鼓舞。

我们在党训班学习时，西北青年救国会召开代表大会，会议三天。党训班各班都选派一个代表，我也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第一天下午二点钟请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我们从训练班赶到时，会场已挤满了人，前面还有凳子可坐，整个会场后边根本没有座位，不少人都站着听。会议开始，由和周副主席一同从武汉回来的，当时还在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和他妻子孟庆树各讲了几分钟话，然后就请周副主席做“保卫大武汉”的报告。周副主席神采奕奕，沉着坚定，他虽然没有讲稿，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早已胸有成竹，他分析了武汉的形势、人民群众抗战爱国热情、敌人进攻的意图和兵力部署、武汉城防和外围我军的部署、人民武装的活动等，提出了如何保卫大武汉的方案……。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充分显示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风度。他站在那里，一口气讲了六个多钟头，人们专心致志地听着。他那逻辑性很强而又生动有说服力的讲话，使听的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直到暮色苍茫，我们才返校吃饭。归途中同志们关心和议论着武汉的安危，以为再好的方案，在国民党那些喝兵血、发国难财的常败将军手里也会弄糟的。大家都很担心着武汉的战局。

在会场我意外地遇到了归绥一中的同学巩纯一同志，当时，她正在“抗大”学习。他乡遇故知，我们多么高兴能在延安相会，可

惜，我们只匆匆地谈了几句话，以后就没有再见面了。十年动乱中，我从外调人员的口中，才知道她在辽宁省教育厅任副厅长。

党训班和延安其他学校一样，生活虽然艰苦一些，但同志们精神上是愉快的，文化生活也非常活跃，每个支部都由大家推选成立了文化娱乐委员会，领导大家从事各种课余文娱活动。组织了歌咏队，有专人教唱救亡歌曲；没有球场，大家在院里托排球；每到周末晚上还举行娱乐晚会，有的同志唱歌，有的讲革命故事，或者做游戏。这些活动非常有教育意义，比如有一种游戏——传球，大家围圈而坐，挨个传球，当哨子一吹，球传到谁手，就得唱一支歌或表演一个节目，或者抓一张已经写好折叠起来的纸条，请你回答上面写的问题，如刘邓支队打到什么地方了？刘邓指的是谁？日本板垣师团是在什么地方被哪个部队歼灭的？十一月七日是什么纪念日？慕尼黑协定是哪个国家签订的？内容是什么？晋察冀指的是哪些省？如果答对了就继续传球，如答不上来或答错了，就请别的同志当众告诉你，实际上这是进行时事教育的一种效果很好而又有趣的方法。我们还看过几次关于十月革命的电影，都是俄语的，放映时有一位懂俄语的同志给翻译。同志们过去大多数没有看过苏联影片，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列宁同志在国外从事革命的活动、办《火花报》，看到了列宁在同志们掩护下如何躲过沙皇警察宪兵的搜查，从国外秘密回到俄国领导十月革命，攻克冬宫，以及列宁和工人、农民、士兵的密切联系，对儿童的关心等等。特别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到前线视察时，在一所木头房子里两个人削土豆蘸盐吃的镜头，革命领袖们在困难面前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党训班刚刚创办，参考书很少，上期同学为了后来的同学学习好，曾经积极筹办了一个图书馆。我到党训班不久，这个图书馆也筹办得差不多了。房子也有了，购买了延安出版的很多马列主义书籍和国统区出版的大批进步图书，还有同志们个人赠送的，

已经放满几个书架。还从第一期学员中派了一位工人同志负责管理。由于他文化低，又不懂得怎样分类、编号、登记，只是把书排列在书架上照看着。所以，还不能出借。党支部号召懂得图书馆工作的同志们出来帮助他整理，以便尽快地供同志们借阅。同志们都没有在图书馆工作过，于是我自告奋勇去帮助他。本来学习很紧张，我除听课外，把整个自学和休息的时间，都集中在图书馆里整理图书，我们两个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辛勤工作，把所有的图书进行了登记、分类、编号，开始借阅了。整理完后，这位工人同志再三向我表示谢意，党支部还表扬了我这种不怕耽误学习为大家服务的精神。

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转瞬间就快两个月了。同志们越学越感兴趣，越学越觉得自己对党的知识和马列主义懂得太少了，都希望能多学习一个时期，三个月时间太短了。在一次全体党员大会上，我以自己到延安行路时间比学习时间多得多的情况为例，说明来延安学习很不容易，提出延长学习时间的要求，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认为这个意见反映了大伙儿的心愿。总支书记曾固同志最后说：“同志们希望多学习几个月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但学习要服从工作，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好革命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也可以学习。现在前方急需干部，八路军发展很快，比如晋察冀边区群众参军形成热潮，有兵没有官，连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同志的警卫员，也派出去当连长去了。此外，政权工作、群众团体等，处处都需要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顾工作，安心学习下去吗？现在能够学习三个月就很不容易了。共产党员必须服从抗战需要，到党需要的地方去……”听了总支书记的话，大家想起刚刚学过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组织原则，也就无话可说了。准备学习完毕，服从组织分配。谁料到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和十几位同学，只学习了两个多月，还未结业，就被提前分配工作，并且很快就奔向敌后了。尽管我在党训班学习的时间很短，但是通过

这两个多月的学习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我开始懂得了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如何在敌后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收获很大。

从延安到晋察冀

—西北战地服务团活动片断—

再见了、延安

一九三八年夏末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提前结业，到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做党的组织工作。并且告诉我：西战团不久将奔赴晋察冀边区，叫我马上到西战团报到。关于西战团的情况和我的具体工作，由西战团主任丁玲同志、副主任周巍峙同志和我面谈。

西战团住在延安城外西边山坡上的一排窑洞里。当我拿着组织部的介绍信，兴冲冲奔向那里的时候，一位小同志把我领到了丁玲同志住的窑洞。里面一位三十出头，穿着朴素的土布蓝色制服，长着一双清亮美丽眼睛的女同志，迎面起来接待我。啊，这不就是丁玲同志吗？过去我虽然没有看见过她，但她的小说“莎菲女士日记”、“水”、“法网”等我在中学读书时就拜读过不只一次了。不久之前，我在桃力民还读过她写的“一颗未出枪膛的枪弹”。她是我崇敬的作家之一。在胡也频、白莽、殷夫、李伟森、冯铿遇难之后，我在武昌中华大学高中读书时，刚刚悲愤地读过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还不到半年，又传来丁玲同志被捕和牺牲的消息，我含着泪又读完了沈从文写的“记丁玲”。记得那本书的封面，就有她的一幅很大的头像，那圆圆的脸和一双清秀的大眼睛，是那么深刻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我和她见面了，而且今后还要和她一起工作，我心情多么激动啊！我走向前去双手紧紧握着她的手，望着她微笑的面孔说：“丁玲同

志，我是组织部分配来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和学习的。”说着，我从衣袋里把介绍信拿出递给她。她看后说：“叶频同志，我们早就等着你来了。”她一面让我坐下，给我倒水，一面笑容可掬地跟我说：“听说你也喜欢写诗，在绥远参加过不少文艺活动。”我想解释：那算什么，那只不过是一时革命热情的冲动，在塞外学习着做些拓荒的工作。可是，还未等我开口，她又继续谈下去：“这很好哟，西战团是党领导的文艺团体，很需要你这样懂得文艺的同志来做党的组织工作。”她那平缓和藹的湖南口音，使人听了感到非常亲切，也很好懂。这时，我激动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听她讲：

“组织上分配你担任西战团党支部干事会的组织干事，当然，你是知道的，为了到敌后工作的方便，团员中还有些是群众，咱们党的组织还是秘密的。所以，你还不能公开身份，在行政上你参加通讯组（后又改为文艺组）工作；团里凡是有条件的同志都参加合唱队，你看可以吧？”我点点头听她说下去：

“因为西战团经常远离上级而单独活动，是一个独立作战的单位，所以，这里的党支部和一般机关支部不同，它不仅要保证行政工作任务的完成，而且还要领导行政工作。”

在我们谈话的中间，周巍峙同志进来了。丁玲同志给我做了介绍。她（他）们二位一起把西战团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向我介绍了一番。这时，我才知道，西北战地服务团这个解放区的文艺团体，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后，在党中央毛主席关怀下成立的。除总务科外，设有宣传股（后来取消了），下分音乐组、戏剧组，美术组和通讯组。一些全国闻名的文艺工作者如吴奚如、邵子南、田间、史轮、塞克、戈矛（徐平羽）等人都在西战团工作过。后来凌子风、王昆、贾克、洛丁、陈强、芦肃、管林、张铮等同志也相继调进团内工作。前不久，西战团在山西前线做宣传工作，经常深入农村为部队和群众演出，大大鼓舞了前线将士和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为党争得了荣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九三八年三月奉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过黄河、经潼关，到西安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除了在山西演出过的相声、大鼓、民歌、秧歌、短剧等节目外，他们日夜赶排了三幕话剧“突击”，这是一个反映前线军民团结抗战的剧本，在西安首次演出就打响了第一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曾经轰动一时。后来他们又采用陕西人民喜闻乐见的秦腔突击赶排演出了“烈女殉国”。西战团的同志们每次前往剧场时，总是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高昂的战斗情绪，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列队行进。他们高亢雄壮的歌声和那雪白整齐的列宁服，给西安市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演出秦腔，以夏革非同志为女主角。过去秦腔没有女演员，夏同志登台后，打破了秦腔数百年来陈规，竟又一次轰动了整个西安，达到了座无虚席，场场客满，戏票提前几天就被人们抢购一空。他们还派出一些同志到学校、团体教唱救亡歌曲，帮助排剧，在墙壁上写团结抗战的美术字标语，虽然也遇到过某些刁难和经过一些斗争，但总还想方设法做了不少工作。在西安演出期间，不少著名作家如萧红、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都寄居在西战团，“突击”一剧就是当时他们三位和塞克集体创作的。其间，丁玲同志因事回延安一趟，又碰见了在临汾分手的萧军，他是到五台途中折回延安，还准备去五台，当时未能成行。丁玲从延安转回西安时，萧军也随她一道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后来，有人告诉我，萧军和萧红就是在那时永远分手的。

和丁玲、周巍峙同志谈完话后，丁玲同志把我带到她隔壁的窑洞，跟我说：“邵子南同志住在这孔窑洞里，你俩就住在一起吧。”作家、诗人邵子南同志，当时是政治干事兼支部书记，后来为了照顾他的写作，政治干事和支部书记便由王泽江同志担任了，但他仍参加支部干事会任宣传干事。

我就这样加入了西战团这个革命队伍的行列，并开始了紧张而繁忙的党的组织工作。由于我刚从党训班学习出来，脑海深深

铭记着：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的原则，为了党的事业，必要时，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和爱好，于是我把思想和精力都集中在党分配于我的组织工作上。每天除参加一些集体的文艺活动外，就抓紧时间和党员逐一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各组党员的情况和非党群众的思想……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天气很好，火红的太阳挂在蓝莹莹的天上，天空显得格外明亮，辽阔而深邃。延安城的主要街道，人群交错往来，歌声此起彼伏；一队男女自卫队员扛着红缨枪走过去，生气勃勃。市面显得十分繁华。这种繁华，是当时敌占区和国统区根本没有的。正当我从新华书店买书往回走的时候，突然，一阵尖厉的防空警报把延安城和平安谧的生活气氛破坏了，拥挤在街上的人们纷纷往四下疏散，朝事先挖好的简易防空洞跑去。有的同志还来不及隐蔽，日寇的飞机就已窜到延安的上空，疯狂地用机枪扫射、投扔着炸弹。城隍庙党训班和新华书店以及街上人多的地方，都遭到敌人的轰炸。事后听说党训班的同学路克南同志中弹牺牲了，她是一位十八、九岁很能干的女同志，是党训班里非常活跃的活动分子，是我们的文娱委员之一。那时候凡是到过延安的人都不会忘记：一到延安如同进入一个歌的海洋一样，从早到晚，到处都能听到慷慨激昂的抗日救亡歌声，使人非常振奋，给人以一种别处所没有的生气和活力，给人以希望和力量。我们每天早上整队从城隍庙到延河边洗脸，她经常领着大家边走边唱。在开会的时候，她经常指挥大家唱歌或带领大家拉着让对方唱歌。我和她虽然不在一个班里，却对她有很深的印象。同志们谈起来，都说这样一位泼辣而又能干的同志，还没有到战斗的岗位，发挥她的组织才能，牺牲在抗日的前线，却被日寇炸死在延安，感到非常惋惜，同时也更加激起对日寇的无比愤怒。防空警报解除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团里，后来清点人数，现有在团里的同志都安全地回来了。

当天下午，丁玲同志开会回来宣布，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

失，中央决定疏散延安人口。根据中央指示，凡是决定到敌后根据地工作的，都必须立即提前出发，离开延安。团部决定西战团今天半夜出发到晋察冀去。由于工作的需要，丁玲等同志留在延安，于是我们这支由四、五十名文艺战士组成的队伍，在副主任周巍峙同志的带领下，就在日寇空袭的翌日凌晨两三点钟出发了。

不知是因为文化人平时缺乏锻炼，还是同志们对革命圣地的眷恋，第一天行军，我们走得很慢，同志们走走停停，不断回头注视着革命摇篮延安、再望望宝塔山，眼睛里流露着儿女对母亲的依恋。黄昏前，我们在一个小村里宿营，计算起来，我们一天才走出四十里路。

一到宿营地，由老吴、老任、老魏等几位老红军组成的炊事班，早为我们烧开了是一大锅开水，他们喊着：“同志们！快打开水烫脚呀，休息好，明天行军走的快哟！”在这几位可敬的老同志的催促下，我们大家洗了脚。当我洗完脚之后，立即和几位同志跑到村外的高坡上，向着延安的方向眺望。延安，早已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了，可是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已经装在我们热血沸腾的胸中，我们几个同志几乎不约而同地向着延安的方向高呼：

“再见吧，母亲！
再见吧，延安！”

行 军 途 中

1、人民欢迎我们演出

为了加紧赶路，尽快地到达晋察冀抗日前线，在延安出发之前，我们原则上决定行军途中只做诸如书写标语、街头诗、画漫画、唱唱抗日歌曲等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不做大规模的演出活动。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允许我们那样做。原因是，西战团早已名声在外。每当我们移至一地，当地党政机关或乡亲们知道我们

是西战团的时候，总是热情挽留我们，恳切地要求我们为他们演出。开始，盛情难却，加之这是送上门来的革命工作，我们就临时凑上几个节目，如歌咏、相声、大鼓、花子拾金等演演。我们的演出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收到十分强烈的效果。在清涧，我们和当地军民举行了联欢晚会。所谓联欢，当然是我们演出，他们观看。演出时，台下空场坐满了战士和老乡，有些老乡是从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地赶来的。演出时，台下众多的观众鸦雀无声，每当一个节目结束时，台下总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有的节目要重演一两次，观众才能通过。演出结束后，不少乡亲还不愿立即离去。第二天正当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当地党政机关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赶到我们驻地挽留，他们的态度十分恳切，说有些部队和群众没有看上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能再留一天，给他们演出一次，并且告诉我们一些驻在较远地方的部队正在往这儿赶。我们为他们这种诚挚的盛情所感动，更不能让我们的战士白跑一趟，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第三天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不少乡亲来为我们送行。当地群众组织还慰劳了我们四十多双鞋。

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为了满足沿途军民的要求，加强宣传效果，我们做出了决定增加演出项目，把因个别演员调走、角色不全的节目，如“烈妇殉国”等新配备了演员赶排出来，同时还不耽误赶路。党支部和“民先”队部分头进行了动员，同志们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发扬了八路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不怕辛苦、疲劳，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经过绥德时，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绥德是陕北根据地的一个专区所在地，党政机关、驻军较多。但是，自从日寇轰炸延安后，上午都出外防空。为了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当我们在城外找到一个适当的隐蔽地方之后，大家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的练歌排剧，有的写剧本、通讯，有的写诗谱曲，有的党小组开会。从城外回来，马上准备演出时用的道具、灯光等，每次演出结束，已是夜半时分了。第二天早上照常行军，西战团就是这

样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养成了良好的工作和战斗作风。

2、街头音乐会，向群众学习

西北战地服务团一九三七年在山西前线，就曾积极地收集并利用了大量的旧的民歌小调，填上抗战内容的新词，到处演唱，进行宣传工作。因为容易懂、容易学，群众喜见乐闻，容易接受，也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这次从延安出发已经积累打印了厚厚的一册。途中只要停留一天，早上歌咏队就要练唱。我们的音乐组长、歌咏队指挥是何慧同志，她对工作非常认真抓得很紧。从延安出发开头几天沿途举行的晚会中，歌咏队除了演唱“到敌人后方去”、“打回东北去”、“打回老家去”、“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等齐唱合唱外，唱得最多的是小调，群众欢迎再唱时，也往往以民间小调来补充。而每次晚会的节目里，小调也是群众最喜欢的节目。在清涧演出时，晚会已经结束了，我们把布景、道具等都已收拾起来，准备回住处了，群众还拥在台下不散，呼喊：“再唱一个歌吧！”“再唱一个歌吧！”于是，我们又唱了两个新填词的小调，其中有一段词是：

“吹起军号打起鼓，
朱总司令调队伍，
兵强马壮真威风，
要打退东洋鬼子兵。
桃哟桃杏花、李子花，
抗日的英雄、人人都爱他！
桃哟桃杏花、李子花，
抗日的英雄、人人都爱他！”

唱过这几个小调后，群众听到我们有些同志嗓子都哑了，才慢慢散开。不少老乡边走边回头来向我们望着，好象恋恋不舍，犹未满足似的。

在行军途中休息时，我们也随时抓紧机会，向群众做一些宣

传工作，扩大影响。每到一村时，进村前都要把队伍整顿好，列队唱着歌经过村里，群众听到歌声时，都从家里跑出来。于是，我们就站在街头适中的地方，给群众唱几支歌，向群众做简单的演出，进行宣传。队伍大休息喝水时，同志们采取和老乡唠家常的方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也经常不拘形式地召开一些简单的街头音乐会。有一次，我们走到一个叫石家河的村子，同志们正准备休息，突然听到一阵动听的歌声和琴声，大家朝着歌声走去一看，原来是走在队伍前面写标语的美术组的劫夫坐在一个土坡上弹尤克利利（一种琴名），旁边站着个衣衫破旧的当地中年汉子在唱民间小调。他们身旁聚拢了许多人。我们走过去，劫夫笑着对我们说：“这几个乡亲都是能拉会唱的民间歌手，乡村音乐家。”于是，歌咏队的同志们立即围拢过来，鼓掌欢迎他们唱，他们唱了一个后，也鼓掌欢迎我们唱，我们一个对一个地唱起来，一个别具风格的街头音乐会就这样开始了。最后，我们歌咏队的同志们集体合唱了“男女一齐上前线”、“驱逐日本强盗滚蛋”等几个新词小调。我们唱时，他们都点头欢笑了，因为他们都熟悉这些曲调，问他们歌子的意思懂不懂，他们笑着点头说：“懂！懂！”歌咏队的同志便找出些歌篇，发给他们，教他们唱。因为调子熟，多少识几个字的人，教唱两三遍，就可以看着歌篇唱了。老乡们非常喜欢这些他们熟悉的民歌小调，也听得懂抗战内容的新歌词。一位小脚老太太，听到我们的歌声时，也走出家门，可是当她刚走到街上，我们的队伍已经出发了。她望着我们的背影，懊悔地说：“唱的真好，可惜我出来的晚了。”

我们除了采取街头音乐会的形式进行宣传外，所到之处，还经常派人出去教唱。当时抗日救亡歌曲，人人爱唱，互教互学，形成一种抗战爱国的气氛。所以，我们经过的地方，救亡歌曲、抗日民歌小调到处流行，成为鼓舞人们抗战热情的最有力的武器。同时，我们也利用教歌的机会，向群众中的一些音乐家、歌

手不断地收集各地的民歌小调，记录下来，有的填了新词，再教唱出去。这样既向群众学，也向群众教。我们学习了记录了不少各地的民谣曲调，不但有陕北的，还有山西的、河北的、江西的、绥远的和蒙古族的民间曲调。

当时，我们利用民歌小调，填写了新词演出，一方面是为了迅速把党的抗战主张、任务向群众宣传解释，鼓舞群众积极贯彻执行，同时也因为当时音乐组能够作曲的同志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光用现有的民歌小调和现有的歌曲去宣传动员群众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次行军演出中，我们的总领队、西战团副主任、作曲家周巍峙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到达晋察冀之后，他就开始了给音乐组的同志们讲授作曲法，并且出版了音乐刊物“歌创造”，培养出一批能作曲的同志，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

3. 活报剧和凌风（凌子风）同志

在我们行军的沿途，一些当地机关和群众多次提出要求为他们演出“突击”、“八百壮士”等话剧。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演过的节目，但是因为离开延安时人员有所调整，演员角色不齐，布景也有困难，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正当我们快要到达清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多才多艺的凌风（即凌子风）同志，他参加了我们西战团，并且很快地用他编导的活报剧弥补了我们这方面的缺陷。

本来，凌子风同志和张竹、石群等同志参加抗日艺术队在榆林一带活动。榆林是当时的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抗日艺术队的活动进行多方面的限制和破坏，甚至要秘密地逮捕他们，这样他们就被迫分散离开榆林。石群同志先到延安，参加了西战团。在凌子风搭乘大卡车向延安进发时，恰好让我们队伍中的石群同志一眼看见，石群同志喊住卡车，叫下凌子风同志。凌子风同志从车上提着一个行李袋跳下来，记得那时他戴一顶蒙古式的大

皮帽子，高大的身躯上穿一件肥大的羊皮大衣，脚登皮靴，满脸浑身的尘土，真象个蒙古族老乡呢。石群同志告诉他，她已参加西战团，现在准备到晋察冀去，希望他也参加同去。他经过一番考虑，同意了。听说凌子风同志参加西战团，我们团的同志都十分高兴，到了宿营地，支委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请凌子风同志担任西战团编导委员会的委员长。在清涧停留期间，还由周巍峙同志主持，为凌子风同志开过一个茶话会欢迎他。会上，除主任讲话作简短的介绍外，同志们表演了一些小节目，凌子风同志也在大家欢迎下演唱了一支蒙古语的国际歌。他的嗓子挺好，加之歌子本身也好，听起来别有风味，后来，有些同志还跟他学会了这支歌。

凌子风同志不但是位优秀的导演、演员，还善于绘画，也是一位很好的舞台装置专家。他参加后又增加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根据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他提出我们可以多排演些活报剧，因为它是一种轻骑式的短小灵活的杂剧，能紧密地配合形势任务，剧情简单明了，老乡看得懂，演出场地和道具也没有什么特殊讲究，编写起来也很方便。在山西西战团也演出过活报剧，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凌子风同志便编出了两个活报剧，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比如，其中一个活报剧叫“人间地狱”，内容大意是：一个游击队员，受伤被捕，敌人严刑拷打他，逼他供出我军活动情况和藏粮食的地方，他不惧酷刑，坚定地回答：“不知道！”当敌人要杀害他时，我军战士和民兵配合攻入敌据点，消灭了敌人，救出了这位游击战士。最后军民高举火炬，边歌边舞，庆祝胜利。每次演出，当剧情发展到这里时，台下观众的情绪，一下子达到高潮，发出一片欢呼声，于是，台上台下，一片歌声，经久不息，以致演出结束了，台下的军民还在不停地高歌欢腾……。

4、街头诗，行进在队伍的前列

把短小通俗，又具有很强的号召性的诗歌写在街头上，是抗日战争中革命诗人的一个创举，是中国诗歌的一场革命。街头诗确实起到投枪、匕首、号角、战鼓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还是西战团在延安时，就和战歌社及其它单位的文艺战士一同发起了街头诗的运动。西战团文艺组的田间、邵子南、史轮等同志，都是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发起人。八月初的一天，延安城内的大街小巷、墙头和城墙上，一下子出现了不少油印的诗传单，用美术字写的街头诗。大街的中心，还挂出了写着街头诗的巨大红布条幅。柯仲平同志的街头诗“我们的党是北斗星”非常醒目地用美术字写在一面墙上。到处围着很多人在看，不但是文化人，不少手持长枪的自卫军和部队战士也站在墙边读诗，一时间，轰动了整个延安和陕北地区。此后，西战团一直把书写街头诗做为重要的战斗任务去完成，坚持推动街头诗运动的开展。

在从延安到晋察冀的途中，我们走一路，写一路，街头诗行进在我们战斗行列的前头。那时，文艺组的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等同志，常常是走在队伍的前边，手里提着标语筒、刷子，或者用白粉笔、黑木炭，把自己创作的街头诗，写在村头的照壁上，写在轰炸过的墙头上，写在行军沿途山谷间的巨石上。这些街头诗，不但号召动员着本地的军队乡亲，也鼓舞着许多奔赴延安和走向前线的革命青年。记得后来在我离开西战团到地方上做党的宣传工作时，有几个从延安分配到晋察冀工作的青年学生，还和我背诵过我们写在路上的街头诗。一首是田间同志写在一个村子断垣上的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才！

一首是史轮同志写在从甘谷驿到清涧的岩石上的：

在抗战里，
我们将损失什么？
那就是——
武器上的锈，
民族的灾难。
和懒骨头！

有些街头诗，是美术组的同志用很醒目漂亮的美术字写在墙壁和岩石上的，有的还配上画，真可谓图文并茂了。

革命诗人，是捍卫真理的战士。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的诗，才会茂盛不衰。革命的战斗生活，给了诗人们巨大的创作灵感和激情。田间、史轮、邵子南等同志用空前的热情创作着，几乎每天都有新作问世。田间同志每到一处，或者去把自己的新作写在街头，或者利用休息的空儿，坐下来，燃上烟斗，把自己构思好了的诗歌写在笔记本上，他后来出版的《给战斗者》诗集，就收有这个时期写的诗。

史轮同志是位富有才华又具有个性的诗人。他是山东邱县人，原名马清瑞，字超尘，史轮是他的笔名。早在三十年代开展新诗歌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著有诗集《夜渡黄河》。他一路上写诗，也写歌词。“坚持持久战”歌词就是他在途中写的，并且由劫夫谱曲，沿途演唱。史轮同志还具有朗诵的才能。我们行军沿途演出的节目里，从甘谷驿起增加了朗诵诗，就是由他朗诵田间的诗“我们这一代”开始的，很受群众欢迎。因为他个性很强，我和邵子南同志不只一次给他做过思想工作。

记得我们到晋察冀边区阜平不久，一次宿营，大概是分配住房的问题，他生气了，背起背包就要走，我们追出好远才把他拉了回来。他后来调边区文救会工作，一九四二年秋季反扫荡战斗中，在雁北一个农村被俘，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在山西灵邱下关。诗人用满腔热血，抒写了对祖国、人民和党的忠诚。

写街头诗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同志们总是早起程，多跑路，但是却从来没有谁叫过一声苦，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邵子南同志，为了节省鞋子他常常把鞋子掖在背包上，光着脚板走路，他赤着脚，比穿着鞋子的同志走得还快。因为我和邵子南同志一直同住一屋，又一起参加支部工作，对他是比较了解的。他出身很苦，因为生计而在峨眉山出家当过和尚，流浪过，淘过金，当过苦力，后来到了上海，从事写作，显示出不同一般的创作才能。丘东平就曾赞誉过他是一个象高尔基那样当过流浪汉的有希望的作家，他在沿途也写了不少好诗。到了晋察冀后，他最早的油印诗集《组织》和《墙壁的诗章》除一小部分是他在晋察冀写的外，其余都是在从延安到晋察冀途中写的。

街头诗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这也大大地鼓舞了西战团同志们的创作热情，许多同志拿起笔来，写诗、写歌。西战团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把诗歌运动开展到哪里。到了晋察冀边区后，由于“诗建设”的出版，更有力的推动了边区诗歌运动的开展。在几年的战斗生活中，西战团的同志们创造出不少好的诗、歌。就连我这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党的组织工作而置笔几年的人，也拿起笔来，写了一些诗歌。我写的歌词，张见同志作曲的“参加军民誓约运动”，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及鲁迅文学奖金委员会“军民誓约运动征文”首批音乐作品中获甲等二类奖；金戈谱曲的“遵守军民誓约”、“拿出自我牺牲”、“最后生路”，张海谱曲的“服从抗日政府”等均获乙等奖。戎征同志谱曲的“反共派你反共反不了”，在日本投降后，解放张家口时，曾由当时的新华广播电台多次播放。

贺龙同志鼓舞我们前进

十二月初，我们到达了葭县。葭县好象座落在一个石头山上似的，完全是个石头城，满街的道路都是石头铺的，房子的墙壁也是石头垒的。登着坎坷不平又高又陡的石阶，一级一级地下去，就是奔腾咆哮的黄河了。

在葭县演出一次，休息两天，便乘船渡过浊浪滔天的黄河。在黄河岸上的克虎塞演出一次，便经临县到了岚县。当时一二〇师司令部就设在岚县城里。提起一二〇师，不能不使人想到这支劲旅的统帅——早被民间传奇了的神武将军贺龙同志。在快到达岚县的行军途中，我们私下议论起来：能不能见到贺老总，贺老总长得什么样哟？有的同志谈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还谈到贺龙同志有个姐姐贺英更有能耐，在建立革命武装和开辟湘鄂西洪湖根据地工作中，协助贺龙同志作过不少贡献，听说许多土匪头子听到她的名字还害怕咧。

到了岚县之后，贺龙司令员和关向应政委非常关心和照顾我们，还请我们到司令部会餐，会餐前他抽空接见了我们。贺龙同志那双机警有神的眼睛和他留在唇上黑黝黝的短髭，给我们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和我们一一握手，笑呵呵地说：“欢迎哟，欢迎你们这些文化兵。”他坐下来和我们随便聊天，问这问那，当话题转到我们要去的晋察冀边区时，他说：“别看那是敌人的后方，铁路线、城镇都被日寇占领，四周都是敌人，可是，我们的游击队到处都可以活动，有时候，我们的侦察兵，还化装到敌人占领的城市里游逛咧……”他说罢哈哈大笑，把大家逗得也都笑了起来，接见开始时的一点拘束紧张的气氛，一下子被笑声冲得无影无踪。贺龙同志还说：“特别是山区是咱们的，好大一片啊，那是咱们的天下。群众是咱们的，政权是咱们的，民兵自卫队、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都组织起来了。除了敌人进行扫

荡，那里人民安居乐业，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一块模范的抗日根据地。生活虽然苦一些，但小米子饭还是有得吃噢，你们去了，好好开展文化宣传工作，那儿是大有可为啊！”我们这些男女青年望着他，象在聆听自己崇敬的长者的教诲。敬爱的贺司令员，在我们即将到达晋察冀边区时，对我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教育。我们听得兴奋的不得了，恨不得一下子就赶到晋察冀边区去。虽然，贺司令员接见我们的时间并不长，他的谈话也很简短，但却给我们多么大的鼓舞啊！我们多么希望他能和我们多谈谈啊！可惜，不久就会餐了。会餐还是八路军的老作风，每桌八个大碗菜，真是实惠味美，在当时那种艰苦的年代中，这的确是一顿极为丰盛的美餐了。贺龙同志还让后勤部门给我们补充了鞋子，还特别赠送我们每人一件缴获的日军黄呢子大衣。大衣穿在我们身上，暖在我们这群文化兵的心上，以至在八年敌后抗战中和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每当遭到艰难坎坷时，就想起贺龙同志赠送我们的黄呢子大衣，它给我们多少上进的力量和斗争的勇气啊！这以后，黄呢大衣竟成了我们西战团的特殊标志，人们一看见穿着黄呢子大衣的四五十个青年男女，背着行李，拿着乐器，唱着歌行进着的队伍，就知道这是西北战地服务团了。我们在岚县没有演出。贺司令员知道我们从延安匆匆出发，没有一点准备，而且就要过封锁线了，所以没有让我们演出，还请我们看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演的话剧“军火船”。因为当时除了西战团外，在敌后活动的剧团都很少有女演员，“军火船”中的女主角，据说是由剧社指导员，一位长征时代的红小鬼饰演的。该剧由成荫同志导演，戏演得相当好。剧情大意是：在敌占区我地下工作者，为抗日军队运送一批军火，由一女同志做港口站岗伪军的工作，启发他的爱国觉悟，最后顺利地把这批军火运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记得演出前，我们整队进入礼堂，负责会场的同志，特意把我们安排在靠前的地方。我们坐下不久，贺司令员和关政委陪同

彭真同志进来了。彭真同志是参加党的六中全会后，回晋察冀边区途经这里的。贺龙同志他们几位就坐在我们前两排。忽然他发现了我们，就转回身来问道：“你们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吧？”我们回答说：“是。”于是贺龙同志转过身来和我们随便谈起来了，还不时地发出愉快的笑声。记得他和靠近他坐的戏剧组的女同志徐捷谈的最多。他用左手拍着她的肩膀，慈爱地问她是哪里人，多大年纪。听她回答说是广东人，十八岁，贺司令员笑着说：“噢，原来你也是一个南蛮子啊，从广东到这里好远啊，想不想家？哭鼻子没有？”说得大家忍不住都笑了，默默地坐在那里的关政委，这时也笑了。贺司令员还问徐捷同志到北方生活习惯不？吃小米子饭行吗？行军掉队没有？徐捷同志一一做了回答。贺司令员点着头，语意深长地说：“一切都会慢慢习惯的。战争是一个大熔炉，年轻人在斗争中会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你们西战团在山西前线和西安工作得蛮好嘛！这次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更是文艺工作者锻炼的好机会，你们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在革命的烈火中炼一炼呵，要经得起考验呵……”大家倾听着他那亲切而又风趣的教诲，心里感到无限温暖。

冲过封锁线

离开岚县，经过两天行军，我们到了距忻县县城百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宿营，这里距铁路线也将近百十里。当天夜里传下命令，把不必要的东西都精简掉，带两天干粮，准备从忻县和原平之间的铁路通过。虽然我在离开延安时，把一些带不了的书籍，都留在延安，但还带着几本自己喜爱的书，这次也只好忍痛丢掉两本。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前进。到离铁路线还有七八十里外的一个村庄，队伍隐蔽下来休息。这时，又传来命令，除必要的东西，统统精简，茶缸子拴好，鞋子要缝上带子系好，今天就要过封锁线了，行程一百八十里，其中急行军七八十里。于是大家

又紧张地整理东西，我手头仅有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本是《论持久战》。再三考虑后，我把《论列宁主义基础》精简了，又把《论持久战》用剪刀把书边都剪掉，把它装在自己的衣袋里。后来，这本书一直伴随我走遍晋察冀的山山水水，指引着鼓舞着我战斗、工作。

除彻底轻装外，我们又按身体强弱、男女划分了互助小组，指定专人在前面划路标，再由最后一人负责擦掉，并派了专人跟驮子，指定了收容队。当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出发了。

那天人们行军时，心情非常紧张，只听见脚步的嚓嚓声和偶尔从前面传来“原地停留”、“不要掉队，跟上去”的轻轻的口令声。到天黑时，我们已经走了四十多里，距铁道还有三十余里了。通过公路时，都是跑步前进的。公路两旁警戒的战士，不时地小声叮咛着：“快！快！不要掉队。”走啊！跑啊！不久，前面又传来：“传下去，快过铁路了，跟上，不要掉队！”的命令。当我们通过铁道时，一些没坐过火车，也没见过铁道的同志，边跑边弯下腰来用手摸摸铁轨，看看是什么样子。有的几乎被后边急走过来的同志撞倒。过了铁路，一阵小跑跑出了三十多里，时间已经快夜半，这时人们又累又困，又饥又渴，都想歇歇。可是前面又传过话来：“还没有脱离危险区，再走二三十里，就快到根据地了，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于是，同志们又互相鼓励着、互相搀扶着继续前进……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这支文艺队伍和其它部分的同志，终于到达了第一个宿营地——苍营沟，踏上了党领导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土地。

在晋察冀群众中播下艺术的种子

——记西战团第一期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副主任周巍峙同志的率领下，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到达晋察冀边区。在最初的一年里，主要是为晋察冀分局、军区、边区政府、群众团体、军分区、专署以及其他单位和群众进行了频繁的演出。在这一时期，我们踏遍了晋察冀的山山水水，走遍了各个分区。和所到之处的干部、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和各兄弟艺术团体——军区抗敌剧社、联大文工团、战线剧社、七月剧社、冲锋剧社、火线剧社、大众剧社、劳动剧社等互相进行了观摩学习、座谈、交流经验，或者一起活动，出版了《诗建设》、《歌创造》、《战地》等文艺刊物，对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工作的开展和提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我们自己和各兄弟艺术团体在艺术理论和演出水平方面都有所提高。我们在总结这一时期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今后新的工作方针，即面向群众，把艺术交还群众，开展乡村艺术运动。

首先开展组训工作，广泛培植地方上的文艺骨干和基层组织，开展乡村的文化娱乐工作，活跃晋察冀边区的乡村文艺活动，使文化娱乐工作与抗战建国的要求紧密地联系起来。

其次是多尝试，多创作。在尝试和创作的过程中，创造大量适应边区具体环境的文艺作品。

第三，最主要的是推动并开展边区的艺术运动。首先在三分区的完县和唐县，同时举办两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然后总结

经验，又在一分区易县举办了一个较大的有五六百人的乡艺训练班。以后还在繁峙办过一期。

下面就是第一期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工作纪要：

(一)

新的工作方针决定之后，在非沟的一个多月时间，也就是我们为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作准备工作的时期。

一九四〇年的四月末，我们到了三专署，在各县县教育科长联席会上，决定开办两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以地区划分，唐县、曲阳、阜平等县是一个；望都、定县、完县等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同志除一部分参加边区文化界考察团，一部分坚持出版刊物和指挥联络组成指挥部，剩下的除几个到病院休养的同志外，其余适当的配备为两个队，担负这次乡村艺术干部组训工作的任务。

于是在五月初，我们带了团的新的工作方针，一队由凌风带队到唐县，为乡艺二校，一队由我带队到当时乡村剧运搞得蓬勃发展的完县为乡艺一校。开办边区也是全国首次创举的“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

我们每队十五个从事艺术工作的青年男女，去搞这比较生疏而又史无前例可资参考的工作，最初，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运动的开始，我们这次成绩如何，对今后这一工作的开展，将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四专署那活跃在剧运热潮中的、在艺术上感到饥渴的民众，又是如何渴望着我们给他们以艺术的滋养啊，于是大家互相鼓舞着，警惕着，把所有的精力都贯注在学校的工作上了。

在学生未集中之前，动员新战士是当时边区的中心工作，两队都赶上欢送新战士的大会，于是一方面准备训练班的工作，同时也抓紧时间进行了宣传和组训工作——编印了一些诗传单、诗与画、朗诵诗、大的宣传画，帮助健全了一些村剧团，召开各种座谈会，成立文艺小组。积极参加动员新战士的工作。

学生逐渐集中，我们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一方面与同学谈话，登记，填表，分配班次，分队，一方面整理改编讲义，讨论各科时间的分配，制定课程表。开始时大家忙极了，尤其是完县一校，因为后勤工作不能很好配合，以致我们还分出很大的精力对外联系搞后勤工作，唐县二校也因学生较多，生活指导处的同志，忙得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而学生因刚来不习惯，琐碎的小问题不断发生，并且在街上乱跑，随便吃东西，没有礼貌，象野马似的，所以开始两天显得很乱，但是大家却都工作得很起劲，并不因忙、累和一些困难问题所苦恼，而且经过努力这些困难也很快地克服了。

因为学生没有来齐，还不能马上开课，让他们闲着是不好的，于是在他们到校的第二天，就开始教歌，上早操，给他们讲一些普通的军事常识和同学间、教员间应有的礼节。晚饭后进行一些游戏，不使他们感到烦闷、冷寞，晚上有教员参加讨论了校规。

在五月廿号，便正式开始上课了。

(二)

我们的学生是来自乡村而对新艺术抱着无限爱好并准备搞艺术工作的战士，在过去，他们差不多完全被拒绝于艺术的门槛之外，而享受不到艺术，也不懂艺术，甚至有些敌占区来的同学来校之前，还没有看过话剧，很少听过救亡歌曲，更谈不上知道什么文艺美术了。在文化水平上，他们中间多数是高小学生或上过一季冬学，个别几个是初中学生、小学教员，还有少数是区村级干部，程度不平衡极了。在政治认识上也同样表现出水平不齐，有的懂得一套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大道理，有的连统一战线还不清楚。在生活上绝大多数是没有过严格有组织的生活的，不惯于集体生活，散漫、小气、自顾自的现象成为教学中的一大障碍。

我们训练的对象是这样一伙人，我们训练的内容又是文化部门较高级的艺术，我们训练的目的在于教他们认识艺术、懂得艺术

之后，马上就要在工作中使用，作为抗日宣传的武器，而我们训练的时间又是如此之短，仅仅一个多月，这也就是我们学校之名为突击训练班的原因。并且由此决定了下述教学上的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是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反对教条主义。在讲课时特别强调原则化、具体化、通俗化，让学生不仅懂得正确的理论原则，而且能灵活的、具体的融化于实际工作当中，所以在上课时说话要尽量通俗，内容务求和他们的生活与村内工作配合起来，使他们易于接受和适于应用，因而在课程方面，实习占着主要部分，差不多每天下午的时间都是实习上午讲过的内容。在这时候大家可以实地练习，通过实际运用，不但加强他们对理论和原则的认识，帮助了他们的记忆，并且提高了他们学习的兴趣。此外，就是在其他一切课外活动中，我们也注意到随时予以实际的教育，锻炼他们以组织上、技术上、工作上的能力和方法。

其次是切合实际。由于对象和时间的限制，我们不能把一切艺术部门的各方面都详尽地教给他们，使他们都懂，或者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专家，如果有这种念头，也是瞎打算，一定会碰壁的。我们只希望在这短促的时间内，使他们对所学的课程，能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并且回到村里能在工作中运用。所以我们反对贪多和一切形式主义，要把握中心，切合实际、踏踏实实从基础上着手，教他们以艺术上的一般常识。

第三是示范教育。无论我们的教员和学生，都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我们的艺术是服务于政治，配合政治，而且促进政治向前发展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革命的艺术工作者，不和过去关在象牙之塔的所谓艺术家一样，我们是这块革命的、进步的、民主的土地上的革命艺术工作者。同时也和一切革命者一样，要养成自己高尚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所以，在课程上，我们特别有“革命艺术工作者的优良作风”一课，而教员除了教育学员以理论的

技术的组织的能力和_{方法}之外，还要在工作上、生活上、行动上以身作则，为学生做出活的好榜样，让他们学习，以加强他们思想意识上的锻炼。

这三点不但是我们学校和教员在教学上应遵循的原则，同时也是学生在学习上的一个最好的学习方法。

(三)

因为我们是在敌后战争的环境里，特别是在相持阶段，敌人不断残酷地进行扫荡，我们不能不随时作战斗准备。所以，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一切都要做到军事化、战斗化。因而在课程方面为了准备打游击，各课结束有前有后，音乐课的普通乐理第二周就结束（唱歌是每天都有的），文艺课在第三周结束，美术课在第四周，戏剧和政治在最后。戏剧方面主要的内容，也在前三四星期内讲完。在学习组织上，我们把全校学生分成三个中队，每中队两个小队，每小队三个班，中队之上有大队，大队长由校长兼，以便于指挥、调动。中队长、小队长、班长都从学生中选拔，中队设指导员一人（一校是由生活指导处指派，二校也是由学生担任），这是我们学校组织系统纵的方面；在横的方面，校长以下有教务处和生活指导处。教务处下分组，有戏剧、音乐、文艺等组；各组都有两个人以上。专门研讨本门课程的教材的编制，教学法的改进，以及怎样鼓励学生对这一课的学习情绪。记得一校由我、李牧、朱星南、郎宗敏、田野、石群、胡冰、张海、方涯、李友仁、古塞和老红军老吴和老魏等组成。由我任校长（或称主任），李牧负责教务处，郎宗敏负责生活指导处。戏剧组有李牧、朱星南、郎宗敏、田野，音乐组有胡冰、张海，文艺组有石群、方涯和我，美术组有李友仁、古塞，后勤工作由老吴和老魏负责，方涯同志还兼校部秘书。二校由凌风、鲁前负责，凌风任校长，其他人名记不清了。

(四)

上课了，每个同学都以对艺术的渴求和无限的爱好的听讲，作

笔记，实习，参加讨论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埋头在紧张的艺术学习里了，就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也是在整理笔记，练习唱歌，作素描，或聚集在课外读物栏前，在那些油印的诗集里，画册里，歌本里，尽情地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艺术营养。几本《歌创造》成为他们最亲切的朋友，珍贵地抄写在自己的本子上。有的无论碰见那一个教员经过，都热情的硬让他教唱上边的歌子，不管他们是不是音乐组的，或者会不会唱歌，尤其是女同学们。

在开学典礼时，校部负责同志在讲话里，就特别强调的指出，同学们在文化、政治，认识、年令，以及对问题的了解上程度不齐、各不相同，因而一个优秀的学习战士，不但自己努力学习，做一个学习的模范，而且要以极大的团结友爱精神，耐心帮助其他同学一块进步，求得大家比较平衡的发展，在集体学习、互相帮助的学习中来完成学校的教育计划。在开学不到一周之后，互助小组已经切实能起到它的作用了，在自习或其它课外活动能抓到的时间里，互助小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以回答和讨论的方式，帮助那些学习比较差一些的同学了。

而教员，这些年轻的艺术战士，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把自己对事业的热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在课前找参考书，修改教材，以及收集很多与日常学生生活中有密切联系的例子，作充分的准备。在讲课时尽量注意到自己的口语，能使学生听得懂，耐心地把话说的简明、清楚，并举实际的例子和比喻，帮助学生对理论的了解，充实和活泼讲课的内容，不让他们感到枯燥、疲倦，以集中他们的注意力，提高他们学习的情绪。课外还给学生改笔记，改实习的文艺稿子、素描，或进行个别演员的训练。在自由活动时，随时不拘形式地帮助与指导学生，晚上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同时，每天早晨还有自己的两小时政治学习。此外，还写文章、创作，以保证《歌创造》、《诗建设》的出版，还要参加其他会议和过组织生活等，每天的时间都在这样紧张的愉快的教学、创作合一的生活中过去了。

在讲课的方法上是根据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从联系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来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推求其前途，特别注意到各课之间的联系，使他们了解艺术各部门虽然彼此不同，却又有联系，并非孤立。每次上课在未讲之前，先提出上次讲过的问题，发问大家，一则可引起学生的回忆和复习上次讲过的问题，同时也便于接着讲新的问题，还可以从学生的发言当中发现有些容易混淆的问题，以便纠正，并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新民主主义的艺术”，稍一疏忽，就容易错为“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新民主主义是日寇在敌占区提的口号）。如遇到这类的问题，教员便注意予以纠正，或自己提出清楚的解释，使他们对此有很深刻的了解与印象。如“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两个词在和四中同学共同组织的观摩会上，讨论宪政问题时，我们的同学就是年令最小的也能讲出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同时在问答当中，也采取这样的方式，如果一个问题这个同学答不来，除了叫其他同学解答并告诉他外，有时便叫他们互助小组长、班长带到旁边告诉他，一直到他真正了解为止。这时还可以继续向大家问答其他问题，这对于加强互助组长的责任心，活跃互助小组都有很好的效果。

在对同学的态度上，我们是适当的强调了严肃活泼团结友爱的精神。在课堂上和工作的时间，我们相当严格，而在课外和游戏时间，则和学生打成一片。普遍的接近他们，使他们感到可近可亲，真正是他们的教员、同志和亲爱的战友。所以在休息时间，每个教员房间都拥满了人，有的讨论问题，有的问这个问那个的，在操场上则大家一块唱歌，游戏，跳秧歌舞。在接近他们中间，也易于了解他们，发现他们中间的一些优秀分子，或理解力较差的同学，以便加以特殊的教练与补习。因此，在很短的时间，每个教员都很熟悉他的学生，能指出那个是他所教的最优秀的或是最差的。

（五）

配合着紧张的学习，在生活上他们也同样受到严格的锻炼。

在战争环境里，背包是每天都要打的。早晨起床后，除了跑步，做柔软操外，还要学习一般的军事动作，有时爬山或到河边练习发声。不论是上课、吃饭、游戏、睡觉，都要求严格地遵守时间，执行命令。在集合时为了做到迅速，差不多总是跑步的。吃饭也限定了时间。晚上在上自习之前进行晚点名，无故不到要受到批评。请假制度也严格地建立起来，每周的生活检讨会，非常认真地进行，对于违犯纪律，生活学习散漫，以及想家的倾向，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他们刚到校时，不习惯集体生活的情形很快就在相互帮助中被克服了。开学一星期后，和我们同住的一位卫生部的同志，一天，参加了我们早操和生活会之后说，几天功夫，能做到这样真不容易。

每天晚饭后，有两个多钟头的课外活动，三天是集体游戏，三天是自由活动。在集体游戏时，一方面为恢复他们一天紧张学习后的疲劳，另一方面介绍给他们一些游戏方法。并且在游戏时也配合了学习，如扭秧歌等，或者参加集体劳动，我们的课堂、操场、救亡室，都是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建设起来的。

开始，个别同学因吃不惯菜汤和小米饭，一个人偷偷地在屋子里哭，甚至想回家，可是经过说服、解释，尤其在学习上提高兴趣后，他们也就习惯和乐于这种艰苦的学校生活了，到毕业时，他们生活上也都有很大的进步。

(六)

开学后不久，他们自己的组织——救亡室成立了。

事前生活指导处帮助他们很好地布置动员，所以开成立大会时，大家情绪都非常高，举行了很隆重的仪式，筹备会的同学报告了开会意义后，请校长讲了“乡艺”救亡室除了一般的救亡室任务之外，它的特殊作用即是各个股的活动都要密切和我们学习的业务结合起来，成为课外推动学习的重要场所。然后大家热烈地竞选了自己的负责人。当主席宣布当选名单时，热烈的掌声和

口号响彻了整个会场，尤其当每个当选人在台上讲出自己的工作打算和希望时，同学们也以极响亮的口号表示拥护。会后，同学们很满意地说：我们的负责人真不错啊！

救亡室的成立不但活跃了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帮助了行政工作很有保证的进行，同时，也锻炼了他们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在生活上因为组织股竞赛干事的鼓动，各队之间掀起极热烈的挑战，具体地提出很多竞赛条件，紧张极了。学习上，研究股组织了音、美、文、戏各种研究会，这是比较更深入的专门的研究，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从哪方面发展比较有条件而选择参加其中一项，请教员指导。这种研究会的成立，对于在某些方面有特长的同学，可以不受限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以后他们的成绩也证明这一点。

文艺研究会，参加的同学练习编壁报，给其他同学改稿子，经常出壁报，他们进步真快，就是几个从来没有写过东西的，也能写相当带些“文艺”性的稿子了。毕业时，一校出版了一本反映他们学习生活的小册子——“生活集”，二校出版了描写他们离校回去工作的感想的小册子——“出发”。

戏剧研究会，在排戏当中，加强对理论的更深刻的了解，到毕业时，两校各排出十几个戏，锻炼出不少的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并且个人或集体创作了十几个剧本。

美术研究会，每周出画报两期，另外还油印了四期“我们的画”、几期“乡艺画报”和“乡艺生活”。除后者，他们都及时地紧密配合了当时的中心工作，很受地方上的欢迎，而且有的单位还翻印了它。两校共刻了七、八十幅木刻，标语字写了很多。人们都说写的真漂亮。一切壁报的报头，救亡室的布置都是他们自己搞的。

音乐研究会，主要的是加强了他们的识谱、分析歌曲的感情、锻炼指挥的能力，并且培养出不少很好的小歌咏指挥。

在救亡室的活动，不但提高了他们的艺术技巧，锻炼了他

们的工作能力，而且反对过不良倾向。克服了一些想家、不安心学习、违犯纪律的缺点。经常注意对群众的关系，对同学中病号的慰问。筹备和主持了“五卅”、“七一”两个盛大的纪念会，进行了每周的时事报告，举行了政治讲演会，特别是发扬了同学间互助友爱的精神，比如说学校预算中，没有印歌篇这笔经费，但为了学习方便和将来工作上的需要，他们要求印歌本，哪怕自己出钱都可以，但是有许多同学当时没有钱，于是救亡室提出号召募捐，发挥同学们互助友爱的精神，使没有钱的同学也能得到一份歌篇。在号召的第二天，这工作就完成了，有一位女同学裘天香才借到五毛钱就都捐了出来。其他捐三毛，捐五毛的也很多，结果每人不但得到一个很满意、很漂亮的歌本子，而且还印发了两个剧本。

(七)

前面说过，实习是“乡艺”课程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不论任何活动，都与他们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相配合，达到他们对理论的深刻了解和具体应用。一般实习外，而第一次实习晚会对于他们是更大的鼓舞和锻炼，特别是克服了男女同学间的不愿接近的扭捏现象，以及女同学害羞不愿与男同学合演的封建束缚。

这次实习晚会是在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举行的，一方面为提高他们学习的情绪和信心，锻炼他们舞台工作的经验，另一方面在演出当中，可发现更多的问题和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克服并引导他们思考今后在乡村中自己工作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想办法解决。这次实习是以军民联欢晚会的形式举行的。

这次实习，各课都配合着进行。演出的是：“组织”、“谁是好孩子”、“姚王桥”三个话剧。美术股画了三幅很大的海报，相当不坏，吸引了大批观众。文艺股出了两张壁报。音乐股表演了二部合唱“风陵渡的呼声”、四部合唱“万岁啊！晋察冀！”和几个齐唱的歌子。同时一切舞台工作，大都是他们自己做，教员在旁指导，因此，在演出、舞台工作、化妆等各方面给他们实

际锻炼体会的机会。

会后，他们举行了很长时间的检讨会，每个人都踊跃发言，对演出的各方面，谈得很内行，而且差不多都很正确。

这以后，他们对戏剧更感兴趣，过去很难解决的女角色，也不成问题了。一个戏决定要排时，都争先恐后地出来担任角色，也练习着作导演。

在“七七”、“七一”这一周间，全边区展开反投降的运动，到处开大会，街上的标语全刷白了，都要重新写。完县各界前几天就筹备这个盛大的纪念会，决定乡艺写一部分标语、慰问信、纪念壁报，这又给同学们一个很好的实习机会，于是，同学们开始分组在街上刷白的墙上写标语了，过路的人看见这些土头土脑的小孩子，写出很不坏的美术字，象发现奇迹似的围拢来看，后来分配给别的单位写的另一部分标语，也请乡艺同学写了。

上课到第六个星期，我们的课程差不多都结束了，这时除了温习，每天上午就作专门的报告，如革命艺术工作者的优良作风，怎样领导组织村剧团、戏剧站等。下午就把他们分成三个乡艺工作队下乡工作，一方面围绕当时的中心工作，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另一方面进行戏剧等组训工作。一切工作计划、布置都由他们自己来作。从他们每天的汇报和最后的总结看，这次实习对他们有更大的意义，他们不仅能向别人一套套地谈文艺、美术和戏剧，能教歌子、教秧歌舞，并且学会怎样抓紧时间计划工作，互相分工，由某种形式转到另一种形式，进行自己的工作，这对他们回村后开展工作，帮助是很大的。

(八)

在学习过程中，为了便於唐县、完县两校互相鼓励，提高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并有利於将来工作上的配合及共同战斗，我们发起了两校的互相参观学习。参观团由学生组成，教员领导。他们在参观学习中不但彼此都得到热烈的欢迎和招待，同时在学习组织上、方法上，生活各方面都学到不少的东西，也互相提出批

评建议。为了共同进步，提出了革命的竞赛。竞赛中，两校同学都不甘落后，最突出的是学习情绪越发提高了，哪怕是自己的最小的缺点，也都时刻注意着克服，毫不放松。通过参观学习，对他们以后的学习，生活，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观之后，为了检阅我们的力量，又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会合，这就是包括四专署的大部分文化和艺术工作者——四中全体教职学员、乡艺两校全体教职学员、劳动剧社、西战团指挥部、儿童演剧队，还有剧协主任罗东同志——差不多一千五百多人在四中举行的观摩会。

观摩会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他们在学习中的一切作品都展览出来了。四中的墙上完全为他们的漫画、写生画、连环画、海报、木刻、壁报、诗刊、文艺作品所贴满；举行了运动会，音乐、美术、戏剧、文艺、宪政、生活各种座谈会，张专员作了有系统的、材料丰富的宪政报告，做了各种座谈会的总结，四中、乡艺、劳动剧社、儿童演剧队都表演了话剧和歌咏。

这里特别应该提出的，就是乡艺二校的田庄剧的演出。不用幕布，不用布景，一切都以现成的树、山坡和乡村里到处可以找到篱笆来布置演出，分外逼真，使人感动。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创试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观摩会紧张、兴奋地进行了两天才胜利结束。

(九)

“七七”即将到来的时候，乡艺第一期同学毕业了。我们组织了欢送两校三百多个乡村艺术战士到艺术战线上去活动来纪念它。

这次活动进行了三天。在活动的前一天，同学们便在教员的指导下布置会场、舞台以及展览室了，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实习。

活动的第一天是纪念“七七”三周年，第二天上午参观展览室和其他活动，午饭后举行毕业典礼，第三天上午报告“乡村剧

运的发展和今后的任务”，下午乡艺同学总会代表会通过简章，正式成立总会，传达总会成立和简章的内容，同时以县为单位讨论上午报告提纲，以后以县为单位开联欢会。三天晚上都有游艺，并出了三期两张腊纸的大会日刊。在晚会里出现的艺术形式有快板、快板戏、活报剧、歌咏、诗朗诵、歌剧、话剧，还有特别应该提到的四百多人的黄河大合唱和下庄村剧团一百多人的宪政舞。

黄河大合唱是乡艺全体教职员共同表演的，在毕业前一个星期才决定。通知下去总共练习了四、五天，两校总的集中练习只有一次，虽然时间很短促，但总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完成了。而演出的独唱都由学员担任，成绩之好出乎我们预料，使人们相当惊奇。

这四百多人的大合唱，主要是乡村里的群众演唱的，不但在边区是第一次，就是在其他地区，也很少见。

宪政舞是反映民主运动的，由将近百多名下庄老乡们表演的舞蹈，参加跳舞的真正的是一些老大爷、老大娘、小脚妇女、青年、儿童。当乡艺同学正要带着艺术到乡村去时，这个舞和黄河大合唱的同时演出，充分地说明了民众是英雄，他们有高度的艺术接受能力和创造性，使同学们有了充分的信心回去开展乡村艺术运动，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

乡艺第一期同学毕业了，紧张的学习生活至此告一段落，他们学习了怎样使用艺术武器为抗日服务，学习了革命艺术工作者应具备的优良作风，学习了怎样领导和组织乡村剧团，带着学习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方法到大众中去，到工作中去，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

(十)

为了帮助乡艺同学回去开展工作，为了克服过去乡艺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对于这些学员如何配备、总的领导怎样建立等许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和县里商量。于是我们在同学们回县的时候，也把两校的教员，每县都配备了几个，和他们一同出发到

各具去。

当时正是宪政运动到处热烈开展的时候，县里知道他们要回来了，都已计划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合这个任务。所以一离开学校回到县里，他们就走上战斗岗位。使用自己的武器了。

因此，在同县还没有分配工作之前，同学们都根据该县的环境，组织了乡艺工作队、剧团以及到游击区活动的突击队、活动小组，在宪政运动宣传当中广泛地进行乡村艺术运动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剧运。这个时期他们的任务是：

首先把各县已有的剧团加强、健全起来，使它发挥出应起的作用。没有剧团的帮助建起来。一个村有几个剧团的合并统一起来，做到一村一个剧团。并为加强他们在艺术上的领导，以集体的力量解决困难，还建立了戏剧站、联合戏剧站、戏剧分站等。

其次，目前的中心工作是宪政运动，要积极配合这次运动，作广泛而深入的宣传鼓动，造成民选的热潮，同时一切活动也都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第三，为了加强同学间的联系，团结乡村艺术工作者，开展乡村艺术运动，就要在工作中加强对同学会的关心、爱护，健全同学会的组织。

这次工作中，各县乡村剧运都在乡艺同学的努力之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就是在游击区，我们的同志也化妆和乡艺同学所组织的突击队在那里撒下艺术的种子，在离敌人五、六里的据点附近演出，帮助成立剧团、歌咏队，游击区也到处听到宪政的歌声了。

在工作中，他们除了演戏、写标语、画漫画、出壁报、教歌之外，还召开联欢晚会、群众大会、干部会、政治报告会、艺术问题的讲演会，组织和领导化妆讲演或表演秧歌舞，帮助区里布置竞选会场，区代表成立大会会场，帮助村剧团演出，举行了村剧团干部流动训练班，到处作广泛的宪政运动宣传，尽他们自己的能力，发挥了艺术的作用，发挥了乡艺同学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的精神，发挥了他们在工作中的计划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

性。不但在他们演的戏、写的标语、画的画、唱的歌这些方面使一般人感到惊奇，就是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上，也给他们所接近的群众以良好的印象。因而所到之处，对他们的反映都很好，并且大多数被选为本区、本县或本村的戏剧站长、剧团团长，积极开展和推动着当地的乡村剧运。

(十一)

第一期组训工作从准备时期一直到训练班结束以及和同学们一起到各县去，差不多五个多月都是在一贯紧张的教学做统一的生活中过去了。中间虽然没有休息，但是并没有谁感到疲累，都为这艰巨的“把艺术大众化”的事业的热情所鼓舞、所感动，当我们在自己的努力下亲眼看见一些来自乡村里的男女农民，由不懂艺术经过很短时间的学习，就能初步地掌握、使用艺术这个武器，使“艺术和大众相结合”为抗日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时候，我们才心地踏实，感到无限欣慰。

这条事业的路还很长，然而我们已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开办第二期，第三期……

回到绥远

我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将近五年——从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主要做党的工作，后两年担任了支部书记。虽然前后兼任过文艺组长，救亡室主任，秘书等职，实际上都是为了做掩护，以便更好地进行党的工作。因此，主要把精力放在党的工作上，没有在写作上下功夫，写得东西也就少了。只是在晋察冀分局和边区政府有什么重大的号召，以及分散参加中心工作时，也写了一些诗和歌词，发表在《诗建设》和《歌创造》上。在反扫荡时，和美术组的同志出过“诗与画”。有几首歌词曾在边区文联及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军民誓约运动征文”评选中得过奖。有的写得虽很一般，但从宣传动员工作的角度上说来，在当时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如“这是我们献身的时候”，歌词是：

我们青年的岗位在前头，
我们青年的岗位在前头，
人民和强敌艰苦的战斗，
祖国向我们热烈的招手，
这是我们献身的时候，
这是我们献身的时候。

一切服从于抗日的要求，
一切服从于抗日的要求。
今天为民族永远的自由，
爱情和生命都放在背后，
这是我们献身的时候，
这是我们献身的时候。

(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八月《歌创造》第五期)

这首歌在动员参军时，曾在有些地区流传、歌唱。建国后，自治区教育厅高教局的一位副局长，是阜平人，看到“劫夫歌曲选”上有这首歌，歌词署名叶频，她说：“原来这首歌词是你写的，我们当时到处教唱这支歌呢。”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延安之前，一九四三年五月，我和一部分同志被留下，调到地方上工作，先后到行唐、灵寿、广灵等县做党的宣传工作。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张家口、宣化解放，我又被调到宣化县委任宣传部长。于是，我又开始摸索做新解放区和城市宣传工作了。当年地委在天镇县城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我于会后返宣化时，途经张家口，下火车到医院看望正在生孩子的我的爱人徐濛，顺便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看看陈守忠同志。大陈同志对我说，现在正准备抽调一批干部到东北，同时绥远的一些老同志苏谦益、郑天翔、杨叶澎等同志说绥远干部很缺，当地干部更少，他们希望绥远的一些同志能回绥远去。大陈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是回绥远、还是到东北去？当时，我想自己是绥远人，亲自参加解放自己故乡的斗争更有意义些。于是我表示同意回到绥远。回宣化后不久，便接到分局的通知调我到绥蒙区党委报到。这样，我一九三八年从五原经临河、伊盟到延安学习，当年就又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工作了八年。日寇投降后，又从晋察冀的宣化，调到当时已经解放了的丰镇县。整整转了一个大圈子，最后，终于又回到了绥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五辑 - - 塞北文苑萍踪

作者 =

页数 = 2 5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